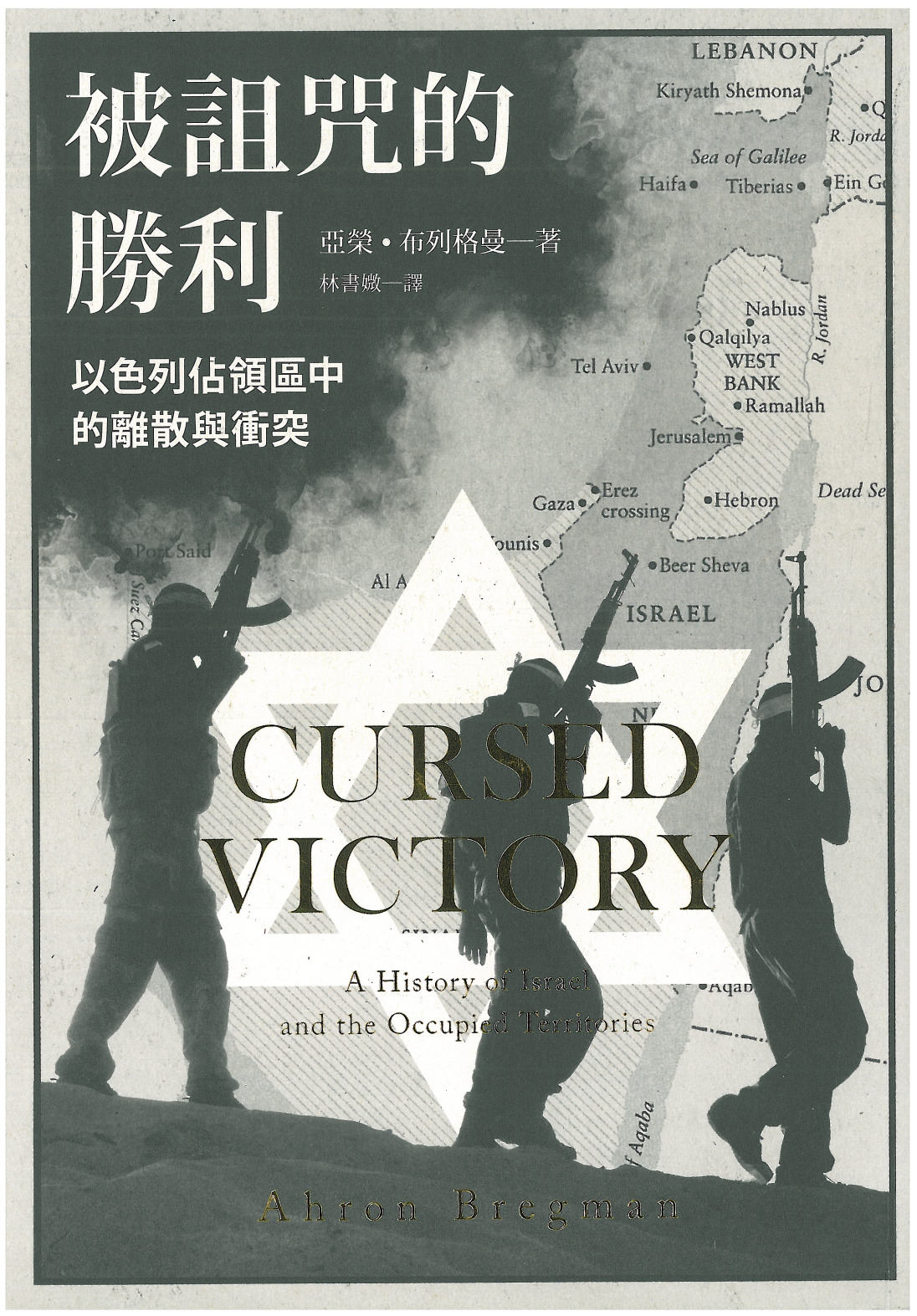
被詛咒的勝利

亞榮・布列格曼—著
林書嫩—譯

以色列佔領區中的離散與衝突



CURSED VICTORY

A History of Israel and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Ahron Bregman

了解中東紛爭與以巴衝突的第一手完整情報
從六日戰爭到黎巴嫩戰爭，
完整披露以色列在佔領區的軍事鎮壓

前以色列軍官分析以色列如何從離散的
猶太民族成為強權的武裝國家？
解析背負悲情創傷的民族如何加劇中東的
戰火硝煙、難民的流離失所？

1967 年 6 月 5 日，以色列決定對敘利亞、埃及、約旦等國開戰，並驚人地在六天內佔領加薩走廊、西奈半島、戈蘭高地、西岸與阿拉伯屬東耶路撒冷。自其於 1948 年建國以來，阿拉伯人認為以色列佔據了他們的家園，因此無論是南邊的埃及、東部的約旦，還是北部的敘利亞，都不斷地和以色列相互攻擊。在「六日戰爭」之前，鑑於猶太民族過去經歷大屠殺的歷史，以色列一直被西方國家視為悲情的受害者。但這場戰爭改變了一切，「受害者」搖身一變成為「佔領者」。以色列對佔領區人民的軍事鎮壓及對阿拉伯人的迫害，使這場勝利從被賜福的光榮時刻，逐漸成為「被詛咒的勝利」。

布列格曼曾服役於以色列國防軍，並親身參加 1982 年的黎巴嫩戰爭。他憑藉親身觀察與第一手情報，依循著以色列佔領地政策的曲折經歷鋪陳敘述。他帶領讀者認識以色列對西岸、耶路撒冷、加薩走廊、西奈半島、戈蘭高地的佔領，佔領區內巴勒斯坦人的動亂與起義，以及以巴走走停停的和平協商。四十多年來這蜿蜒曲折的經歷，不但擺盪在兩股背道而馳的驅力之間，更決定了活在佔領區中數百萬平民的命運。衝突及錯誤的累積造成仇恨，也造成以巴兩國人民的悲劇，在「寧要土地，不要和平」的堅持下，這場中東衝突的主角該如何全身而退？

9 789570 846485 00450
ISBN 978-957-08-4648-5 NT$450
建議分類：世界史／中東史

作者

亞榮・布列格曼 Ahron Bregman

1958年生於以色列，曾服役於以色列國防軍，於1978年的利塔尼行動及1982年的黎巴嫩戰爭中，以砲兵軍官身分參戰，並被晉升為上尉。退役後，他於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就讀國際關係及政治學。1988年在以色列《國土報》的訪問中，宣稱將拒絕在以色列佔領區內擔任後備軍人，旋即離開以色列並定居英國。之後取得倫敦國王學院的軍事研究博士，並任教於此。著有《五十年戰爭：以色列和阿拉伯人》（*The Fifty Years: Israel and the Arabs*）、《以色列的戰爭：1947以來的歷史》（*Israel's War: A History since 1947*）、《以色列的歷史》（*A History of Israel*）及《稍縱即逝的和平：聖地如何擊潰美國》（*Elusive Peace: How the Holy Land Defeated Ame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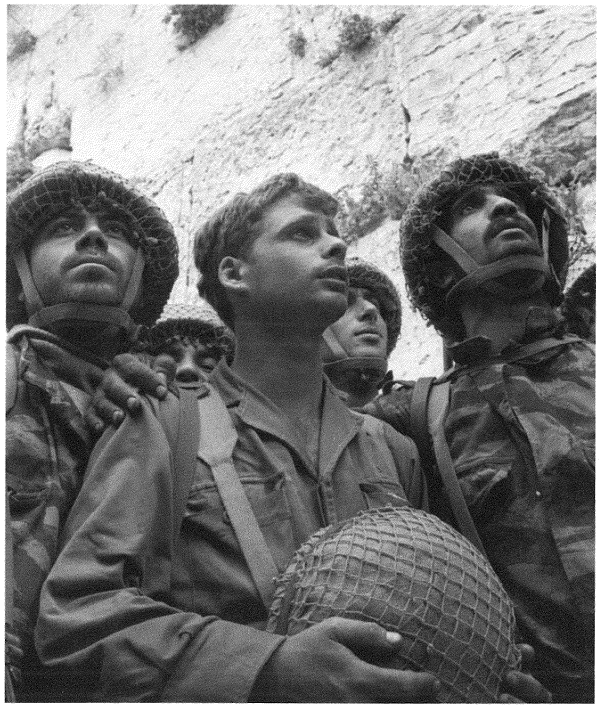
譯者

林書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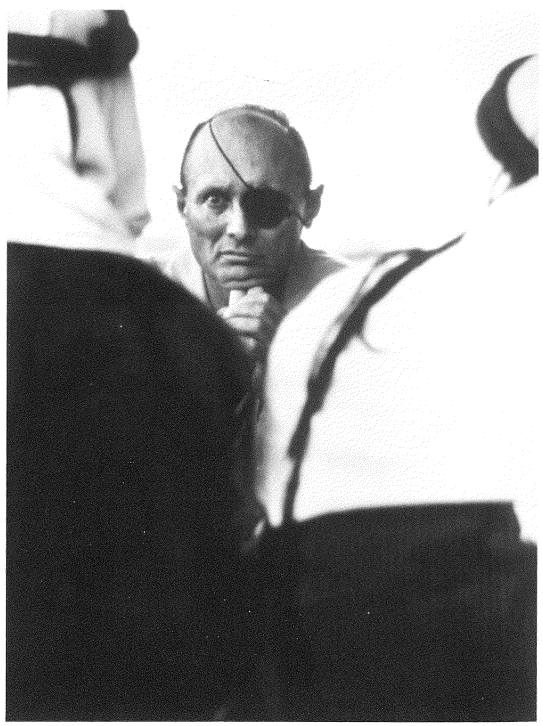
台大外文系、中央法文所畢業，目前就讀於康乃爾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班。譯有泊硯（Erik Bordeleau）的〈不透明性的關照：論蔡明亮「保守」的電影姿態〉（《變／遷／留／轉：視域之徑》）、〈「在場」的如夢似劇：黃明川電影二三事〉（《如夢似劇：黃明川的電影與神話》）等。

Cover design by 高偉哲 | www.kaoweiche.com

Cover photo © 達志影像/Corbis



圖一　三位以色列傘兵抬頭望向猶太教最神聖的地方——哭牆。1967年6月的六日戰爭後，此地便被以色列佔領。這張照片成為猶太—以色列歷史中輝煌的一刻，但是起先看來是被賜福的成功，很快便演變為被詛咒的勝利。



圖二　以色列的國防部長摩西・達揚，也是對佔領區命運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六日戰爭後，他在接近耶路撒冷的蓋蘭迪耶（Qalandiya）難民營與巴勒斯坦人會晤。

圖五　以軍在撒馬利亞地區搜查巴勒斯坦反抗運動者。而幫助以軍指認嫌犯的通敵者，頭罩麻布袋，以防被巴勒斯坦同胞認出。他們被以色列人戲稱為「猴子」。

圖六　1982年4月，以色列將西奈還給埃及之前，以軍進入其屯墾區之一的亞米特區，強迫那些設障將自己封住、拒絕離開的猶太屯墾者遷出。

圖三　1967年戰爭的最後兩天，當以軍長揚直入戈蘭高地時，數以千計的敘利亞難民盡可能地將家當帶在身上，逃離高地。

圖四　終戰後，一小群戈蘭德魯茲人獲准留在戈蘭，因以色列相信他們會對以國效忠。由於與身居敘利亞的朋友、家人的往來通路遭切斷，留在原地的德魯茲人往往攀上戈蘭佔領地的山丘，使用擴音器向在敘利亞一端的家人們高聲呼喊。

被詛咒的勝利

以色列佔領區中的離散與衝突

亞榮・布列格曼—著　　林書嫩—譯

CURSED VICTORY

A History of Israel
and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Ahron Bregman

圖七　自1987年以來，巴勒斯坦人已經忍無可忍，愈來愈傾向與以軍正面衝突反抗佔領。2002年2月15日，在西岸的拉馬拉，一名巴勒斯坦男孩向以色列坦克投擲石塊。

圖八　巴勒斯坦人派遣自殺式炸彈客潛入以色列城市和鄉鎮。

獻給

米莉安・艾希柯爾

Miriam Eshkol

歷史大講堂

被詛咒的勝利：以色列佔領區中的離散與衝突

2015年11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45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　者　Ahron Bregman
譯　者　林書燉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87876242轉211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　話　(02)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198號
暨門市電話　(04)22312023
台中電子信箱　e-mail：linking2@ms42.hinet.net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02)23620308
印刷者　文聯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　話　(02)29178022

叢書主編　梅心怡
校　對　呂佳真
封面設計　高偉哲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4648-5 (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Cursed Victory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by Penguin Books Ltd, London
Text copyright © Ahron Bregman 2014
The authors have asserted his moral right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nguin Book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2015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被詛咒的勝利：以色列佔領區中的離散與衝突

Ahron Bregman著．林書燉譯．初版．臺北市．聯經．2015年11月（民104年）．444面．14.8×21公分（歷史大講堂）

譯自：Cursed victory: a history of Israel and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ISBN 978-957-08-4648-5（平裝）

1.猶太民族　2.國際衝突　3.中東

735　104022140

目次

地圖 8

資料來源紀要 15

作者誌 17

導論 23

關於佔領 31

第一部

第一個十年（一九六七～一九七七）

1 西岸與耶路撒冷 39

2 加薩走廊 99

3 戈蘭高地 116
4 西奈 134

第二部
第二個十年（一九七七～一九八七）
5 利庫德年代 151
6 黑色十二月（一九八七） 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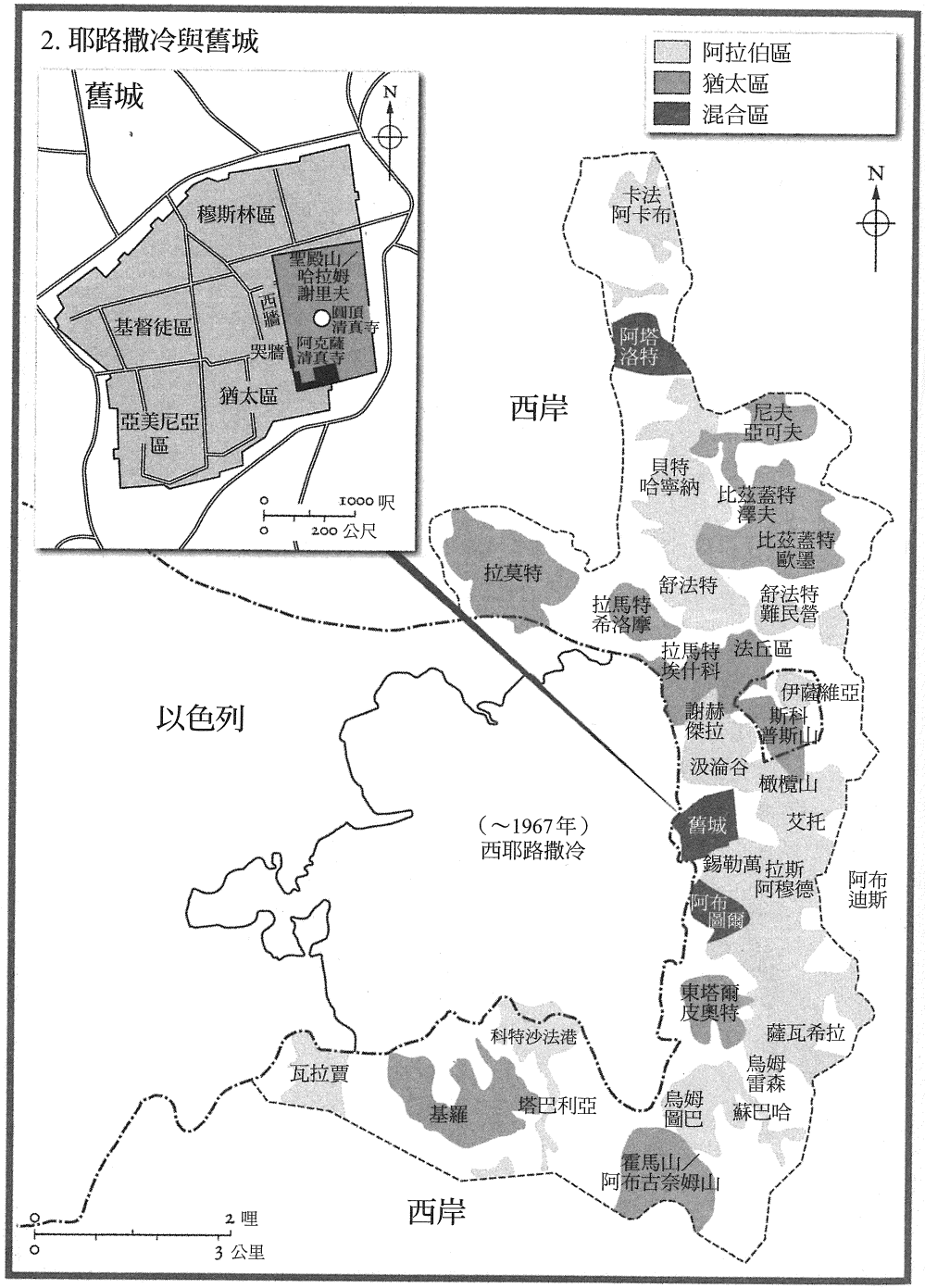
第三部
戰爭與外交（一九八七～二〇〇七）
7 起義 199
8 波灣、馬德里、奧斯陸（一九九一～一九九五） 221
9 錯失良機（一九九五～一九九九） 247
10 戈蘭優先（一九九九～二〇〇〇） 264
11 大衛營Ⅱ（二〇〇〇） 283
12 阿克薩起義（二〇〇〇～二〇〇一） 319
13 夏隆與阿拉法特（二〇〇一～二〇〇四） 343
14 單向主義和其獎賞（二〇〇四～二〇〇七） 368

進入佔領的第五個十年 3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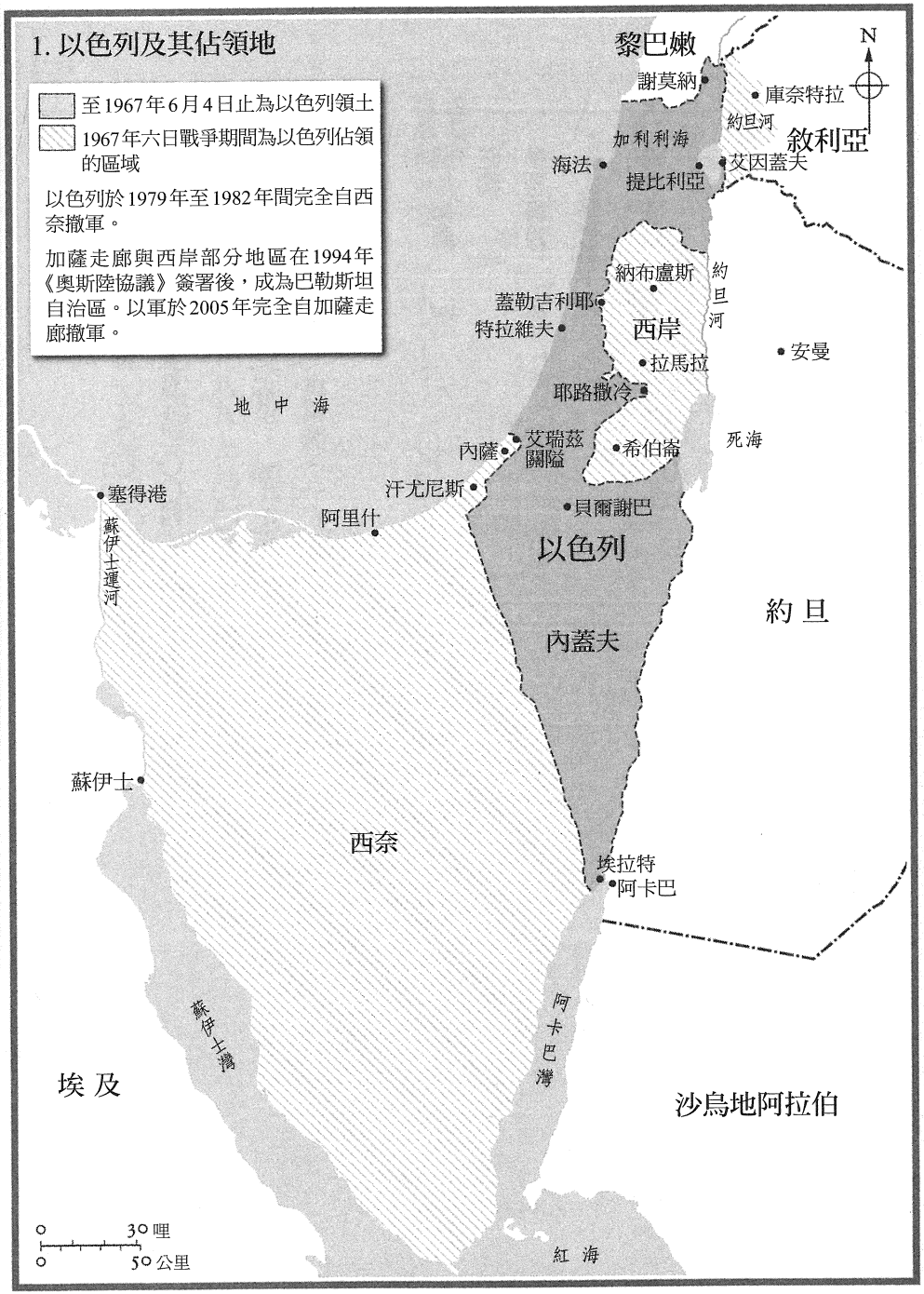
後記 389

圖片來源 397
註釋 432
參考書目 4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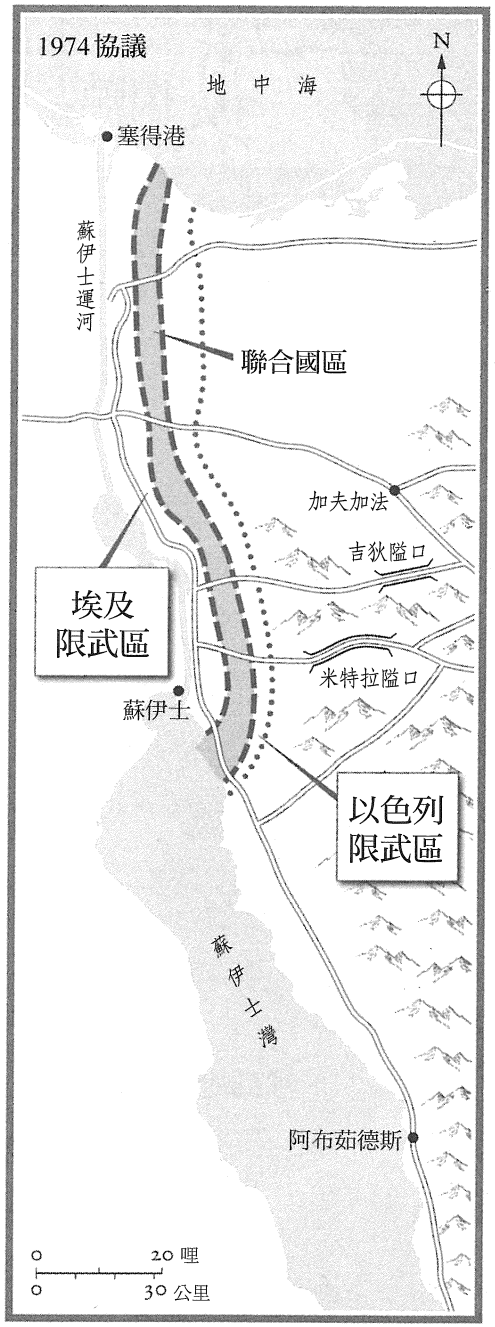
2. 耶路撒冷與舊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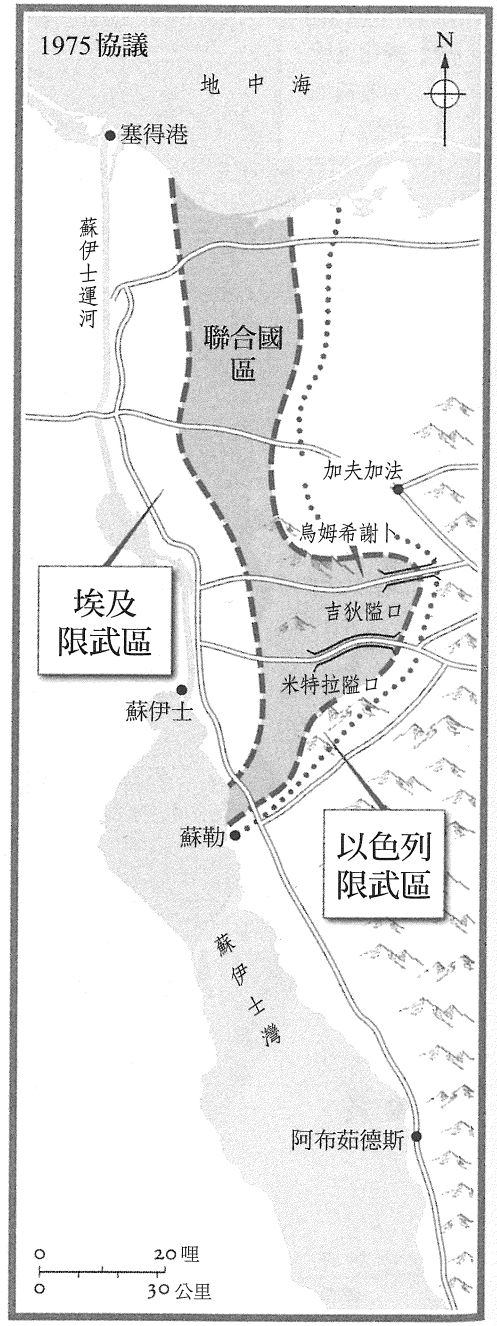


1. 以色列及其佔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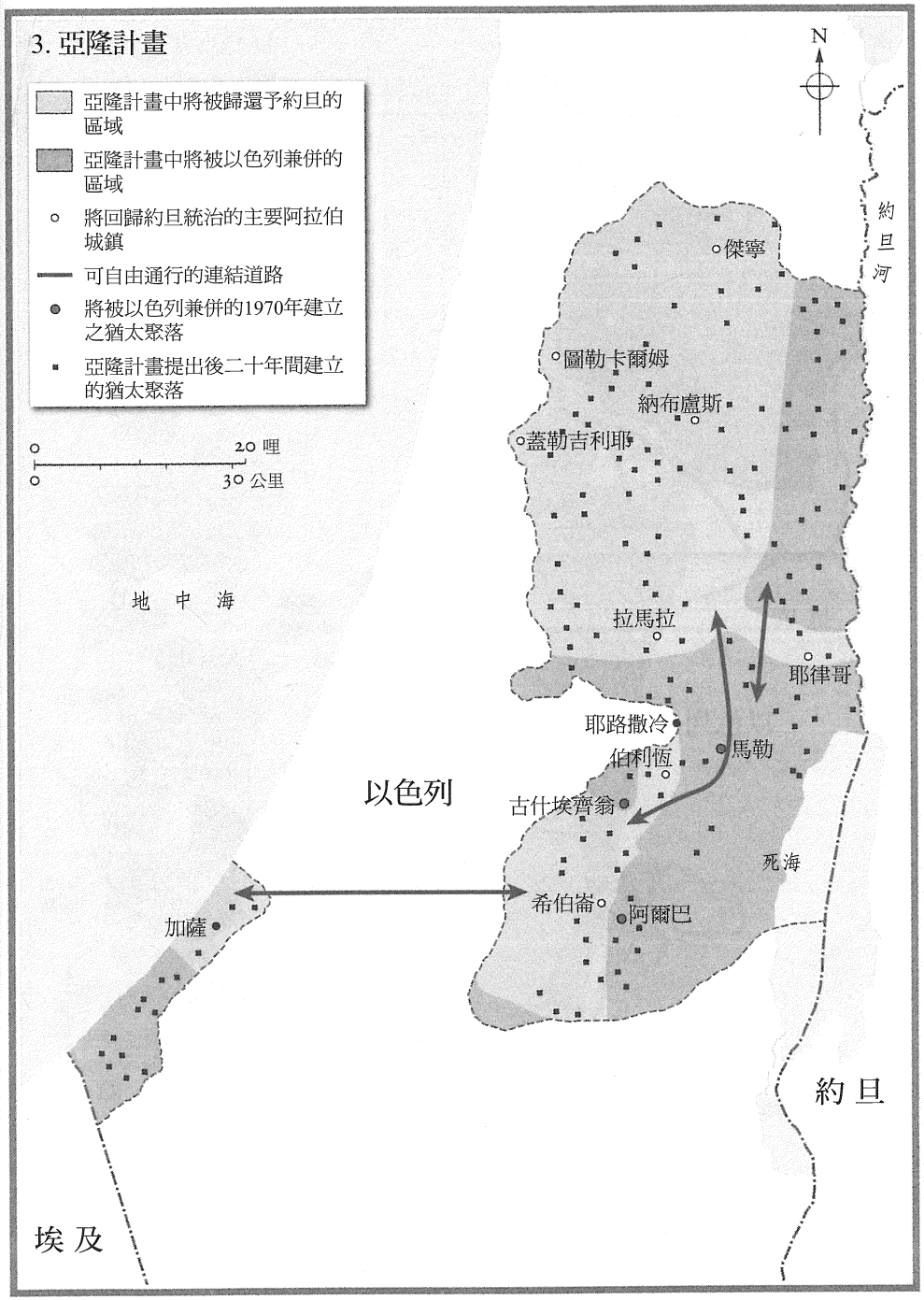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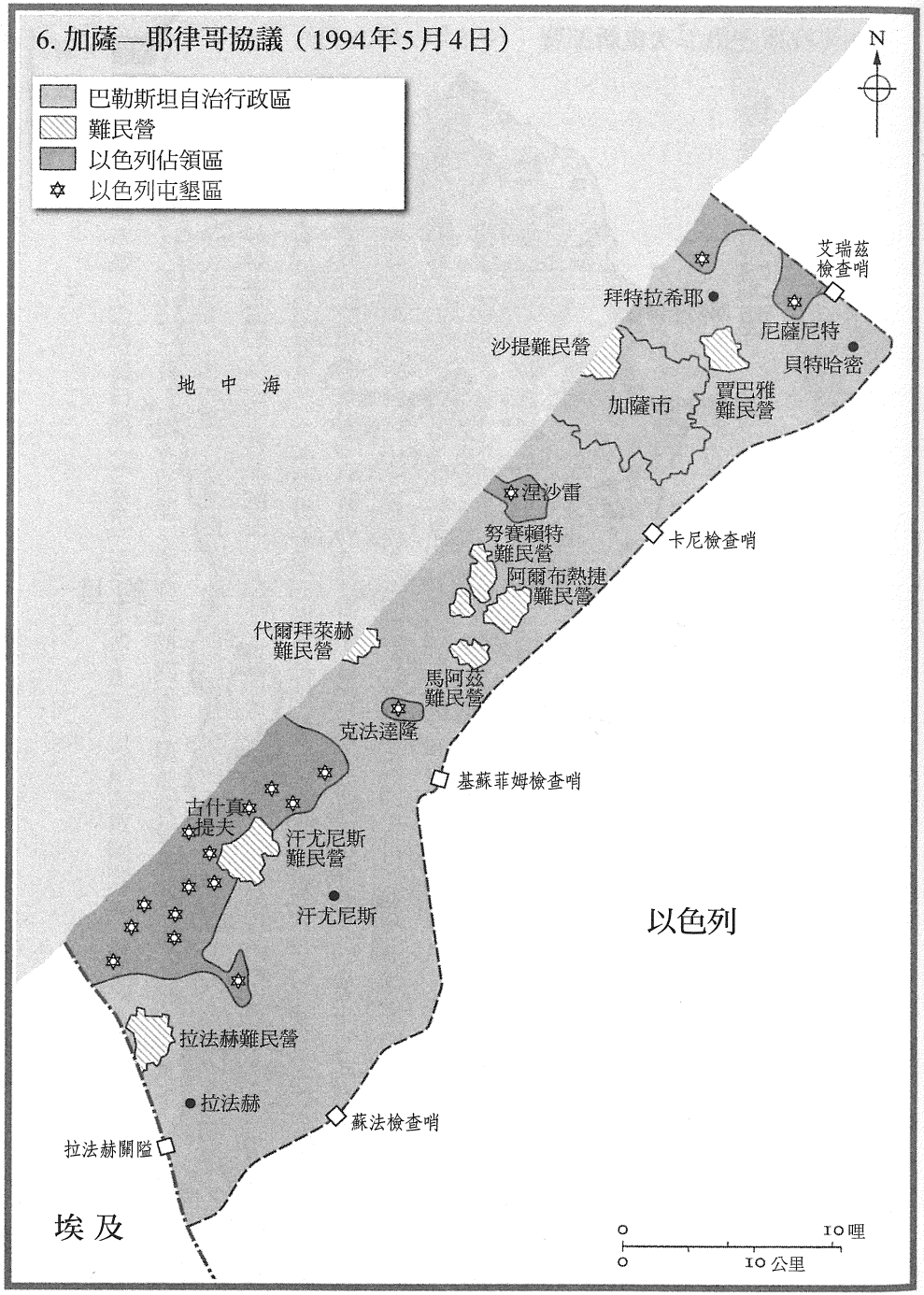
4. 西奈撤離協議（1974、1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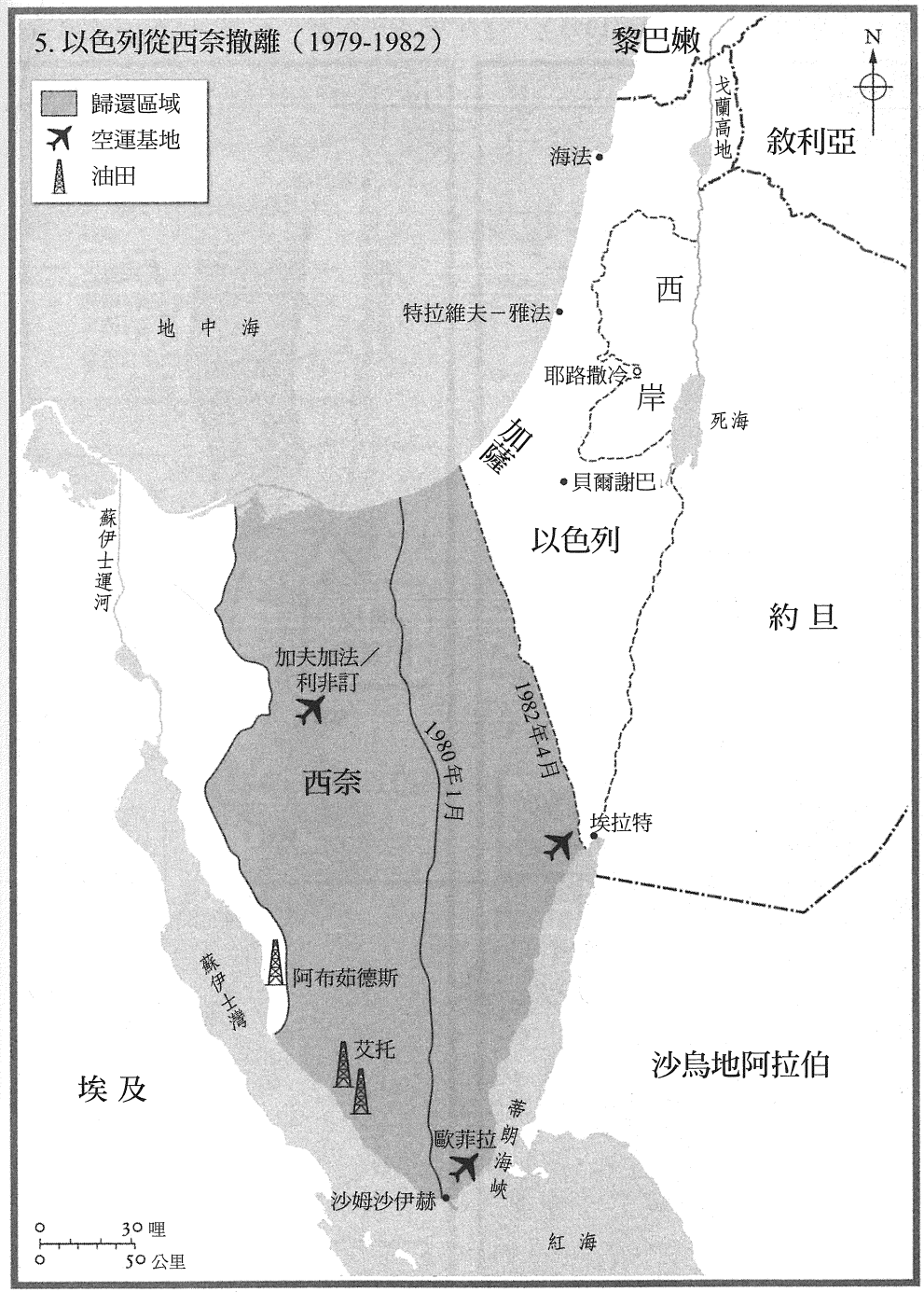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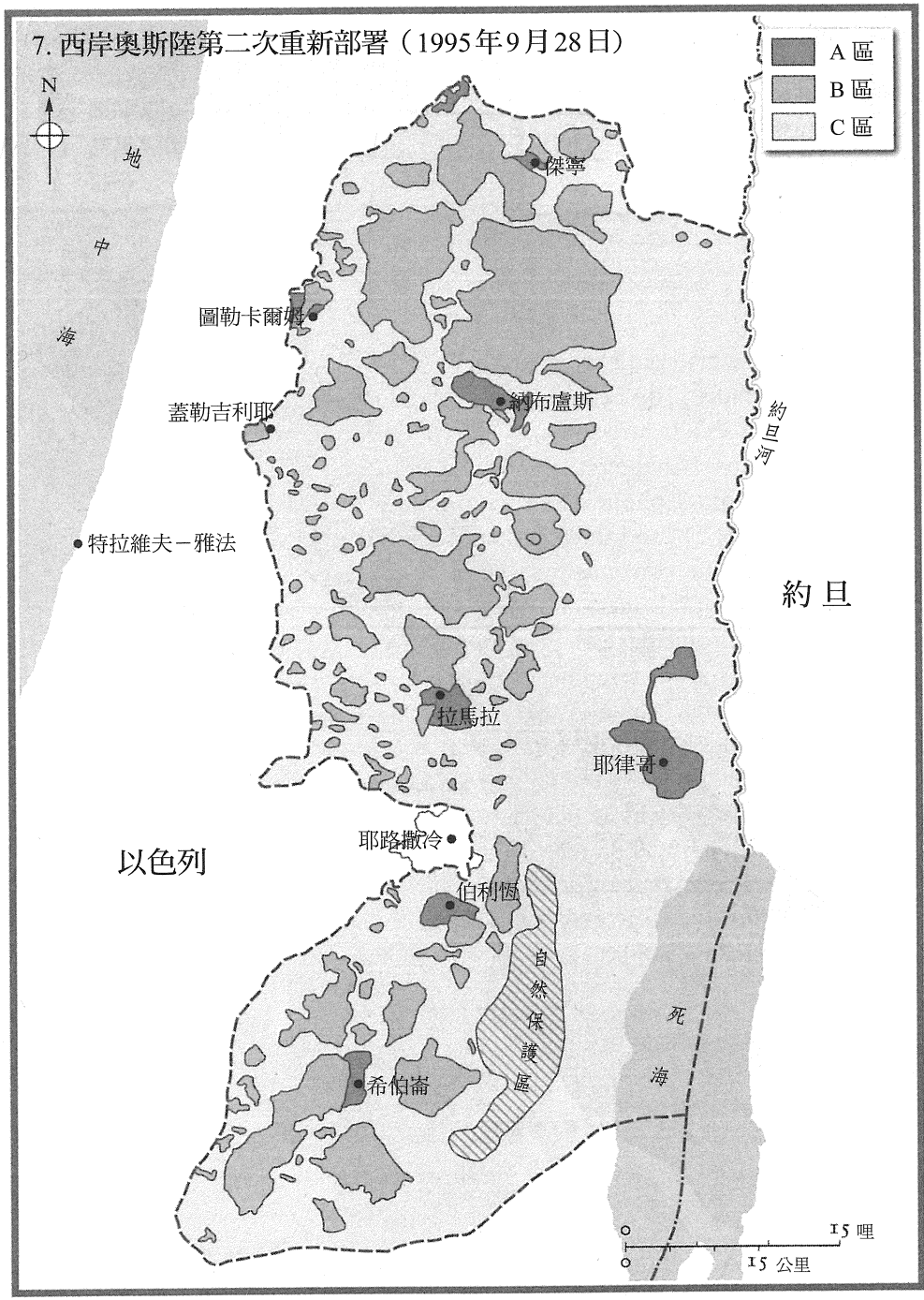


3. 亞隆計畫




6. 加薩—耶律哥協議（1994年5月4日）
巴勒斯坦自治行政區
難民營
以色列佔領區
以色列屯墾區
N
地 中 海
艾瑞茲檢查哨
拜特拉希耶
尼薩尼特
貝特哈密
沙提難民營
賈巴雅難民營
加薩市
涅沙雷
努賽賴特難民營
阿爾布熱捷難民營
卡尼檢查哨
代爾拜萊赫難民營
馬阿茲難民營
克法達隆
基蘇菲姆檢查哨
古什真提夫
汗尤尼斯難民營
汗尤尼斯
以色列
拉法赫難民營
拉法赫
拉法赫關隘
蘇法檢查哨
埃及
10哩
10公里


5. 以色列從西奈撤離（1979-1982）
歸還區域
空運基地
油田
N
黎巴嫩
戈蘭高地
敘利亞
海法
西
岸
特拉維夫－雅法
地 中 海
耶路撒冷
死海
加薩
貝爾謝巴
以色列
蘇伊士運河
約旦
加夫加法／利非訂
1980年1月
1982年4月
西奈
埃拉特
阿布茹德斯
蘇伊士灣
艾托
埃及
沙烏地阿拉伯
蒂朗海峽
歐菲拉
沙姆沙伊赫
紅 海
30哩
50公里



資料來源紀要

我在本書當中、尤其是第九至十四章所使用的某些資料，例如「最高機密」備忘、信件與報告，過去均從未公開過，且未來短時間內也不大可能公開。特別是第十章直接引用了敘利亞官員在美國參加協商的過程中，與其家鄉當權者的電話交談內容，以及美國總統與其他世界領導者的電話交談，這些都是以色列特務使用多種電子設備秘密竊錄下來的。為了保護我的資料提供者，我經常避免提及與他們相關的眾多指涉性資訊。同樣地，為了保護他們，許多人的身分都是捏造的。

我將本書的重點放在二十年來我所做的個人訪問，特別是在我擔任BBC/PBS電視系列節目的聯合製作人兼學術顧問時所進行的訪問：《五十年戰爭：以色列與阿拉伯人》（*The Fifty Years War: Israel and the Arabs*）共六集，及其續集《以色列與阿拉伯人：稍縱即逝的和平》（*Israel and the Arabs: Elusive Peace*）共三集。目前，完整的訪問逐字稿被收藏在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李德・哈特資料館（Liddell Hart archives），可供大眾閱覽。

作者誌

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在驚人的六天內佔領加薩走廊（Gaza Strip）、西奈半島（Sinai）、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西岸（West Bank）與阿拉伯屬東耶路撒冷（Arab East Jerusalem）時，我年僅九歲。我還清楚記得，我們第一次的家庭旅遊是到剛被佔領的東耶路撒冷。我們家靠近特拉維夫（Tel Aviv），我們先從那裡搭火車到以色列屬西耶路撒冷（Jewish West Jerusalem），然後坐一段短短的計程車到雅法門（Jaffa Gate），在我們將以色列的里拉幣（lira）兌換成約旦的第納爾（dinar）之後，從那邊走進了舊城（Old City）。

顏色！這就是我首次造訪耶路撒冷的記憶。一切是如此色彩繽紛：廣場上有著形形色色的阿拉伯攤販，戴著他們的阿拉伯頭巾（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真正的」阿拉伯人）；甜品店銀托盤中裝著滿滿的庫納法（*Kunafa*），一種用精緻麵條做成的甜點，裡頭塞滿白乳酪、浸潤著糖漿；木製的手推車上滿載著新鮮的水果和蔬菜；卡克（*cakh*）是裹著芝麻粒狀似甜甜圈的麵包捲，它常與渣塔（*za'atar*）——一種用阿拉伯報紙包起來的混合香料一起賣；那宏麗的圓頂清真寺，它金色的圓頂閃

燦照耀著聖殿山（Temple Mount）。脫下鞋子後，我們走入了神殿，我仍然記得那裡的涼爽與寧靜，記得腳下踩著的厚地毯、寫在牆上的阿拉伯文可蘭經，以及四處可見的虔誠信徒時而跪下、時而鞠躬、時而起身進行禱告。然後到了西牆（*Kotel*），好幾個世代的猶太人曾經在這裡禱告，而我也在一張小紙條上寫下我的心願，將它塞入西牆石縫中。在牆的上方不可觸及之處，在古老的石頭上野草發芽茁長，鴿子也在上面築巢。在我們走過狹窄的鵝卵石巷弄和舊城的蹊徑時，我握緊父親的手，睜大眼睛環視周遭，爬上牆偷偷窺視隱蔽之處，圓頂、石穹頂、紅磚屋頂、尖頂、砲塔、教堂尖塔，植在舊錫罐中的茉莉、金盞花、天竺葵，和教堂的鐘聲。暮色降臨時，我們從一個高而平緩的屋頂上看著耶路撒冷變成金黃色。雖然城牆上滿是子彈刻出的傷痕，但它並沒有讓我們覺得這是佔領。就像是到了國外，到了異國土地，像活在夢裡一般。

十年或更久之後，我才開始面對佔領的現實。在我成為一名以軍的年輕軍官時，我被派遣去巡邏加薩的街道。那毫無掩蔽的穢物、未鋪設的泥地街道、腐敗與惡臭、齜牙咧嘴的狗在黑暗的巷弄間狂吠、（超大的）老鼠在垃圾中穿梭，以及，最重要的，當地人們所展現的赤裸裸敵意使我極度震驚。那是我第一次覺悟到，**我**實際上是一個佔領者，而**他們**是被佔領者，不論我喜歡與否，我軍靴底下踩著的，都是佔領地。

十多年後，我成為一個市民與後備軍官，我在尼泊爾的加德滿都放蜜月長假時，再度發現佔領地燃燒著熊熊戰火；這場戰爭很快地將會得到它響亮至今的名號：起義（*intifada*）。而在這遙遠浪漫的城市角落，一家小店中，我看到一張以色列軍人以來福槍柄毆打巴勒斯坦示威遊行者的照片，

我的髮根豎直了起來。這張照片令人悲痛：巴勒斯坦人向上看著以色列人，而這位以色列軍人高舉他的來福槍往下看。我從加德滿都寄了一封信給以色列報紙《國土報》（*Haaretz*）的編輯，批評以色列人——我的同胞、我的朋友，控訴他們對巴勒斯坦人犯下如此殘暴的罪行，這是世界上眾多其他族群曾經施加給猶太人的。我的岳父是拉特維夫大學的教授，他在不知道我寄了此信的情況下看到了報導，立即打電話向編輯抗議。他說他的新女婿，一個一九八二年黎巴嫩戰爭的老兵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並要求對方道歉。編輯回答：「教授，那封信現在就在我面前，我可以告訴你，我什麼都沒改就送印了，頂多只改掉一個逗號。」

我在信中寫道，在殺戮結束之前，我不會返家。但是到最後，我無處可去了。我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書店撞見了我的一位記者朋友，他抬了抬眉毛問：「是嗎？那你現在在這兒幹嘛？」我沒有回答。但我說，若被軍隊傳喚到佔領地去履行義務，我會明白拒絕。大約一週後，他將這席對話發表在《國土報》週末副刊中，標題為：「榮尼．布列格曼首次拒絕」[1]（'Ronnie Bregman refuses for the first time'）。我頓時感到，如同琳達．葛蘭（Linda Grant）筆下《猶在》（*Still Here*）的主人翁約瑟夫對越南所做的事情——戰爭是錯誤、不道德的，也是一個恥辱。[2]我不能夠變成他的一部分，因此和約瑟夫一樣，我覺得在這瘋狂的事情結束之前，我必須找到另一個國度，到那裡生活。就我的案例而言，移民到國外可以把我從可預見的前途堪虞中解救出來，避免因拒絕服役——這種在起義前罕見的叛逆行為——而被送進監獄。因此不久後，我搬到了英國，現在我仍然住在那裡。

不論是多麼嚴謹的歷史學家，任何作者都無法將作品與自己的經驗、興趣、品味截然劃分開來，因而我確定本書必然背負著一道印記，亦即，無論是在近如以色列的第一手經歷，還是遠從英格蘭所報導的事件，作者既是當局者，也是旁觀者。如同讀者會看到的，我對於佔領的明確態度和犀利批評，相信會被我的以色列同胞視為賣國行為。寫這本書讓我得以重新省思我所經歷過的年代，並且質疑那些我一直以來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如同其他作者，我必須決定要含括什麼、刪除什麼：在這麼做的時候，我試圖剔除我的個人情感，盡量客觀忠實地專注於我認為是關鍵轉折點和重要事件的地方，我相信歷史會證明它們值得受到重視。

一路上我受到許多人的幫助。首先感謝丹尼爾・布列格曼（Daniel Bregman）和湯姆・饒（Tom Raw），他們以如鷹般警醒的眼睛閱讀這些文字；感謝尼爾・雷西西（Nir Resisi）博士提供西奈半島的資訊，感謝阿隆・那坦（Aharon Nathan）對於一九五六年戰爭後以色列政府在加薩的精彩洞見，感謝拉比斯・希維亞・羅斯柴爾德（Rabbis Sylvia Rothschild）和希比爾・舍理頓（Sybil Sheridan）檢視我的聖經引言，感謝伊恩・思科比（Iain Scobbie）對於以色列佔領之合法性所做的有用評論。我親愛的朋友諾瑪・派西（Norma Percy）說，那位虛構的布萊恩・拉平（Brian Lapping）也幫了一點忙；事實上他幫助極大，因為他建議將這本書的標題名為：「被詛咒的勝利」。我有幸遇到一位盡心盡力的研究員丹尼拉・里切多瓦（Daniela Richetova），他提供了珍貴的幫助，蒐集個人見證，為這些被敘述的事件增添了人性的面貌。我也應該感謝我國王學院的學生們，選修我在戰爭研究系開設的關於佔領的碩士課程，我在你們身上學到了很多，希望我能夠給予你們的亦同。在英國的企鵝出版社，我想要感謝史都華・博費特（Stuart Proffitt）接受我的構想——寫作一本關於以色列佔領的書，並且感謝他如聖人一般耐心地等待我的最終定稿。感謝我的主編蘿拉・史狄克尼（Laura Stickney）在著作早期提供的機敏評論與洞見，她對於作品的建議使得此書的文字進步卓著。感謝我的版權編輯馬克・漢德思禮（Mark Handsley），責任編輯理查・度蓋德（Richard Duguid），他也編製了我在企鵝出版社的前一本著作。我將這本書獻給米莉安・艾希柯爾（Miriam Eshkol）——以色列前總理勒維・艾希柯爾（Levi Eshkol）的夫人，也是我多年的好友。

通常接下來會有這麼一行字：「所有史實或解釋上的謬誤都由筆者承擔」，承載著豐富主題如本書，我要特別強調這一點。

亞榮（榮尼）・布列格曼，倫敦，二〇一四年

導論

本書乃講述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Six Day War）以秋風掃落葉之姿，擊敗約旦、敘利亞、埃及等鄰國聯軍，從此佔領西岸、耶路撒冷、戈蘭高地、加薩走廊、西奈半島等地的故事。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二年間成功達成和平協議後，西奈逐漸歸還埃及，以色列也在二〇〇五年八月自加薩走廊撤離軍隊和屯墾區（settlement）；在一九九三年與巴勒斯坦人峰迴路轉的奧斯陸和平協議後，以軍陸續從西岸撤離。然而在本書付梓之際，西岸、阿拉伯屬東耶路撒冷、戈蘭高地的大部分區域，仍然處於以色列的嚴密控制之下。

以色列於一九六七年取得的土地，因政治色彩差異而有不同的稱呼：「巴勒斯坦」（Palestine，支持巴勒斯坦者使用）、「佔領區」（occupied territories，左翼普遍使用）、「解放區」（Liberated Territories）或「朱迪雅—撒馬利亞區」（Judea and Samaria）（右翼猶太人使用），此外尚有「行政區」（Administrative Territories）、「綠線外的領地」（Territories beyond the Green Line）等稱呼；純粹為了方便或持觀望態度的人，乾脆直稱之為「領地」（Territories）。以色列對這些地區的軍事奪

取在他處已廣為報導，在此不再贅述。[1]然而，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至十一日之間的六天是一個轉捩點，以色列在西方大眾觀點中，從受阿拉伯人夾攻的受害者變成了佔領者。就在這戲劇性的幾天內，以色列搖身從大衛變為歌利亞，世人的同情心開始從以色列人轉向新的落水狗——也就是以國佔領地的人民。有鑑於此，一九六七年偉大的軍事勝利起初彷彿是以色列（也就是猶太人）歷史上被賜福的一刻，事後卻成為如同本書書名所示——被詛咒的勝利。

以色列將大部分取得的土地歸軍政府管轄，軍官直接統治居民的日常生活，並強調把這些佔領地當作「押金」，作為協商的籌碼，直到阿拉伯人承認以國在中東和平存活的權利，以此公開終結了阿拉伯人以武力摧毀其鄰國的迷夢。[2]同時以色列人民向世人保證，在親身經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殘酷迫害後，猶太人國家會建立一個真正的「開明佔領」（enlightened occupation，希伯來文是「Kibush Naor」）。

但世界各地研究帝國的史學家日益明瞭，所謂開明佔領乃是個矛盾的字眼，「就像一個四邊的三角形」[3]一樣；隨著時間的遞嬗，以國的「開明佔領」漸趨乖戾。如同過去到現在的同類事件一般，以色列人未能理解一個簡單的事實：沒有任何佔領在定義上可以是開明的。佔領者與被佔領者之間的關係總是奠基在恐懼與暴力之上，在羞辱與傷痛之上，在磨難與壓迫之上——一套主奴的制度對於被佔領者而言，終究只能是負面的體驗，此種負面體驗有時對不同意政策、卻必須充當劊子手的佔領方個人亦然。以色列是個如此生氣蓬勃、高度智識的國度，對歷史的傷痛極度自覺，卻步上軍事佔領一途，令人咋舌。及至一九六〇年代末期，世界上的前殖民帝國已在遠離佔領和殖民主

義，以色列人民卻似乎背道而馳。

一九六七年戰爭的二十年後，巴勒斯坦人在加薩走廊和西岸發動起義時，以色列表示震驚。但細究以色列在這些地區出沒的歷史，就知道這次起義並非無跡可循，而是以軍抵達後，層出不窮的抵抗達到了高峰：從一開始，以軍面對的怒火便不只是來自實際發動攻擊的武裝激進分子，也來自平民百姓——學生、教師、律師、工程師、店主、家庭主婦……實際上，巴勒斯坦社會的各個角落從一開始就都以赤裸裸的敵意來迎接以軍。英國《泰晤士報》（*Times*）前駐外編輯艾德華．哈吉金（Edward Hodgkin）在西岸被佔領後兩年踏訪此地，寫道：「這個社會各個階層的人民深切、普遍地憎惡著以色列人」。[4]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五年間，巴勒斯坦佔領區一年有三百五十起暴力抵抗事件記錄在案，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二年間這個數字翻漲一倍，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六年間更上升到三千。起義的前六個月，巴勒斯坦佔領區內的暴力事件達到了驚人的四萬兩千三百五十五起。[5]每日發生的抵抗行動致使以軍愈來愈仰賴高壓武裝來維持佔領，進而導致傷亡人數激增，尤其是巴勒斯坦方面的傷亡。一九六七年六月到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間，每年平均有三十二名巴勒斯坦人因抵抗佔領而遭到殺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到二〇〇〇年九月上升到一百零六人；二〇〇〇年九月到二〇〇六年十二月達到六百七十四人。一九六七至二〇〇六年間有六千一百八十七名巴勒斯坦人遭到殺害，相較之下，有二千一百七十八名以色列人在佔領區內被殺，或在以色列轄區遭巴勒斯坦攻擊遇害。[6]

至於非巴勒斯坦人居住、一九六七年以軍佔領地西奈半島，廣袤的土地上多是沙漠，人口稀疏，在以軍佔領期間相對維持平靜；六日戰爭最後三十個小時內，以軍從敘利亞奪得了戈蘭高地，

因此較能輕易遂行其意志。由於山勢險峻，且以軍先遣隊摧毀了當地多數村莊，迫使居民逃往敘利亞，因此戈蘭的人口遠不如西岸、加薩人口那般眾多而稠密。至於以軍允許留在高地上的戈蘭居民多為德魯茲人（Druze），是穆斯林傳統的一個分支，性情溫馴——至少在佔領的初期是如此。

接下來的故事是關於以色列佔領的政治與操作，我會經常停下來補充、解釋、觀察這部分的敘事史（narrative history）。既有的文獻通常採取主題式切入的方式，而非按時間順序先後進行敘述，敘事史則可以彌補既有文獻出奇的不足。我對敘事史體例深信不疑；傑出的史學家詹姆士．喬爾（James Joll）曾注意到：「提醒讀者事件的先後順序很重要……如同提供一張座標圖，讓讀者可以在狂風暴雨的汪洋中航行」。[7]

我們會看到有三根梁柱支撐著以色列的佔領行為。第一是鎮壓被佔領者的軍事力量，包括軍事命令、任意逮捕、驅逐、虐待、延長羈押等；第二是法律和官僚規章，使以色列得以控制公職任用、就業、遷徙，發放各種區域發展規劃需要的牌照和許可等；第三是地上事實的確立，包括土地徵收、摧毀阿拉伯村莊、建設猶太人屯墾區和軍事基地、安全區、控制水和其他自然資源等。[8]

讀者將會看到，佔領，是個遠比乍見之下更為複雜多面的現象，可以說由兩個圈子所組成：內圈是佔領者與被佔領者每日摩肩接踵的區域；外圈是遠離現場、卻為佔領一事爭戰不休的區域，是政治人物、外交人員、特派記者縱橫捭闔的地方。內圈與外圈並非完全絕緣，它們相互接觸彼此，餵養著彼此：在佔領地上（「內圈」）士兵、武裝派和市民們影響著外圈的聯合國會議廳、高級飯店和電

視台，反之亦然。多少次敏感的政治協商延宕數月，只因為以軍來福槍魯莽發射的一發子彈，或者一顆巴人惡意的自殺式定時炸彈？另一方面，外圈對內圈的影響，沒有比二〇〇〇年在大衛營（Camp David）舉辦的以巴和平高峰會更好的例子了。高峰會的垮台激起巴勒斯坦人強烈不滿，似乎只差一星火花、一個導火線，就可以推動巴勒斯坦人使用生化武器與自殺式炸彈進行大規模暴動（第二次起義），而這個導火線即是當時反對黨領袖艾里爾．夏隆（Ariel Sharon）大剌剌地造訪耶路撒冷。當我在處理被佔領者與佔領者**兩方**時，我的重心必然放在佔領者上，因為以角色天性來說，佔領者通常都是驅動事件的一方。這裡的歷史如同他處，都為勝利者所宰制。同樣地，我試著讓讀者聽到、了解到那些被佔領者的聲音與經驗——更正確的說法是痛苦——藉此將人性的樣貌放入故事中。

我依循著以色列佔領地政策的曲折經歷鋪陳敘述，四十年以來這蜿蜒曲折的經歷，總是擺盪在兩股背道而馳的驅力之間，決定了活在佔領中的幾百萬平民的命運。在天平的一端，以色列政策透過建立猶太屯墾區與植入軍事硬體設備，施行佔領地的實質併吞（儘管並未併吞生活在其上的**人民**）；在天平的另一端，則往往是日漸沉重的國際壓力，或因被佔領者的攻擊引起偶發的政治意念，欲撤離佔領地，或至少撤離一大部分的佔領地。以色列的政治與社會擺盪在這兩股勢力之間，長久處於緊張狀態，有時甚至導致以色列政府同時推進**兩種**政策：提倡和平與撤離的同時繼續建立屯墾區。如同接下來的故事所清楚呈現，以色列在這兩條路線上的優柔寡斷，使得佔領地命運懸而未決，惶惑不安。

另一條貫穿這套敘事的經緯是錯失的先機，這可說是阿拉伯—以色列衝突的真正悲劇所在。在

以色列佔領的前四十年，各方都犯下了些許謀略上的小失誤。這些小錯可以更正，可以淡忘，或者被一連串不斷的事件給擱到一邊。但也有重大的戰略錯誤，把衝突帶向了人們所不樂見、也不能預見的境地，延長了佔領時間，造成雙方不必要的傷亡。其中最重大者，可能是佔領後第一個十年內以色列勞工黨政府（Israeli Labor government）所鑄下的。當時勞工黨政府曾有千載難逢的機會，一勞永逸地解決與巴勒斯坦人的爭端。這個機會出現在一九六七年，以色列戰勝，首度將幾乎整個巴勒斯坦國收歸以色列的控制下，是個當面處理衝突根源的良機，或許能夠對巴勒斯坦人做出一些讓步，給予巴勒斯坦人更有尊嚴的生活、更好的未來希望。這次機會之可貴並不是事後諸葛；當下就有觀察家斷言：「現在就是做決定的時候。」「我們如果不善加利用，機會錯過就不再了。」[9]但在佔領之初的關鍵數年內，進展宛如牛步：一九六七年後做了幾年總理的勒維・艾希柯爾（Levi Eshkol）組成一個又一個委員會來建議最佳路線，而一旦要依照任何一種建議行事時，他卻又迭有疑義。我們只能臆測——也許是因為缺乏自信，並直覺要抓緊這些土地不予歸還；又或者像當時大多數以色列政府官員一樣，他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份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一九六七年戰爭後，艾希柯爾養成了在公開場合比出邱吉爾「V」形手勢的習慣。太太米莉安（Miriam）問他：「艾希柯爾！你在幹嘛？你瘋了嗎？」總理回答：「不，這不是英語裡的『V』手勢。這是意第緒語的『V』手勢！*Vi Krishen aroys?*意思是：『我們該如何全身而退？』」[10]

往後的政府同樣隨波逐流，為事件所左右，未設定一條自己的路線以導向衝突的解決與佔領的終結。政策的制定往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充斥著面對特定事件或壓力下膝反應般的反射動作，

毫無有條不紊的決策過程可言。輿論在此扮演著重要角色：隨著一九六七年大敗阿拉伯的偉大軍事勝利，以色列人民自認所向無敵，不認為有任何理由需要對以國政府施壓，要求歸還那些咸認有助於以色列經濟與其他面向的土地。以色列人無論信徒與否，都反對歸還以色列歷史的搖籃耶路撒冷和希伯崙（Hebron）。[11]我們應該記得總理（在以色列歷史上史無前例地）邀請右翼政黨參加一九六七年的戰時內閣，戰後這些右翼政黨仍歸入總理的陣營，他們強烈反對將最高領導人梅納赫姆・比金（Menachem Begin）定義為「解放」區的領地歸還給阿拉伯人。

一九六七年，以色列並未有來自美方強大的壓力，缺乏撤離佔領地的要求也是重要因素，因為當時美國極具影響力的參議員如羅伯・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雅各・賈維茨（Jacob K. Javitz）和其他議員，均呼籲美國政府不要在阿拉伯政府同意簽署和平協議前對以方施壓撤離。[12]一九六八年競逐美國總統大位的理查・尼克森（Richard M. Nixon）於戰爭後不久便造訪佔領地，並公開支持以軍持續駐紮，聲稱這能讓阿拉伯政權順服就範，同意在「六個月內」進行和平會談。[13]

同樣地，一九九〇年代末曾出現一次結束佔領戈蘭高地的契機，並有機會達成以色列與敘利亞間的和平協議，以國領導人再度沒能走出關鍵性的一步。在第十章，我使用尚未出版的文件證明，敘利亞為了取回被佔領地，願意做出必要的讓步並簽署和平協議，以色列當時卻選擇緊抓著佔領地不放，寧要土地，不要和平。而且，我們會看到更多錯失的良機。事實上，以色列傳奇外交官阿巴・埃班（Abba Eban）說，阿拉伯人從來沒有錯過任何錯過機會的機會，同樣的形容也完全適用於以色列政府。

我將本書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講述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七年十年間的佔領，並進一步依照四個不同的地理區劃分為四部分：西岸（含耶路撒冷）、加薩走廊、西奈半島、戈蘭高地。就眾多面向來說，我理應偏好四個區域一起進行敘述——畢竟在現實生活中，這四個區域的事情是同時發生的，且往往相互影響。但是這十年間事件的總數實在太龐大，特別是被佔領的西岸地區，以至於這種理解的角度可能使讀者淹沒在史實與細節的茫茫大海中。本書的第二部分論及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七年十年間的佔領，結束於巴勒斯坦反對佔領加薩走廊與西岸所引發的動亂與起義槍響中。第三部分含括剩餘的兩輪，一九八七到二〇〇七年，是最為戲劇性的時代，期間，佔領地的「內」圈與「外」圈相互交纏，第一次起義和第二次起義在許多走走停停的協商之間狂嘯怒吼，其最高點在以色列提出的單邊撤離計畫（unilateral disengagement），從巴勒斯坦的某些領地撤出。

我將《被詛咒的勝利》視為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希望能在以色列佔領故事繼續進行時陸續將之添入此書中，我相信不久的將來，佔領必會進入尾聲。目前，我將主要敘事結束在二〇〇七年，最後的重大事件是以色列撤離加薩走廊和四個西岸屯墾區，以及在加薩走廊發生的後續事件，提供了讀者四十年的以色列佔領史。我將此書結束於在二〇〇七後幾年之反思，並思考事情未來可能的發展。

歷史學家威廉．蘭格（W. L. Langer）曾經察覺，一個歷史學家所能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打造一個清楚完好、合乎邏輯的模式，然而事實上，所有事物都充滿著混亂與矛盾。我期許自己，在嘗試給予以色列佔領史一些意義與清晰度的同時，不要扭曲它如此混亂、矛盾和無邏輯的特徵。

關於佔領

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奪取的土地，應該被視為「佔領」嗎？以色列是「佔領者」嗎？為這類問題找到一個確切的答案比一般人想像的困難許多，但是這些答案非常重要，因為如果以色列的確是佔領者，那麼依據國際法，以國對於其所佔領的土地和人民就有著特定的責任。

無論是一九〇七年較精簡且廣義的《海牙公約》（Hague Convention），還是一九四九年較詳盡、篇幅較長的《日內瓦第四公約》（Fourth Geneva Convention），以色列都是公約的締約方之一。兩項公約俱要求佔領者在佔領地遵守多項規定，[1]例如禁止在佔領地上強制改變人口結構。《日內瓦第四公約》第四十九條規定，佔領國「不得將其國之部分人民驅逐或移送至其所佔領之領土」，且「凡自佔領地……個別或集體強制移送及驅逐……不論其動機如何，均屬禁止」。這些規定旨在防止征服者一方的人民，透過建造屯墾區或開發土地資源（例如水）來殖民被征服方的領地。此外，佔領者必須保護被佔領方的人民及其財產：《日內瓦第四公約》第五十三條規定：「佔領國對……動產或不動產之任何破壞均屬禁止」；一九〇七年的《海牙公約》第四十六條指出，佔領方

「不得沒收私有財產」，例如被佔領者的私人土地或房屋。同樣根據《日內瓦第四公約》第五十三條，佔領方有「義務」確保「人民的食物和醫療用品之供應充足」。《日內瓦第四公約》第五十六條明確表示「佔領國……有義務……確保並維持佔領地內醫療與醫院的建設與服務，公共保健與衛生」。事實上，一九四九年的《日內瓦第四公約》第三部分（佔領地）包含三十條以上規範佔領軍的義務與責任。

然而，佔領的概念並非毫無爭議。在一九六七年戰勝之後，以國政府始終不斷地挑戰它從約旦奪取的巴勒斯坦土地是「被佔領」的這種說法。但是，如同一名前以色列外交部法律顧問所言：「自從以色列奪取了西岸……這塊領地實質上就是飽受爭議的土地，以色列、約旦和巴勒斯坦人都認為自己擁有這塊地的主權……」[2]因此，以色列人宣稱一九四九年《日內瓦第四公約》中明定的、所有佔領者的責任和義務，皆不適用於西岸和加薩走廊。這個觀點是根據以色列對《日內瓦公約》第一條的詮釋，該條文聲稱：「各**締約國**承諾在一切情況下尊重本公約並保證本公約之被尊重」；第二條也提到「本公約適用於兩個或兩個以上**締約國**間所發生之一切經過宣戰的戰爭或任何其他武裝衝突……」。

以色列將「締約國」（High Contracting Parties）一詞解釋為特定國家的主權統治者，辯稱在衝突中，若對方陣營不存在符合此條件的締約國，那麼「條約」——也就是整個《日內瓦公約》——的其他部分也就不適用。可以肯定的是這不只是政治聲明，也為頂尖的法學專家所支持，例如前以

色列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梅爾．沙瑪加（Meir Shamgar）認為，正式說來，一九四九年的《日內瓦公約》不適用於西岸和加薩走廊，因為該公約預設的是，原本有一個正統主權統治者，但如今遭到驅逐。以方堅稱無論是一九六七年以前治理西岸的約旦王國，還是統治加薩走廊的埃及，都不是那些領地的主權統治者，所以都不能被視為「締約國」。以方堅稱約旦和埃及在一九四八年非法入侵巴勒斯坦；埃及在奪取加薩走廊後從未正式將之併吞，約旦在一九五〇年對西岸的併吞（見第一章），則從未獲得除了英國和巴基斯坦外的國際社群承認。這種論點常被稱為「缺少歸復地產權者」（missing reversioner），堅稱不論約旦、埃及對西岸和加薩走廊都沒有主權，因此以色列並非佔領者。這是以色列用來辯稱《日內瓦第四公約》不適用於這些地區的論調。

此外，以色列聲稱在一九四八年第一次以阿戰爭告終時，它和鄰國之間劃出的分界線，也就是所謂的「綠線」，不應被視為正規的「邊界」，只應該被看作停戰線。由此，他們繼續辯稱以軍在一九六七年戰爭期間並未跨越國際公認的邊界。以國另外又宣稱一九六七年的戰爭係出於自衛；前美國國務院法律顧問、後來主持海牙國際法庭的史提芬．史威伯（Stephen Schwebel）在一九七〇年寫道，要是前任占有者（如以色列口中的埃及、約旦）非法奪取領土，那麼接下來透過合法自衛手段取得該領地的國家（如以色列聲稱它在一九六七年所為）就比前任占有者「更名正言順」。這表示以色列對加薩和西岸的主權比約旦和埃及更具有正當性。最後，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以色列認為至少就西岸來說，猶太人比巴勒斯坦人更具有其所有權，因為以色列土地（Land of Israel）在猶太人歷史上扮演著比在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歷史上更為重要的角色，且三千年來猶太人持續在此

出沒。可以肯定的是，阿拉伯人尤其強烈質疑這點，因為他們幾個世代以來已經成為此地人口的極大多數。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以方堅持一九四九年的《日內瓦第四公約》和一九〇七年的《海牙公約》皆不適用於西岸和加薩走廊，卻仍然承諾在這些「飽受爭議」的土地上遵守公約的**人道**規範。然而依舊問題百出，因為以方的承諾含糊其辭，又僅出於自願，使得以色列可以自行選擇何時要遵照這些規定。[3]

大多數的法律專家駁斥以方的核心論點：亦即，由於該領地先前的狀態與公約協議者所預設的有些許出入，所以《日內瓦第四公約》和《海牙公約》不適用於此。事實上，關起門來，以色列領袖也承認，一九六七年後以方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地區並非被佔領地的這種說法難以取信於人，禁不起考驗。在一封一九六七年送到總理辦公室的「最高機密」信函和「最急件」備忘錄中，外交部法律顧問西奧多・梅隆（Theodor Meron）指出，國際社群拒絕以方聲稱的「西岸不是『一般』佔領地」的說法，並接著說道：「以色列所採取的某些行動，甚至與自己堅稱西岸不是佔領地的說法相抵觸」。[4]

可以說，否認佔領本質的以色列政府及其辯護者相對孤掌難鳴，即使以方企圖混淆佔領的定義，或者重新定義佔領一詞，其他人卻不認為有詮釋的空間。舉例來說，聯合國大會判定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奪取的土地就是佔領，並呼籲以色列尊重《第四公約》和其他公約的規定。[5]而聯合國

國際法庭多半是冷靜、主流、傳統的法律機關，其中無論是法官個人或法庭全體，都毫不含糊地指出：「鮮少有議案能像這樣獲得幾乎全體成員的共識……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西岸地區（包括東耶路撒冷和加薩）的存在係屬軍事佔領，適用於國際體制對軍事佔領的規範。」[6]

在此我採取的觀點與聯合國和大多數的國際觀察家一致，無論以色列的法律觀點為何，西岸和加薩走廊係屬被佔領地，因此適用於一九四九年的《日內瓦公約》和其他公約。戈蘭高地和西奈半島也毫無疑問地是被佔領地，這些地區在一九六七年戰爭前歸敘利亞和埃及統治，而敘利亞和埃及也皆是合法締約國。

1967

第一部

第一個十年

1977

1 西岸與耶路撒冷

狀如腎形的「西岸」長約一百一十公里，寬五十公里，地如其名，壤接約旦河西岸，也是古巴勒斯坦的心臟地帶，一路延伸到西岸以北、以西和以南的地方。

西岸內部的地理風景並不均質：南部（聖經中的朱迪雅地區）氣候嚴苛、乾燥少雨，其北部（撒馬利亞）卻氣候溫和，土地豐饒。以人口和文化來看，西岸由三個不同的區域組成。南部以希伯崙（阿拉伯語Al Khalil）為中心，是穆斯林社群的發源地，密集而傳統。第二個區域位於中間，以耶路撒冷（阿拉伯語Al Quds）為重心，因為這個城市的獨特地位、國際名聲與絡繹不絕的遊客，使其相對具有國際性。北方以納布盧斯（Nablus）為首，是除了耶路撒冷以外西岸最大的城鎮，當地人較富政治意識與愛國主義，知識階層的文化底蘊深厚，還有勃興的商人與地主階級。

一五一七到一九一七年的四個世紀，這個地區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領土，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佔領了此處與其餘的巴勒斯坦土地。三十年後，英國撤出巴勒斯坦，那裡的猶太社群

人口數不及非猶太巴勒斯坦人的一半，卻旋即在一次短暫的內戰中擊敗了後者，並進一步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宣布獨立。甫建國的以色列隨即與鄰國開戰，這些阿拉伯鄰國反對以色列的存在，希望能夠為戰敗的阿拉伯裔巴勒斯坦人重振士氣。戰爭期間，阿卜杜拉王（King Abdullah）的約旦軍隊跨過約旦河，拿下了西岸和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區，那裡有許多至為重要的伊斯蘭聖地。之後，阿卜杜拉王在一九五〇年四月的議會中通過了《統一法案》（Act of Unification），將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納入了開國僅四年的約旦哈希姆王國（Hashemite Kin'dom of Jordan）。

國際間對於這我行我素的併吞行為普遍不以為然，其中包括了代表阿拉伯國家的阿拉伯國家聯盟（the Arab League），因為被併入哈希姆王國國土的巴勒斯坦土地，已經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被聯合國指定給阿拉伯裔巴勒斯坦人，以建立一個與猶太國家比鄰的阿拉伯國家；[1]只有英國和巴基斯坦認可這次的國土兼併。面對如此的反對聲浪，阿卜杜拉王直言西岸的兼併並非無法改變或不可撤銷，他會保管這塊土地直到「巴勒斯坦從以色列人的手中解放」。[2]

雖然兩害相權取其輕：西岸人認為哈希姆王國較以色列政權可接受，但是整體而言，他們對這個新霸主的態度仍然曖昧模糊。他們懷疑這個國王密謀削弱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認同，況且長久以來西岸人都認為自己比新領主進步、高尚，教育程度也較高，因此往往戲稱這些新來者為「落後的沙漠遊牧民族」（backward Bedouins of the desert）。儘管如此，西岸人並不是不知道整合約旦河西岸與東岸具有重大意義，西岸人迄今都向西尋求與世界貿易和對外聯繫的管道，但是以色列國的建立

於此築起一道藩籬，切斷西岸的傳統貿易路線，西岸人被迫必須向東找尋新的貿易機會與聯繫管道，也就是朝向約旦河以東。以此角度來說，雖然很少西岸人會將自己看作約旦人，但是與東岸合併、並且將其餘的古巴勒斯坦地區併入約旦，確有其重大意義。

許多西岸人漸漸接受了哈希姆政府，尤其因為一九六〇年代的約旦經濟起飛，年成長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三，這樣的繁榮也無可避免地注入西岸。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日阿卜杜拉王遭到暗殺，他的孫子胡笙・賓・塔拉勒（Hussein bin Talal）於一九五二年繼承王位後，非常重視西岸的需求，努力將這個區域整合進他的王國。然而，這相對的和平突然在兼併十七年後的一九六七年中止了，以色列先遣部隊佔領了阿拉伯屬東耶路撒冷和西岸，並且炸毀約旦河上的橋梁，象徵性地、同時也是實質上地，重新割裂了兩岸。

以軍步入西岸時，這個地區有大約六十七萬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東耶路撒冷的三萬五千人。[3]在這塊傳統的土地上，生活步調緩慢，大家庭與社區扮演重要角色，一九六七年，隨處可見婦女從井中汲水，農人使用木犁驅牛犁地。但是隨著戰爭爆發，以軍摧毀了整個村落，土地和人民遭受了既快速又戲劇性的變化，萊特龍（Latrun）地區便是一例。

在一九四八年的戰爭中，介於特拉維夫與耶路撒冷中繼點的萊特龍經歷了激烈的戰鬥，以色列派了一波又一波的軍隊反覆嘗試欲攻陷這個約旦軍團的重要根據地，但屢試徒然。現在一九六七年，以軍終於成功地驅離了約旦駐兵，並控制了萊特龍與其鄰近地區，其中包括依姆瓦斯

（Imwas）、貝特努巴（Beit Nuba）、雅魯（Yalu）等巴勒斯坦村落。

一九六七年以前，這些農村的生活簡單而平淡，就像雅魯村的八歲孩童艾希（Aishe）回憶道：

> 人們相處融洽。他們總是坐在一起……村裡有一個中央廣場，人們結束工作回家時都會到那裡去。他們會帶著咖啡和糖，在廣場一起歡樂。當外來訪客來到這個廣場，他會被邀請共進午餐與晚餐。請吃午餐的主人會宰殺一頭羊，分給廣場中的每一個人。[4]

一九六七年發生在這些村落和其周遭地區的事情，我們可以從阿莫斯・肯南（Amos Kenan）——後來成為重要作家的一位以色列軍人口中窺知一二，他回憶道：「我這一團的指揮官說，上級決定要炸毀這些村莊，掃蕩這些謀殺者的巢穴，並且防範未來可能的任何基地滲透者。」[5]他和他的同袍被指派去搜尋村莊中的武裝犯人，「沒有武裝的人都必須在時間內打包好自己的物品，然後離開。」重型軍械於是被帶了進來，將整座村莊轟成碎石堆；在依姆瓦斯，三百七十五棟房子被摧毀，雅魯有五百三十五棟，而在貝特努巴則有五百五十棟；一萬名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並且從此不許再回到他們的土地上，這些土地有些被分給了以色列軍人，剩下的則變成了國家公園用地。[6]然而，萊特龍事件並非特例，整個西岸的巴勒斯坦村莊摧毀事件廣泛發生於一九六七年戰爭與戰後期間，赫然違反國際戰爭法。然而，最戲劇性且重要的改變發生在耶路撒冷。

改變中的耶路撒冷

對巴勒斯坦人來說，東耶路撒冷不只是聖地，也是重要的商業、行政、文化中心，是連結西岸南部和北部的天然交通樞紐。就像在萊特龍等地一樣，耶路撒冷的地方軍隊指揮官親自出馬主掌一切事務，以便在其軍事將領或政要的道德良知不受煎熬的情況下改變地上事實。因此耶路撒冷戰後第一任軍官、後來成為以色列總統的哈伊姆・赫爾佐克（Chaim Herzog）在首度造訪神聖的哭牆（Wailing Wall）時，下令移走一座正對著哭牆的小便斗。儘管這不過是個出於善意的小動作，但卻為日後其他重大改變埋下伏筆。赫爾佐克事後說道：「我們決定善用這個機會，把哭牆前的區域整塊清空。這是個歷史性的契機……」[7]當時在哭牆前有二百多戶糞廠門區（Magharbeh Quarter，阿拉伯語Harat al-Maghariba，或稱摩洛哥區〔Moroccan Quarter〕，意指摩爾人之門〔Gate of the Moors〕，因為十六世紀時，該地是北非摩爾穆斯林移民聚居之處）的房子，裡面的穆斯林住戶仍住在建於一一九三年的古伊斯蘭建築裡。但是由於糞廠門區位置離哭牆如此之近，因此沒有空間讓猶太人聚集禱告。從一九六七年以前的明信片上看來，哭牆前的建築是櫛比鱗次的。

六月十日，赫爾佐克將軍再度造訪此區時，和尤澤・納爾基斯（Uzi Narkiss）將軍一同命令軍隊拆毀整個糞廠門區，意圖在哭牆前建造一個可以容納數百人的廣場。赫爾佐克日後承認，他並沒有得到任何人授權，也壓根沒有想過要取得拆遷許可。他合理化這項決定的說法是：如果花太長時間等待政府批准，可能會錯失先機。納爾基斯的想法也類似，他提道：「某些情況下不需要牽扯到

上級。」[8]猶屬西耶路撒冷市市長特迪・科勒克（Teddy Kollek）陪同將軍造訪耶路撒冷時，對拆遷的合法性有所疑慮，他諮詢法務部長，得到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什麼叫合法的情況。快點做，願以色列的上帝與你同在。」[9]

緊接著，官員在糞廠門區挨家挨戶通知，住戶必須在兩小時內清空房子，一百三十五戶阿拉伯家庭（約六百五十人）被迫在推土機拆毀房舍前撤離。有些家庭拒絕離開，被活埋在殘骸之下。當時負責指揮拆除的以色列官員埃坦・本—摩西（Eitan Ben-Moshe）少校在一九九九年受訪時描述：「我們拆除完這一帶後，發現一些拒絕搬離的居民的屍體……」[10]離開的人則來不及帶走太多東西；當年三十四歲，生長在此，於一九六七年新婚的馬赫穆德・馬斯路克希（Mahmoud Masloukhi）帶著家人逃離，「身上只帶著衣服」還有黑白相片。[11]另一位居民穆罕默德・阿布岱—哈克（Muhammad Abdel-Haq）描述，在拆除後數日，他的妻小回到故居遺址，清理善後的工程持續了數天之久，等以色列的推土機清除瓦礫，「我們才可以取回當時來不及帶走的衣服和其他財物」；這道儀式就這樣重複了整整一週。[12]此區約半數的居民祖籍摩洛哥，在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Hassen II）的援助下，許多人返回原鄉，其他人則到北耶路撒冷的舒法特（Shufat）難民營找尋棲身之所。

近來被佔領的東耶路撒冷地區中，最受人矚目的非聖殿山（Temple Mount，阿拉伯語Haram al-Sharif）莫屬。這裡原先是西元前十世紀所羅門王所建的猶太聖殿，四百年後重建，復又在西元七〇年被羅馬人摧毀。約七個世紀後，穆斯林在同一地點建造阿克薩清真寺（al-Aqsa mosque），並在

突出地表的岩石之上建立圓頂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根據伊斯蘭傳統，先知穆罕默德就是從這裡登上七重天，這裡被視為伊斯蘭第三大聖地。然而，約旦軍隊戰敗後，聖殿山落入以色列手中，人們愈來愈憂心宗教狂熱信徒（不論是哪個宗教）會聲稱此地屬於他們，因而激起流血事件。國防部長摩西・達揚（Moshe Dayan）意識到了這個危險，於是出手干預。

時年五十二歲的達揚，是以色列最偉大的戰爭英雄之一，他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獨立戰爭中，證明自己是個勇於衝鋒陷陣的陸軍元帥。八年後，達揚年方四十一，是當時以色列軍階最高的總參謀長，他與法軍、英軍聯手，成功領軍襲擊埃及。在戰爭中瞎了一隻眼睛的達揚，戴上黑色單眼眼罩，看起來活像現代版的海盜。他是以色列最色彩繽紛、也最備受爭議的人物：驍勇善戰，富領袖氣質，卻也剛愎自用，壯志凌雲，玩世不恭，高傲自負，還帶有些許享樂主義色彩。達揚在一九六七年的戰爭前夕被授命為國防部長，以軍在他的帶領之下大勝阿拉伯。

戰爭結束後幾天，達揚赴西耶路撒冷跟負責聖殿山的穆斯林委員會（Muslim Council）接洽。他明確表態希望所有宗教的信徒都可以自由進出聖殿山，且雖然以色列須負責整體的維安，但是國家並不會干涉其他方面，穆斯林仍然可以繼續如戰前那樣管理聖地。達揚也承認，讓猶太人在聖殿山祈禱可能會被看作挑釁，因此向穆斯林領袖保證禁止猶太人在聖殿山上禱告，猶太人只能在聖殿山下進入哭牆。達揚在回憶錄中記述，雖然穆斯林領袖對新規定「並不十分滿意」，但他們除了接受也別無選擇。[13]在六月二十三日，五千名穆斯林——其中有一千位來自以色列本土（及至此時，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都還不被允許進入這個聖地）——參加了星期五在聖殿山上的祈禱。

以色列很快就顯現出對耶路撒冷野心勃勃的興趣。以色列的終極目標是完全改變此地的地理與人口結構：擴大市區的疆界，將阿拉伯屬東半部和猶太屬西半部合併，從而將過去被分割成兩部分的耶路撒冷統合為一個由以色列統治的城市。

早在一九四七年時，國際社群提議應該將耶路撒冷的特殊現況定為「獨立個體」（*corpus separatum*），並且維持統一。但是一九四八年戰爭後，卻由以色列和約旦兩方割據：西耶路撒冷，面積三十八平方公里，歸以色列統治；而東耶路撒冷，面積六平方公里，則由約旦統治。後來，兩方築起了一道藩籬，分隔雙方的城市領地，同時在邊境設置地雷帶，在這難越雷池的藩籬中，只有兩處在聯合國監視下得以進出，一者為曼德爾鮑姆門（Mandelbaum Gate），另一者則為錫安山（Mount Zion），但也只有外交官員或者朝聖者在宗教節日時可以進出。

然而，此時以國政府設置了一個特別的行政委員會，以謀建立一個統一的、由以色列控制的耶路撒冷。委員會的某些討論，甚至進一步建議將更廣大的、鄰近耶路撒冷的三分之二的西岸都擴大納入城市中。[14]在這些討論中，達揚是較為中性的聲音，「這是什麼？」他評論一個提議：「這是一個城市計畫，還是國家計畫？」[15]在其他場合他則說：「我知道猶太人的大胃口……但是我不贊成將……有兩萬名〔阿拉伯〕居民的村落〔併入耶路撒冷〕。」[16]

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委員會帶著其最終提案向政府尋求批准。這個計畫將實質地兼併東耶路撒冷，以國的法律會被施行於此地，並且城市的面積將由一九六七年的四十四平方公里擴張到令人咋舌的一百零八點八平方公里。[17]眾行政首長批准了這項計畫，並且進一步爭論應該如何將

這次的兼併公諸於世。不若後來的幾年，在一九六〇年代，以色列人對國際情勢與輿論都非常敏銳，知道他們擴張耶路撒冷的領土會違反國際法，觸怒國際社會。因此各行政首長無不試圖低調行事，面對以色列媒體時，只說是一連串小型行政事務，因而事態的全貌「不會受到太多宣傳和評論」。[18]委員會會長暨法務部長雅科夫．新雄．沙皮拉（Ya'acov Shimshon Shapira）向委員會彙報，在與幾位記者討論過後，他覺得「所有的記者都有同感〔並且願意低調處理〕，只有一名編輯認為讓他的讀者知道事情的發展比保守秘密還要重要」。為了確保國外媒體也低調處理，部長建議「進行審查，不得讓任何關於統一耶路撒冷的消息透過出版品或電報傳到國外……」；同時，外交部指示駐外代表避免使用「兼併」一詞，要將政府行動描述為「行政措施」，目的是供應水電，促進大眾運輸，提升教育及健康服務，是「市政整合」而非「兼併」。

許多人暱稱耶路撒冷的新邊界為「菸酒邊界」（the Arak and cigarette border），因為其制定的方式，彷彿讓巴勒斯坦的工廠只能在城市邊界之外生產菸酒，這些不受當時清教徒般的以色列國民所歡迎的產品。這些新邊界制定的方式，也是為了讓兼併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變少，讓耶路撒冷愈「猶太」愈好。

新的地圖繪製完畢，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以方發布命令解散由八名民選委員組成的阿屬東耶路撒冷議會，並補充道，所有市政單位各級機關的阿拉伯官員從此成為「〔以色列屬〕耶路撒冷市的臨時雇員，必須提出工作申請，並且由耶路撒冷市政府決定派任職務」。該命令最後「感謝

儒希・哈提卜（Ruhi al-Khatib）先生（阿屬耶路撒冷一九五七年以來的市長）和市議員從以色列國防軍（Israel Defence Force，簡稱IDF）進駐〔阿屬東耶路撒冷〕迄今以來的服務」。[19]就此，擴編的市區併入統一後的耶路撒冷，由首任猶太市長科勒克所管轄。

兼併區內的巴勒斯坦人享有永久居留權，可以在以色列居住、工作，參與市政選舉投票，享有以色列提供的福利，在以色列和被佔領區內往來不受限制。想要取得以色列公民權的人，須宣誓效忠以色列，放棄其他國籍（通常他們有約旦國籍），且須通曉一點希伯來文。

達揚的一次舉措尤其大膽，他下令同時拆除所有一九五〇年代起就分隔阿屬東耶路撒冷和猶屬西耶路撒冷的水泥藩籬、鐵絲網和地雷區，准許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互相往來。國防部長的這個決定起初引起警方和市長柯勒克的反對，他們害怕流血事件，但在達揚的堅持下，所有將耶路撒冷一分為二的藩籬都被拆除了，這即刻導致雙方人民的交叉遷徙。是夜，市長柯勒克拍電報給達揚：「你對了，」他說。「城市成了一個大型的嘉年華——所有阿拉伯人都在〔猶屬西耶路撒冷的〕錫安廣場，所有猶太人都在〔阿屬東耶路撒冷的〕雜貨市集。」[20]沒有發生任何喋血事件。

儘管政府極力混淆視聽，耶路撒冷的改變仍逃不過外界的法眼：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聯合國大會採取第二二五三號決議（ES-V），要求以色列「廢止所有已採取之措施，就此停止採取任何將改變耶路撒冷現狀的行動」，而以方置若罔聞。以國外交部長埃班派送快遞信件給聯合國秘書長吳丹（U Thant），反覆強調以色列的論點：「兼併一詞是與現實不符的」，並且進一步說明以色列觀點，那些為了整合耶路撒冷所採取的措施都「在行政與市政的範圍內」。[21]

住在現在業已被佔領的西岸與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一開始只是單純地被嚇傻了——誠然，一九六七年六月到七月是公認的「震驚月」（months of shock）——但是一從驚嚇中回過神來，他們立即揚起了抗議以色列兼併的旗幟，並且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發動遊行抗爭。在八月二十六日，被解職的前東耶路撒冷市長哈提卜，率領八名阿拉伯貴族，在其巴勒斯坦同胞間分發一張信函，抗議以軍在耶路撒冷的所作所為，這份信函後來也被寄送到聯合國。它詳細地描寫以軍如何使出渾身解數，欲使其兼併成為地上事實：

> 以色列佔領區當局……對國際輿論充耳不聞，違背阿拉伯居民的意願，一逕著手實踐兼併計畫，違背國際法中關於被佔領國家的最基本部分……他們……只在禱告的時間給予〔教堂和清真寺的〕通行許可。我們必須嚴正抗議男男女女的穿著和行為完全缺乏禮節，冒犯信徒的宗教情感……猶屬市政府摧毀了無數阿拉伯建築，而它持續採取相似的手法，目的在抹除最後一點〔耶路撒冷〕東西分隔線的蛛絲馬跡……原先在這座城市阿拉伯區所執行的所有約旦法律都被撤銷，被以色列方案和法律所取代，這違反國際法所說，必須尊重執行於被佔領區的法律……佔領區政府無法防止聖地被褻瀆，使世界上最大也最神聖的一間教堂遭受夜盜侵襲。髑髏地痛苦聖母像上鑲著鑽石的王冠被偷走了……佔領地軍隊摧毀了位於〔城〕牆內的大塑膠工廠，造成了兩百位技工與神職人員失業……建築本體被摧毀，而機械設備也被掠奪。

他們在信末聲明：

> 耶路撒冷阿拉伯區與西岸居民堅決聲明，反對所有以色列佔領當局所採取的策略……這個藏在「行政措施」袍子內，試圖混淆視聽的兼併行動，與他們所謂「居民們」的意願相違。任何情況下，人們都不會屈服或接受。[22]

在日益高漲的反對聲浪下，達揚告誡軍隊須在敏感地帶，例如耶路撒冷、納布盧斯、希伯崙等處，部署至少四到六台坦克車，以阻斷可能發生的暴亂。「我們必須處於備戰位置，以立即將他們撲滅。」他說。[23]達揚所給的告誡出人意料，因為我們現在應該已經知道，他對於以色列佔領應該如何進行的哲學與此舉大相逕庭。

達揚的隱形佔領

達揚不僅是人們時常戲稱的「佔領地的蘇丹」（the Sultan of the Territories）——可謂一九六七年對以色列佔領地命運最有影響力的關鍵人物，他也是唯一有與佔領地阿拉伯人群交涉經驗的行政首長。在一九五六年戰爭後，身為軍隊的參謀總長，他接管被佔領的加薩走廊，當時以色列才剛從埃及那裡得到這塊土地，並且將保管它長達一年。達揚在該地最重要的特色，或許就是他不願意打

擾加薩當地人民的日常生活。當地人民進行一場大規模抗議佔領的罷工運動——關閉學校和商店——時，達揚傳喚了加薩市（Gaza City）市長，並且告訴他：「如果你關閉商店，只有你的同胞會受苦。如果學校關閉了，是你們孩子的損失。我們不會干預……」[24]

十年後，一九六六年，達揚學到了更深刻的一課。當時他以記者的身分跟隨美軍進入越南，並將切身經歷寫成一本名叫《越南日記》（*Vietnam Diary*）的書，這本書多為後人所忽略。在書中，他高度批評美國人強制將美式文化、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加諸於越南人身上的行為和企圖。他無法理解為什麼美國人認為越南小孩打棒球如此重要，他觀察到，與其干涉越南人的生活，不如讓他們自由發展、無為而治，美軍可能享有更大的成功。

這個經歷解釋了達揚對耶路撒冷軍事總督赫爾佐克下達的指示，在佔領舊城後，達揚立即敦促他，制止軍隊介入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不要試圖統治阿拉伯人，」他警告督軍，「讓他們自己管理自己……我想要的策略是阿拉伯人可以從出生到死亡都不會看見任何以色列官員。」[25]以同樣的理念，戰爭結束後五天，達揚會見軍事指揮官時督促道：

> 不要霸凌〔阿拉伯人〕。由他們去吧。不要試圖教育他們，也不要對他們說教。若是安全考量……就去吧，用強硬的手腕。〔但是之後〕還他們平靜。讓他們自由活動，不管走路還是坐車，讓他們去種他們的田，做他們的生意……還有，為什麼有這麼多軍人在〔納布盧斯〕城裡？離開這座城。去城外部署。你們不需要被看見。這座城市必須看起來像是沒有被佔領一

樣……讓他們覺得戰爭結束了，而且生活沒有任何改變。[26]

達揚還要他們撤下西岸司令部和軍事基地的以色列國旗，告訴他們，因為以色列國旗「對阿拉伯人而言是一個可恨的符號，我們不想因為一些不必要的挑釁，讓事態變得更糟」。[27]

如同達揚自己常說的，他珍視阿拉伯文化；在戰爭之前，他時常與阿拉伯村莊的領袖在以色列會晤，並且親訪在以色列南部的內蓋夫沙漠（Negev desert）遊牧村落，與他們一同放牧，進入他們的帳篷，坐在地上與他們一同吃吃喝喝。因為這個原因，很多人都說他早期的佔領政策寬大懷柔。然而，我認為他的政策並非導因於寬大懷柔，而是馬基維利主義：他以為讓他的軍隊隱藏在「隱形的佔領」後方，拿掉像是以色列國旗這樣明顯的佔領標誌，就能夠使巴勒斯坦人對現況變得漠不關心，削弱他們對改變的渴望，藉此讓以色列得以永久地抓住這些佔領地。雖然並非信徒，但達揚確將西岸——朱迪雅和撒馬利亞——看作是猶太歷史的搖籃，並且希望以色列永遠保有這塊地。不過他也知道過於明顯的佔領形式只會招致更多反抗。若反抗確實發生，達揚希望是巴勒斯坦父母，而非他的軍隊去處理這件事。有一次，西岸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女孩們，發動示威遊行，抗議佔領，達揚召集了當地的巴勒斯坦領導人，告訴他們：

> 我們不會與這些女孩衝突。這些女孩……他們有家有父母……我們之間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有件事情我們是一樣的——你有女兒，我也有女兒。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們會無法控制我們的女兒，或者她們會做出我們不願見到的事情。[28]

達揚的隱形佔領有著另一個面向，他對於約旦介入西岸事務視而不見，允許約旦的第納爾幣（dinar）持續通行。以色列不願意投資佔領地，並且就達揚所見，如果約旦資金可以持續支持西岸，何樂而不為？事實上，胡笙國王持續支薪給當地公務員——老師、醫療從業人員、法官和行政人員，希望透過持續的資金挹注，繼續保有他在此處的影響力，以期有朝一日這塊土地能夠回歸於他；而且在經濟上安定住被佔領的西岸，使當地居民願意留下來，他們就不會蜂擁跨越約旦河，到已經收容過多巴勒斯坦難民的約旦本土。[29]

單向橋梁

在一九六七年戰爭中，達揚決定要把約旦河上的橋梁炸毀，但是當以色列完全掌握了西岸後，他便立即決定重新開放兩岸人口和貨物的流通，使其如戰前一般。

那知名的達揚「開放橋梁」（Open Bridges）政策往往被歌頌為「開明」，但事實上，那也是另一種「隱形佔領」的最佳表現。他有理由認為，允許巴勒斯坦人自由進出約旦並且回到他們在佔領區的家，能減低佔領在他們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對巴勒斯坦人來說，若情況多半與戰爭之前相同，便不需要反抗。進一步而言，如果巴勒斯坦人確實感覺到佔領的壓力，那麼與對岸的流通可以

提供一個「安全閥」，讓他們有地方釋放壓力，放鬆一下。也許達揚也算計到，開放兩岸移動的自由有助於減少佔領區的阿拉伯人口——畢竟以色列人還是較喜歡土地上沒有原生人種——如同那些離開的人，例如學生到國外讀書，會選擇不再回國，因為故鄉工作機會稀少，薪水低廉，且職業選擇受限。跨越約旦河的移動自由也是軟硬兼施的策略——如果巴勒斯坦人惹出麻煩，那麼跨越約旦河的權利將隨時被撤銷，如同達揚時常說的，這給了他們「一些可能失去的東西」（something to lose）。

然而如同許多以色列的佔領地「政策」，「開放橋梁」既未在政府單位中事先規劃，亦未見討論，甚至沒有任何論壇。在以色列，政府直接指揮軍隊，但沒有任何顧問團提供安全評估（例如美式的國家安全會議），導致政府過分仰賴軍事力量，而在此處亦是如此，橋梁開放政策是由下而上形成的——從軍隊到政府。

這個政策源自於一位機敏的陸軍中校以色拉爾・伊坦（Yisrael Eytan），他是西岸北方撒馬利亞新上任的軍事總督，在戰爭結束後，他馬上面臨一個意外的難題：要如何處理蔬果過剩的狀況——有八萬多噸的西瓜、哈密瓜、葡萄、番茄、橄欖和黃瓜——因與約旦傳統市場的運輸通路被切斷，農產品現在正在裝運箱或植株上漸漸腐壞。雖然許多農產品被賣到以色列和歐洲市場，以軍也增加了每日對蔬果的消耗量，甚至載運一些蔬果給予美軍，卻仍大量過剩。

一位來自納布盧斯的巴勒斯坦富農阿布・哈珊（Abu Hashem）在約旦谷地擁有五百公頃的農

地，在這個緊要關頭，他向這位陸軍中校獻計：雖然約旦河的橋梁仍然處於毀壞狀態，但是夏天約旦河的許多地方，汽機車是很容易涉水而過的；如果軍隊允許農產品出口到約旦，這個產量過剩的問題很快就可以解決。而因為政府與此有關的政策尚未擬定——就像很多其他事情一樣——陸軍中校伊坦向西岸當地的農人散發消息，軍隊會默許農產品「出口」到東岸。後來，一九六七年六月的最後一週，在以軍視若無睹的情況下，兩輛卡車從西岸北部城市傑寧（Jenin）出發，滿載著農產品，開至約旦河對岸水位較淺的、接近特拉卜茲（Tel Abu Zuz）的地方，與對岸的護衛隊相會，幾分鐘內所有的農產品都在那裡卸貨，然後裝載上在旁等候的約旦卡車。

在這因陋從簡的開端之後，貿易迅速繁盛了起來，七月第一週就有十輛卡車越過約旦河，第二週增加至二十輛。很快地，軍隊開始整頓這個渡河運輸，他們登記號碼，並且記下車子回來的數量；在安息日，猶太人不被允許做任何工作，於是將事先預備好的便條交給司機，讓他們在回程交回便條，並於隔天將之記錄在「渡河手冊」（Book of Crossings）中。不久之後，上百輛卡車渡過了約旦河，載運蔬果、橄欖油、伯利恆（Bethlehem）生產的塑膠容器、拉馬拉（Ramallah）礦場的建築用石材、家具和家庭必需品。

達揚於八月二日來到特拉卜茲，當時這個地方已經被公認為「蔬果市場」，他在回憶錄中將這景象描繪得栩栩如生：「前所未有的景象，就像好萊塢西部荒野的場景，只差沒有牛仔、牛隻、馬車在河畔淺灘交會而已，在那裡，滿載的卡車、貨車和手推車被拖繩拖曳過河。」[30]

本來只是因應作物過剩而想出的權宜之計，現在在達揚的個人監督下，漸漸發展成「開放橋

梁」政策，在此規定下，不僅是貨品，連**人民**都能夠雙向渡河。冬天來臨，水位高漲以至於無法渡河時，達揚派遣了納布盧斯市長哈迪・迦南（Hamdi Canaan）當特使，去與約旦國王胡笙協商，詢問其是否同意建造一座跨越約旦河的永久性橋梁。特使與國王素相熟識，回報道國王願意合作，並且約旦軍團將在約旦河上垂降兩座軍用便橋：一座將設置在耶律哥（Jericho，又譯傑里科）東部，供耶路撒冷、伯利恆和希伯崙居民使用；另一座則在舊的達米亞橋（Damiya Bridge）附近，供納布盧斯、傑寧和其他西岸北部城鎮的居民使用。

有好一陣子，這些措施有助於製造一切正常的氛圍，讓軍隊可以一直處於視線之外，也符合了達揚的隱形佔領哲學；但是西岸佔領地的其他發展很快就證明，事情遠非如此樂觀。

難民任務

西岸的戰爭很短暫，但是以軍成功地鼓勵巴勒斯坦人民移居到約旦；如同在他處，以色列希望能夠有一塊沒有原生人民的土地。大部分移出的人是第一次以阿戰爭的難民，也就是一九四八年從巴勒斯坦逃出的巴勒斯坦人；現在，一九六七年，他們再度變成了難民。哈吉・法蒂瑪・達恩（Hajji Fatima Da'en）有二次巴勒斯坦難民的典型經驗；至今她仍記得一九四八年抵達西岸後，「我們建了新的家，種葡萄、無花果、蘋果、梅子……所有東西。」但在一九六七年，「猶太人來了，把我們趕了出來。他們搶走我們種植的作物，然後把我們扔了出來……」[31]其他西岸人起而效尤，

紛紛遷出，很多人非常憂慮如果留在原地，會就此被迫與在東岸的親戚和工作分離。事實上，戰爭造成許多家庭被迫離散，一部分家人在東岸，另一部分則在西岸。從西岸查拉迪亞（Kalandia）難民營來的巴勒斯坦人拉伊達・薛哈德（Ra'ida Shehadeh）回憶道：「我有兩個姊妹和一個弟弟……我的父母因為〔一九六七年的〕戰爭而分離……母親去了約旦，父親則留在這裡生活……」[32]

在屬於西岸的耶路撒冷，軍隊尤其積極主動，戰爭剛結束就提供每日從舊城（Old City）的大馬士革門（Damascus Gate）到約旦的公車。以軍將領納爾基斯證實，他在耶路撒冷設置了許多公車，上面寫著「到安曼（Amman）—免費」。這趟接駁完全由軍官就地組織發起，公然違抗國際法規定，但並未受到政府的干預制止。一經橋梁抵達約旦河對岸，巴勒斯坦人就會簽署一份離境聲明，宣告他們是自願離開，然而這當中鮮少有人是出於自願。一位過去負責在橋梁彼端蒐集簽名的以色列軍人說：

> 我們強迫他們簽名……開往橋梁的公車上只載男人……年齡從二十到七十歲不等，軍人隨行在側。上級告知我們這些人都是搞破壞的，最好讓他們離開這座城市……〔巴勒斯坦男人〕並不想離開，他們被強行拉下公車，同時被來福槍擊打。當他們靠近我的簽名檯時，往往已經完全視線模糊，無法理會簽下的是什麼……因為驚嚇，他們會飛也似地逃到另一邊……若有人拒絕把手伸過來給我，〔軍人們〕就會重重地責打他。然後我必須拿起他的拇指，將之浸潤到墨水中，為他畫押……[33]

以色列外長埃班私下敦促政府，抹除任何可能被視為強迫性的巴勒斯坦人流疏運，並且在九月聯合國大會協談中東危機前，允許一些已經離境的人回到西岸。埃班的考量是，難民危機可以把國際注意力從一九六七年戰爭的責任歸屬問題轉移開來，順理成章地把責任嫁禍於阿拉伯人，因此他認為改變運輸政策才是明智的。

為此，七月二日，政府公開地著手執行「難民任務」（Operation Refugee），允許一些離境的巴勒斯坦人在一個月內回到他們的家。結果這變成一道冗長的程序，因為離境者（還在約旦的時候）首先必須填寫申請表，然後以方會審核他所遞交的資料。更糟的是，在實際執行的時候，整個程序還會被繁文縟節所延宕，其中也因為以色列和約旦官員之間所爭論的一些技術性問題。例如，安曼方面希望難民使用紅十字會申請表格（遣返的組織工作實際上委由國際紅十字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執行），以色列卻堅持要使用有以國國徽的表格。事實是，即使以色列人知道此刻不應該太激怒世界輿論，他們仍然希望難民留在約旦，甚至鼓勵更多難民離境。達揚曾被錄下這樣的談話：「我們想要遷出〔西岸〕……我們想要創造一個新的地圖，我們鼓勵遷出……對鼓勵遷出有具體想法或建議的人，歡迎發言，我們不會置之不理。」同時，軍事總督也鼓勵他的下屬們「不要迎合每個〔西岸人〕向我們提出的要求」，[34]因為他們不想讓巴勒斯坦人過太舒服的日子，他們在尋求「增加阿拉伯人遷出」的方法……[35]

因此，在以色列極力鼓勵遷出、難民回歸西岸的程序又如此複雜而冗長的狀況下，統計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估計有大約十七萬五千到二十五萬巴勒斯坦人於戰爭期間或戰爭後離開，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大約一萬四千人被允許遷回。

書的戰役

在政策層面上，以色列政府對於該怎麼處理殖民地問題總是決策緩慢，但是在地上戰略層面，卻令人難以置信地積極。例如，以色列官僚總是迅速滲透所有巷弄中的巴勒斯坦生活，並且緊密地監控他們，清楚記下冰箱、牲畜、拖拉機、商店、汽車和其他物品的數量，登記耶城與西岸各地和國外往來的信件，甚至調查巴勒斯坦的飲食習慣以及他們食物籃中的營養價值，並列出詳盡的清單和統計數字。然而，還有一個地方，他們不僅試圖監控、記錄，並且還主動地進行重塑，那就是巴勒斯坦的教育體制。

戰爭結束後未久，內閣特別委員會旋即擬定了佔領區學校教育的新課綱。以色列尤其希望將前此成功兼併的阿屬東耶路撒冷納入自己的教育體系中。以方批准調查（必要時甚至查禁）任何帶有仇以、仇猶意味的教科書，或者助長巴勒斯坦國族主義的教材。這個決策與第一百零一條軍事命令（Military Order No. 101）相輔相成，該軍事命令規定，所有西岸的閱讀材料——書和期刊，皆須通過軍事審查。

調查巴勒斯坦學校教科書的任務，落到了以色列教育部的頭上。以國教育部瀏覽過教材後，判斷在一百二十本巴勒斯坦教科書中，約六十本含有某種程度的反以或反猶言論，其中四十九本甚至

嚴重到禁止在任何學校中使用。在其他情況下，官員也重新撰寫他們認為不合宜的段落。例如，在一本文法書中有一行字：「我們的團結會嚇壞敵人」被「我們的成功會取悅父母」所取代；〈美麗的雅法〉（Beautiful Jaffa）這首詩從課本中刪除，只因為內容提到先知穆罕默德到訪耶路撒冷。

西岸北部傑寧市的兩百位老師，因氣憤以國政府干預其教育體制，連署抗議批評以色列人更改他們從約旦統治時期就開始使用、至今已沿用了二十年的教科書。這次行動在西岸引發了更多連署、抗議和聲明書的浪潮。八月十七日，一本在耶路撒冷發送的廣告摺頁宣稱，以色列國內供阿拉伯少數民族學校所使用的教科書被引入東耶路撒冷，此書「冒犯了阿拉伯人」，因為以色列用的這本書採取的是猶太復國主義的敘事，尤其與一九四八年戰爭相關的部分，阿拉伯人稱之為*Nakba*：災難。三天後，在東耶路撒冷發起了一場貿易罷工，這本摺頁宣傳品也在圖勒卡爾姆（Tulkarm）、蓋勒吉利耶（Qalqilya）、納布盧斯等地分發，呼籲學生從九月一日即新學期的第一天開始罷課缺席。西岸北部納布盧斯地區的教育部主管拉希德·馬瑞（Rashid Maree）向軍隊報告，學校無法上課，因為有太多教科書被禁，而且老師們較喜歡約旦的課程設計；軍隊馬上逮捕了馬瑞，並且在沒有審訊的情況下將之拘留了三個月。

滿城風雨之際，達揚仍試圖保持冷靜，告訴軍事司令官們：「他們想的話，就讓他們去罷工吧！」但是他仍然保持警覺，知道這樣的示威遊行將對以色列的國際形象造成傷害，透露出佔領區內並非風平浪靜。達揚在「視若無睹」與「痛下重手」兩個截然相反的手段之間擺盪，最終選擇了

後者。「我們對阿拉伯人的公開立場是：要不要復學、復課是他家的事，我們不會強迫他們讀書。」他告訴軍隊：「同樣地，必須讓他們搞清楚，我們會將罷課事件視為不服從的行為……停止學校罷課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做到，無疑是我方的重大勝利。」[36]

直到九月中，罷課事件仍然沸沸揚揚；當西岸大部分地區的抗議聲浪漸漸銷聲匿跡時，納布盧斯卻仍然持續進行，並且備受關注，也因此，這座城市變成了整個西岸挑戰佔領的標準代表。

納布盧斯在聖經上的名字是示劍（Shechem），對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來說，都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根據聖經，此地是亞伯拉罕（Abraham）在西元前一八五〇年時抵達的地方，他在一次異象中得知，這塊他選作新家園的土地，早已在上帝的意志下註定要給予他和他的後代（創世記12:6-7）；約伯在那裡買了一塊田地（創世記33:18-19）；約書亞（Joshua）在那裡聚集他的人民更新他們的盟約（約書亞書8:30-35, 24:1-29）；約瑟夫（Joseph）也是在那裡被埋葬的（約書亞書24:32）。約瑟夫的墳墓是以色列土地上三大猶太聖地之一，其他兩個聖地是耶路撒冷的聖殿山，和希伯崙的列祖之墓（Tomb of the Patriarchs）。然而，納布盧斯在一九六七年從約旦手中被奪取過來時，就是一個阿拉伯城鎮了——它是商業和工業中心，工廠雲集，最著名的滿月（Al Bader）肥皂工廠在這裡營運了兩百五十年以上。

在約旦的規定下，納布盧斯和其周圍轄區都享受著西岸一大部分的小額投資。這麼做是為了讓納布盧斯與東耶路撒冷抗衡，讓後者不致太過強盛，以免東耶路撒冷挑戰到安曼當局的地位。但對

於外國佔領者來說，納布盧斯總是令人頭痛；現在以色列人發現，納布盧斯帶有強烈的阿拉伯國族主義色彩，比任何其他西岸城鎮對外來統治更具敵意，也更具反叛性。因為納布盧斯帶領著這波反對以色列介入巴勒斯坦教育體制的運動，軍隊決定使用懲戒性手段來殺雞儆猴，讓其他城鎮瞧瞧反抗佔領者的下場。此時達揚被迫放棄了他的「隱形」佔領，九月二十一日，他給軍隊開了綠燈，讓他們來擺平納布盧斯。

隔天，陸軍上校茨維・歐弗（Zvi Ofer）召見迦南市長，打算告知他軍隊將會對納布盧斯採取什麼樣的制裁和懲戒性手段。但是市長婉拒了這次邀請，並未出席；市長稍後的解釋是，在前一次與歐弗上校會晤時，對方拒絕與他握手，對他表示怠慢。幾個小時後，軍隊的吉普車轟轟然開進了鎮上，透過擴音器宣告，在「進一步通知之前」，下午五點到早上七點將實行宵禁；清真寺尖塔上的擴音器平日被用來召集穆斯林進行禱告，如今卻反覆被用來宣布宵禁時間。工程師隨後關閉了納布盧斯的電話系統，於是每個家庭都被孤立在自己的屋內，當夜晚降臨，軍隊便開始進入住家與機構進行搜索。這支軍隊——佔領初學者——在如何進行搜尋上，被給予了極為精確的指示：

> 在搜尋時，必須經常觀察人們的反應；這往往是一個可信賴的指標，引導我們找到搜尋的對象……牆壁和地板經常是藏污納垢的地方。因此，搜尋者必須敲打每一道牆壁和地板，聆聽其聲音。鈍悶的回音表示這可能是一個藏匿處……[37]

同時，大眾運輸被關閉，軍隊選擇了二十家曾經參與罷工的店鋪——其中包括了迦南市長的店——將之封閉「以待進一步通知」；一些批發商的執業證照也被撤銷。以色列會計師被帶入城中，以審查市政財務記錄，找尋違法之處與貪污證據。

在軍隊全面掃蕩的情況下，納布盧斯原本西岸北部商業中心的經濟地位瞬間滑落。軍隊也封閉達米亞橋這個通往約旦的主要通道，強迫納布盧斯居民和商人選擇更遠也更迂迴的道路。

在軍事行動的第一個晚上，迦南市長召集市政府上下，要求軍隊取消所有制裁行為。然而，當他打電話給軍事總督，要求緊急會面以傳達市政府的訴求時，卻無法打通；他被告知，督軍在「忙」。九月二十三日，迦南向以方報紙《晚禱報》（*Maariv*）解釋為何在所有城鎮中，是由納布盧斯發動反對以色列的罷工運動。「納布盧斯——」他解釋道，「是較為混亂的。人們擁有較高的教育，所以對於政治問題更為敏感。」

那天，宵禁的第一個小時內，一輛軍用車輛在納布盧斯附近遭遇槍火襲擊，它隨即反擊，並且叫來兩輛坦克砲轟子彈來處的房子，在軍隊闖入屋內前就殺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其餘的人也遭逮捕。一架直升機緊追其他逃離現場的巴勒斯坦人，尾隨他們找到一個洞穴，捕獲了十三個破壞者和大量的武器與炸彈。這件事使軍隊更加理直氣壯：現在國防部長可以基於安全理由，為自己對納布盧斯執行的嚴酷手段辯護了。有了這個理由，軍隊進一步加強它的力道，包圍了城鎮，不讓任何人進出，並且增加搜索與逮捕人數。

逐漸地，軍隊殘酷的行為開始敲響納布盧斯的喪鐘：食物價格飆升，那原本熱鬧的市集，如今門可羅雀。看著鄰近的傑寧趁此之危蓬勃發展，其經銷商取代了納布盧斯懸宕的經銷貿易，為西岸北部提供農產品，市政官員愈來愈擔憂。迦南市長背負著沉重的壓力，要求正式謁見達揚，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兩人在耶路撒冷會晤，過程艱巨。市長迦南告訴國防部長達揚：「納布盧斯已經很久沒有遭受如最近這樣沉重、激烈的手段了。這支鐵拳把所有人們對於佔領勢力可能有的好感全部抹除了。」[38]達揚回覆道，他並不期待納布盧斯居民「愛」以色列人，但是他們必須維持正常的生活。他補充道：「你們擁有的選擇只有井然有序的生活，或者叛變。但是你們要知道，如果你們選擇叛變，我們除了摧毀你們之外，沒有別的選擇。」[39]迦南放棄了抵抗。他建議，可以透過組織會議，與以色列教育部代表討論學校教科書的審查原則，來緩解巴勒斯坦人對於以色列干預教育體制的不滿。最重要的是，他確保學校最遲會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前重新開學。

達揚和他的軍隊贏了：他們結束了罷工罷課浪潮，讓納布盧斯屈膝，並且在人民面前重申了他們的威權。這一晚宵禁和其他制裁被解除了，在二十五個難熬的日子後，納布盧斯的生活回歸正常。至於那惹人爭議的教科書：最後七十八本禁書中，五十九本在些許改動、並蓋上「本教科書由軍事司令官授權」章之後，被重新印製使用；在被逮捕的老師和學生獲釋後，所有學校重新開學。但是這個插曲變成了隱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下，一個溫火慢熬的民怨隱患，也標示著這些怨恨可以輕易地達到沸點，變為公開的反抗。這為發展中的以色列審查制度鋪路，成為往後幾年佔領的主要特徵。如同巴勒斯坦詩人與批評家穆罕默德．阿巴札威（Muhammed Albatrawi）所證實的：

> 我寫的每個字都要經過審查室。我的詩被禁止書寫雅法城（Jaffa）的阿拉伯名亞法（Yafa），必須使用希伯來文雅佛（Yafo）。不能夠寫阿什凱隆（Askalan），必須寫亞實基倫（Ashkelon）。有時我寫的是一首簡單的情歌，但偉大的以色列審查委員認為它是帶有巴勒斯坦國族主義的詩。因為這個原因，我試著用最清楚的方式書寫，這樣他們就不會曲解我有其他意圖，把整篇詩句改得滿江紅。我必須猜測以色列審查員會怎麼想並將之納入考量，以免他對我怒火相向……我永遠無法事先得知審查員會怎麼反應：有時我寫一些危險的話，他沒有任何意見地准許了，而有時我寫的是完全無害的東西，卻被全面禁止。這會使你失去理智，因為裡面沒有任何邏輯可言。[40]

巴勒斯坦知識分子阿里．阿哈利利（Ali Alkhalili）也有著相似的經驗：

> 如果不希望你的書在發行後立即被全部沒收，你必須把手稿寄給審查員……現在發生在我身上的……是我驚恐地發現自己內心漸漸出現一名小以色列審查員，他監視著我。我突然領悟到，某種程度來說，我已經不再是一個自由的人了……當他〔審查員〕有任何疑慮，他會希望我刪掉。有時候我可以從他筆端刻進稿子的深度，感覺到他對我是多麼的生氣……他就像是一位劊子手。畢竟，文字是充滿生命的東西，而他的工作卻是把它們的頭砍下來。[41]

佔領的組織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三日，在迦南市長屈服、達揚解除包圍納布盧斯後幾天，內閣會議通過了「行政領地運作綱要」（Operational Principles for the Administered Territories）。[42]這些新的指導綱要，以言簡意賅的軍事體例寫成，整合了從納布盧斯罷工事件學到的教訓，提供了佔領哲學的精彩洞見，尤其是西岸的佔領。

新指導綱要的擬定目的，如同其第一條所述，在於確保「行政領地有效的軍事與行政控制」。整份文件的主軸在於鼓勵巴勒斯坦人從佔領地遷出，例如其中第二條說到，軍人被要求執行巴勒斯坦人「自由遷徙的政策」，必須正面地回應他們「為讀書或工作而出境的要求……」，同時，「沒有任何外來的阿拉伯人可以得到行政領地的居留許可。」

以色列的高稅率被視為一個有效利器，在鼓勵巴勒斯坦人離境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指導方針也要軍隊讓巴勒斯坦人相信以色列會「長久地」統治佔領區；或許因為有些撰寫這份文件的人認為，反抗的發生是出於不確定感，如果西岸人相信以色列會一直駐留在此地，那麼他們要不就是離開，要不就得安分守己。有趣的是，約莫同時，以色列旅館業主被送到西岸去與耶律哥和其他地方的旅館業主討論套裝旅遊行程，這可能也是在試圖對西岸人說，以色列確實想要永久留在這裡了。

這份文件也指示軍隊強化阿拉伯人對六日戰爭「軍事慘敗」的意識，這很可能是為了阻止巴勒斯坦人的挑戰，且其對公民不服從的現象表現得「漠不關心」。但是同時——典型的矛盾往往見於

以色列的佔領地政策中——指導方針也強調軍事智囊應該竭盡全力找出引發叛亂的人，懲罰他們，最好將他們逐出西岸，送到對岸約旦國境內。

根據這份文件，任何與軍隊合作的巴勒斯坦人，例如那些將情報提供給以軍的告密者，都應該「獲得獎賞」，軍隊對於這些願意幫助佔領地的當地人，應該採取「補償和保護」策略。反之，任何巴勒斯坦平民對反抗佔領運動提供支持，都應該被鎮壓；任何助長反抗活動或者用來作為恐怖主義者基地的村鎮，都沒有資格得到政府的補助金、貸款或其他利益。

指導綱要寫明，對軍隊人身攻擊者不容姑息。一旦暴力事件確實發生，那麼：「一、回應應當迅速嚴厲；二、必須逮捕嫌犯……；三、供恐怖分子使用的房子必須拆毀；四、基於以方內部士氣考量，每一起暴力衝突事件都必須經過許可方可公布出版。」

新的指導綱領也強調，西岸經濟應該占以色列預算比例愈少愈好，雖然要「避免貧困、饑荒等會激發顛覆政權、為以色列招致國際政治壓力的情況」，但是不鼓勵任何挹注佔領地的投資。最後，指導綱領說：「我們的政府……應該永遠有一個軍事面向」。任何接觸都「必須避免」，尤其是與女人的接觸。最後這道禁令，如同當時在另一本軍事手冊中所寫的，是為了杜絕性傳染病的危險，「這在敵國極度常見。」[43]

除了這些一般性原則，複雜的許可證體制（regime of permits）漸漸變成顯著的佔領特徵之一，且備受憎厭。巴勒斯坦人在幾乎所有事物上都被要求取得證照許可：參與金融活動、蓋房子、出

國、念書、住在戶籍地之外、在某些地區放牧——甚至種植特定的蔬果。如同納迪雅・阿布—薩哈（Nadia Abu-Zahra）和阿達・凱伊（Adah Kay）在《巴勒斯坦不自由》（*Unfree in Palestine*）一書中所言，「巴勒斯坦人沒有許可證就不能種番茄……也不能夠種茄子。不能粉刷房子。不能修繕玻璃窗框。不能夠從井中汲水。不能穿巴勒斯坦國旗顏色的上衣，家裡不能有含巴勒斯坦國歌的錄音帶。」[44]取得許可證往往需要經過漫長的過程，包括填寫表格、負擔費用（這變成了佔領區政府很重要的收入來源），而且常常要通過非常冗長的面試。

許可證體制和其他佔領政府主辦的活動都帶有法律面向，以色列最高法院因此成了佔領地人民和佔領區政府的最高仲裁者。它也許是以色列最受人尊敬的機構，不僅審核佔領區的政策，而且受理許多巴勒斯坦人的申訴案件；這些案件五花八門，包括申訴軍隊拆毀房屋（這往往是集體懲罰巴勒斯坦人的手段）、延長宵禁、將佔領地人民驅逐到約旦或其他地方、虐待事件等。社會學家巴魯克・吉姆林（Baruch Kimmerling）觀察到，透過審理這些案件，最高法院不僅給予佔領本身一個開明的面貌，也同時實行了對佔領地的「司法兼併」（judicial annexation），製造一種「合法」的形象。[45]而大衛・克萊茨梅（David Kretzmer）在其《司法佔領》（*The Occupation of Justice*）一書中，也指出最高法院幾乎在所有關於佔領區的審判中，都依據「可疑的法律論證」做出對當局有利的判決。[46]因此，實際上最高法院提供給巴勒斯坦人的是一個裝飾性的正義，最終強化了佔領者與被佔領者的不平等關係。

治理巴勒斯坦佔領地居民的軍政府乃由以軍人員組成，責任由安全部門和民事部門共同承擔，兩方官員向地區督軍報告。安全部門（Security Branch）負責維護法律與秩序，保障猶太屯墾者的安全，在接下來幾年，猶太人口飛快成長。安全部門建立軍事基地、部署軍隊，並往往對巴勒斯坦人施以集體懲戒。軍政府的民事部門（Civil Branch）監視工業、商業、農業、勞工以及財政活動、教育、福利、健康和郵政事務。在這裡，軍隊藉由上千名巴勒斯坦人的幫助——校長、老師、社工、醫生、警察、郵局員工和其他官員——有效地進行不同民間機構的日常運作。因此任何一般的巴勒斯坦人與佔領地政權接觸時——透過申請許可證或其他事情——都可能遇到另一個巴勒斯坦人，也更符合達揚的希望，讓佔領盡可能隱形。

消滅游擊隊

對於軍隊來說，與像是納布盧斯事件的罷工、抗議周旋，本質上就是一個整頓秩序的任務，但除此之外，西岸還必須面對持有槍械的反抗者。其中一位巴勒斯坦領袖般的人物就是亞西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但他絕非是唯一的一位。

他的全名叫作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烏夫・阿拉法特・古德瓦・侯賽尼（Muhammad Abdul Raouf Arafat al-Qudwa al-Husseini），出生於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地可能是埃及開羅，他是巴勒斯坦商人之子，在七位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六。四歲時，他的母親過世，舉家搬到耶路撒冷，

住在一位鄰近哭牆和阿克薩清真寺的叔父家。年輕的阿拉法特在英國託管的巴勒斯坦，目睹了日益緊繃的以阿關係。

一九三七年他的父親續弦，全家搬回阿拉法特成長的故鄉開羅。阿拉法特從小便表現出極強的領袖特質，他會聚集鄰近地區的小孩，試著強迫他們踢正步，並且用棍子責打不服從的人。一九四八年第一次以阿戰爭，阿拉法特參加了一支非常備軍，與埃及常備軍並肩作戰，在加薩走廊南部對抗以色列，由於表現優異，他很快贏得了無懼戰士的名號。

後來，在開羅學習工程時，他在好戰的埃及學生會以及巴勒斯坦學生會間活躍了起來。一九五二年，他獲選為巴勒斯坦學生會會長。擔任會長期間，他表現出一種後來為人所熟知的特質：精力旺盛、詭計多端、不可一世的天性，並且愛出鋒頭，喜歡比戲劇化的手勢。而就在這時，阿拉法特開始綁上阿拉伯頭巾（*kefiya*），這塊覆蓋頭部的布料除了能掩藏他日益稀疏的頭髮，也成為他的標誌。

一九五八年拿到開羅大學工程學位後，阿拉法特到科威特擔任一個公共工程部門初級工地的工程師。後來他自己創辦公司，並且聲稱他即將變成百萬富翁。

一九五九年在科威特，他和他的好友阿布．吉哈德（Abu Jihad）開始創辦《我們的巴勒斯坦》（*Our Palestine*）雜誌，當中對於阿拉伯政府大加撻伐，批評他們沒有為巴勒斯坦人民傾盡全力，他也呼籲發動「人民的解放戰爭」（popular liberation war）以解放巴勒斯坦。他們兩人一起發動了「巴勒斯坦國家解放運動」（Palest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簡稱為「法塔」（Fatah）。

早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們便發動第一次反以軍事行動；此行動尚不成氣候，以失敗作收。

一九六七年阿拉伯戰敗後，戰爭期間都住在大馬士革的阿拉法特，與一群同袍一起到約旦旅行，從那裡潛入約旦河，渡河回西岸。他是眾人中第一位橫渡約旦河的人，因為他只有五呎四吋（一六三公分）高，水會淹到他的肩膀，所以他必須將他的衣服和來福槍高舉在頭上。一抵達對岸，他便跪下親吻這塊土地，等待其他二十八個人上岸。然後，他帶領他們走過群山直到抵達西岸北部，阿拉法特在那裡建立了一個根據地。[47]接下來的幾週，他開著一輛福斯汽車在這個區域來回穿梭，傳揚巴勒斯坦理念，招募年輕巴勒斯坦人組成秘密基層組織，一同反抗佔領，發動國家解放戰爭；他相信以色列的佔領，就像法國在越南和阿爾及利亞的政權，最終都會在暴亂中變得脆弱而不堪一擊。阿拉法特手下的攻擊行動，包括對巡邏軍人投擲手榴彈、埋伏、打帶跑式的攻擊、在工廠和鐵路線上埋設炸彈等。

因為缺乏良好情報，以軍一開始難以找到反暴亂的有效方法，窮於應付阿拉法特和他的民兵，但是不久，沙巴克（Shabak，以色列國安局的希伯來文縮寫，等同於美國的FBI，或英國的MI5）在佔領區部署，並開始蒐集情報。沙巴克雇用了一個線民網絡——成員從年輕到年長、貧窮到富裕，不一而足——潛入巴勒斯坦生活的所有角落，穿透城鎮與村莊，利用宗教對手、並且更進一步使用黑社會勢力。從巴勒斯坦人當中招募線民的方式之一，便是前述的許可證體制，因為面試提供了沙巴克機會鎖定可能援助的人選。許可證的核發與否，經常隨申請者的合作意願而定；以色列人

也經常使用撤銷刑責、減輕刑責或改善監獄條件的方式來換取合作。在一九四八年戰爭後，西岸難民間折磨人的貧窮肆虐，金錢一直都是沙巴克非常重要的招募途徑。巴勒斯坦合作者A．T．解釋道：

> 從一九六七年開始，在佔領地向軍政府申請許可證的時候，沒有任何人不曾被沙巴克利誘，要他與政府合作好讓申請得以通過。這便是佔領的天性。任何想要過好一點生活的人，任何有雄心壯志的人，都或多或少遭遇過這樣的兩難考驗。[48]

沙巴克也透過寄發恐嚇信函，招募巴勒斯坦女人擔任線民，利用她們在傳統巴勒斯坦社會中的柔弱特質。巴勒斯坦運動者胡笙．阿瓦德（Hussein 'Awwad）解釋了他們的手段：

> 當局透過強拍裸照或者拍攝她們從事不貞行為的方法來招募婦女。他們威脅說，如果她們不合作，就會把裸照寄給她的家人，並把照片刊登在報紙上。已經被招募為線民的女人，則誘惑其他女人與男人從事性行為〔過程都被以色列人偷拍下來〕，藉此延續線民的來源。[49]

為了斬除巴勒斯坦的反抗，軍隊與沙巴克和巴勒斯坦線民密切合作，企圖捕獲巴勒斯坦反抗運動的首領，阿拉法特很快變成了頭號要犯。沙巴克在以軍內部流通著一本「通緝」名單，其中也有阿拉法特戴著他阿拉伯頭巾的照片，使用他的戰時代號阿布．阿瑪（Abu Amar），對其描述如下：

> 阿布．阿瑪：法塔（Fatah）的創立者之一、指揮官、組織者。在西岸出沒。組織中極重要的人物。
> 描述：約四十五歲。身高：一百五十五到一百六十公分。膚色：棕。體格：矮胖，頂上禿。鬢角髮色——灰。未蓄鬍。下唇突出。言談：埃及口音。動作：緊張。眼神：飄忽不定。
> 服裝：傳統阿拉伯服——經常穿著歐洲服裝。眼鏡——他現在可能已經戴眼鏡了。
> 名字與暱稱：阿布．阿瑪，亞西爾．阿拉法特，穆罕默德．拉夫醫生，尤瑟夫．阿瑪醫生，費茲．馬赫穆德．阿拉法特，知名綽號：「醫生」。
> 親戚：在加薩有一位堂弟杉米．阿拉法特（Sami Arafat），亦是照相館老闆。
> 祖籍：納布盧斯或加薩。
> 評論：一逮捕到案，立即通知國安局。[50]

雖然阿拉法特的行蹤仍然難以捉摸，但由於他的手下大都尚屬生澀、缺乏經驗，因此落入以色列手中。他們總是成群結隊行動，團隊的數量過於龐大，知道太多彼此的事情，且盲目地相信巴勒斯坦群眾，群眾中很多人卻因賄賂、或因被恐嚇，而早已決定與佔領地政府合作。

以軍也非常積極活躍，總是找尋機會先發制人。例如，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軍隊包圍了納

布盧斯的三個難民營，其中一個最大的便是巴拉塔難民營（Balata camp），他們使用「猴子」作為確認嫌犯的代號。「猴子」是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人的稱呼，他們在前幾次西岸北部的突擊時，被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說服，幫助以軍；他們頭部都戴著一個粗布袋，只有前方的兩個洞露出眼睛，因此巴勒斯坦同胞認不出他們，他們會用手指出嫌犯。

為了阻止當地人支持游擊隊，軍隊也採取了集體懲戒法，使用於法塔成員被發現的村莊。例如，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最後兩星期，在發現村人庇護游擊隊成員後，軍隊炸毀了幾十棟吉夫特里格村（Jiftlig）的房子。

軍隊漸漸設法把反抗分子都趕到了約旦河東岸，透過加強監視、搜查往來約旦和西岸的車輛，斷絕剩餘人馬的軍火補給。雖然達揚的「開放橋梁」政策一如往常，但是軍隊只允許極少數他們熟知的車輛往來，且要求這些車輛把所有可移動的嵌板都拿掉，包括椅套，讓橋邊的警衛能夠更輕易地看出是否有槍枝。某些過去可以進口的食物現在都遭禁運，例如，伯利恆地區雕刻工業所使用的橄欖樹幹被禁運，因為其中容易藏匿武器；基於同樣的理由，裝載柑橘類水果的空的木製板條箱現在只能夠從西岸運到約旦，不可以再被載運回來。化妝品、不同種類的管子、噴霧器、茶桶，甚至香菸盒都遭到禁運，所有從橋梁彼端運過來的東西都必須接受全盤查驗。另外上千名回國居民和訪客的個人財產受到搜查，並進行搜身檢查。

達揚的「開放橋梁」政策曾經被看作是一個「安全閥」，給予西岸人一個離開佔領者、釋放怨氣的地方；但是約旦山谷炙熱的天候，尤其是夏天中，排隊等待數小時重新入境西岸前，必須經歷

最嚴格的搜身檢查，這些在在強化了巴勒斯坦人對佔領的怨恨。巴勒斯坦作家拉加．薛哈德（Raja Shehade）回憶他的表弟來訪後抱怨：

> 他抵達後整整咒罵了我兩天，他指控我，要我為他從約旦過來時在阿倫比橋（Allenby Bridge）受到的待遇負責。孩子被脫衣搜身時傳來的哭聲；看見要運到西岸下葬的屍體從棺材中被拿出來，以通過安檢；旅客們的鞋子被送去X光檢查，經歷漫長的等待後，他們雙腳散發出的臭味；令人心碎的一位母親的哀號，因為他十四歲的兒子被帶去審訊，久久不回。所有這些事情，以及每個人被叫到名字前那漫長的等待……[51]

屯墾區

在鄂圖曼時代（一五一七到一九一七年）和英國統治巴勒斯坦的時代（一九一七到一九四八年），幾乎沒有猶太人定居在現在我們稱為西岸的地方。反之，虔誠的猶太人多移民到以色列地帶的四個聖城定居——耶路撒冷、提比利亞（Tiberias，又譯太巴列）、采法特（Tzefat）或希伯崙，而不信教的猶太復國主義先驅，則大都安頓在地中海沿岸平原和耶斯列谷（Jezreel Valley），這兩處較多雨，較容易買到土地，且較少人居住。東巴勒斯坦的土地較貧瘠，且大都由巴勒斯坦個體農戶、家族和村莊平均持有，他們大致上都不願意將土地賣給外來人，對於移民吸引力較小。

然而，一九六七年的勝利之後，約旦河西岸變成以色列移民難以抗拒的地方：首先，有些人在這裡感覺到強烈的宗教連結，因為這是祖先的以色列地帶，是上帝承諾要給予猶太人的；其次，由於以色列本土剩餘的屯墾區已十分稀少，僅剩的可供使用的地區往往不吸引人，例如內蓋夫沙漠；反之，在佔領的西岸地區，似乎有一大片廣袤的空地等待開發。

以色列政府中鼓勵人們到佔領區屯墾的驅力，便是副總理以加爾・亞隆（Yigal Allon），他將這個想法納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的「亞隆計畫」（Allon Plan）中。

亞隆計畫 vs. 達揚計畫

前軍事將領亞隆在一九四八年戰爭中脫穎而出，主要從事國安相關工作，他相信猶太人屯墾西岸能夠確保國家安全。他提議以色列兼併一條大約十到十五公里寬、壤接整個約旦河西岸的長形土地，並且在那裡建立高密度的屯墾帶。這些村莊與約旦河畔的實體藩籬合併後，可以變成以色列和約旦之間的緩衝地帶，甚至防範更遠的、來自東邊的阿拉伯軍隊如伊拉克、敘利亞的入侵威脅。[52]亞隆的計畫也鼓勵在阿屬東耶路撒冷建立猶太市區，對於加薩走廊也提供了一些想法（見第二章）。

亞隆試圖透過兼併土地重繪以色列的疆界，同時避免任何巴勒斯坦人口的增加；在他看來，以色列無法在不威脅到猶太本質的前提下，吸納佔領地中快速增加的巴勒斯坦人口。因此儘管以色列會兼併這塊約旦河沿岸的長形土地，卻不會兼併西岸剩餘地區；反之，他會讓這塊本已人口眾多的

地區自己管理自己，如同一個自治區——他們能夠自治，處理巴勒斯坦的日常生活。[53]畢竟，四百年來鄂圖曼在中東總是提供區域內的少數族群——猶太人、基督徒和其他——政治、司法和經濟的實質自主權，而且成效卓著。

然而不久後，亞隆修改了他的計畫，將他原本想留給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轉而贈與約旦的胡笙國王。在這個新版本中，以色列兼併其國安所需之土地（主要分布於約旦河沿岸），而將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土地贈與約旦的胡笙國王，使之透過傑寧周圍的一條走廊地帶與約旦國土相連（見地圖三）。我們可以提供一連串的理由，解釋為何亞隆決定選擇約旦而非巴勒斯坦人，雖然主要的理由極可能是美方施加的壓力。當時美國堅持以色列對西岸的處置方式必須與美國政府的盟友、戰爭時佔領此地的胡笙國王共同決定。在一個決定應選擇巴勒斯坦或約旦的官方辯論中，副總理亞隆清楚聲明他傾向與約旦國王打交道，因為「美國人較希望如此」。[54]

然而亞隆的贈與是有一些條件的。首先，約旦國王必須同意，贈與他的西岸地區要永久維持無軍隊駐守，不在那裡部署軍力，否則會威脅到以色列的安全。其次，國王必須同意以色列進入這些地區追捕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以免他們將這些地區當作跳板，對以色列發動攻擊。第三，國王必須認可阿屬東耶路撒冷和約旦河沿岸兼併區的以色列主權。最後，因為以色列也希望兼併一些加薩走廊的土地，約旦國王必須同意吸收原本居住在這些地方的巴勒斯坦人，讓巴人遷居到他的土地上。[55]為了誘使胡笙國王接受這個計畫，亞隆提議給予他一條道路，使之得以從西岸轉進加薩走廊北部，如此一來，約旦便擁有了進入地中海的機會——這是它自從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後就喪失的重大

利益。

達揚強烈反對亞隆的計畫，不單單因為兩人是宿敵；在一九六七年戰爭前情勢高漲時，他們都爭奪過國防部長一職，達揚的勝利激化了兩人間的緊張關係。

然而達揚反對亞隆計畫的原因，不僅侷限在個人恩怨的範疇；他認為將巴勒斯坦人擠進西岸，夾在屯墾區和以色列本土之間的作法是不可行的。「他們不是笨蛋，」達揚堅稱，「如果我們要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夾在中間……這就表示西岸從約旦脫鉤……」[56]與之相反的，達揚提出了他自己的計畫，而這計畫在很多地方都是亞隆計畫的鏡像。

達揚認為西岸中央的山脊，**而非**約旦河沿岸低地，才是以色列國家安全所需要的戰略土地。因此他提議將屯墾的「拳頭」延伸到西部，從以色列本土擊出，直到西岸山脊的深處。他擬出五個區塊，從北部的傑寧，經過納布盧斯、拉馬拉，到南部的希伯崙山，每一個「拳頭」（屯墾區）都伴隨著一個軍事基地，並且透過公路系統，皆可通往以色列，電力、自來水和通訊亦復如此。由於猶太屯墾區比鄰巴勒斯坦人口稠密區，以色列得以繼續控制整個西岸土地——但是根據達揚的計畫，住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是約旦哈希姆王國的臣民，從一九五〇年，阿卜杜拉王兼併這個地方開始便是如此。不同於亞隆計畫的是，巴勒斯坦人不會覺得變成約旦河沿岸猶太屯墾區和以色列本土的「夾心餅乾」，如此一來，他們較不會感受到戰爭的擾動和佔領的事實，因為他們仍可以在達揚的「開放橋梁」政策下自由進出約旦。

亞隆和達揚的計畫代表著兩種非常不同的佔領哲學，兩者將在接下來的歲月中持續相互競爭。亞隆希望在兼併最少土地的情況下，確保以色列的安全，並且試圖完全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他們居住的土地切割開來。相反的，達揚希望繼續維持整個西岸的佔領，因為如同他常說的「這是朱迪雅和撒馬利亞……我們的家鄉」；此外不同於亞隆，他不覺得以色列需要與巴勒斯坦人分隔開來。他認為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可以肩並肩地生活，也能整合在一起。他所謂的整合，是指巴勒斯坦人終究會因為其經濟能力而變得**依賴**以色列，同時他相信，當他們與以色列經濟相調和後，他們的民族主義色彩會變得較不濃厚，也較不反抗以色列的存在。達揚並沒有掩藏他的看法；如同他告訴巴勒斯坦詩人法德娃．圖肯（Fadwa Tuqan）的這段話：「這可比為一個男人和他所綁架的女人之間的關係，雖然女人並不愛他，也不想嫁給他，但是一旦他們的孩子出生了，孩子會把男人視為他的父親，把女人視為母親。這個綁架行為對他們來說不具任何重要性。你們也是，今天人們不想要我們，但是我們把自己強加在你們身上。」[57]在訪談的錄影中，達揚往往會把他的手指交纏在一起，並且說他想要在佔領地製造一個情況，讓佔領地難以脫離以色列，「就像把我交纏的手指分開一樣困難」。

然而，政府拒斥了達揚的方案，對他的「整合」構想感到遲疑。達揚的其中一位同事和親密盟友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稍後觀察到：「摩西〔達揚〕的觀點是，如果我們學會『與阿拉伯人共同生活，而非活在他們之上』，我們便能控制領地，或者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改變對阿拉伯人的態度，我們就不需要改變地圖——這些說法都是看走了眼，會鑄成歷史性的錯誤。」[58]或許政

府反對達揚計畫的另一原因，是該計畫提議以色列應該安頓在**遠離**約旦河的區域，也就是約旦河西部的山脊，這與以色列的戰略思考背道而馳，後者認為國界應該設在猶太人**實際**落腳的地方，而非地圖上的一條線。

至於亞隆的計畫，政府沒有正式採納，也沒有駁斥，也許只是因為政府無法下定決心，或是因為若政府持續對佔領地的意圖含糊其辭，便可以不因其政策違反國際法而遭受批評，因為國際法不允許佔領地有地上的實質改變。畢竟，即使是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美國，都清楚表達不支持亞隆計畫的實行，因為華盛頓政府只能贊同「在安全前提下極小的改變」，而亞隆計畫似乎表達的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是維繫在「土地的實質獲取」上。[59]儘管如此，亞隆計畫在繼任的勞工黨政府主政下，變成一個非官方的屯墾設置藍圖。

合法化掠奪之地

因為新的屯墾區必須建立在無既有居民和地主的情況下，以色列政府進一步建立了一個合法的官僚法律結構，以容許「合法」獲取巴勒斯坦土地。這個想法乃欲建立一個系統，在此系統下，土地可以從**私有**轉變為**國有**財產，然後屯墾區和道路可以在此建立起來，以此創造地上事實。

這個法律的主要基礎是英國的《緊急狀態法律》（Emergency Law，一九四五年）和《關閉區域法》（Law of Closed Areas，一九四九年），允許軍隊在情勢未明之時封鎖任何地區，以利軍事作

業。而《行動法》（Law of Taking Action，一九五三年）亦允許國家沒收任何巴勒斯坦地主沒有耕種的土地，作為軍事防禦之用。在接管土地之後，軍隊就將其轉交到屯墾者手中，建立屯墾區。

還有其他獲取土地以建立屯墾區的辦法，例如宣稱它是「缺席者財產」（absentee property）；軍事命令第五十八條定義缺席者財產為：「合法擁有者或任何具有法定控制權的人，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被軍隊佔領〕以前或以後，離開了這個區域」的情況；在佔領最初幾年，以色列人登記了西岸大約百分之七點五的土地為缺席者財產，其中不乏在戰亂下變成難民逃往約旦的西岸人，或者那些在戰爭期間離開這個國家，並且從此不許再回來的人。另一個軍隊用來接管巴勒斯坦土地的手段，便是宣稱它為「敵邦的財產」；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發布的軍事命令第五十九條宣布，任何歸屬於敵邦的土地或財產，都應該變成以色列的國有財產。事實上，除非巴勒斯坦人能夠證實他們的所有權，否則所有土地均可視為國有財產；然而，證實往往是困難的，因為很多西岸的交易都未曾留下記錄，土地所有權也往往奠基於非官方的共識上，或來自過去幾代財產的繼承。

那麼接收被沒收的巴勒斯坦土地的屯墾者呢？如同前面所說，一九四九年《日內瓦第四公約》禁止佔領方人民移居佔領地，但是允許軍事人員進入這些地方。為了設法規避公約，政府使用納爾旅（Nahal Brigade）——一個統合了軍事和民事任務的軍事單位。他們穿著制服，肩負在因「軍事目的」而被沒收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造幽靈「軍營」的任務，當這些軍營成為地上事實後，便再被轉交到人民的手中——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屯墾區。

儘管許多法規表面上容許巴勒斯坦土地充公以建立屯墾區，但是佔領的第一個十年，以色列的政策與後來相比，仍然是限制重重的。首要規則是，屯墾區必須建立在巴勒斯坦人口中心之外，並以國家安全為主要考量：將一個村莊建立在什麼位置可以大體上保護以色列不受阿拉伯人跨過約旦河的侵襲。儘管如此，仍然有許多「特殊案例」，其中最惡名昭彰的案例便發生在希伯崙。

希伯崙的對峙

希伯崙位於耶路撒冷以南三十二公里左右，地形多山丘和溪谷，一直以來對穆斯林和猶太人都具有重大意義。對於猶太人，它是僅次於耶路撒冷的重要聖地；「希伯崙」此名來自希伯來文的「朋友」（haver），典出基督教元老亞伯拉罕，因為他被認為是上帝之友。希伯崙的阿拉伯名「哈利勒」（Al Khalil），字面意義是「朋友」，同時也指亞伯拉罕，因為穆斯林也同樣稱他為上帝的朋友。根據聖經，上帝在這裡與亞伯拉罕訂下契約，要他大量「繁衍後代」（創世記17），而亞伯拉罕以四百個舍客勒的銀子（Shekel，古希伯來或巴比倫人使用的貨幣度量單位），向西台人以弗倫（Ephron the Hittite）買了一個洞穴和鄰近的田地，作為家族的墳墓（創世記23）。根據聖經，亞伯拉罕與以薩（Isaac）、雅各（Jacob）、撒拉（Sarah）、利百加（Rebecca）和利亞（Leah），就埋葬在麥比拉洞（The Cave of Machpelah）中。[60]當然，亞伯拉罕也是穆斯林的祖先易司馬儀（Ishmael，基督教譯為以實馬利）的父親，祖先的洞穴對於穆斯林也非常重要，因此他們在洞穴上

方建造了易卜拉希米清真寺（Ibrahimi mosque）。

幾個世紀以來，僅有很小的猶太社群住在希伯崙的阿拉伯人之中；他們的數量在十九世紀末時因東歐猶太人遷居此地而增加。但是希伯崙的猶太人一直以來都被他們的鄰居憎惡著，將之視為驕傲的殖民主義者；在一九二九年八月橫掃巴勒斯坦的族群暴力浪潮下，六十七個猶太人被希伯崙的阿拉伯人殺害，他們的社區和猶太教會堂也被摧毀。倖存者逃往耶路撒冷，並且留在那裡，直到一九三一年，三十一戶猶太家庭回到希伯崙重建他們的社區。然而，這個努力並不長久，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託管此地的英國政府為防流血衝突重演，決定疏散此地的猶太家庭。一九四八年戰爭中，約旦的阿拉伯軍團得到了希伯崙，一九五〇年進而得到整個西岸，將之整合進約旦哈希姆王國中。

七十年以後，一九六七年戰爭的第四天，希伯崙被以色列軍隊佔領；猶太人希望回到此地重建他們的社群，然而如今這裡已經是一個傳統、保守的純阿拉伯小鎮，自此希伯崙的衝突似乎無可避免了。

禍端浮現於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四十到四十五個虔誠的猶太人抵達希伯崙，慶祝猶太逾越節（Passover）。他們因為幾天前報紙裡的一則廣告而聚集在此，廣告呼籲欲重建古希伯崙城的家庭或個人請與摩西．勒文傑（Moshe Levinger）聯絡。勒文傑時年三十五歲，是一位極端的猶太牧師，有著救世主般的狂熱，要將希伯崙收回給猶太人。負責此地的軍事指揮官納爾基斯上將要求他們隔日便離開希伯崙，在此條件下放他們入城。由於這群人攜帶的行李異常之多，包括冰箱、洗衣

機和其他家電用品，上將必定早已得知他們真正的意圖。獲得准許後，勒文傑帶著他的人馬，住進了由巴勒斯坦裔加瓦斯米（Qawasmi）家族所掌管的埃爾哈勒德旅店（El-Haled Hotel）。

旅客非常興奮，而勒文傑牧師的太太米莉安（Miriam）回憶道：「每個人都極度興奮、快樂，如同救世主就在附近街角一般……就像他們已經與上帝直接接觸了。」[61]他們清潔分配給他們的廚房，舉辦逾越節晚宴（Seder），但是隔天，他們沒有如承諾的那樣離開希伯崙，反而在旅館升起一面以色列國旗，宣告將從此定居城中。他們在二樓設置臨時神學院時，旅館主人法赫德・加瓦斯米（Fahed Qawasmi）要求他們離開，但遭到拒絕。四月二十一日，希伯崙市長穆罕默德・阿里・賈巴里（Muhammad Ali al-Ja'abri）寫信給總理勒維・艾希柯爾和國防部長，抱怨這群人的入侵，雖然帶有些許諷刺口吻，但他說，希望希伯崙的猶太人回到他們老家的這一天將會到來，而阿拉伯難民也可以回到他們於一九四八年離開的巴勒斯坦家園。

最適合處理這個問題的人非達揚莫屬，但他當時因一起嚴重事故住院療養，無法動彈。當他缺席時，這件事情便落入受達揚對手亞隆影響極大的以色列總理手中。亞隆說服他的同事讓遷居的屯墾者繼續留在希伯崙，這令達揚大失所望。[62]在幾年後的一次訪談中，達揚觀察到：「亞隆並不關心希伯崙的移居者，他只針對摩西・達揚。我反對在這裡野蠻的墾殖，這點對他來說，已是充分的理由，促使他想方設法讓這些人留在那裡。」[63]

在達揚出院時，希伯崙事件已成定局，達揚覺得除了與同意搬到軍事圍籬裡的屯墾者妥協外，

再無其他選擇。達揚或許希望軍事基地內艱難的生活條件可以打消這些屯墾者的念頭，但是顯然他太小看他們的決心了；他們在嚴峻的軍營中汗水涔涔，與達揚和軍隊打持久戰。最後，一九七〇年，在同情屯墾者的行政首長們施以的壓力日益攀升下，達揚同意讓他們在希伯崙城中心的東部建立屯墾區。接著，在基利亞巴（Kiriath Arba）——聖經中希伯崙的另一個名字（「現在希伯崙這個名字以前是基利亞巴……」約書亞書14:15）——二十五公頃巴勒斯坦人民的私有地，被軍事總督以安全考量為由徵收。起初建立一個「軍事基地」，然後在一九七一年，二百五十個軍事單位竣工後，第一批屯墾者開始遷入屯墾區。

在與屯墾者的對話中，達揚敦促他們不要教孩子憎恨阿拉伯人，屯墾者們回答：「阿拉伯人必須知道，這裡是有主人——猶太人的。猶太人統治以色列地帶（*Eretz Israel*）……阿拉伯人不過是碰巧住在這個國家的過客……」[64]達揚很清楚，與屯墾者妥協是一個天大的錯誤，他終其一生都為此感到悔恨。「我沒有盡到國防部長的職責，」他日後說，「因為我沒有阻止發生在希伯崙的海盜屯墾。我知道它的後果，這是一場災難，我曾經以辭職要脅……但是我並沒有說到做到，為了這個我真的感到抱歉。」[65]

屯墾者運動大獲全勝，這就是達揚所言「對未來有著潛在危險」，[66]因為它表示一群志在必得的少數人可以強加其意志於政府之上。屯墾者們確實學到了，純粹的執著可以戰勝一切，而希伯崙事件的野貓佔領行為，為未來西岸其他地方的屯墾者群體開了先例。

說服一位國王

同時，遠在佔領地之外，一九六七年戰爭後的數週、數月間，以色列官員在倫敦和巴黎與約旦胡笙國王召開了一連串的會議，直到一九六八年。其中一次會議發生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出席的有以色列外長埃班、國王和兩名助手。埃班試圖表達以色列對約旦的和平議案以及亞隆計畫。根據計畫，西岸佔領地的責任可以劃分，由以色列和約旦共同承擔；埃班試圖澄清的是：如果其他地方，例如埃及和敘利亞拒絕簽署和平協議，約旦國王可以單獨與以色列簽署協議嗎？他能夠確保反以色列的恐怖行動不再發生嗎？[67]國王聽完埃班的報告後，承諾稍後會就分離計畫給予回覆，而埃班顯然將國王彬彬有禮的回應視為會議進行順利的跡象；事實上，在得到胡笙的正式回答前，埃班已建議內閣，下個會議應由總理來面見胡笙國王。[68]但是艾希柯爾並不特別積極，他拒絕了親自與國王商談的建議，生怕這會為談話帶來太多衝力，甚至迫使以色列在土地方面做出讓步。

與之相反的，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身為行政首長的埃班和亞隆面見了國王，亞隆藉此以「個人」而非官方的名義說明了他的計畫。[69]他非常大膽地說：「國王應該為一九六七年的戰爭負責……」[70]他告訴胡笙國王：「你戰敗了，你就必須背負這個後果。」他們徹底討論過亞隆的想法。國王習慣性地承諾會仔細考慮這件事情再回覆以色列。一段時間後，他以文件形式提出六個重點，說明「完全無法接受」亞隆計畫。國王的使節解釋道，未來任何和平方案都必須是能夠讓國王「向阿拉伯世界解釋……且……阿拉伯世界能夠接受的……」。[71]更多會議在國王、埃班、亞隆以及幾

位助理之間召開，討論以色列開出的條件，其中尤以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以色列輪船上進行的會議最為重要，但是所有會議最後都無寂而終。

也許是被勝利沖昏了頭，以色列才會認為戰敗的胡笙國王會接受他們提出的任何條件，或以為經過一段時間後，國王對面臨失去整個西岸及接受以方施予的少許土地兩者之間，會折衷接受亞隆計畫，事後證明這樣的想法大錯特錯。不過更可能的原因是，以色列在與當地巴勒斯坦人的協商，或是稍後與國王的協商中給出的讓步都少得可憐，他們有把握這樣的條件會被拒絕，職此便可以理所當然地緊抓著這些土地不放。對國王來說，最底線就是收復西岸失土，雙方只做少許的疆界更動。顯然，他不願卸下對耶路撒冷穆斯林區和基督徒區的責任，但是以方卻堅決將此地收歸轄下，一如他們堅持擁有西岸土地一般。也許，胡笙國王認為較為明智的作法是讓以色列繼續參與其中，以防止以方與巴勒斯坦地方領導人在他背後私下協議，甚或更糟的情況是，將他還在設法討回的土地主權，授予巴勒斯坦領導人。

殖民

同一時期，在西岸，佔領正劇烈地改變當地經濟：觀光交易在過去是主要的部分，也是外幣的重要來源，現在尤其受到重挫。戰爭前，西岸吸引觀光客從世界各地聚集而來觀覽這些聖地，尤其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地方首長安瓦爾・哈提卜・塔米米（Anwar al-Khatib al-Tamimi）回憶一九

六七年之前的景象：

> 一九六七年以色列攻擊之前，耶路撒冷曾經非常繁榮……城中的旅館家家客滿，市場中群眾摩肩接踵，紀念品店也充斥著觀光客，觀光巴士堵住了耶路撒冷和西岸的街道。我們可以看見數十名搭便車的人背著他們的背包在城鎮間的小路邊，以拇指招攬便車載他們到下一個目的地……[72]

阿拉伯旅客尤其規律地來訪此地，像是冬天的熱門景點耶律哥，和被譽為「約旦的瑞士」的夏季景點拉馬拉，這樣的旅遊尤其吸引約旦的有錢人離開安曼來此避暑。但如今跨河大橋變成了斷垣殘壁，戰爭也使觀光事業幾乎全部停擺。以色列對於觀光的管理模式還渾沌不清，且大抵意興闌珊，尤其不歡迎阿拉伯觀光客蒞臨現在的以色列佔領區。雖然以色列觀光客的確遞補了這個缺口——戰後，許多以色列人蜂擁到耶路撒冷和西岸來——但是典型的以色列觀光客只會在這裡留宿一晚，這對於重振西岸旅館業和服務業並無太大幫助。

佔領同時也改變了西岸的農業。在戰前，農作物曾經是經濟的穩定支柱，也是出口的主要產物。透過眾多小額經銷，銷售到當地市場和對岸的約旦。因為傳統且守舊，這種經濟模式無法與其他地方一樣與時並進：百分之二十的可耕地仍舊任其荒蕪，因為沒有使用肥料、現代農業機械與合適的灌溉方式，也沒有嘗試改良農作物以適應氣候。戰後的一小段時間，以色列人貢獻卓著，派遣

專家和顧問來指導以色列農民如何使用新的農業技術，例如使用塑料覆蓋薄膜來保護農作物，使用灑水器或滴灌的方式來代替原始的灌溉方法。在以色列的指導下，佔領地引進了新的機械器具，戰前西岸的拖拉機不到三百輛，一九六八年數量增加為四百六十輛，十年後更增加到一千六百七十三輛。以色列人也幫忙接種動物疫苗。一九六九年的軍事報告細述其過程：

> 在獸醫檢視所有牛群的期間，大約三萬頭牛被做上記號，施打口蹄疫疫苗。牛隻被檢查是否罹患肺結核，病牛被軍政府買下來屠宰掩埋，不會造成農民的損失。而整個雞群——大約五十萬隻雞——被施打了新城病（Newcastle disease，或譯「紐卡素病」）疫苗……由於今年施打疫苗，雞隻的死亡率顯著降低，其數量比過往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上千隻狗則遭到撲殺。[73]

這些措施並非出於慷慨，而是因為確保巴勒斯坦牲畜的健康，對以色列有既定的利益，畢竟病毒和疾病是不分國界的；同時人們認為，對於以色列支援的依賴和相對的經濟繁榮，足以壓制巴勒斯坦的國族主義。然而以色列農夫將西岸的現代化農業視為自身利益的威脅，他們向政府施加的壓力日益攀升，政府遂停止協助巴勒斯坦農民。而且為了保護以色列農業，政府甚至禁止西岸農作物銷售到以色列本土；反之，他們被銷往東岸——到約旦和其他更遠的地方——而同時，以色列農夫前往西岸市場的管道卻暢通無阻。政府也採取措施，透過鼓勵西岸農民生產經濟效益低、往往被以色列忽視的農作物，以確保巴勒斯坦農業能夠補給以色列本地的需求，而非與之競爭。

然而，對西岸農業打擊最大的，莫過於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八月的決策，將水源供給的管理權轉移給軍事單位職掌（與一九六八年三月在戈蘭高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加薩走廊的作為如出一轍）。這個改變使鑽井灌溉受到嚴格限制；許可證體制再度沿用，隨之而來的是繁冗的官僚作業。大部分巴勒斯坦人急需用水，但他們遞交的申請書卻遭到否決，僅有極少數人得到家庭用水的許可。一九七五年，以色列將螺絲拴得更緊，透過配額制來限制從已開鑿的井中汲水，並且裝置計量器來執行這個新規定，林林總總的規定，造成能夠使用的水量過少，無法維持健康活躍的巴勒斯坦農業。

在工業方面也是類似，以色列鼓勵西岸人專注於發展能夠補足以色列經濟需求的工業。例如成衣工業，由以色列製造商會提供原料——衣服和設計模板——而大量的巴勒斯坦工人（通常是女工和童工），在低廉的工資下使用縫紉機做苦工。就像在其他領域一樣，許可證體制被用來重新編制西岸工業以符合以色列需求，避免與之競爭。

佔領也頗為劇烈地改變了西岸的就業市場。戰爭結束時，西岸的失業人口極高；巴勒斯坦共計八萬五千七百名的勞動人口中，就有高達三萬到五萬的失業人口。認知到失業現象會加深對佔領的憎恨，以色列試圖創造更多工作機會，首要的就是透過工務局。為了將工作分配給更多的西岸人，工作的形態變成一星期只有上工二到三天。這樣的模式在數字上有著顯著成效，一九六七年九月西岸失業人口已降至兩萬五千人（失業率百分之三十），一年後更降至一萬一千五百人（失業率百分之十四）。

雖然在往後數年，加薩走廊行將變成以色列主要的廉價勞工來源，但是戰後，第一批被以色列雇用的巴勒斯坦人是來自西岸。在一九六八和一九七二年間，西岸成立了二十三家工作仲介以調節工作市場，顯然是為了工人的利益，但是事實上也是為了滿足以色列的工、商業需求，且以安全考量而言，也能趁機篩選工人：這些仲介代表為以色列沙巴克安全局工作，透過雇請願意幫助佔領者的合作對象，提供安全局情報。

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勞力逐漸被集中用於營造業，營造業變得幾乎完全依賴巴勒斯坦勞工；諷刺的是，在西岸建立的新猶太屯墾區，往往都是巴勒斯坦勞工建造的。即使傳統上總是依賴猶太勞力的基布茲（*kibbutzim*），在農業和工廠方面也開始雇請巴勒斯坦工人。同時，以色列工人不再做這些純勞力、無技術性或技術性低的營造、服務、農業或低科技產業的工作，轉而從事高技術、高科技、管理和官僚階層的工作。以色列不能合法雇用未滿十七歲的巴勒斯坦人，他們轉而流向黑市，那些為免繳百分之三十所得稅而不願意受官方登記的人亦同，以色列人必須負擔這種高所得稅率，他們甚至比西岸巴勒斯坦人的負擔更重。巴勒斯坦工人面臨兩難，一方面官方禁止他們在以色列過夜，另一方面以色列老闆又希望他們在以色列待上一星期，每天負擔更長的工時。這導致巴勒斯坦工人必須非法住在情況惡劣的地方，擠在農場外的庫房、棚房、倉庫等處。同時，因為太多人到以色列工作，西岸農地幾乎任其荒蕪，無人耕種，使軍隊更容易徵收這些未耕種的地方，以建立猶太屯墾區。

但是，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的收入，比留在西岸工作多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百，以色列人

所提供的新工作導致快速的經濟成長。因為人們口袋裡的錢更多了，私人消費爆增；西岸人現在能買更多瓦斯爐、冰箱、電視機和其他家電用品。另一方面，因為受過教育且具技術能力的巴勒斯坦人開始向外找尋工作機會，這個新的勞動市場對西岸的社會結構有著非常負面的影響。西岸社會的菁英如教師、醫生、工程師和其他專業人士，大都移民到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約旦和其他地方，拋下未受教育的無產階級在以色列工作，或者留在西岸做少數他們可以做的事情。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苟延殘喘

如前所述，一九六七年戰爭的影響，由阿拉法特等人領導的巴勒斯坦反抗運動試圖在西岸穩定陣腳，以抵抗佔領。但是軍隊一點一滴成功地將他們從這個地區驅逐出去，趕到對岸的約旦。這些游擊兵分屬不同的巴勒斯坦派系，有著不同的理念基礎，從巴勒斯坦國族主義（法塔）、毛主義（PFLP），到基本教義派的馬克斯主義（PDFLP）；但是他們都是一九六七年戰爭後才萌生的，附屬於一個母體大傘之下，亦即「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簡稱 PLO），這是一個政治與軍事並行的組織，創始於一九六九年，由阿拉法特領導。

被以軍從西岸趕到約旦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繼續透過傳遞指示、金錢和武器，嘗試動員西岸民眾對抗佔領。同時，在約旦本土，他們把目標轉向胡笙國王，試圖推翻他的政權，若沒有了胡笙國王這塊絆腳石，他們就能把約旦國變成反以游擊隊的行動根據地，最終解放巴勒斯坦。最重要的

是約旦的地利優勢，因為以約之間的國界線長，且約旦的巴勒斯坦人為數眾多，普遍對此事心有戚戚。然而，這卻鑄下了致命的大錯。巴解組織低估了胡笙國王的能耐：一九七〇年九月，胡笙國王對巴勒斯坦游擊隊騷擾他的王國忍無可忍——當時約旦王國的部分地區只差沒有全然淪入巴勒斯坦游擊隊的統治之下——在後來稱之為「黑色九月」（Black September）的事件中，胡笙國王轉而對付巴解組織，叛亂分子被逐出約旦，輾轉進入黎巴嫩。

巴解組織在約旦的重挫，對於被佔領的西岸有著極劇烈的影響，巴解組織就此失去了對當地政策的影響力。在此背景下，一九七一年十月以色列內閣決定在西岸舉行市政選舉，如今時機成熟了——這是一九六三年以來第一次選舉——政府高層推測，因巴解組織在約旦受到重創，一般西岸人應該更不會投給親巴解組織的候選人，換句話說，這將使相對溫和且國族主義色彩淡薄的候選人贏得選票。在英國託管時期以及一九四八到一九六七年間約旦治下，西岸市政府掌理重要的都市機能，如都市計畫、建築營建許可、自來水和電力使用等。但是在以色列佔領下，這些機能都被褫奪，並且轉移到軍政府手上。即便如此，西岸市政府的確扮演著重要角色，亦即西岸人民和軍政府之間的橋梁——如轉交許可證申請書，它也因而變成軍隊管理佔領區的工具。因此，對於以色列而言，在西岸選出非親巴解組織的議員才會如此重要，也因此，他們覺得在巴解組織最虛弱的此刻實施選舉是一個好時機；而且，實施選舉能夠賦予佔領一個開明的假象。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軍隊宣布撒馬利亞和耶律哥第一輪全面市政選舉的日期為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一旦以色列人能夠準確評估情勢，並且計畫好進行的方式，其他的選舉將稍後舉

行。

然而，巴解組織嗅出了玄機，迅速回應，警告西岸人不要與佔領政府合作，且接下來的市政選舉也不要去投票。這番話效果卓著，尤其在國族主義色彩最濃的納布盧斯以及西岸北部。由於擔心其他城市會仿效納布盧斯，軍隊召集了納布盧斯的阿爾．馬斯里（Al Masri）和圖肯家族成員，以直升機載送他們到朱迪雅和撒馬利亞區在貝特埃爾（Beit El）的司令總部，他們在那裡謁見了以色列國防部長。達揚威脅道，如果他們無法在接下來的選舉中推出候選人，軍隊會接管他們的私人工廠，禁止他們載運產品過橋到約旦，且等著看納布盧斯成為廢墟。

選舉日投票的隊伍大排長龍：百分之八十四具有投票權的公民都前來投票，相對而言，一九六三年的選舉，投票率只有百分之七十六；如同以色列的正確預測，巴解組織的候選人都戰況不佳，而中間路線的候選人則成功維持了大部分市政府的多數席次。以色列見獵心喜，五週後，西岸其餘的選舉也陸續展開，在這些選舉中，巴解組織的候選人選情普遍不佳，而中間路線的候選人繼續執掌西岸市政。

以色列繼續對巴解組織施加壓力，一九七三年四月以方在貝魯特（Beirut）暗殺了三位巴解組織領導者。但是政府小看了佔領地對巴勒斯坦游擊隊的支持；暗殺潮引爆一陣抗議風暴，導致西岸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原本集會運動中使用的約旦旗幟，如今換成了巴解組織旗。同時在國際間，巴解組織取得了更有力的形象；十月十四日聯合國常會，與會的多位穆斯林國家代表由於同情巴勒斯坦的困境，邀請巴解組織來參加會議，討論以巴問題，因此給了它聯合國觀察員的身分。兩週後，阿拉伯高峰會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Rabat）舉行，宣布巴解組織——而非約旦——是「唯一正統的巴勒斯坦人民代表」。[74]最後，阿拉法特被邀請到紐約聯合國常會上演講，這番話變成了後來著名的「槍與橄欖樹枝」（gun and olive branch）的演說。「我持著一根橄欖樹枝和一把自由戰士的槍來到這裡，」他告訴會眾：「不要讓橄欖樹枝從我手中掉落。」這番話使得巴勒斯坦佔領地舉國歡騰，上千名群眾衝上街頭表達他們對巴解組織的支持，譴責以色列的佔領。[75]以色列軍隊嚴厲地反擊，延長宵禁時間，逮捕兩百位以上的群眾，對一百三十二位巴勒斯坦人處以六個月以上的徒刑，並科處罰金。[76]

因此，儘管一九七〇年九月在約旦和一九七二年的選舉遭遇雙重打擊，巴解組織在被佔領的西岸顯然握有基本盤，甚至成功地重燃抵抗精神，同時約旦國王的影響力似乎正逐漸走下坡。繼之，一九七六年以色列軍政府再次舉辦西岸市政選舉時，巴解組織大獲全勝。

如前所見，由於一九七二年巴解組織杯葛選舉，並且敗在中間路線的候選人手下，這些候選人大都較為傾向與佔領政府合作；現在，巴解組織從過去的失敗中汲取教訓，大幅宣傳自己的候選人，組織他們進入「全國聯盟」（National Bloc）。另一方面，以軍則幾乎全面禁絕全國聯盟，試圖阻止他們推行自己的議程，並且直接介入他們的選舉造勢活動——禁止印有巴勒斯坦國旗的海報，並且切斷巴解組織候選人支持者的遊行隊伍。

在希伯崙，軍政府內部的擔憂日漸攀升，擔心巴解組織會打敗中間路線、反國族主義的現任者賈巴里是以色列的親密盟友，佔領之所以能順利推進，他扮演了關鍵角色。[77]在一九七二年選舉時，賈巴里是唯一的候選人，因為清單上沒有其他候選人來挑戰他，所以自動當選；但是，現在他面臨了巴解組織候選人艾哈邁德・哈姆茲・納特實（Ahmad Hamzi Natshe）的挑戰。現任國防部長希蒙・佩雷斯允許軍隊在希伯崙執行所謂的「有限度的干預」，以助賈巴里一臂之力。隨後，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軍隊以刺激與組織罷工為由把納特實驅逐出境、徹底趕出希伯崙。[78]這對巴勒斯坦選舉露骨的干預行動反而產生反效果，在希伯崙人民之間引燃更臻沸騰的民怨，致使最後賈巴里全面退出選舉活動。

選舉當日，四月十二日，六萬三千名男女前往投票，投票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二點三。巴解組織在西岸上下打了場漂亮的勝仗，而以色列的中間路線盟友，也就是約旦政權的殘存者，敗選後失去了權力。在一百九十一個競爭席次中，巴解組織所領導的國家聯盟拿下了教人咋舌的一百四十八席，反國族主義者的唯一勝仗是在信仰基督教的伯利恆，埃利亞斯・弗拉杰（Elias Freij）獲選為當地市長。[79]

在這些選舉之後，一組新的執政者出現在西岸，他們血氣方剛，更為激進，耀示著一股嶄新的政治作風，並且毫不諱言地支持巴解組織。新任市長中，有八位國族主義立場鮮明，相較之下，一九七二年的選舉中只有三位；十八位新議員曾經參與軍隊所稱的反佔領「恐怖主義活動」（terrorist activities）；其中九位曾經進出以色列監獄，一位在選舉期間還身陷囹圄。最激進的改變發生在納

布盧斯和希伯崙，在納布盧斯，親巴解組織的候選人贏得了議會的所有席次，只失掉一席，新上任的市長巴山・沙卡（Bassam Shaka）公開與以色列為敵；在希伯崙，賈巴里的溫和路線宣告終結，因為他的繼任者是親巴解組織的法赫德・卡瓦斯摩（Fahed Kawasmeh）。

選舉說明了大部分西岸人口在佔領之下都發展出強烈的國族情感；他們支持巴解組織為他們的代表，反對約旦的西岸政策；約旦的影響如今已秋風蕭瑟了。不若以往互相交惡的前任領導者，新當選的親巴解組織領導人彼此合作密切，商討著反佔領行動策略，並且在選舉後數週內，便發動了一連串的抗議與示威遊行，反對徵收土地和猶太屯墾區的建立。

巴解組織的勝利是如此驚人，以至於接下來的十年間，以色列避免在西岸再舉行任何市政選舉，以免巴勒斯坦國族主義的勢力從中獲得更廣泛的支持與勝利。

佔領者的面貌

在佔領即將屆滿第一個十年之際，究其所以，可清楚看見佔領絕非以色列人所聲稱的那般開明。雖然以色列允許市政選舉，以軍卻抑制政治自由、摀住媒體的口、執行審查制度，並且同時在佔領的土地上促進屯墾區的建立——這些在在都與國際法相抵觸。雖然歷任的勞工黨政府試圖將屯墾區的建立導向約旦河谷，遠離巴勒斯坦人聚集的區域，然而宗教團體卻施以日漸沉重的壓力，其中「虔誠教徒集團」（Gush Emunim）就曾迫使政府緊挨著巴勒斯坦人口稠密區建立屯墾區；及至

一九七七年五月為止，西岸已經有二十四個屯墾區和三千兩百位移居者（不包括耶路撒冷）。

西岸在佔領的第一個十年相對繁榮，但是在許多方面，這只是人為的經濟表象——可歸因於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工人寄回家的薪資，以及胡笙國王在威信下滑的情況下，為了緊抓住所剩無幾的影響力而挹注的金錢。在這佔領的第一個十年，西岸經濟被轉變成殖民式經濟，為以色列提供廉價勞力、強迫購買以色列產品，而且無法與獲得津貼補助的以色列農業競爭。與此同時，以色列對水的控制迅速地癱瘓了巴勒斯坦農業。

雖然政治上來說，以國曾經躊躇不前地提出過許多試圖解決以巴衝突的方案，例如實施前述的亞隆計畫、達揚計畫等，但是這些方案都逐漸被更體制化的、對土地與人民的軍事控制所取代。

2 加薩走廊

加薩走廊鑲嵌在今日的以色列與地中海之間，南邊有一小段疆界與埃及接壤，面積相對狹小，形狀大致為長方形，長四十公里，寬六點四到十二公里，總面積三百六十平方公里。不論是歷史、政治或宗教，這裡的重要性都遠不如西岸，因此加薩走廊往往被稱為「西岸領養的小孩」。

無論是在鄂圖曼時期（一五一七到一九一七年）被歸屬為獨立的耶路撒冷桑賈克（independent Sanjak of Jerusalam），或英國託管時期（一九一七到一九四八年）歸屬於巴勒斯坦託管地（Mandatory Palestine）南部轄區，今天的加薩走廊都未與巴勒斯坦其他區域區別開來。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當聯合國提議將耶路撒冷劃分為阿拉伯屬與猶太屬時，將一個「L」型區域，包含加薩走廊與其周邊地區，劃歸給阿拉伯人。然而，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和埃及的激烈戰爭，使這塊領地面積縮小，三分之二的土地被併入以色列；而剩下的土地，包括主要的加薩市和其他小城鎮，則落入埃及手中。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簽署《以埃停戰協議》（Egyptian-Israeli Armistice Agreement），結束了戰爭，

這塊埃及獲得的土地變成了家喻戶曉的「加薩走廊」。

雖然加薩走廊變成政治實體是不久以前的事，但是同名的非官方首都加薩市，卻是世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位於古老的「沿海大道」（*Via Maris*）上，這條古老的大道西起埃及、沿著海岸線經過巴勒斯坦、直到古迦南帝國（the ancient kingdom of Canaan）北部的腓尼基（Phoenicia），其核心地帶就是現在所稱的黎巴嫩和敘利亞，但是範圍更往南延伸，含括了整個西奈半島。加薩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入侵者難以抗拒的目標：從古老的以色列人，歷經埃及人、亞述人（Assyrians）、塞西亞人（Scythians）、巴比倫人、波斯人、羅馬人、穆斯林、十字軍東征和馬木留克（Mamelukes）的爭奪，一直到鄂圖曼和英國的統治。現在，加薩已是此區最大的城市，也是整個區域貿易和運輸的樞紐。

一九四八年加薩走廊成為一獨特的政治區域，令當地居民悲痛欲絕，因為，在既關鍵又災難性的兩起事件中，此地的社會和經濟組成就此改變，無可挽回。第一便是完全喪失加薩走廊具生產力的腹地——放牧的草地和農業規劃地——這些現在都已淪為甫建國的以色列國土。巴勒斯坦的垮台也意味著加薩地區與中心地帶如貝爾謝巴（Beer Sheva，又譯別是巴）、耶路撒冷的貿易聯繫都遭到切斷；尤其在海法（Haifa）和雅法（Jaffa）地區，由於勞動力已不再能流動到現在的以色列國境內，就業機會一夜之間蕩然無存。

第二件造成加薩走廊如此傷痛的事，是突如其來、大量湧入的難民潮，尤以從巴勒斯坦沿岸城

市湧進的難民最多，劇烈地改變了加薩的人口組成。一九四八年以前，加薩地區的主要人口多是土生土長的加薩人，總人口大約八萬，由一群富有的少數地主家族菁英所統治，傳統上依賴出口貿易賺取收入。但是戰後，從巴勒斯坦流亡來的二十萬難民，一夕之間改變了這個現狀；新來者在臨時營區安頓下來，往往星散於加薩周圍的果園中。巴勒斯坦人舉村遷移，集體移居到加薩走廊，生活方式和社會位階往往參照巴勒斯坦舊村莊的模式。

新來的難民主要來自低收入的社會階層：在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間離開巴勒斯坦的，往往是社會中最貧窮、最無一技之長且最無社會優勢的群體。悲劇在於他們無法在加薩地區生存，因該處土地泰半是不毛的砂質丘地，且面積狹小，自然資源匱乏，無法供給土地或工作俾使他們重新整頓生活。因此數千名巴勒斯坦人突然得仰賴國際社會的慈善援助維生，而國際救助的帶領者，乃是一九五〇年聯合國專為巴勒斯坦難民設置的分支——聯合國救濟工程局（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簡稱UNRWA）。

及至一九五二年，救濟工程局在加薩走廊建立了八個難民營，並且一肩挑起難民照護的責任，供給食物、醫療、教育，並雇請許多人到其行政單位工作。儘管他們的生活狀況有所提升，但是新的環境委實差強人意；事實上，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正是加薩走廊逐漸沒入貧窮與困乏的時候。加薩走廊的原居民現在變成了相對少數，與剛抵達的難民關係緊張，甚至互相仇視，縱然長時間以來，這兩個族群都因對以色列同仇敵愾而站在同一陣線。

一九四八年戰爭後，埃及由一駐加薩市的埃及軍事總督領導，透過特別的軍事行政方式，從開羅統治著加薩走廊。埃及的統治並不寬厚，國王法魯克（Farouk）不信任巴勒斯坦人，指示他的官員殲滅任何叛亂跡象，嚴加統治這群難民。所有公共單位、社會服務、法律、司法、商業等活動，都必須在督軍的支持下進行。埃及人占據所有高層行政職位，且對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所有面向都握有重要的任免權。結果，幾乎所有社會、經濟面向都停滯不前，或許唯一繁盛的產業就是由貝都因人（Bedouins）主導、往來於西奈半島與加薩走廊的貨品走私。一九六七年六月，在以色列勝利的旗幟下，加薩走廊落入以色列手中，以軍長驅直入，幾星期前，加薩市的馬吉里斯塔什里（al-Majlis al-Tashrīʿī）建築原是埃及督軍駐紮的地方，如今成為以國軍政府所在地。

軍政府與人口流放

國防部長達揚要求這個新的以色列政府確保國家安全，並且重新讓公共服務步入正軌。戰前所有公共服務都是巴勒斯坦市議會所提供，像是在拉法赫（Rafah）、代爾拜萊赫（Deir el Balah）、汗尤尼斯（Khan Younis）等地。一九三四年由英國託管政府的市政合作法規中，賦予這些議會監督公共服務的權力：從都市計畫到水源使用配置、電力供給、污物處理、大眾運輸、公共基金的用度等等。然而現在以色列軍政府發布第一百九十四條和第二百三十六條軍事命令，否決過去議會擁有的權力，並將權力由當地政府轉移到軍隊。這個法律上的技術性變更，旨在削弱本土的巴勒斯坦領導階層，讓領導階層必須仰賴佔領方的恩澤——當然，只有在他們表現良好的情況下，軍隊才會垂青。

軍政府給予原加薩居民以色列國籍（大部分的人都拒絕接受），但卻不發放給巴勒斯坦難民。其原因出自亞隆計畫，如同前面所討論的，這個策略是為了與約旦的胡笙國王共同分擔西岸的責任，但除此之外，它也規劃了加薩走廊的未來。如同計畫幕後的首腦副總理亞隆所言：「加薩走廊與原居民〔最終〕會變成以色列的一部分。」但是，這要在難民「離開這塊土地」後才會發生。[1]

亞隆對於加薩走廊的提案，本質上是策略性的，亦即以色列將兼併走廊南部大部分的土地，這一帶柑橘類果園生長繁茂，而原生居民零星散居在小鎮中，猶太人很容易在此屯墾，以便形成與埃及和西奈沙漠間的緩衝區（計畫已經預設以色列極可能將西奈歸還埃及）。根據亞隆的計畫，走廊的北部包括人口稠密的加薩市以及西岸的部分土地，將贈與胡笙國王。以色列人希望胡笙國王接管加薩走廊的難民——尤其是以色列試圖兼併的南部地區的難民——並且將他們安置在約旦河東岸，或以國所贈與約旦的西岸地區。以色列也認為這些被疏散的難民，可以落腳在西奈北方的城鎮阿里什（Al Arish），住進埃及人留下的空房子。埃及人曾經住在這裡，但一九六七年以色列佔領西奈半島時逃離了此地。

一九六七年戰後最顯著的特徵是，為了殖民的策略性目的而導致大批人群的遷徙，以色列從不掩飾其對新獲土地上充斥著原居人民而感到厭惡。戰爭結束不久，艾希柯爾總理公開表示，戰爭的結果是「我們得到了一份嫁妝〔指的是新土地〕；問題是這個嫁妝與一位新娘〔阿拉伯人民〕一起

嫁過來，但我們並不想要這位新娘……」。[2]由於阿拉伯人口眾多，艾希柯爾經常把加薩走廊描述為「一朵多刺的玫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他對聽眾說：「我們必須允許加薩〔的〕阿拉伯人離開。」[3]但艾希柯爾夠實際，他知道巴勒斯坦人不會在沒有鼓勵的情況下「離開」，因此他指派艾達・塞拉尼（Ada Sereni）負責督導執行一個計畫，給加薩難民幾百塊錢，讓他們自願離開。他向塞拉尼說希望他們全數離開，「即使是去月球」，且時常去電詢問：「今天你趕走了多少阿拉伯人？」[4]他要她「找出把〔加薩走廊的〕阿拉伯人移出境外的方法和路徑」，甚至提議要把他們疏洩到南美洲或澳洲，因為「將人移到那裡，就沒有人知道他們存在這世界上」。[5]但是塞拉尼後來向他報告，儘管巴西和澳大利亞徵求移民，但「一聽到他們是阿拉伯人，便顯得興趣缺缺……」。[6]

為了誘使加薩人離開走廊，以色列提供他們西岸的工作，希望在較為繁榮的地區待上一段時間，能鼓勵他們永久遷移。因為戰後加薩走廊失業人口眾多，許多加薩難民接受了工作，前往西岸，在那裡以色列雇請他們從事不同的工作，包括建造一條通往死海二十五公里長的公路。在離耶律哥不遠處專門為他們建造了一個特別營區——這個區域就是亞隆計畫中打算贈與約旦的土地。然而讓以色列幻滅的是，當工程結束後，幾乎所有加薩人都選擇回到走廊，而非繼續留在西岸。

由於難民似乎不願自動離開，軍隊開始訴諸強制流放行動。第一群要處理的是在戰爭爆發時，因工作或其他原因而離開加薩走廊的兩萬五千名到五萬名工人的家庭。藉由防止這些加薩人回到加薩走廊的家，軍隊有效地強迫他們的家人離開加薩走廊，若他們想要跟家人團聚，一旦離開便不准再回來。一個更為直接的族群清洗行動亦隨之展開。一九六七年，一位加薩走廊的居民阿布・哈桑（Abu Hassan），回憶起自己如何被迫離境：

> 走廊被佔領的幾週後，以色列人開始執行強制流放計畫。有一次，以軍將我住的那區所有男人都集中起來，趕往雅法學校。有兩位本地耆老（mukhtars）〔巴勒斯坦的村莊長者〕跟以軍一起，他們告訴軍官每個人的職業——「他是個工人，那是個老師」等等。以色列選出他們想要的人，把他們放上卡車，載他們到約旦去。[7]

一九六八年八月，以色列政府指派了一個特別委員會，負責將十五萬到二十五萬的難民從加薩走廊運到西岸。[8]統計數字顯示，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和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之間，加薩走廊減少了約百分之二十五的戰前人口。

同時，由於新移民正加劇約旦的社會躁動，約旦國王胡笙請求聯合國和華府幫忙阻止難民從佔領地湧入他的王國。在當地，大部分的人口已經是巴勒斯坦人了。但以色列並不制止難民的流動。一九六九年十月，他們實施一項官方政策，據此加薩走廊的難民會被（用以方的話來說）「鼓勵遷移到西岸的難民營，靠近有工作機會的以色列和西岸本地……」。[9]但以色列沒有提到的是，這些難民營也同樣鄰近約旦。

在嘗試了各種手段後，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成功地大幅削減加薩走廊的人口。但最後，他

們的努力並未成功。由於加薩走廊的高出生率，及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人口又恢復成戰前的數字。[10]

殲滅加薩暴亂

戰後階段，巴勒斯坦運動者決定親自出手執行正義，加薩走廊立即有一股暴力浪潮撲襲而來，他們攻擊巴勒斯坦同胞，以阻止他們與佔領政府合作或者到以色列工作；載運加薩人到以色列的公車、計程車等交通工具經常遭受攻擊。武裝分子也攻擊那些他們認為將要與佔領政府合作的人，殘酷地折磨他們，然後丟在街上任其死亡。

只要這些武裝分子僅攻擊巴勒斯坦人，達揚便選擇視而不見，但是當以色列人也成了攻擊目標，情況立即大變。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一九七一年一月二日，一個猶太家庭走訪加薩時遭遇了攻擊，兩個幼兒被殺。負責管理加薩走廊的上將艾里爾．夏隆（Ariel Sharon）告訴國防部長：「如果現在不予以回應，我們將失去〔對加薩走廊的〕控制」。聽了夏隆的話，達揚回答：「你可以開始了。」[11]這給了夏隆綠燈，讓他開始對加薩武裝分子發動殘酷鎮壓，在巴勒斯坦人的記憶中仍是惡名昭彰的一頁。

艾里爾．施恩內曼（Ariel Scheinerman，後易名為夏隆）於一九二八年英國託管時期，出生於一個名為卡法馬拉（Kfar Malal）的巴勒斯坦村莊。他的童年並不快樂，由於他的父母對他們的猶

太鄰居趾高氣揚，讓他在這小小的屯墾區中備受孤立。六歲時，父親給他一根粗棍子防身，此後小夏隆總是隨身攜帶著。夏隆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態度是在他父母的經驗下被模塑出的；他出生的前一年，阿拉伯暴民攻擊卡法馬拉，造成許多損失，在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九年巴勒斯坦暴動期間，卡法馬拉的人們總是戒慎恐懼。

夏隆在一九四八年的以色列獨立戰爭中受到重傷；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他組織了一個規模雖小但訓練精良的突擊隊，稱為一〇一部隊（Unit 101），並帶領部隊攻擊阿拉伯村莊。他在許多情況下會過度執行上級所命令、策劃或可接受之事，但他往往辯稱這是由於「敵人突襲反抗」，需要拯救其士兵的生命，或避免置傷亡者於不顧。前總理戴維．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非常喜歡夏隆，認為他是一個說謊成性的人。「如果夏隆能夠擺脫他的缺點，像是不說實話，」本—古里安在他的日記上寫道：「他將會是一個模範軍事領袖。」[12]一九六七年戰爭時，夏隆在西奈與埃及作戰時脫穎而出，終戰之際，便確立了他身為以色列首屈一指的戰士形象。

在加薩的猶太家庭遭到攻擊翌日，夏隆調兵遣將進入巴勒斯坦難民營，全面執行宵禁，挨家挨戶搜索並逮捕嫌犯。這次的突擊窮凶極惡，軍隊的犯罪行為如搶劫等時有所聞；兩名夏隆的軍人被解職，因為他們在突擊時不當使用武力。巴勒斯坦武裝分子透過策劃一連串壯觀的突襲行動來反擊，對象並非軍隊，軍隊對他們而言太強大，難以與之交鋒抗衡。他們針對的是加薩市民，炸毀了主郵局，造成六十一位當地巴勒斯坦人受傷。

夏隆不僅想為受到攻擊的猶太家庭報復，更要把加薩走廊所有反抗勢力和游擊團體一舉殲滅。計畫擬定後，他把第一等步兵帶入行動，開始訓練他們，進行他所謂的「反恐游擊戰」。

夏隆將加薩分成數個易於控制的小區塊，大約一點五平方公里左右，依自然疆界劃分。他將特定的區塊指派給特定的部隊負責，並指示軍隊：「這一個區域是你唯一的責任。你必須裡裡外外徹底了解這個區塊，你的責任是找出裡面每一個恐怖分子，然後幹掉他們。」[13]

夏隆成功顛覆了達揚原本讓軍隊遠離巴勒斯坦人口集中區的想法，直領軍隊深入每一個巴勒斯坦市區的核心，尤其是窩藏叛亂分子並提供他們情報、後勤、新兵源的難民營。他的戰略十分殘暴，為了將軍隊的危險減到最低，他指示在調查可能的窩藏地點時，不論是一棟房子、一個沙坑，或一個在橘子園中的洞穴，都要先投下一顆手榴彈；然後在下達不准動的命令時，若有任何嫌犯不願配合，一律格殺勿論。他還設置了秘密行動小組，由四、五支連隊的猶太軍人和被捉住、為了財物而合作的巴勒斯坦人所組成。他們潛入其負責城鎮的核心，熟諳阿拉伯語的人與本地人攀談，刺探資訊，其他喬裝的軍人則靜觀其變。這個計策往往讓整個組穿上阿拉伯人的衣服，擒拿疑似游擊兵的人，將之帶離現場問話，繼而往往徵召他們加入以色列軍隊。

夏隆在加薩的果園間散步時理解到，與以色列農人不同的是，巴勒斯坦農人較少修剪枝葉、疏花疏果，較少干預樹的自然成長。於是夏隆說道：「他們的果樹很美麗，卻極度濃密，軍隊難以穿透，但非常容易窩藏恐怖分子。」[14]為了增加軍隊的可見度，減少可能的藏匿處，夏隆命令巴勒斯坦農民剪掉加薩走廊約七千公頃柑橘園內所有果樹的下層枝葉；他還經常命令把整個果園的樹木都連根拔起，或摧毀整片農作物，以杜絕暴亂分子藏匿。

大量的房屋與建築亦遭拆毀。在一九五〇年代的加薩走廊，聯合國救濟工程局往往提供巴勒斯坦難民家庭一小塊地，讓他們在上面建造單層的房屋，裡面有兩間臥室和一個廚房，周圍有一道牆和一扇門，在道路兩旁方格狀對稱排列著。幾年下來，由於對生活空間的需求增加，巴勒斯坦人將他們的房子向上、向外搭建，占用到道路空間，漸漸使道路變成一條狹窄的巷弄，變成我們目前可見的加薩走廊的景觀。這表示軍用車輛無法在街道間穿梭，使軍隊必須置身在外徒步追緝叛亂分子。為解決這個問題，夏隆引進了「窄化」（thinning）政策，其中包括拆毀數排房屋，以打造能夠切開難民營的巡邏街道。

夏隆的「窄化」政策對加薩走廊有著劇烈影響，岸邊的難民營亦難逃一劫。當地人熟知的「沙提」（Shati）難民營坐落在加薩市的地中海海濱，這個難民營是加薩八個難民營中最擁擠的一個，容納一九四八年從盧德（Lydda/Lod）、雅法、貝爾謝巴等地逃離的難民。在夏隆的軍隊抵達海邊的難民營前，殘骸街（Wreckage Street）只是一條狹窄的無名巷弄，卻因夏隆軍隊大舉拆毀而得名。易卜拉辛・甘寧（Ibrahim Ghanim）當時住在那裡，他回憶夏隆的軍隊：

> 在夜晚抵達，並開始在他們想要拆毀的屋子外用紅筆做記號。早上他們回來，命令所有人離開。我記得所有軍人對人們大叫，Yalla, yalla, yalla, yalla〔快點，快點，快點，快點〕！他們把所有人

的東西丟到街上。然後夏隆弄來一台推土機，開始夷平這條街……[15]

工程結束時，幾百棟房子已成斷垣殘壁，不僅是殘骸街，整個海邊的難民營亦復如此，數百名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他們不被允許重建房子，被迫在學校、公共建築或親戚家找尋棲身之所。當夏隆的軍隊摧毀以澤丁・阿布萊什（Izzeldin Abuelaish）的家時，阿布萊什年方十五。他在《我不應恨》（*I Shall Not Hate*）一書中，憶及那晚他們家的房子是如何被拆毀，且後來的好幾個晚上：

> 我們住在舅舅家的一個房間裡，父母和兄弟姊妹在地上成排睡著，就像圍籬上的木樁，我躺在全家人的腳端。僅有的家當堆疊在門外的箱子裡，因為房間裡沒有空間可以容納它們了……睡在別人的腳下令人覺得羞恥……[16]

其他屋舍被拆毀的巴勒斯坦人多為從事政治運動的人，他們被裝進卡車，丟在當時還在以色列轄下的西奈半島接近阿里什鎮處。統計數字顯示，高達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五名巴勒斯坦人，因為夏隆的窄化政策而被迫舉家搬遷。[17]

在夏隆的指揮下，整個走廊被一圈長達八十五公里的圍籬封鎖起來。街道加裝電力照明系統以便監視，洞穴和沙坑被封堵或填補起來，以免變成藏匿處，宵禁在個別城鎮或難民營間歇性地實施，以便遂行搜索。[18]

以方巡邏軍隊的凶橫使加薩人悚懼；身陷夏隆的恐怖與武裝分子之間，許多巴勒斯坦人都選擇與軍隊合作。夏隆一點一點地把對叛亂分子撒下的網收緊；一句據說出自他嘴巴的話開始迴盪此地：「唯一的好恐怖分子是死了的恐怖分子」。在加薩走廊間流傳著一張武裝分子通緝名單，每消滅一人便將其名字畫去。夏隆的加薩行動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和一九七二年二月間臻於高峰，儘管士兵間的不安逐漸升溫——因夏隆的某些戰略明顯已屬戰爭犯罪——但是他的政策的確成功地減少巴勒斯坦暴力事件：一九七一年六月，軍隊記錄在加薩走廊有三十四起恐怖事件，十二月時卻只有一起，在那之後便幾乎銷聲匿跡。

恢復平靜後，歷史上執政治之牛耳的加薩柑橘富農和地主菁英開始重建加薩走廊。其中一位柑橘富商拉沙德・沙瓦（Rashad al-Shawa）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就任加薩市長。在軍隊首肯下，他與加薩的上層階級組成了市議會。[19]由於軍隊橫征暴斂，再加上新的貿易限制、課稅等，柑橘業在戰爭期間受到重挫，一九七二年，沙瓦把注意力集中在加薩柑橘業經濟的復甦。他也加強加薩文化組織的發展，包括紅新月會（Red Crescent Society），還成立一社區制健康診所、一律師公會和一婦女指導聯盟。

然而逐漸地，沙瓦的活動受到來自親巴解國族主義者和以軍雙方的批評：前者將他視作佔領政府的爪牙乃至通敵者；以色列人則認為他太過專斷獨行。一九七二年十月，軍隊迫他下野，加薩又再一次直接受軍事總督管轄——這與西岸截然不同，如前面所述，管理西岸市政的都是人民選舉出

的當地巴勒斯坦領導人。[20]事實上，長此以往，這一直是以色列政府搖擺不定的難題：讓巴勒斯坦人擁有某些程度的自治，抑或不要給他們太多自由空間。

殖民主義在加薩

當一九六七年以色列人大舉進犯加薩走廊時，經濟固然凋敝，但是仍然勉力賡續。其經濟結構以服務業為大宗，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最大部分；其次為農業，大量依賴柑橘類水果從加薩的小港埠出口到東歐；營造工業次之，再者為手工藝、食品加工等輕工業部門，以及漁業和其他邊緣產業。戰爭無可避免地殃及加薩走廊的經濟，戰事完全截斷了加薩走廊和埃及過去二十年間發展出的經濟聯繫，導致埃及政府所籌劃的行政工作、公共工程計畫無疾而終。埃及軍隊戰敗後撤退，聯合國的軍隊也在戰爭前夕離開，這意味著外幣的重要來源也消失了。凡此種種，都直接導致戰後失業率較戰前上升許多。

對以色列市場開放後，加薩走廊的現況逐漸獲得改善，以色列從戰前的經濟蕭條中重新奮起，某些部門正短缺人手，需要低廉的勞力，這非西岸和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莫屬。及至一九六八年末，與西岸相似，在加薩施行了五個勞工交換計畫，把工人運往以色列。以色列也開設了六個職業訓練中心，提供課程給不具備技術的人，訓練巴勒斯坦人縫紉、製鞋、簿記、木工、建築、修車、焊接、搭設鷹架和製作鐵器。

以色列的勞動市場對加薩人開放，影響加薩走廊的就業模式甚鉅，到以色列工作的人數顯著上升，從一九六八年的八百名激增到一九七〇年的五千九百名。達揚非常高興，因為他十分樂見與佔領地的經濟整合，認為這是一個能讓巴勒斯坦人民滿意，並有效維持佔領地平靜的手段。他寫道：

> 在加薩走廊的難民營〔有〕一場真正的經濟革命。數年來難民都把時間花在閒坐屋外、下西洋雙陸棋、討論政治，很少換下他們的睡衣，現在他們開始工作了……因為以色列的高工資，他們的生活水準、生活方式〔得以〕提升。他們頭一次〔可以〕拿到新衣服、家具和廚房家電用品。[21]

一九七二年，政府解除所有加薩走廊與以色列本土間的移動限制，到以色列就業的浪潮達到了新高。除此之外，一九六八與一九七三年間，在位於以色列境內緊鄰加薩走廊北部的艾瑞茲（Erez）工業區建立了十二間以色列和外國企業，占地約四十點五公頃。這項政府推動的方案提供了六千個新的工作機會給加薩人，目的在鼓勵本地巴勒斯坦企業家創立小型工業，與以色列市場相輔相成；以色列提供貸款，甚至允許放逐在外的巴勒斯坦富僑回來投資。

由於艾瑞茲因素、以色列的工作，以及戰後小型企業在加薩走廊的湧現，觸發了「走廊經濟」驚人的年成長率，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三年間成長了近百分之三十，鼓舞了加薩的經濟。一九七三年，原本奄奄一息的加薩走廊，就業率創下史上新高的百分之九十八；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不好

的一面——這也意味著加薩走廊變得幾乎完全依賴以色列提供工作。[22]

然而加薩的農業部門卻花了很長的時間復原。如同在西岸，起初以色列人幫忙引進新的科技，例如滴灌技術、新的農作物、肥料，也建立了兩個機械化的包裝工廠，以迅速有效地將柑橘出口。然而，這樣的慷慨作為僅是曇花一現：如同西岸，一旦以色列了解到幫助加薩人等同於為他們自己的產品創造競爭對手，他們便開始設下阻礙。一九六七年以前，加薩通常將自己的農作物直接傾銷到東歐、西歐和新加坡，一九六七到一九七四年間，以色列只允許加薩作物透過以方的柑橘市場委員會出口；最後，它們被用比競爭價格低廉的價位賤賣，情形每下愈況。在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九年間，當加薩的柑橘盛產時，以色列為防止他們與自己的農產品競爭，禁止加薩的產品行銷歐洲，迫使其在阿拉伯世界尋找替代市場，因為以色列產品無法打入這些地方。被迫退出歐洲市場後，加薩人的確在伊朗成功發展出能夠賺取利潤的市場，但除此之外，加薩的柑橘業被朝令夕改的以色列人所牽制，每當以國萌生加薩會起而競爭的幻覺時，就改變遊戲規則。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以國政府從加薩市開始，把走廊納入國家電力供給網絡，往後數月間更連結起其他城鎮，至此，加薩走廊愈來愈仰賴以色列的垂憐施恩。當巴勒斯坦人抗議這是把加薩實質兼併入以色列，並要求立即中斷時，國防部長摩西．達揚駁斥他們的請求，堅稱出於「安全考量」必須如此。以色列的供電無庸置疑是更有效率，並能為更多加薩家庭供給電力——單單加薩市就有兩萬四千戶，相較之下，戰前只有五千戶。[23]但這也意味以方控制了巴勒斯坦人重要的歲入來源，並成為控制加薩人民的重要工具，因為以色列可以在巴勒斯坦人不接受佔領政府時切斷電源，這是

以色列日後的慣用手法。

同樣地，根據以色列一九五九年的《水利法》，所有加薩走廊的水都成了以國的商品，以色列依據此法將加薩走廊的水源供給整合到自己的國家水利網絡中。軍事命令第一百五十八條補充道（我們現在可能已經可以猜到）：挖掘新井需要執照。對加薩人而言，這造成了嚴重的問題，因為沒有河川，開洞鑿井是標準的集水程序。以色列採取的水資源控制也打擊了柑橘業，其用水量至少占了百分之八十的加薩用水。

由於以色列變成巴勒斯坦人就業機會的主要供應者，並擅自控制了水利、電力和其他資源，以方實際上已成了舊日的殖民主義者，完全掌控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3 戈蘭高地

「戈蘭」一詞的起源和許多其他事物一樣，是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爭論不休的話題。敘利亞的解釋會說，「戈蘭」源自阿拉伯文「Jwal」，指的是被塵土覆蓋的土地，而戈蘭高地確實時常受到沙塵暴漫天席捲。以色列對於「戈蘭」的解釋則上溯至聖經時代。聖經中，戈蘭這個小鎮名為「Ir Miklat」，是殺人凶手避難之處；但不論是這個城鎮，或是這個區域，都不曾被劃歸進聖經中的以色列地，反之，聖經稱其為「Ever Ha'Yarden」，指的是「約旦的另一邊」。

戈蘭坐落於敘利亞西南部，是個多山的高原，南北長六十五公里，最寬的地方在南部，約二十五公里；戈蘭包含兩個不同的部分——北部的上戈蘭由火山丘構成，由古老的岩漿覆蓋在高原的石灰岩床上所形成；南部的下戈蘭則較為平坦。整體而言北部與黎巴嫩接壤，南部比鄰約旦，西部則與以色列相接。

戈蘭高地最重要的城鎮一直都是庫奈特拉（Quneitra），阿拉伯語意指小拱門或橋梁，因城鎮環繞著小拱橋搭建而得名。庫奈特拉起初是一間旅舍（khan），古地圖上稱之為「康—庫奈特拉」（Khan-Quneitra）。十九世紀中時它還僅只是一間旅舍；及至十九世紀末，此地已有約一千八百位居民，大都是來自高加索的穆斯林少數民族西爾卡西亞人（Circassians）。到了一九四〇年代，庫奈特拉已有約五千位居民，大多數仍是西爾卡西亞人，而一九五三年時，人口增加到八千一百人，但那時城鎮已漸失西爾卡西亞的特質，因為與大馬士革貿易的阿拉伯商人逐漸取而代之。

一九六〇年代早期，庫奈特拉正式成為戈蘭地區的首善之都和商業中心，也成為敘利亞軍隊的中心，軍隊總部和不同的軍營駐紮在城市周圍，包括「以色列前線指揮」（Israel Front Command）總部。一九六七年戰爭前夕，庫奈特拉的人口高達一萬七千人，儼然成了戈蘭人經常前往找尋工作機會的「大城市」，儘管他們往往仍保有自己鄉下的土地和蘋果園。

在以軍抵達前，戈蘭基本上是農業社會，男人在小耕地上耕種，妻小在田裡幫忙農事。同時由於位處敘利亞一個相對孤立的角落，戈蘭的主要農產部門相對落後，開發不足；一九六七年前，這裡幾乎找不到任何拖拉機、收割機和其他現代農業機器。根據敘利亞的統計數字，一九六〇到一九六六年間，戈蘭高地每年的農產品總數是十一萬六千噸的穀物、一萬三千噸的蔬菜、一萬三千四百噸的牛奶、六十七噸的羊毛、十六噸的蜂蜜、兩千噸的肉以及一千八百萬顆蛋。[1]

地處偏遠同時也意味著自給自足，因為戈蘭人必須依賴田地產出生活所需。來自戈蘭布塔雅赫村（Butayah）的穆罕默德・朱瑪・依撒（Muhammad Jum'a Isa）憶及以軍進犯前，「我們過著簡單

的生活，沒有艱辛。物產豐富，隨手可得，所有的必需品都價格低廉。一個農人需要的只有糖、茶葉和菸草……〔這是〕窮人的天堂。」[2]來自阿斯巴赫村（al-Asbah）的法蒂瑪・阿里（Fatima al-Ali）也記得過去人們和平共存，社群緊密無間：「我們的村子很小……一個簡單的村莊……戈蘭高地到處都非常豐饒……它的水、它的土地、它的贈與。我們曾經從磨坊中汲水……在過去的日子，即使有辛苦之處，生活仍然比現在好……人們很關心彼此……」[3]在德魯茲人阿米那・哈提卜（Amina al-Khatib）的證詞中，戰前戈蘭這種唇齒相依的社群關係也顯而易見：「我們與鄰村關係極佳。基督徒、伊斯蘭遜尼派教徒和德魯茲人情同手足，只不過大家在不同的地方禱告而已。當有其他活動的時候，我們甚至穿著打扮相似。我們也慶祝基督徒祭典。」[4]歐馬爾・哈吉・哈利勒（Omar al-Haj Khalil）出生在戈蘭的艾恩艾沙村（Ayn Aysha），他記得當時生活非常接近大自然：「我們生活在葡萄園和野地中，追捕動物，放牧牠們，在田中耕種作物……」[5]

一九六七年前，戈蘭高地有著一百四十二所小學，十五所高中，但是學生為數不多，如法蒂瑪・阿里解釋的：「因為學校很遠，且家家戶戶都有大概二十頭牲畜，有很多工作要做。女孩必須擠牛奶和做家務，有些男孩去上學，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文盲。大夥都在田裡工作。」[6]

然而，一九六七年戰爭的最後三十個小時，以色列對敘利亞開戰，如此簡單的生活被破壞殆盡。在此期間，以軍攀上了戈蘭高地並將之據為己有，對戈蘭斯土斯民造成了極為迅速、劇烈而又創痛至深的改變。

族群清理和德魯茲人的興起

戰爭前夕，戈蘭有大約十三萬八千名敘利亞人，居住於一百三十九個村莊、兩座城市和六十一塊農地裡，這廣袤的農業區中，很多是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時期興建的。[7]然而在戰爭和戰後時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戈蘭人離開了，戈蘭高地幾乎成為空城。是什麼造成短期內如此大量的人口流失？他們是出於自己的意志離開的還是被趕走的？

戰爭結束後不久，摩西・達揚旋即在《生活》（*Life*）雜誌發表文章解釋道，敘利亞戈蘭人與撤退的敘利亞軍隊，在狂轟濫炸下的存亡之秋一起向東逃命，這個觀點迄今仍是以色列的主流看法。[8]例如在侵占戈蘭高地滿一週年時，記者露絲・邦笛（Ruth Bondy）在以色列的《達瓦爾》（*Davar*）雜誌中報導：

> 〔戈蘭〕沿途的阿拉伯村莊悉數棄置……在以色列防衛軍抵達前，懼於野蠻的征服者，所有人都逃逸無蹤，一個也不剩。人們原先對「先進」〔敘利亞〕政府提供農民的寒酸茅舍感到嗤之以鼻，見到這些棄置的村莊，看見西爾卡西亞人的村莊中相對齊整、受人悉心照料的房舍，不禁使人悲從中來……

她不禁納悶：「蠢蛋，為什麼他們要逃？」[9]敘利亞難民的證詞證明，某些人確實是出於恐懼

而自願離開。如同難民法蒂瑪．阿里在後來的訪問中提到：

> 村中的長者說，家裡有女兒的人都要帶她們走，〔也〕要帶自己的妻子離開。他們說：「把所有東西統統留下，包括牲口，讓你自己和家人能順利逃走。」所以大家都試圖拯救妻女，帶她們逃離這個區域，確保她們的安全……有些人也帶著牛羊一起逃難。[10]

並沒有證據足以證明以方拿女人當暴力行為的標靶，但是這種恐懼似乎是他們離開家園的主因，因為此一考量也在其他證詞中出現，包括一位來自馬賈德爾沙姆（Majdal Shams）的德魯茲人以乍特．阿由博（Izzat al-Ayoub）亦說道：「人們因恐懼而離開。他們認為以色列人會侵犯他們的女人……」[11]

為數不少的戈蘭人決定暫且避禍遠走，一如人們在戰爭期間會做的事，冀望在戰事稍歇之際返鄉。但從戈蘭人和甚至以色列人的證詞中可以得知，更多人是直接遭到軍隊驅離，因為以色列想要的是一塊沒有原居民居住的土地。以色列人用來鼓勵他們離開的方法之一，是將戈蘭人喝退。法蒂瑪．阿里記得：「以色列飛機在我們頭上盤旋，恐嚇我們，要我們離開……以色列人……在晚上使用武器射擊，以進行大規模破壞。我們就是在那時逃走的……我們村裡的群眾四處流散……每個家庭都往不同的方向逃，因為他們嚇壞了……」[12]聯合國特別代表尼爾斯．戈蘭．古辛（Nils Goran Gussing）戰後立即來到戈蘭，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的報告中觀察到：「顯而易見地，某些當地〔以色列〕督軍所授權的行動，是〔敘利亞人〕逃亡的重要原因。」[13]

以色列人的證詞也提及蓄意驅離的直接行動；在戈蘭作戰的軍事指揮官艾曼紐．沙克德（Emanuel Shaked）詳述道：

> 我們將〔戈蘭人〕聚集在一起，讓他們用背囊攜帶家當，有時我們也出動卡車幫他們載運。許多人徒步而行，有些人乘馬車……有些人抗議或大叫，但是沒有人反抗或挑戰我們。[14]

以色列人往往會迫遷整座村莊的人，如戈蘭北方的朱巴塔村（Jubata），戰前有一千五百人到兩千人住在那裡，其中一位居民哈穆德．馬列（Hammoud Maray）記得：

> 朱巴塔約有一半的人離開了他們的村子，藏匿到馬賈德爾沙姆……他們因為害怕戰爭而離開朱巴塔。〔然後〕以色列軍隊佔領了朱巴塔村，開始強制疏散留在原地的人；那些離開了朱巴塔〔並到馬賈德爾沙姆藏匿〕的人，嘗試回到家園……但也被遷走。以軍開始無時無刻對空中、對人群發射子彈，恐嚇人們……在人們離開後，朱巴塔變成了封閉的軍事區；沒有任何人可以回來……[15]

其他證詞也證實，以軍集結朱巴塔村人，叫他們朝黎巴嫩的方向走，並且在他們頭頂上方開槍以威

嚇他們。[16]在西岸，軍隊要戈蘭人簽署一份文件，表明他們是自願離開的；一九六七年曾經在戈蘭作戰的一位以色列軍人見證到：「我們看見一大群敘利亞公民，好幾百人，聚集在桌前，軍人們坐在他們身邊。我們停下手邊的事，問軍人他們在做什麼。他回答道他們在做預先驅離登記〔就是讓敘利亞人簽名，聲明他們是出於自己的意願離開〕。」[17]一些被驅離的人沒有一起逃離，他們在耕地中搭起帳篷，等待著適當的時機返回自己的村子。一位在戈蘭高地的以色列軍人回憶道：「我們看見上百人在村外的耕地中，從安全的距離外看著我們，等著看事態會如何演變……」[18]法蒂瑪．阿里解釋道，她村子裡的人們希望留在鄰近之處，「因為他們想要回去〔收割〕。」[19]

然而軍隊不許戈蘭人回到他們的村莊，六月十八日，戰爭結束數日後，此區的以軍指揮官叔穆耶爾．亞德曼（Shmuel Admon）上校發布了一道軍事命令，宣布整個戈蘭高地是一「軍事封鎖區」（closed military zone），因此沒有任何離開的人可以被允許回來；違反命令者可能被處以五年徒刑。但是許多戈蘭人確實嘗試回來，主要是為了來拿沒有帶走的家當。來自艾恩吉萬村（Ayn Ziwan）的曼杜哈．哈杰．艾哈邁德（Mamduh al-Hajj Ahmad）一家離開得非常倉促，因為「我們無法再坐以待斃，我們目睹了以色列人殺死我姑丈……所以在以色列佔領十天後，我們鎖上家門，徒步逃離了……」。然而，曼杜哈想返家取回他的課本和文件。他後來回憶道，當他抵達時：

> 村莊空無一人。以色列人曾經進過我們的房子，他們把所有的床都翻倒、把床墊割開。他們射殺了我們的狗……我在那裡待了一夜，黎明的第一道曙光乍現前，我拿了我的書和文件，躡手躡腳溜了出去，就像我來的時候一樣。[20]

以軍記錄顯示，數十位試圖返家的戈蘭人遭到槍擊或逮捕。一九六七年九月的一份軍事報告中說道：「我軍為追捕接近前哨站的牧羊人和潛入者，開了二十二次槍……」[21]也提到，「由於我軍機警，對接近的人開槍，相對於過去幾週，從敘利亞領土潛入的人已大為減少。」九月二十七日另一份軍事報告中，描述了一個部隊「發現十五個人……並且朝他們的方向開槍……他們〔便〕逃走了」。而另外一份十月上旬的報告提到了二十起以上的軍隊開火事件，都是為了驅離敘利亞潛入者而發動的。例如報告指出，十月三日，軍隊「對一名阿拉伯女人和她的小孩開槍，因為他們試圖越境〔進入被佔領的戈蘭高地〕」。開槍後，軍人們試圖追捕他們，但是他們逃逸無蹤了」。當時所有軍事報告中的事件都被審查，禁止刊登，然而軍隊與戈蘭武裝人民或戰鬥員交鋒的事件，卻被大幅報導。

戈蘭人民的確試圖潛返家園，但當他們抵達時，往往發現自己已經無家可歸，因為他們不在的時候，以軍已經摧毀了整座村莊。戰爭期間，第三十六軍團的指揮官埃拉德．裴勒德將軍（General Elad Peled）證實：「戰爭結束後幾天……我們開始摧毀村莊……一些房子甚至不需要重型機具，就可以輕易用鋤頭剷平。」裴勒德估計在戰爭結束之初，大約有兩萬名留在戈蘭高地的人民「在被疏散或逃離的同時，眼睜睜看著村莊被拆毀……他們已無家可歸了」。

如同在西岸，拆毀工程多由當地軍事指揮官在沒有明確政府授權的情況下推動；例如在政府知

情以前，軍隊已摧毀了班雅斯村（Banyas）裡百分之八十的屋舍。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內閣會議時，梅納赫姆・比金（Menachem Begin）思忖：「……這種事情是當地指揮官謀劃的嗎？」[22]儘管如此，在政府沒有下達明確的反指令之下，軍隊在敘利亞摧毀村莊的行動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八年。

位於戈蘭高地西北隅的六座村莊逃過一劫，其中六千人（主要是德魯茲人）獲准留下。[23]為什麼德魯茲人得以幸免於其他戈蘭人的命運，村莊得以完好無損？因為以色列人推斷戈蘭的德魯茲社群會對以國效忠，如同他們在以色列加利利（Galilee）的血親。從一九四八年戰爭開始，德魯茲的一個社群就與以色列人和平共處。不同於以阿關係，他們是徵兵的對象，社群中的多數人甚至自願從軍。一九六七年的此刻，他們與政府合作，說服首長們允許戈蘭德魯茲社群留在他們的家鄉；同時戈蘭的德魯茲領導階層（尤其是較年長的一輩）亦告誡他們的子民，務必記取他們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學到的教訓，切莫逃之夭夭。當時，在反抗法國的敘利亞大起義（Great Syrian Revolt）期間，德魯茲人捨棄了他們的村莊，結果回來時只剩下廢墟一片。

也因此，在一九六七年戰爭中，德魯茲社群只是戈蘭的一個小小的少數民族，卻因為其他戈蘭人不是逃難就是遭到驅離，而變成了高地上的多數人口。

而那些離開的人命運如何？許多人在真正安定下來前，都歷經顛沛流離。來自戈蘭高地的難民曼杜哈・哈杰・艾哈邁德說：「年長者難以適應新生活。許多人第一年就在悲痛中死去。情況艱困。」[24]除此之外，三分之二的戈蘭難民搬到難民營和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周圍的住宅區生活，其他人則四散於敘利亞各地；一些人留在接近戈蘭的村莊，如莎莎（Sa'sa）和蓋塔納（Qatana）。由於人們放逐在外，返鄉之路受阻，絕大部分的村莊又毀於一旦，在無家可歸的情況下，戈蘭人被迫與其土地分開，分離和思鄉逐漸變成了戈蘭人流亡生涯的主要特質。被驅離戈蘭的數十年，自一九六七年便卜居敘利亞的以乍特・阿由博解釋道：

〔以色列〕佔領將我與故鄉故土隔絕。我現在已經垂垂老矣，即使我已經忘卻生命中的許多事，我仍舊記得那些睽違三十三年的地方。我曾經在那裡的花園做著農事、放牛牧羊，吃著冬天的食物——糖蜜混著白雪和熱騰騰的玉米。如果你給我筆和紙，我就能夠將老鎮上一間一間的房子，一條一條的街道、巷弄畫出來。小鎮住在我的記憶中，彷彿此刻我正身處於我們的泥頂石屋裡，在冬雪中劇雪嬉戲。[25]

阿米那・哈提卜原本住在艾恩昆宜赫（Ayn Qunyih），但是一九六七年她住在大馬士革，與戈蘭佔領區的家人分隔兩地。她解釋道：

從此之後我便與家人分離。我母親過世了，四個叔叔伯伯也過世了，父親也過世了，我卻沒有

看到他們任何一個。那些我離開時還是小孩的，現在都結婚了。言語難以形容我對戈蘭的思念，它的土地、它的水、它的樹木、它的人們……[26]

改變

以色列中止了敘利亞在戈蘭的法律，建立起軍政府，由一名長官發布軍事命令，開始統治此地。整體的目標在剷除戈蘭的「敘利亞實質遺留」（physical remnants of Syrian presence），接管這塊土地，改變剩餘人口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抹除他們的敘利亞阿拉伯身分認同，將他們重新改造成以色列公民。

完全掌握了當地司法行政後，以軍遣散了其餘村莊的民選長官，指派新的長官接替他們的工作，並且建立新的村議會以實施新規定，將軍事命令變成地面上的政策。在一九六七年前敘利亞統治期間，戈蘭的村莊在大馬士革政權下選舉「集體委員會」來代表個別村莊，農民的需求透過此政治體系轉達至大馬士革，中央給予的協助也由此傳遞給村民。然而，現在軍人解散了集體委員會，指派了一些人走馬上任，作為佔領的爪牙，由他們發放許可證和執照，戈蘭人的許多活動都必須依靠這些執照。他們還允許這些代表發放肥料等必需品給農夫，使得戈蘭人更加依賴這些人，也間接地更加依賴佔領政府。

以方進而用以色列的里拉幣（lira）取代敘利亞貨幣，發放特殊車牌，並沒收敘利亞身分證，

用以色列軍事身分證取而代之。如同在西岸與加薩走廊，在這裡，以色列人也開始介入所有層級的教育體制，派遣一位軍官來統籌戈蘭當地的學校體系，其課程規劃強調德魯茲族群認同與敘利亞的不同，以此取代敘利亞的教案。這是以色列的策略之一，將剩餘的德魯茲人拉抬為被偏愛的少數族群，冀望他們背棄過去的敘利亞政權，轉而擁抱以色列。由於許多教師在戰爭期間已逃離戈蘭，且軍隊不斷解聘效忠前朝的合格教師，學校的師資短缺，軍隊進而指派中學學生充任老師。

戈蘭人眼睜睜地看著凡此種種的改變，卻無從反抗，因為他們在戈蘭人單勢薄，且多虧以色列人一開始就恩准他們留下，他們才得以續住此地，但是他們仍心有不滿。德魯茲人米德哈特・沙利・沙利（Midhat Salih al-Salih）出生於馬賈德爾沙姆，成長於以色列佔領下的戈蘭高地，他回憶道：「我長大的過程中，開始意識到佔領意味著什麼，佔領的反面——自由——又意味著什麼。我張開孩童般的眼睛，只見到戈蘭高地上的以色列軍人……他們的壓迫……」[27]

留在戈蘭高地的敘利亞人最大的憂慮，就是以色列人會沒收他們的土地。當地傳統的土地制度，一直以來皆是半數以上土地為個體農戶擁有，剩下的由村人集體持有，主要作為放牧之用。然而，因為擔憂軍隊會強取豪奪非私人持分的土地，戈蘭人在戰後立即瓜分集體持有的土地，在上面種植蘋果樹，從而使得耕作地區激增，在村莊被摧毀、大部分人口外流的情況下，導致戈蘭地景變化劇烈。

以方繼續挺進，為使徵用戈蘭高地土地的行為「合法」，軍政府發布了一連串的法規。例如在

這些法律之下，所有軍隊攻占或讓出的土地（其中也包括被居民棄置的土地），都可以被宣告為放棄產權，並收歸為「國家用地」。一如他們在西岸的所作所為，以色列人也使用了（緊急）防禦法規（Defence [Emergency] Regulations），此法規旨在允許軍事指揮官封鎖任何地區。這些軍事法規加上其他策略（如在特定地帶植入地雷，以驅使戈蘭人遠離以色列覬覦的土地），使得戈蘭高地百分之九十四的土地都落入以色列人手中；有了這麼多土地，以色列人便進一步建造新的屯墾區。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副總理以加爾．亞隆向政府提出「戈蘭高地勞動營」（Labour Camps on the Golan Heights）計畫（這是在他針對西岸與加薩提出「亞隆計畫」的十天前，與亞隆計畫殊異）。該計畫要點是在高地上建造勞動營，依照他的解釋，在此地耕作需要建造營區以供勞動者住宿，存放器械、種子和肥料，而他深信政府很快就會批准。亞隆的真正用意究竟是要建立這些暫時「勞動營」以安置人們和器械，還是要逐漸將之變成永久的屯墾區，無從得知。雖然他很可能推測到，有朝一日戈蘭高地終歸會還諸敘利亞——這與西岸截然不同，以色列人堅稱西岸從未屬於約旦，但對於戈蘭屬於敘利亞這一事實卻從未有過爭議；但由於不清楚土地何時會歸還敘利亞，他或許覺得勞動營可以迫使大馬士革同意順以色列之意達成和平。戰爭結束後，美國批評屯墾區的建立坐實了阿拉伯的疑慮——以色列無意撤離一九六七年所佔領的土地；對此，以色列駐華府大使伊札克．拉賓（Yitzhak Rabin）的回應和亞隆如出一轍：「阿拉伯人愈是發覺到拿不回領地，他們便會愈來愈渴望協商。」[28]

無論可能的原因為何，首長們批准了亞隆的計畫。並且後來在七月十九日，工人們遷入一座靠近敘利亞廢棄村莊阿萊卡（Aleika）的樹林中，開始耕種。八月二十七日，政府批准在戈蘭高地上建造更多的屯墾區，卻在公開場合對該政策含糊其辭：「我們不建造永久的屯墾區。」[29]這項決議導致史尼爾（Snier）於九月二十四日建立，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屯墾者進入了庫奈特拉被棄置的敘利亞民宅，以建造「以色列集居」（*kibbutz*）的戈蘭，後來被稱為「Merom Golan」（戈蘭的高地）。「戈蘭的高地」在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遷移到最後的永久地點。此肆無忌憚的屯墾措施始於一九六七年夏秋兩季，正值敘利亞及其他阿拉伯政府戰意節節高升之際；不無諷刺的是，阿拉伯人的戰意卻成為以色列的棋子，以方政府藉此聲稱阿拉伯人罔顧和平，建立屯墾區被合理化為自我防禦之舉。在戈蘭大興土木建造猶太屯墾區的同時，政府對於阿拉伯區的建設卻百般阻撓，如同來自布加塔（Buqata）的德魯茲人穆菲德．偉利（Mufeed al-Wili）所說：「幾乎所有的以色列企劃案都會得到〔政府〕補助……土地免費地給予〔來屯墾的人〕……如果我們〔德魯茲人〕想要多一點地，必須向以方購買或者承租……〔但是〕我們不願向以色列人購買或承租土地，因為我們不認為他們是土地的擁有者……我們要如何向未擁有土地的人承租或者購買土地呢？」[30]因此，德魯茲人既未建造也不擴大現有的村莊，但是及至一九六九年三月底，以色列已經在戈蘭高地擁有了十個新的猶太屯墾區。

反抗與戰爭

戈蘭的反抗佔領也以各種方式出現，而且甚至比巴勒斯坦佔領地更加暴力血腥，因為此地的反抗運動逐漸與敘利亞軍隊和重型槍械結合。敘利亞人準確地判斷出戈蘭高地上無法移動的屯墾區是以色列的弱點，因此將他們的大砲瞄準這些地方，此舉嚇壞了以色列屯墾者，不論是精神上或肉體上，他們對這樣近距離的攻擊都毫無防備。

敘利亞人對以色列持續占有他們的土地感到憤怒，進而與埃及合作，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的侵襲，於是間歇性的戰火交鋒逐漸演變成傾巢而出的戰役；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埃及也同時從南部襲擊以色列。這便是一九七三年十月戰爭——或稱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對於那些誤以為阿拉伯人會因逐漸習慣佔領而放棄土地的人，尤其是以色列人，不失為一個警告，告訴他們這種事不會發生。敘利亞的坦克和軍隊，加上空中支援，幾乎完全出乎以軍意料地攻入了戈蘭，侵占了高地上的大片土地，以求將之從以色列佔領者手中解放出來。然而，敘利亞最初的捷報是短暫的，因為以軍很快便逼退敘利亞，收復庫奈特拉和所有失地——事實上，以軍甚至比戰前攫獲了更多土地。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在美國的援助下，以色列和敘利亞簽署了一份停戰協定，正式結束一九七三年戰爭，雙方小心翼翼恪守陸海空停戰協定，盡可能按兵不動。雖然雙方同意以色列可以繼續留在大部分一九六七年佔領的戈蘭地區，但是庫奈特拉和其餘以色列戰時斬獲的土地皆須歸還敘利亞。聯合國附屬軍隊——聯合國脫離接觸觀察員部隊（United Nations Disengagement Observer Force，簡稱UNDOF）也在以敘軍隊間的緩衝區停駐。

然而這項協議的達成卻因庫奈特拉事件而籠罩了一層陰影。如前所述，庫奈特拉一直是戈蘭最重要的城鎮，它在戰爭期間因以軍回擊時進入了此地，造成大幅破壞，而遭受巨大打擊。如今既然簽署協議結束戰爭，庫奈特拉必須馬上歸還敘利亞，於是以色列的戈蘭屯墾者擅自將重型機具開進城中，並在軍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情況下，竭盡所能大肆摧毀。《世界報》（*Le Monde*）駐敘利亞記者為《時代雜誌》（*The Times*）所寫的文章，詳盡描述了他所親眼目睹的破壞行為：

> 庫奈特拉面目全非。房子的屋頂塌落在地上，看起來猶如墓碑。許多瓦礫覆蓋著新的土壤，是推土機輾過的痕跡。到處充滿支離破碎的家具、廢棄的廚房用品、猶太報紙……左是一張撕裂的床墊，右是一條舊沙發的彈簧。幾面倖存的牆上刻著希伯來文宣言：「你想要庫奈特拉，你就只能得到被摧毀的它。」[31]

以方拒絕賠償損失，聲稱這大都是出於以敘戰火交鋒的結果，但舉世輿論皆無法接受這個沒有根據的說法。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聯合國採取決議（3240/A），痛斥以色列在戈蘭違反人權和蓄意摧毀庫奈特拉。[32]

以色列從一九七三年戰爭中得到的教訓是：在戈蘭的十六個屯墾區不但無法提供安全，且由於在戰前和戰時必須疏散所有居民，反而成了軍隊最大的負擔。儘管如此，也許是為了展示戰爭並未削弱以色列的決心，政府決定建立更多屯墾區，並為了壯大寥寥六百名的屯墾人數，還遷入更多人到戈蘭；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政府首長發布命令，要在戈蘭建立一座名為卡茲林（Katzrin）的城市，可容納五千戶居民、一間學校和其他公共設施。他們也同意要將屯墾區的建立擴展到戈蘭中部和北部，發展工業而非農業，以克服土地磽瘠的問題。

為進一步加強對戈蘭的管控，以色列於一九七五年建造了一道更堅固頑強的圍籬與地雷區，將戈蘭與敘利亞其餘地區完全分隔開來。佔領初期，戈蘭人有時仍可入境敘利亞拜訪親戚與朋友，但現在他們卻因新的路障而完全隔絕；由於百分之九十的戈蘭人都有親戚住在敘利亞，這樣的情況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劇變導致分隔兩地的家人們聚集到「長嘯山」（Hills of Shouts），長嘯山是戈蘭馬賈德爾沙姆村外的兩個山丘，被停火線所分隔，分居兩地的家人使用擴音器來傳達家裡添丁、喪葬和婚嫁的消息。來自艾恩昆宜赫村的阿米那·哈提卜在一九六七年戰爭後，便居住在停火線外的敘利亞方，在他的證言中提到這種處境是多麼令人不勝唏噓：

> 在那裡〔長嘯山〕，我覺得非常洩氣。我的村莊近在眼前，卻無法企及。當我去〔長嘯山〕……他們用擴音器告訴我誰誰誰死了，誰誰誰瀕臨死亡，我怒不可遏。我想要扯壞那些鐵絲網和地雷，我不在乎會怎麼樣了……[33]

有趣的對比在於，戈蘭人奮力與身在疆界彼端的敘利亞親友遙相聯繫時，戈蘭的德魯茲人卻和以色列的德魯茲社群漸行漸遠。雖然一九六七年戰爭後，住在加利利村莊中的以色列德魯茲人即刻趕往戈蘭高地，重新找回因為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而斷絕聯繫的親戚們，但是兩個群體由於政治傾向不同，關係日益緊繃，戈蘭德魯茲人對他們的同胞與以色列政府的關係充滿猜忌。

在以色列佔領的第一個十年將暮時，戈蘭高地上（包括新城市卡茲林）已有二十四個屯墾區，屯墾者在一九七七年夏天開始遷入此區。但是猶太屯墾區在戈蘭從未達到關鍵規模（critical mass），及至今日數量始終不多。不若西岸屯墾者常為了工作或其他事務往返於西岸與以色列本土之間，在戈蘭的屯墾者傾向在當地工作。在戈蘭南部，他們靠著畜牧維生，生產土雞肉、牛肉，也種植蘋果，視為重要的經濟產業。些許工業在戈蘭中部和北部發展，如電化凝灰岩的生產（這是建築和道路建設的基本原料）、滅火設備、鞋子和涼鞋，甚至葡萄酒的製作。在其他屯墾區，尤其是著名的涅維阿提夫（Neve Ativ），提供觀光設施，當地主要的觀光事業是赫爾蒙山（Mount Hermon）的滑雪活動。

一九六七年以色列佔領戈蘭時，戈蘭尚未開發，幾乎沒有良好的道路，村莊中也沒有電力和自來水。以此觀點看來，戈蘭的猶太屯墾區的確促成當地基礎建設的發展，但是戈蘭人——雖然很多都在以色列找到工作，且享用著建設發展的果實——仍然持續表示對敘利亞的忠誠，視自己為敘利亞人，並且反對以色列的佔領。

4 西奈

人們往往忘記，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從埃及手中奪走的西奈半島也曾是佔領地的一部分，一方面因為以色列統治西奈半島的時間相對短暫（從一九六七年六月到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方面則是隨之而來的改變相對較小。由於沙漠廣布，此處少有人居，佔領者與被佔領者間的衝突較小。儘管如此，西奈半島在這十五年間仍屬佔領地，其佔領的主要特點仍值得探討，因為它與其他以色列控制的地區境遇雷同，且被以色列視為重要的附屬地，因為它增強了以色列的安全感，提供了石油等重要的自然資源。

西奈半島北部壤接地中海，東部與南部緊鄰紅海，西部比鄰蘇伊士運河，是個面積約六萬平方公里的沙漠地帶，形狀如倒三角形。其非官方首都是位於西奈北部的阿里什。埃及（包括西奈）直至一九一八年在司法上都屬於鄂圖曼帝國，西奈當時雖由開羅的鄂圖曼代表所統治，但相對自治，因為鄂圖曼人主要在大城市行使控制權，而非如西奈這樣地廣人稀的沙漠區。逐漸地，埃及和西奈

變成英國的勢力範圍，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一九二二年埃及獨立後西奈直接受其管轄時。至此西奈便完全被視為埃及領地。

一九六七年戰爭前夕，極大部分的埃及人仰賴西部的蘇伊士運河維生，因此西奈絕非杳無人跡。當以色列奪取此地時，半島上居民約在十三萬人之譜，其中十萬人安居西奈北部，年降雨量約一百到兩百公釐，是全區最高之處。貝都因人多達一萬一千到一萬兩千，雖然逐水草而居，隨遊牧而遷徙，但他們在半島西北角接近加薩走廊的地方有兩個永久村莊：阿布提拉（Abu Twila）和雪克朱德（Sheik Zuid）。前者是此區貝都因人的主要市場，當地居民以交易、貿易和農業為生。雪克朱德的貝都因人則務農為生，由於臨海之故也製鹽；除此之外，從西奈走私貨品到加薩走廊和其他地方，一直是他們額外的收入來源。

屯墾西奈

不若一九六七年佔領的其他地區，以色列一開始並未在西奈大規模建立屯墾區。以國對屯墾西奈興趣缺缺，不若未曾被納入埃及屬地的加薩走廊，和對以國人來說從未屬於約旦的西岸，由此可見他們認為西奈半島終究會被歸還給其法定擁有者——埃及。然而有趣的是，以色列有某些人，尤其像是以色列銀行（Bank of Israel）行長大衛・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戰後立即建議以色列當局從埃及手中買下西奈半島，並在當地建立屯墾區；霍洛維茨甚至與美國官員討論此事，但終究

無疾而終。然而不久後，一九六九年政府授權在半島地中海岸、鄰近加薩走廊的拉非雅赫平原（Rafiah Plain，希伯來文Pitchat Rafiach）進行小規模屯墾。這行動背後的目的，是在半島西北方建立一個屯墾區，作為加薩走廊與西奈間的楔型緩衝區。如此當西奈歸還埃及時，此村莊可成為實體路障，阻礙埃及的軍武走私進入加薩走廊。

因這個屯墾計畫而被標上特殊記號的大都是貝都因部落所在地，軍隊在夏隆將軍的領導下，於一九七二年初著手清理區域；它大面積地徵收貝都因的耕地，基於「安全考量」以圍籬將之區隔開來。接著，夏隆揮軍長驅直入，將住在當地的一千五百四十個貝都因家庭逐出此地。[1]驅逐方式冷酷無情：房子被剷平，樹木被連根拔起，貝都因人為了灌溉、畜牧而開鑿的水井被封死。許多被迫遷離的人居住在封鎖區城郊的帳篷裡，一度試圖跨越圍籬，繼續回來種植他們的田地。被驅離者向以色列最高法院陳情，但軍方強詞奪理，辯稱將其持有地轉型為緩衝區係出於必要，以便分隔西奈和加薩走廊。一九七三年五月，毫無意外地法官達成結論：「我們沒有理由懷疑軍隊在拉非雅赫平原建立緩衝區的正當性，早在我們審理此案前，此事就已充分且善意地討論過了。」法官操持一切權力，並繼續說道：「這種案件，軍人們的意見必然比請願方更被重視……」[2]請願被駁回，貝都因人不能再回到他們的土地上，新的猶太屯墾區隨後於此建立。

由於西奈半島和戈蘭高地一樣，並不被視為聖經的以色列地帶，所以對西岸影響極大的宗教屯墾在此地並不顯著，只有一個宗教性質的屯墾區阿茲蒙納（Atzmona），或稱伯耐阿茲蒙（Bnei Atzmon）。反之，西奈北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時約有十三個村莊）許多屯墾者都是技術精湛的農牧業者，是以色列本土集體合作歷史悠久的屯墾區農人的後代，他們正在找尋可供開墾的新土地。

西奈北部的新屯墾區以密集農業為主要的經濟產業，以出口為導向（主要是花卉和蔬果），其農業受惠於氣候條件，並得利於自加薩走廊引進的廉價阿拉伯勞工。雖然政府希望將西奈屯墾區變成出口冬季農作物的農莊之首，但實際上，在一月到三月間，西奈屯墾區只貢獻了蔬果和花卉出口中的百分之十五，僅占年出口量的百分之三十。

一九七三年，政府同意在西奈建造市中心亞米特（Yamit），它將沿地中海岸肇建，成為此岸最南端的濱海城市——從北部的海法貫穿到南部的特拉維夫和阿希多德（Ashdod）。府會首長計畫在這座新城市興建一個深水港和一座機場；居民或受雇於觀光業，或受雇於鄰近屯墾區從事其他服務。第一批屯墾者於一九七五年遷入亞米特新建的房舍，此地旋即吸引更多來自以色列各地的屯墾者，來此尋求沙漠冒險和挑戰，教徒和非教徒皆然。雖然這塊土地終將歸還埃及，政府卻帶頭投資興建城市，實在令人訝異，但也許政府首長認為最後總能說服埃及，讓他們留下這座城市和鄰近的屯墾區；或者他們將這個方案單純視為對埃及施壓的手段，使之願意遵照以色列的方式達成和平。

在西奈的另一個角落、後來被稱為西羅摩區（Shlomo District）的地方，政府於一九六九和一九七五年間核准興建一系列的屯墾區，認為這樣多少可以保證以色列船隻在歷來屢受埃及侵擾的阿卡巴灣（Gulf of Aqaba）得以自由航行，促使一九七一年奈維歐特（Neviot）和迪乍哈夫（Di-

Zahav）兩個屯墾區的建立。奈維歐特建立在埃拉特（Eliat）以南僅六十八公里的地方，除了農業之外，還有旅館、餐廳和潛水中心；迪乍哈夫則建立在貝都因的達哈夫（Dahav）村以南八十公里處，屯墾者主要從事觀光業。

一年後，一九七二年，政府核准在半島南端鄰近沙姆沙伊赫（Sharm el Sheikh）處，建造一個名叫歐菲拉（Ofira）的城鎮。歐菲拉旋即擁有自己的電力站、鹹水淡化設備和兩座小工廠，目的在為屯墾者提供工作機會，除此之外還有兩間旅館。但這個區域地處偏遠，對一般以色列人來說從不具吸引力；在其鼎盛時期，歐菲拉擁有一千名居民，如同其他位於西奈東南部的屯墾區，歐菲拉並不算是一次成功的嘗試。西奈偏遠地區的發展之所以失敗，乃因西奈北部屯墾區得到政府大量（經濟或其他方面）的支援，但是東南部的屯墾區幾乎只能自食其力。

以色列在西奈佔領區的計畫，還包括發展聖凱瑟琳（Saint Catherine's）周邊區域。聖凱瑟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修道院之一，據說建立於摩西看到燃燒的荊棘的地方。為使此地與外界聯繫，以色列於一九七六年打造了一個現代化的航站大廈。

以色列人也覬覦西奈的天然資源。他們罔顧國際佔領法，進一步在西奈半島上找尋石油，開鑿發展阿爾瑪油田（Alma oil field），巔峰時期供應了以色列四分之一的年石油消耗量。沙漠廣袤無垠，極適合軍事演練，巨大的軍事基地於是如同雨後春筍般出現，而空軍也將這片沙漠變成主要的練習場。

西奈的戰爭與讓步

一九六七年戰後，在這片廣袤的西奈半島上遊走的人，極可能覺得戰事前線平靜無波。然而事實卻遠非如此，在沙漠西緣的蘇伊士運河區，血腥的戰爭正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間掀起驚濤駭浪。

早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在蘇伊士運河北端離塞得港（Port Said）不遠處，埃及人以四枚飛彈擊沉以色列的驅逐艦艾拉特號（Eilat）之時，即可嗅出日益升溫的緊張氣氛。以色列予以回擊，以大砲轟炸埃及在運河南端蘇伊士城的煉油廠，使之陷入火海，造成鉅大損失。這以牙還牙的交火逐漸演變成一場全面的消耗戰。一九六九年六月埃及總統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宣布開戰，以期將西奈從以色列佔領中解放出來。緊接著幾個月後，兩邊開始交互轟炸，使用戰鬥機、坦克和重型大砲——甚至派遣軍隊到運河對岸進行秘密行動。為了保護軍隊不受埃及戰火侵襲，以色列在蘇伊士運河東岸大興土木，沿河建造防禦堡壘和沙坑，並借用參謀長哈伊姆·巴列夫（Chaim Bar-Lev）之名，將其稱為巴列夫線（Bar-Lev line）。

由於砲彈鋪天蓋地襲來，運河從一九六七年戰爭伊始便維持關閉狀態，停止運輸。雖然納賽爾發動了消耗戰，仍無法奪回西奈，但確實成功地使以軍精疲力竭。血腥的戰事結束之際，兩敗俱傷，雙方簽署停戰協定，於一九七〇年八月七日生效。在這次為期三年的衝突中，三百六十七名以色列軍人和超過一萬名埃及軍人及平民被殺。而一九六七年戰後的現狀卻沒有絲毫改變；西奈仍舊為以色列所佔領。

達揚很清楚，與埃及停戰只是短暫休兵，如果以色列繼續堅持佔領西奈，戰爭必然會重演。因此在停戰協定生效後不久，他立刻向政府提議將軍隊撤離蘇伊士運河，部署於運河以東三十五公里處的吉狄（Gidi）和米特拉（Mitla）隘口。他認為結束部分對西奈的佔領，可以減少前線衝突，而這個誘因，可以使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總統願意重啟蘇伊士運河，以利國際運輸，這是埃及的重要收入來源。達揚認為，一旦運河正常運作，埃及便會失去與以色列為敵的動機，因為戰爭會使運河再度關閉，使埃及損失重要收入。但是達揚的政治對手（尤其是副總理以加爾．亞隆）持反對意見，總理果爾達．梅厄（Golda Meir）也與亞隆站在同一陣線反對達揚，表示他無法理解達揚怎麼會「毫無代價地」提議放棄西奈的部分地區；軍隊也反對從沙漠撤軍，因此這個提案無疾而終。但是埃及無法接受以色列持續佔領自家的土地。到了一九七〇年九月，納賽爾總統的繼任者沙達特（Anwar al-Sadat）決心將之奪回。

沙達特於一九一八年出生於開羅以北六十五公里左右的邁特阿布庫姆村（Mit Abul Kom），家中還有十二位兄弟姊妹。十八歲時進入軍事學校就讀，表現不錯但稱不上出類拔萃。他甫畢業就被派遣到遙遠的前哨基地，在那裡認識了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並與納賽爾及其他軍官一起組織了自由軍官隊（Free Officers group），在一九五二年七月顛覆了埃及君主政權。因此納賽爾在自由軍官隊之後當上了埃及總統，沙達特與他合作融洽，儘管直到納賽爾過世後，藉藉無名、欠缺磨練的沙達特才首次真正踏出前輩的陰影，浮出檯面。起初，沙達特的頭號敵人以色列、或當時的兩大世界霸權美俄、甚或他自己的人民都未認真看待他。然而隨著時間遞嬗，他證明了自己的確果敢有為。

沙達特上任後的首要任務之一便是尋求白宮協助，勸服以色列從西奈撤軍，至少初期先撤離一部分。雖然美方的回應並不正式，但根據埃及的消息來源，美國透過國務卿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讓沙達特了解到，美國唯有在某些危機情況下才會大肆介入，並且需要外交程序來終結西奈的佔領。[3]聽了季辛吉的建議，沙達特總統集結了二十萬大軍駐紮在蘇伊士運河區，並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下午以色列的贖罪聖日（Yom Kippur）時，派出十三萬軍人渡河，以對付四百五十名被留下來修築巴列夫防線的以色列軍人；如同上一章所言，這場贖罪日戰爭是與敘利亞一起發動的。

雖然沙達特的軍隊成功跨越了運河，並深入沙漠佔領地約十公里處，以色列仍迅速收復失土：他們制止入侵者，發動反攻，並且反向跨越運河深入埃及本土二十公里處。三週後戰事告終，以色列和埃及軍隊混亂交纏，以色列軍隊停在蘇伊士運河西岸，而埃及軍隊則在東岸。戰爭階段結束後，就是外交的時候了。

開始結束西奈佔領

美國積極的外交政策由季辛吉帶頭，促成以埃雙方於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簽署六點停戰協定，結束戰爭。事後來看，這可以視為以色列結束西奈佔領的開端。協定的第二點，呼籲雙方開始

討論如何撤離他們如今已糾纏不清的軍隊。[4]幾週的協商後，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兩國的參謀長在沙漠中會面，簽署了一份軍事撤離協定，而這事後被稱為《西奈軍隊分離協定》（Sinai Separation of Forces Agreement）或者《西奈一》（Sinai I）。[5]

雙方決定「恪遵停戰協議……〔並且〕停止對彼此發動所有軍事或準軍事行動……。」以色列同意撤離蘇伊士運河西岸的軍隊，並重新將之部署於西奈距水線約二十五公里的一條界線外，亦即吉狄和米特拉隘口西側——也是西奈最具防禦優勢的天險（見地圖四）。有趣的是，這或多或少與數年前達揚的提案吻合；如果他重新部署軍隊的提議被果爾達．梅厄接受，也許一九七三年十月的贖罪日戰爭就能避免；而另一個錯失的機會，則釀成了一場不必要的衝突。

以色列從蘇伊士運河撤軍、重新部署是一件歷史大事，因為這是以色列第一次撤離一九六七年以來所佔領的地區。埃及方面，則同意在西奈、運河東岸的地方闢出一道長條形、約十公里寬的區域，限制兵器和人員的進出；以色列也同樣在它仍佔領的地區設置相似的管制區作為回應。沙漠中，雙方軍隊之間建立了聯合國區，聯合國緊急軍隊駐紮於此，他們的任務是監視以色列和埃及是否遵循這些自律的限制和規定。以色列堅持要沙達特重啟蘇伊士運河，相信有船隻往來其間，另一場衝突發生的可能性會大幅減低；但沙達特不同意。

《西奈一》不僅只被視為一紙停戰協議，尤其對埃及人來說，它是「往最終的正義和永久和平邁出了一大步……」。[6]因此埃及希望看見以色列撤離更多西奈佔領地，為達此目的，沙達特總統轉向美國求援。

「重新評估」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在華盛頓的美國國務院，沙達特的外交部長伊斯邁爾．法赫米（Ismail Fahmy）與前總統納賽爾的女婿，也是現在沙達特的外交聯絡秘書阿什拉夫．馬爾萬（Ashraf Marwan）面見了美國國務卿。他們的目標在確保以色列能更進一步撤離西奈。在這次會晤中，季辛吉說明了美國白宮對以色列施壓，要求以方更大幅度地撤離西岸時所面臨的問題：首先，美國總統福特（Gerald Ford）甫走馬上任一週；第二個問題，則是他們認為以色列政府明顯地頹軟無力。

季辛吉解釋道，美國不能與以色列衝突，「因為新總統對事物還沒有充分上手……在他坐穩這個位子前，沒有道理讓他捲入〔與以色列的〕紛爭……」[7]同時據季辛吉所言，在伊札克．拉賓領導下的以色列政府，「是一個極度脆弱、由一群極不成熟的人所掌理的政府。我對拉賓很失望……也許有些人總有他們的極限，無法超越……他沒有政治魅力……拉賓是一個文人將軍；這是最糟糕的地方。這使他總要花上數個月才學得到教訓……」[8]但是，埃及訪客繼續要求以色列撤離西奈。「這很困難，以色列不急著走下一步〔超過《西奈一》所協定的更多讓步〕。」[9]然後季辛吉問：「你們有什麼交換條件能提供〔以色列人，倘若他們撤離〕？」法赫米回答道：「和平。」很顯然地，這是非常強勁的字眼。畢竟，就像前任的納賽爾總統，沙達特要求以色列撤軍到一九六七年的那條邊界，但是從未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告一段落前，提供一個完全雙向互惠的和平交易。「你們會提供和平？」季辛吉迫近這位埃及外交官，使得法赫米迅速退後。季辛吉總結：「首

先，我們必須讓總統〔福特〕穩固好他的地位。然後我們會想出一個共同策略……現在總統已經有實權了，但是在大局穩定之前，他還不是真的總統。」[10]

福特總統漸入佳境，在他地位愈來愈穩固後，他開始對以色列施壓，要求它進一步從西奈撤軍。他甚至出言威脅要「重新評估」美國和以色列的關係，提示他可能收回部分美國對以色列的龐大經濟與軍事援助。這大膽的政策使以色列動員它的美國朋友：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七十一位參議員聯名上書給總統，提出抗議與警告：「我們希望再次確認我們對以色列國的存續和其尊嚴的維護，歷經二十六年多、五個政權交替以來，這一直是兩黨所擁護的基石……我們敦促您重述我們國家對以色列安全的永久奉獻，繼續提供軍事、外交和經濟援助……」[11]總統讓步了，但為時不久。

三個月後，一九七五年三月，他允許他的國務卿亨利．季辛吉再度嘗試，以期達成奠基在《西奈一》之上的第二次以埃撤軍協議，透過向以色列施壓，要求它放棄更多西奈佔領地。但是以色列政府不為所動，季辛吉的任務失敗。

福特總統利用機會公開責備以色列的僵持狀態，並繼續威脅要「重新評估」美國在其中的立場。在重新評估期間，華府暫緩所有近期的經濟援助，凍結以色列要求的F-15戰機，延遲送達早已應允的長矛導彈（Lance missiles），並且不再提供以色列軍事武器。以色列再度動員它的美國支持者，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七十五位參議員連署上書給福特總統，要求重新加強對以色列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援助。福特總統堅持不為所動。

《西奈二》

為了支持福特總統，一九七五年六月五日埃及總統沙達特重新開放蘇伊士運河的國際運輸。這出人意表的舉動對以色列造成極大的撤軍壓力，且因為美國持續要求以色列妥協，以埃的間接協商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臻至高峰，雙方簽下《西奈臨時協定》（Sinai Interim Agreement）即為人所知的《西奈二》（Sinai II）（見地圖四）。

在此協議中，以色列同意停止佔領行動，從已佔領的西奈地區撤軍，退至蘇伊士運河以東三十至三十五公里處，並在吉狄與米特拉隘口以東重新部署。以色列也同意撤離阿布茹德斯的油田，此處的油田位於沙漠西緣，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戰爭後不久，就開始冒出石油。

按《西奈一》前例，雙方同意卸除緩衝區的武裝，限制自己在緩衝區邊界的軍備。沙達特承諾不會使用武力消弭與以色列的齟齬，保證維持蘇伊士運河非武裝貨物的流通，並且在一九七三年後，當地強烈杯葛以色列產業時，埃及承諾幫助紓解這些杯葛現象。美國則承諾建立軍事駐防點，負擔相關費用，於此配置兩百位美軍以確保雙方遵守協議，同時有效地取代了聯合國在西奈的和平駐防，因為早在簽署《西奈一》時，以色列就反對聯合國之駐防，認為其對自己有偏見。

然而對以色列而言，交易的最重要因素來自於（有些美國官員形容為「難以置信」〔mind

boggling）的）秘密美援。事實上，美方提供給以色列撤軍西奈的好處，雖然不是一張空白的美國支票，但也很接近了：「不論現階段或長久而言」，美國承諾會竭盡所能對以色列有求必應——透過年復一年通過國會議案，以提供以色列軍事裝備和其他防禦需求。[12]這代表的是永久的、大規模的軍援及金援，在任何緊急狀況下，都能提供順應以方軍事需求的臨時方案，及透過提供美國最精良的武器（例如F-15戰鬥機）俾使以軍優勢固若磐石的承諾。[13]一封密函甚至言明，一旦巴解組織反對聯合國決議第二百四十二條和第三百三十八條（認可以色列的存在權），且不願放棄對以色列採取暴力手段，華府就不承認巴解組織，亦不與之協商。要求巴勒斯坦率先停止對非法佔領進行反抗，方能進入終止佔領的協商，這一先決條件堪稱獨樹一格。由於以色列將放棄一部分西奈的石油，國務卿季辛吉代表美國做出承諾，保證五年內以色列可以從美國那裡得到以國國內的所有石油需求量，且為此美國會在以色列建造一個可以容納一整年石油用量的儲藏設備，對以色列違反國際法，從被佔領的西奈榨取埃及石油一事，置若罔聞。在以色列的要求下，華盛頓也答應在沒有先「盡力與以色列協調，避免提出任何使以色列不滿的方案」[14]之前，不倡議任何和平提案。當然，這是極大的讓步，因為它給了以色列干預美國中東政策的直接管道，形同是實質的否決權。

為了讓以色列在《西奈二》上簽字，美國付出的代價（一國向另一國擔保會給予如此大量金錢和如此陣仗的承諾）似乎史無前例。事實上，以色列當時的國防部長希蒙・佩雷斯估算這些利益時曾說道：「我們放棄一點點，就可以得到更多。」[15]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西奈二》圓滿執行完畢，其中包括以色列從西奈撤軍，在新的地點重新部署以色列和埃及軍隊。大致來說，《西奈二》——以及《西奈一》——是西奈佔領結束的一大步。以色列政府打破了它的禁忌，證實它願意歸還一九六七年所佔領的土地，雖然憑良心說，跟其他地方例如西岸相比，西奈是相對沒有價值、較容易放棄的。沙達特方面則表示要以色列讓步並非不可能，雖然這是在沉重的金錢代價和冗長的協商之後。同樣重要的是，一九七三年末的一系列以埃交易也顯示，華盛頓在結束以色列佔領以及維護以國和其鄰國安全上，扮演著重要角色。雖然很顯然地，最首要的責任落在以埃兩國自己身上，但美國在一九七三年戰後的這段時間，證明它在擔任和事老，使用其外交和經濟影響力促進雙方達成協商共識上，扮演著核心要角。

1977

第二部

第二個十年

1987

5 利庫德年代

有些年分總是較其他年分格外引人注目，對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來說，一九七七年就是這樣的一年。使這年顯得格外特別的，是已經上任七年的埃及總統沙達特和梅納赫姆・比金。

一九一三年比金出生於俄羅斯的布列思特立陶夫（Brest-Litovsk），他從小就是一個赤忱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拿到華沙大學法學士學位後，他成了一位律師。他的父母和親戚都在納粹大屠殺時遇害，此一經驗解釋了比金往後的政治生涯和世界觀。一九四二年，比金移民到英國託管的巴勒斯坦，在那裡他對於英國限制猶太移民的政策憤憤不平，並成為巴勒斯坦反抗英國的核心要角，領導地下恐怖主義團隊——知名的伊爾貢（Irgun）組織，對英國人和阿拉伯人進行粗惡的暴力行動。一九四六年，比金的伊爾貢組織炸毀了大衛王飯店（King David Hotel，當時是英國駐耶路撒冷司令部）一翼，殺害了九十一位英國人；而一九四八年戰爭時，他的手下在惡名昭彰的阿拉伯殺戮事件中，扮演著積極重要的角色，這個殺戮事件發生於以色列建國前夕，耶路撒冷附近的代爾亞辛村

（Deir Yassin），是加速阿拉伯人自巴勒斯坦遷出的重要事件。

比金幾乎整個政治生涯都在國會中領導右翼反對勢力，對抗執政的勞工黨，而在一九七七年的選舉中，在右翼國族主義鼎盛的利庫德（Likud）集團，他達成了以色列的政黨輪替，成為第一位以色列右翼總理，結束了近三十年來的勞工黨專政。

比金是一位宗教狂熱者，篤信猶太人有歷史性的權利（historic right）以得到聖經所記載的、以西岸為核心的以色列地帶，他提到西岸時，使用的都是其聖經名稱「朱迪雅與撒馬利亞」。這個名字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時曾獲官方採用，當時軍政府公開聲明「朱迪雅與撒馬利亞區」應該與「西岸」一詞意義相同，但「西岸」本身似乎將這個地區與「東岸」連結在一起，暗指約旦政權。當時這個新詞並不常被使用，但是現在比金試圖透過公開指稱「朱迪雅與撒馬利亞」來承先啟後，暗示這些地區皆屬以色列無法分割的一部分，如同利庫德黨綱（Likud platform）所揭示，此區應由「城市和鄉下的屯墾區」墾殖。[1]

比金組織了一個聯合政府，其中兩項人事派任對佔領地的命運意義尤為重大。其一是摩西・達揚，他一度是勞工黨運動的堅強堡壘，且直到一九七三年，都是佔領地相關事務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比金現在邀請他擔任外交部長。因未預料到一九七三年的埃及—敘利亞攻擊，而被貶入政治沙漠的達揚，如今看見東山再起的機會。[2]另一項重要的政府人才聘雇則是前軍事將領艾里爾・夏隆，比金指派他擔任農業部長，最重要的是，他變成了佔領地屯墾區的內政部會議領袖。在國會對比金政府的支持下，以色列的歷史和與佔領地的關係進入了嶄新的一頁。

拉巴特的重要會議

如同前任總理，比金本來更希望將以巴衝突的解決，置於更大的以色列—約旦交易之下；一九七〇年代，對於比金與許多其他人而言，在以約之間的朱迪雅與撒馬利亞區，存在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家簡直不可思議。為了確認約旦是否接受這個交易，總理派遣了新任外交部長私下面見約旦國王胡笙。他們於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倫敦見面，但達揚發現國王立場堅決，除非以色列願意提供具體讓步，亦即是實質地從西岸（包括東耶路撒冷）撤退，否則國王不願意與以色列簽下交易；而這對比金而言斷然不可為之。[3]

然而事實上，約旦或巴勒斯坦人都不是比金的首要考量。他認為「埃及優先」：與埃及訂定和平交易，將能有效防止以色列面臨滅國的危險，因為這可將阿拉伯國家中最強勁的敵人拉出戰爭圈外，俾使日後其他國家起而效尤。總理於是轉移目標到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身上，試圖籌辦以埃機密高峰會來解決雙方的意見分歧。哈桑國王擔任中介者適得其所，因為於阿拉伯國家中，摩洛哥擁有最大的猶太社群，且哈桑國王與埃及總統沙達特交情良好。幾天內，哈桑國王帶回了沙達特的回應：沙達特會派遣他的副總理穆罕默德・哈桑・圖哈米（Muhamed Hassen el-Tohami），去面見在摩洛哥的以色列外交部長。

兩人於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六日會面。莫薩德（Mossad，以色列情報機構）的內部報告描述了此

次會晤的情景：

> 外交部長〔達揚〕搭乘特別班機，於十九點十五分抵達拉巴特……貼身保鏢隨行……他們一抵達，就被帶到國王的招待所……這群人由法務部長接見後，達揚卸下了他的喬裝〔一頂假髮和有框眼鏡〕。客人們坐成半圓形，茶几隨處擺放……這個會議持續了四個鐘頭不曾休息，即使國王因母親來訪必須早退，會議仍然持續著。[4]

這份秘密報告顯示，達揚與圖哈米主要談論的是以色列和埃及如何達成協議，於此埃及願意提供完全的和平，而以色列則結束對西奈的佔領。他們也討論了巴勒斯坦相關事務，因為若埃及不願對此有所行動，阿拉伯世界會一致責難它背叛巴勒斯坦。在眾多不同的議題之中，他們對其中一點看法一致，亦即巴解組織和其首領阿拉法特是引起分裂的禍源，「為以色列的未來造成危險，且將約旦國王也逼入險境。」這是因為巴解組織不僅宣稱巴勒斯坦人擁有西岸和加薩走廊，甚至擁有以色列本土，且他對於某些阿拉伯政權手段激烈，尤其是約旦的君主政治，因為幾乎所有約旦人都是巴勒斯坦人，他在那裡有著堅固的支持。為了確保巴解組織不干涉任何和平嘗試，或如一九七〇年初期那樣企圖推翻胡笙國王，圖哈米建議其他阿拉伯國家，也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和埃及，「一起控制這些極端分子〔巴解組織〕，並且確保約旦國王的王位。」這些國家對阿拉法特有著一定的影響力，因為他們是巴解組織的政治後援，且支持著組織的經濟。

達揚從拉巴特飛回以色列後，親自謁見總理回報狀況，隨後便飛往美國，趕赴美國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之約。雖然卡特已從他的情報單位得知達揚與圖哈米在摩洛哥的秘密會議，但他顯然並未將之視為重大事件。在與達揚的會議中，他直言不諱地警告他的客人，以色列現在採取的是「非常強硬的立場，阿拉伯那方則表現得較有彈性；他不滿以色列持續不斷建立屯墾區的政策，但比金的利庫德集團卻堅持要加速落實此政策。」[5]達揚退卻了，以色列領導者不習慣白宮對其採取如此強硬的態度。卡特總統出身南方，後遷居猶太勢力影響相對微弱的社會環境，因而他對於猶太人在美國境內的遊說活動不若前幾任總統敏感，過去美國幾乎總是自動站在以色列這一方。

結束西奈佔領的顛簸之路

同時間在埃及，沙達特總統也發展了他自己的計畫。他的大使圖哈米九月從拉巴特與以國外長秘密會晤後捎來喜訊，告訴總統他們共同商討出了可能的和平交易。一位卓越的埃及記者穆罕默德・海卡爾（Mohamed Heikal）表示，雖然無法得知圖哈米如何報告他與達揚的對話，但是「沙達特理解到的訊息是，以色列已準備從埃及領土撤出」。[6]不久之後，於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也許純粹出於巧合，卡特總統寄給沙達特一封親筆信，「個人懇請您支持」。[7]其中卡特提醒沙達特，在白宮的會議中，沙達特曾經向卡特承諾，「在重要時刻……我們共同尋求的中東和平出現障礙時」，總統可以信任沙達特。如今，卡特繼續說道：「我們已經來到了這一刻，如今我需要您的

幫忙……推展〔和平進程〕的時間已經到了……」

沙達特現在已經蓄勢待發，圖哈米與達揚的會面激發了他的想像。加上卡特總統那封真誠的信函，他在這位新上任的以色列總理比金身上看見了希望。沙達特認為他是有為的領導者，能被寄予厚望，做出困難的抉擇。他做出此一結論的部分原因是出自他們的一位共同朋友——羅馬尼亞總統尼古拉・齊奧塞斯庫（Nicolai Ceauşescu）。一九七七年九月造訪羅馬尼亞時，沙達特問羅馬尼亞領導人：「你看過比金……告訴我，首先，你覺得他想要和平嗎？第二，他夠強〔可以成事〕嗎？」[8]齊奧塞斯庫肯定比金不僅想要和平，而且是一位強悍的領導者。而這正好就是沙達特需要的保證，他現在決定要下險棋了——他會公開與以色列直接而開放地進行和平對話。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日他採取了行動，在埃及國會的演說中宣布，他已準備好要「赴湯蹈火，只要能夠避免任何一位士兵、軍官——我的任何一個兒子——受傷，不是死亡，而是受傷。」[9]他繼續說道：「以色列會非常驚訝……因為我已經準備好要到他們家門口，到以色列國會去跟他們談話了。」沙達特這戲劇化的言論開啟了外交嶄新的一頁，沙達特變成了主要發球者，強迫比金接他發的球，讓美國至今都只能當一個旁觀者，也讓沙達特所蔑視的蘇聯完全沒有出場的機會。

由於必須回應沙達特的挑戰，比金邀請他到耶路撒冷，但在比金的公開演說和他的正式邀請函中，都沒有任何沙達特式的大膽作風。這也許並不令人訝異，這兩人在很多地方都天差地別，個性和作風上很少有共通之處。沙達特是溫暖而外向，不拘小節且較沒有耐心，然而比金卻是嚴肅、拘謹，且令人厭煩地一板一眼。但現在兩人必須並肩同行。

耶路撒冷令人不快的驚喜

十一月十九日，沙達特降落在鄰近特拉維夫的本古里安國際機場（Ben Gurion airport），在那裡他見到了總理和許多以色列前任及現任領導者。他們從此地啟程前往耶路撒冷，抵達耶路撒冷時劇情卻急轉直下，沙達特開始了解到有些事情錯得離譜。他原先從外交使節圖哈米口中理解到的是，九月在拉巴特與達揚的會議中，這位以色列外交部長曾承諾以色列會從西奈撤軍，並放棄該處的屯墾區。如今，在他們的耶路撒冷會議中，比金只簡單告訴沙達特，事情並非如此。達揚（也在場）補充說道，在他與圖哈米的秘密會議中，並沒有做出類似的承諾。沙達特堅持道：「圖哈米說你已經準備要撤軍。」達揚則回答道：「總統先生，我沒有說過這種話。」一會兒之後他說：「如果圖哈米說過我們準備要撤軍，那麼他就是一個騙子。」

拉巴特會議的逐字稿記錄支持達揚的說法：記錄中他向圖哈米說的是，他認為他自己「僅僅是比金的使節，因此必須把所有事情帶回去報告比金，且在得到比金答覆前，無法〔給予任何承諾〕……」。[10]至於西奈的猶太屯墾區，根據逐字稿，達揚的意思似乎是要讓以色列繼續持有它們，尤其是作為西奈和加薩走廊緩衝區的亞米特區，即使以色列從沙漠的其他地方撤退，也要繼續保有此地，並且要請以色列軍隊巡邏以保障其安全。達揚告訴圖哈米：「如果我們撤軍……我們的屯墾區下場會如何？你會在你們管轄之下繼續讓他們留在那裡嗎？」[11]

這份逐字記錄當然沒有傳達出達揚當時說話的聲調，他是否聽起來有妥協的意思，或暗示圖哈

米如果埃及在此事上施加壓力，以色列就會撤軍，甚至撤離屯墾區；或是否他是嚴肅而沒有討論餘地的。談話記錄是用第三人稱希伯來文寫成，且較像是在總結外交部長對圖哈米所說的話；但了解達揚的人知道，他說話往往故意含糊其辭，沒有辦法從他的話當中確定他真正的意思，他的語氣亦是如此。但不論如何解釋這個誤會，沙達特顯然已被事件突如其來的轉變所困擾，然而他已經身在耶路撒冷，且他的和平之球也早就丟出去了。

沙達特這趟旅程的高潮在隔天以色列國會時，在這擁擠的建築物中他提出他的和平計畫。這個計畫的要旨在於他的承諾：「我們真誠地歡迎你們在我們之中和平且安全地生活。」[12]為此，以色列也必須在這起交易中盡一份心力：從西奈和其他阿拉伯佔領地（包含阿拉伯屬東耶路撒冷）**完全地**撤退。而首當其衝的就是巴勒斯坦的狀況，如同沙達特所言，這是「問題的核心」，以色列必須允許巴勒斯坦國家的獨立存在，且將巴勒斯坦難民送回以色列本土。但沙達特沒有提及巴解組織，因為他知道這將會導致強烈反彈，並且使事情毫無進展。

沙達特的要求震驚了以色列聽眾，以至於國防部長埃澤爾．魏茨曼（Ezer Weizman）潦草地寫了張紙條傳給比金：「我們必須準備開戰了。」[13]現在回頭來看，我們很難理解，為何沙達特提議以色列完全從佔領地撤離，尤其是從阿拉伯屬東耶路撒冷撤出，給予巴勒斯坦人回歸故土的權利等事，對他的聽眾而言如此刺耳。雖然在寫這本書的今日，所有這些事情已被放入和平會談中討論，但是在一九七七年，這些都還是嚴重的禁忌。

飛抵以色列的四十三小時後，沙達特回到開羅。事後來看，他這趟旅程至此最重要的進展，就是透過一個重大的舉動，成功消解以埃雙方之間長久存在的猜忌、懷疑、恐懼、怨恨和誤解等心理障礙。我們現在知道，沙達特竭力反對在此次以色列之旅中，有任何實質的行程安排，他向顧問明確表明，這趟旅程本身就是行程。現在以色列和埃及終於可以找到他們爭執的癥結點，問題的解決之道，是以色列將佔領地交還給阿拉伯人，以換取阿拉伯人接受以色列國家的存在之權利。然而，這趟路途遠非如此直截了當。

說服美國人

十二月十七日比金造訪華府，他在那裡直接告訴卡特總統，以色列對於沙達特和平訴求的正式回應。老謀深算的達揚敦促總理向華府報告以色列的回應，而非直接回應沙達特，這麼做是為了「與美國人保持聯繫，且確定他們站在我們這邊」。[14]且達揚觀察到，比起以色列人提出和平協議，由美國人提出，更能令埃及以及全體阿拉伯人接受。比金也深有同感。

在華盛頓，很顯然地，總理想要的是一個與埃及的單獨協議，而這顯然不是沙達特希望的，因為他也需要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否則會被責怪棄巴勒斯坦於不顧。如今，在與卡特會面時，比金對於西奈事件的提案，雖然並非完全地慷慨大方，但是相對願意合作。他表示雖然以色列會結束佔領西奈，但它會堅持保有在西奈的十三個屯墾區，當時那裡大約住有四千名屯墾者；比金提議將之變

成一個特別行政區，由聯合國管轄，且由以色列安全分遣隊巡邏。[15]比金繼續說，西奈半島的眾多地方，會解除武裝，但埃及軍隊幾乎不許接近以色列邊境，且以色列堅持在西奈的重點地區設置前緣防哨站，萬一埃及發動任何攻擊，它可以為之報信。蒂朗海峽（Straits of Tiran）這個過去以埃危機的原因，將成為國際水域，不能阻擋以色列的水路通行。

對於巴勒斯坦，比金知道他必須給沙達特一些交代，因而向卡特發表了二十二點巴勒斯坦自治方案。此想法的核心在於，以色列會給予住在西岸和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民個人**自治權（*personal* autonomy），他們可以在沒有任何以色列干預的情況下過他們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因為土地本身仍然歸以色列所有，巴勒斯坦人不會有任何土地的控制權，且不會有以色列以外的政權。[16]比金的自治方案規劃了一個行政議會，由十一個經過普遍、直接、個別、平等且不記名投票選出的巴勒斯坦人組成。它可以設立部門以掌理各種不同面向的市政活動，例如教育、商業、旅遊、農業、衛生等等，這些過往都是以色列軍人的管轄範圍，但是安全與外交事務——主權最重要的表徵，仍然繼續由以色列執掌。比金提議，這個巴勒斯坦議會將在沉靜的伯利恆鎮運作（顯然並非從以色列視為首都的耶路撒冷），一期四年，並且「會推派一位成員代表到以色列政府討論共同事務」。[17]

比金在華盛頓所提議的計畫，詳細內容將由以色列、埃及、約旦和以色列控管的土地上非巴解組織的巴勒斯坦領導人共同協商，並在協商進入尾聲時，西岸和加薩走廊的居民有權自由選擇要成為以色列或約旦公民，並因此可以得到國家機關的投票權。

雖然卡特總統和他的團隊並不看好比金的自治提案，他們認為這是企圖永遠併吞巴勒斯坦土

地，給巴勒斯坦人自主權（autonomy）、不給他們主權（sovereignty），但他們仍對外宣布了這個計畫，並說這要在「公平的基礎」上，進行更深入的協商，且是一個「協商實際的出發點」。[18]然而，當比金的計畫傳到埃及總統沙達特耳裡，卻令他感到痛苦失望，他覺得比金的處理方式無濟於事，而比金對他的慷慨姿態不予回應。畢竟，以沙達特的角度看來，耶路撒冷這趟旅程，他給了以色列他們一直需要的、進入阿拉伯世界的正當性。沙達特希望他的行動會給以色列好印象，讓他們更願意合作，並進一步給予他真正需要的、得以進行和平交易的東西——伸出一隻援手，以擊潰國內和阿拉伯世界的反對聲浪，當時這些反對聲浪來自敘利亞、伊拉克、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和南葉門所組成的基本教義派陣線。但是比金給他的只是一根手指，而非一隻手，現在沙達特對於這個總理的信心大幅減少了。

在伊斯梅利亞的衝突

十二月二十五日，兩個領導人在埃及蘇伊士運河西岸的伊斯梅利亞（Ismailiya）召開了一場高峰會；沙達特沒有邀請比金到開羅，因為他不確定其首都的人民會用什麼態度迎接這位總理。沙達特的耶路撒冷之行如今已是一個消逝的記憶；伊斯梅利亞沒有任何標語、以色列國旗，或任何問候語以迎接以色列代表，且會議進行得並不順利。

沙達特堅持一併討論結束西奈佔領與撤離以色列一九六七年來佔領的其他土地，要求比金接受

「以戰爭取得領土的不可承認性」原則，卻遭比金的堅決反對與駁斥。比金身為一位法律學究當然很清楚，若他認可了這個原則，那麼他就必須放棄所有佔領地；如果以戰爭獲取領土是不可被接受的，那麼戈蘭高地、西岸、阿拉伯屬東耶路撒冷和加薩走廊，這些以色列一九六七年戰爭時所取得的土地，就都必須跟西奈一起放棄。比金堅持：「以戰爭取得領土的不可承認性」不適用於此，因為（就他所言）一九六七年戰爭中，以色列打的是「防禦戰」，而就他的詮釋，國際法的確認可被攻擊的一方獲取領土。否則，如比金所辯稱的，這對於可能的進犯方而言，就永遠都是雙贏的：因為如果戰敗，他們憑著這個「以戰爭取得領土的不可承認性」原則，仍可以取回他們已經失去的土地，這個論點僵持了數週到數月之久。

最主要的歧見在於，比金一直堅持保留西奈的猶太屯墾區，且並非地處偏遠的西奈屯墾區，而是亞米特區，它在戰略上是一個楔子，嵌在埃及的西奈半島和加薩走廊間，防止可能的、主要是西奈貝都因人到加薩走廊的槍械走私。憤怒的沙達特毫無轉圜地否決了這個要求：「如果我告訴我的人們，比金想要讓他的屯墾區繼續留在西奈，」他告訴總理，「他們會拿石頭砸我……」[19]

高峰會結束時，他們共同發布了協商結果，地主國〔埃及〕表示雙方之間，尤其在關於巴勒斯坦人的未來之事上，仍然存在著許多鴻溝。沙達特宣讀道：「埃及認為西岸和加薩應該被建立為一個巴勒斯坦國家。以色列則認為住在朱迪雅、撒馬利亞和加薩走廊的阿拉伯裔巴勒斯坦人〔僅〕能擁有地方分權（self-government）。」[20]因此一個月前看來還如此有希望的事，如今卻陷入僵持狀態，氛圍愈來愈差。而接下來事情還會每下愈況。

逆行的步伐

與沙達特在伊斯梅利亞的會議後不久，比金增設更多新的障礙，政府通過農業部長艾里爾・夏隆的提案，決定在佔領的西奈半島設立二十個新的屯墾區。很顯然地，他想創造更多地上事實，使之變成與埃及協商的籌碼——透過放棄新的西奈屯墾區以換得繼續保留現有的屯墾區，尤其是亞米特區。達揚支持夏隆的看法：「我們必須試試〔這個策略〕」。[21]接著，重型機械在西奈開始工作了起來，報紙的頭條寫道：「夏隆在西奈建立新的屯墾區」。這個時機非常糟糕，碰巧、甚或可能故意地與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出訪開羅的時間點重疊，卡特和沙達特都因此怒不可遏，懷疑比金故意逾越和平章程。[22]他們一眼就看穿比金的談判伎倆，埃及的態度也變得更加強硬了：在埃及雜誌《十月》（*October*）中，沙達特公開宣示，他不會允許任何一個以色列屯墾區留在埃及的土地上，如果總理想要在以色列撤離西奈前犁平這些村莊，他可以放手去做。

然而，這並未成功嚇阻以色列人，他們仍然持續在西奈建造更多屯墾區，單是一九七八年，就有一百五十到兩百個新家庭搬進日益擴增的亞米特鎮，這不僅激怒了沙達特，也激怒了華府。二月十日，國務卿賽勒斯・萬斯（Cyrus Vance）強烈抨擊，在佔領地建立猶太屯墾區違反了國際法。比金政府則回應，以色列的屯墾政策是「合乎國際法，且一直都是合法、正統且必要的」；以色列要美國「重新考慮一下自己的立場」。[23]

三月二十一到二十二日，卡特總統與比金在華盛頓召開一連串會議時，卡特總統大發雷霆，劍

拔弩張。他告訴總理：「我對於未來的前景非常失望，我必須向國會報告……我要告訴他們……你不願意停止擴張或建造新的屯墾區，你不願意放棄西奈的屯墾區……」[24]

在大衛營畫下終點

一年前在耶路撒冷，沙達特滿懷希望地打開和平之路，及至一九七八年夏天時，不意外地都銷磨殆盡了。沙達特總統仍然為吃了比金的閉門羹而感到被冒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在七月二十三日，沙達特請求總理，透過象徵性地撤出一部分西奈土地，為和平的進程做出一些微小的善舉，卻慘遭拒絕。比金回覆：「甚至連沙漠的一粒沙都別想，沒有人可以不勞而獲。」[25]在這樣的情況下，卡特總統決定孤注一擲。

八月三日，他寄出一封手寫的機密信件給沙達特總統，其中說道，和平進程的「遲滯不前」令他心灰意冷，並說道：「我希望可以親自與您和比金總理見面，愈快愈好……在大衛營（位於美國馬里蘭州，總統的休憩處）……我希望我們三個人和我們的最高顧問，可以在相對幽僻的地方一起商討。」[26]他寫了一封相似的信函給比金。卡特的策略風險極高，因為現在的問題非常棘手。一方面，沙達特堅持要以色列結束對全部西奈地區的佔領，並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然而這涉及非常敏感的議題，像是耶路撒冷的未來，且巴勒斯坦人要求有權返回前巴勒斯坦；另一方面，比金卻想在以埃和平的條件上盡可能地砍價。風險在於，如此高層的高峰會一旦破局，解決問題的希望就會完全

破滅。

沙達特和比金難以回絕此邀約，因此兩人在其協商代表的隨行下，於一九七八年九月五日抵達大衛營。當天沒有舉行任何實質的談話，但即使與兩位領導人僅是短暫的前置會晤，卡特仍發覺沙達特非常溫暖熱忱且開明，相反地，比金卻數十年如一日地僵硬嚴肅——沒有任何想像力，腦中盤旋的都是各種技術細節，而且往往無濟於事。[27]

隔天卡特總統湊合沙達特和比金進行了面對面的會談，沒有任何助手在旁參與；這是非常強硬且不討喜的一次交鋒。[28]沙達特拿出事先準備的埃及和談講稿，宣讀了其中的一部分：以色列必須從西奈撤離，包括西奈的機場、從一九六七年起以國在此地建造的猶太屯墾區，以及阿拉伯屬東耶路撒冷（沙達特應該知道，這就好似公牛前的一面紅旗，對於絕大多數的以色列群眾來說，是無法接受的）。沙達特繼續宣讀，以色列還應允許巴勒斯坦民族自決（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on）（這是另一件當時以色列人視之為洪水猛獸的事，公認是以色列國家安全的直接威脅），同意給予巴勒斯坦難民回到以色列的權利（當時乃至如今，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不會同意此事，左翼右翼皆然），以及完整賠償以國掠奪毀損佔領地自然資源所造成的損失（例如，開採西奈的石油）。沙達特也堅持在以埃簽訂西奈相關協議**之前**，必須先簽署巴勒斯坦相關協議，將巴勒斯坦納入討論，「人們才不會說我背叛了他們。」[29]比金後來說，在聽沙達特宣讀「*tzetalé*」（意第緒語，意為一張紙，在此比金用此字以表諷刺）時，他需要「很強的自制力，才沒有當場大發雷霆」。[30]

在後續的會議中，比金逐段回應並駁斥了沙達特的宣言。他無法接受沙達特關於巴勒斯坦人的方案，因為這會促使巴勒斯坦國家的成立，而這是比金所反對的。他也不會疏散在西奈的猶太屯墾者，因為「〔以色列〕對於屯墾區有著國族意識……我們不會同意拆除屯墾區」。沙達特憤而插話：「我不懂你要你的屯墾區留在我的土地幹什麼。」[31]比金也勃然大怒，他說沙達特要求以色列賠償，這是「擄了戰勝國一巴掌，命令它給予戰敗者和平」。沙達特誤以為比金說的戰敗國是埃及，於是反唇相稽：「一個戰敗國？我們曾經是，但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戰爭中埃及成功橫渡蘇伊士運河〕後，我們已不再是戰敗國了。」[32]他補充道：「比金總理，〔以色列的〕安全，可以。土地——不行！」卡特總統後來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我以為沙達特會暴跳如雷。」[33]

與總理一起來到大衛營的以國國防部長埃澤爾．魏茨曼，後來總結比金和沙達特齟齬不和的癥結點：

> 只要稍稍觀察這兩個人，就會發現他們在態度上有著天淵之別。他們都渴望和平。但是沙達特想要用狂風暴雨的方式解決，透過他到訪耶路撒冷來推動，進而達成他的最終目標；比金則喜歡一寸一寸地匍匐前進。他將這個和平之夢建立在詳細如粉末的細節、法律詞句和國際法引言之上。[34]

在這次會議後，卡特總統做出的結論是：這兩人在直接接觸時無法有建設性的互動。從那次之後，

卡特總統便將比金和沙達特分開——在這次高峰會兩人不再有機會面對面，卡特將責任攬在自己身上，決定扮演中介者的角色，替一方向另一方傳達提案。

高峰會的第五天，因為進展牛步，卡特總統交出了一份十七頁的美國草稿，發表其和平原則。首先他（美國人向來如此）先給以色列人過目，並且與比金討論，而比金則沉重且嚴肅地說「無法接受」卡特的提案。沙達特堅持「以戰爭取得領土的不可承認性」，在卡特的文件中也可以發現相似字句，但比金尤其反對它在文件中出現。正如前文所提，若以色列接受這個說法，可能為它自己帶來更多壓力，迫使它放棄其他一九六七年所獲取的土地。雖然卡特在他的草稿中也試圖在巴勒斯坦方面有所作為，以免中東世界抨擊沙達特背棄同胞，比金仍然拒絕所有超過巴勒斯坦人自治這個底線的提案，這與他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在華府的表現別無二致。當比金繼續堅持以色列要保有對巴勒斯坦的所有控制權、否決權和特權時，萬念俱灰的卡特勃然大怒：「你根本就是想把西岸併吞進以色列！」[35]因以色列想要繼續擁有西奈的猶太屯墾區，此事也一樣在持續地耗損挫折著大衛營中眾人的努力：九月十五日星期五，以色列外交部長摩西．達揚清楚地向沙達特說，以色列沒有一點要解散西奈屯墾區的意思，懊喪的沙達特說道：「是、是，我很清楚，摩西。你想要我的土地……但是我不同意……」[36]

會議第十天，毫無斬獲的卡特面見了兩位領導者。因為理解到比金不可能接受和約出現「以戰爭取得領土的不可承認性」這種用詞，卡特懇切地請求沙達特放棄使用這種詞彙，同意用「所有人

都可以接受的」聯合國第二四二號決議取而代之；此決議呼籲以色列撤離它自一九六七年就佔領的土地，並且確實提到了「以戰爭取得領土的不可承認性」，以色列早在一九七〇年就正式接受這個決議。沙達特和比金都同意了；比金後來解釋道，因為這用詞只出現在第二四二號決議的前言，並非協議的操作層面。

同樣的，卡特認為沙達特不可能同意讓猶太屯墾區繼續留在他的土地上，或者讓以色列控制西奈的任何軍事設施，例如機場。為此卡特與比金激烈地論戰了四個半小時，卡特要求以色列放棄所有西奈屯墾區，尤其現在沙達特已經同意不在接下來的和約上使用「以戰爭獲取土地的不可承認性」這種用詞。卡特警告比金，若大衛營的和談失敗，很可能導致美國和以色列的關係破裂，他的施壓終於達到效果；雖然卡特的國防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回憶道：「在漫長且熾烈的爭論中，比金大叫著『底線』、『過分的要求』、『政治自戕』，但是最後這位總理終於同意讓以色列國會（Knesset）決定猶太屯墾區的命運。」[37] 將決策權交給國會，可以讓比金免於做出最不受歡迎、卻最合他意的決定。他推測：在野的勞工黨總是反對建立屯墾區，他們必然會支持移除西奈屯墾區，而比金所屬的黨團則大部分會支持他。卡特要求比金用手寫下這個承諾，於是比金交給他一封信說道：

> 回去之後，我會將這個動議呈交以色列國會，以決定如下問題：如果在這次以埃和平協商中，所有議題都達到了共識，「你願意支持以色列屯墾者從西奈遷出……或你支持讓上述屯墾者留在這些區域。」總統先生，在這件事情上表決可以完全不受慣常政黨議會原則的約束……[38]

由於卡特承諾美國會出資為其建立替代機場，比金也同意放棄以色列在西奈所建的機場。

現在，大衛營只剩下最後一項棘手問題——這在往後的協商中會繼續反覆出現——耶路撒冷的命運。沙達特仍然堅持要把任何以埃的和平納入更大的交易中，然而比金卻偏好直接、小規模的以埃雙向條約。如今問題的焦點轉移到耶路撒冷的爭議之上。雖然以色列希望整個城市（猶屬西耶路撒冷，和他們一九六七年非法兼併的阿拉伯屬東耶路撒冷）都可以繼續由以方單獨統治，但埃及人卻堅持要求，以國將阿拉伯屬東耶路撒冷歸還給阿拉伯人。不過因為他們無法得到共識，卡特總統尋求外交辭令，使雙方在為耶路撒冷權力歸屬問題上唇槍舌劍，以便在大衛營達成協議。最後，他們決定不在這次達成結論：沙達特和比金寫信給卡特總統，說明他們對耶路撒冷的立場，而總統收藏之以供未來談話使用，並作為後續協商的輔助信。於是信件被送出，雖然雙方都沒有太多讓步：比金強調耶路撒冷「不可分割」且是「以色列的首都」，而沙達特則重申阿拉伯屬東耶路撒冷是西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它必須被歸還給「阿拉伯主權國家」（Arab sovereignty）。這只是用來掩蓋此事無法達成協議的一片脆弱的無花果樹葉而已；但是它達成了目的：九月十七日星期天，在世界各地的電視攝影機前，沙達特和比金在白宮簽下了《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s）。

《大衛營協定》並非定案，它僅提供引導未來協商的框架與原則，以期透過這些對話，在一個

特定的截止日（deadline）前，達成永久的以埃和平協議。這份未來的和約將終結西奈的佔領，且後來如同它所希望的（在這份協定刪去的「附加原則」基礎上），結束以色列對於其他區域的佔領，並且在以色列、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和整個阿拉伯世界締結和平協議。

這個協定也建立了未來五年轉變期間，西岸和加薩走廊的協商原則。這個轉換期，如同協定上所明言，會從巴勒斯坦人的「自治」選舉開始，同時以色列的軍政府會「撤離」。然後，「盡快在轉變期開始的三年內」啟動以色列、埃及、約旦和佔領地上巴勒斯坦人（巴解組織除外）間的協商，「以決定西岸和加薩走廊的最後歸屬……」。

雖然根據《大衛營協定》，這些協商的目標都是導向「完全的巴勒斯坦自治」而非巴勒斯坦國家，但可預期關於最終狀態的討論，會指向羽翼豐厚成熟的巴勒斯坦國家。以色列的亞爾．希斯費爾德（Yair Hirschfeld）教授觀察到：

> 只要仔細閱讀《大衛營協定》，就會發現所有雙方同意的部分，按邏輯必然導向兩個國家的模式。一個由西岸和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民所適切選出的巴勒斯坦地方自治政權，必定不會盡力爭取巴勒斯坦獨立國家，這個假設是很荒唐的。[39]

比金身為巴勒斯坦自治計畫的首腦，似乎的確認知到，《大衛營協定》所牽扯出的後續協商可能促成的並非巴勒斯坦自治，而是巴勒斯坦國家的形成——而這正是他所極力反對的。事實上，他不只一次於公開場合中承認，任何巴勒斯坦地方分權或巴勒斯坦自治，都無可避免地將導致國家狀態（statehood），因為「這是事物必然的邏輯……」。[40]前述提及，他同意為了巴勒斯坦自治進行協商，但他清楚這很可能會導致巴勒斯坦國家的建立，因此他將之視為一個戰術；他知道沙達特總統必須要給巴勒斯坦問題一個交代，否則將被譴責拋棄巴勒斯坦同胞。雖然比金願意提供沙達特他所需要的掩護，但他幾乎完全沒有意願涉入這約定好的、給予巴勒斯坦完全自治權的討論。事實上，如同我們後來會看到的，一旦比金確信以色列與埃及的和平已經穩如泰山，他便轉而撤銷自治的想法，並阻斷所有試圖達成這個目標的協商。

與此同時，巴勒斯坦佔領地上反對《大衛營協定》的聲浪正在醞釀著。支持巴解組織的運動者，尤其是許多市鎮的首長，例如拉馬拉的卡里姆．哈拉夫（Karim Khalaf）、納布盧斯的巴山．沙卡、圖勒卡爾姆的希勒米．哈努（Hilmi Hanoun），他們都於一九七六年的市政選舉中被選出，他們組織領導集會和示威遊行以反對這個協定。他們之所以不滿，是因為他們認為巴解組織是正統領導者，但在這次協商中它卻無法參與，且認為這個自治提案隱含著陰謀，是他們巴勒斯坦獨立夢想的贗品。巴勒斯坦人普遍感覺遭到背叛。納賽爾．拉哈姆（Nasser Laham）是一位來自伯利恆附近的戴舍（Dheishe）難民營的巴勒斯坦運動家，參與了這次西岸的反《大衛營協定》遊行，他解釋道：「許多巴勒斯坦人在這次的以埃和平協議中，都感覺到被欺騙和背叛。他們覺得被遺棄和遺忘了……我們感覺到失落……」[41]反對協定的不僅限於佔領地；九月二十三日在紐約市，如同世界的

其他地方，上百位巴勒斯坦人和他們的支持者走上街頭，帶著巴勒斯坦國旗和色彩繽紛的旗幟，上面寫著標語如：「對《大衛營協定》說No，對巴勒斯坦國權說Yes」和「卡特、卡特，我們不是笨蛋：沙達特和比金都是你的棋子。」[42]

在當地和國際的關切及反對聲浪下，巴解組織趁勢暗中破壞《大衛營協定》，而以色列人則試圖弱化親巴解組織的面向；他們構想出一個聰明的計策，即成立支持協定的巴勒斯坦替代領導層。這個新構想主要利用巴勒斯坦社會不同群體間既存的緊張關係，透過給予保守鄉下農人（占了人口總數約百分之七十）發聲的機會，培養他們對執掌西岸政治的城市人（占百分之三十人口，也是較為極端的巴解組織支持者）的憤恨。

為此目的，軍隊建立了「村莊聯盟」（Village League），從西岸南部的希伯崙地區開始，他們指派了馬斯塔法・杜丁（Mustafa Dudin）作為該地的領導人，統領這七十四個村莊構成的聯盟。杜丁是西岸南部土生土長的巴勒斯坦人，他在約旦河東岸待過許多年，在該處與約旦政府交遊甚密，甚至擔任過約旦內閣的政府首長。一九七五年回到西岸後，他成為一位強力反對巴解組織的當地領導者，他希望巴勒斯坦問題在以約之間解決，將巴解組織架空。現在，軍隊試圖強化杜丁在農村地區的地位，將他變成證照和許可證的發放者——這對巴勒斯坦人非常重要，因為如前所述，幾乎所有他們想要進行的活動都需要得到書面許可證。軍隊也授權杜丁，讓他得以指派村長（*mukhtar*）和公務員、縮短受刑人刑期，以及向村民以折扣價販售如肥料等必需品。對於支持巴解組織的巴勒斯坦人而言，杜丁是一個內奸、一個佔領政權的通敵者，但是因為軍隊給予他如此大的權力，以至於巴勒斯坦的百姓，若希望得到他所分發、他們急切需要的物品，就得被迫和巴解組織保持距離而與他合作。稍後，以色列人進一步複製希伯崙村莊聯盟的模式到西岸其他地方，例如他們在伯利恆指派了畢沙拉・昆西亞（Bishara Qumsiya）作為組織領導者，在拉馬拉則是尤瑟夫・哈提卜（Yusuf al-Khatib）；後者後來被巴解組織活動者暗殺。

《大衛營協定》的定案和施行

欲將在大衛營所商討出的大綱和原則，變成詳細的和平條規並非易事，因為它必須描述新的以埃關係，而對西岸與加薩走廊新安排的確切意涵，都需要精確的語言。但由於卡特總統的個人干預（他必須往來耶路撒冷和開羅以終結議案），最後終於成功。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白宮的一個慶典上，沙達特和比金於和平議案上簽名，結束了三十年來的以埃戰爭。

雙方簽訂的協議規定，以色列須結束對西奈的佔領，於三年內撤除所有的屯墾區和設備，讓埃及能夠在半島上行使完全的統治權，其主權範圍直至國際承認的以埃邊界，並且得以在西奈，主要是靠近蘇伊士運河的地方，部署有限的軍力。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以軍一從西奈的阿里什撤離，埃及人立即撕毀或重新粉刷抹除所有留下的希伯來文標示。以軍離開後不久，沙達特便抵達此地，當他從當地的清真寺出現時，三隻被捆綁的水牛被宰殺，許多年輕人以手沾染牛隻的血，舞動雙手，叫喊道：「沙達特，沙達特。」[43]一

九七九年七到九月之間，在雙方執行協定的其他部分前，西奈的油田移交到埃及手中。

事實上，比金積極執行以埃關於西奈的協定；但他卻不願處理協定中關於巴勒斯坦的部分，因此他對巴勒斯坦自治提案採取了極簡主義的觀點，在華府與沙達特簽下協定後，他幾乎立刻開始重新詮釋協定中關於巴勒斯坦的部分，且他詮釋的角度極為狹隘，以至於議案完全失去了意義。他之所以能夠這麼做，是因為沙達特雖然盡了全力，最終仍未能成功地在這個協定中將兩方——巴勒斯坦和埃及——緊密連結在一起；在協議文字中，與埃及的和平並沒有緊緊維繫在巴勒斯坦事件的進展上。而如今，與埃及的協定已經簽署並定案，如巴勒斯坦人所認為的，比金也就更沒有堅守承諾的誘因，他賭定這不會損及以埃間的和平。比金指派狡猾老練的民族宗教黨（National Religious Party）黨魁尤瑟夫．伯格（Yosef Burg）擔任內政部長，代表他領導行政小組到開羅進行巴勒斯坦自治會談，其作風更為明顯。他也召集了一個接一個的委員會，其中包括對於在開羅的任何提議採取強硬路線的人，而這官僚體制使自治會談所有可能的進展備受阻撓。

話雖如此，以色列仍持續撤離西奈，這在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達到高峰，在國防部長艾里爾．夏隆的監督下，軍隊到此疏散亞米特鎮死守在其居所的屯墾者。在亞米特完全清空後，夏隆引入重型機具，將這個鎮上的建築夷為平地，其他西奈屯墾區亦同。夏隆和總理都反對財政部長所提議的，以七千萬到八千萬美元的價格將屯墾區賣給埃及，因為他們不願將如此接近以色列本土的、建設完好的屯墾區交給埃及接管；不過在西奈南部的歐菲拉鎮和西奈的機場都原封不動地交接給了埃及。在埃拉特以南約十公里處群敵環伺的塔巴（Taba）也被歸還給埃及，雖然這是在國際仲裁會

議中使用了舊地圖丈量後，才顛覆以色列觀點，判定歸屬於埃及。

在上述情況下，結束了西奈的佔領。

春季暴動

在佔領地上、尤其是西岸，巴勒斯坦變得愈來愈人心惶惶。許多人感到沮喪，因為根據自治提案，巴勒斯坦人可以自理他們的日常生活，掌理健康和教育等面向，但卻不被允許擁有他們自己的國家，他們感覺到《大衛營協定》的目的在杯葛巴解組織，因巴解組織並未參與這次的協商。另一個不滿的來由，是一九八一年秋天夏隆所引進的新政體，稱為「民政管理」（Civil Administration）。

為了掌控一切，以國將與國安相關的事物嚴加區隔（使軍政府得以一覽無遺），其中包括執掌健康、教育和福利，以及幫助推廣《大衛營協定》中以色列所詮釋的巴勒斯坦自治，將開羅會議視為無物。以色列試圖將民政管理打造為軍政府的撤除，宛如它象徵著佔領的終結與巴勒斯坦佔領地的回歸正軌。

當然事實並非如此；反之，它僅僅企圖提供佔領的民政表象，而這事實卻逃不過巴勒斯坦人的法眼。事實上，進一步檢視這個新民政管理組織可清楚看見，該新政體在所有實際事務層面都附屬於軍隊，且其管理階層幾乎全數由以色列人組成。同樣滲透這個新政體極深的是以色列情報局沙巴克，它在幕後日復一日地為巴勒斯坦生活垂簾聽政。巴勒斯坦人對於這個新民政管理組織的猜忌極

強，以至於引進之初便導致佔領地鋪天蓋地的反對聲浪，此反對聲浪從一九八一年冬天持續到一九八二年。為此，夏隆指示軍隊對這些暴動者痛下毒手；接著，軍隊關閉了西岸的報社，關閉巴勒斯坦反抗民政管理的大本營比爾載特大學（Birzeit University），並且炸毀被視為武裝分子親屬的住處。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二日，西岸比雷赫（el-Bireh）鎮的鎮長易卜拉因・泰維勒（Ibrahim Tawil）被解職，而他的議會也因為拒絕與民政管理領導者見面而被解散，一位以色列軍事官員被任命為市政首長。西岸其他小鎮和城市層出不窮地抗議，一週後，納布盧斯市長巴山・沙卡被解職，且遭到逮捕，還被軍事法庭下令驅逐出境。他在監獄中絕食抗議，說道：「以色列沒有合法權利〔驅逐我〕……納布盧斯是我的土地。我應該留下來。以色列佔領者才是該走的人。」[44]

儘管以軍對巴勒斯坦人施壓，他們仍不願放棄：五月一日，二十五位西岸市長提交了一份連署聲明，威脅若不廢除民政管理，他們會關閉所有市政服務，並且八天後便著手實行。到了一九八二年中，幾乎所有佔領地的主要城鎮都是以色列軍官所統治，軍隊統治變得更加嚴峻。同樣地，在加薩走廊，軍隊鎮壓暴亂，將組織暴動者關進監牢。

這些衝突以及軍隊的強硬手段，釀成了後來的「春季暴動」（The Spring Uprising）。這次的死傷人數比過去十五年來以色列佔領時期要來得多；單就一九八二年一年來說，軍隊殺死三十一位巴勒斯坦人，傷及三百六十五人。夏隆的指揮殘酷暴虐，使軍隊士兵也開始反彈，負責執行夏隆政策的年長後備軍官，站出來說他們正走向「殘暴……和無差別的集體懲戒」。[45]

戈蘭的問題

問題也出現在平靜的戈蘭高地上。我們應該記得一九六七年戰爭後，軍隊曾經分發身分證給戈蘭的敘利亞人民，但這並非以色列公民身分。現在，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以色列國會修改了國籍法規，使戈蘭人可以得到以色列公民身分。這麼做是因為戈蘭的人口實在太少，戈蘭人民成為以色列公民，並不會對以色列的猶太人口有負面影響，反而藉由讓這塊土地上大部分的居民變成「以色列人」，使以色列更容易兼併戈蘭，並且駁斥戈蘭被佔領之說。

但是戈蘭人反對這個新的以色列政策，因為他們當中許多人仍認為自己是敘利亞人，而且接受以色列公民身分還會被其敘利亞親戚奚落；根據敘利亞的法律，一旦有了外國的公民身分，會導致敘利亞公民身分和其在敘利亞的家產自動失效。

為了使戈蘭人張開雙手擁抱以色列國籍，以色列提供了特權，像是低稅率、更高的配給水量和加速建地許可證的發放；但絕大部分的人仍然拒絕這樣的待遇。事實上，將戈蘭人變成以色列人的作法，反而助長戈蘭的敘利亞國族主義的壯大。一九八一年三月上旬，占戈蘭人口絕大多數的德魯茲社群，其領導者在卡魯維（*khalwat*），也就是德魯茲在馬賈德爾沙姆的祈禱中心，召開了一場會議，大約有六千人參加，占了當時戈蘭人口的一半以上。在那裡，他們起草了其「國家文件」，宣布被佔領的戈蘭是「阿拉伯屬敘利亞國土的一部分」，且「敘利亞阿拉伯國籍是世襲且無法分割的身分，它將從父親傳給兒子」。[46]以色列人企圖「將我們混進以色列中」，以「剝奪我們的敘利亞阿

拉伯身分」，這種計謀使眾人譁然。這份宣言說道，任何想要換成以色列國籍的戈蘭人，「使我們的尊嚴受到羞辱，傷害了我們的國族榮耀，變更了我們的宗教，違背了我們的傳統，且被視為我們國家的叛徒。」並且還有懲處：任何擁抱以色列國籍的人，「都是我們宗教和社會誠信的背教者和變節者，禁止和他們的所有交易、參與其婚喪喜慶以及與之婚嫁，直到他認罪懺悔、請求社會饒恕，且回復其真正國籍，才得以再重新回到我們之間。」這份宣言隨之而來的是一場暴力運動，用以對付那些少數申請以色列公民身分的戈蘭人，同時軍隊也以懲處手段報復德魯茲社群，其中包括飛漲的稅收、旅行移動限制和販賣農產品到以色列；這場抗議以色列公民身分運動的發起人和領導者被軟禁了起來。[47]

一九八一年夏天，危機在某種層次上緩釋了，但是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又再度竄升。政府通過了另一條法律——戈蘭法，根據此法，以色列的國家法規、管轄權和行政權都應該適用於戈蘭高地。這實質上意味著徹底地兼併了他們，軍隊統治也宣告結束，因為戈蘭現在已經變成了以色列本土的一部分。

以色列某些大眾群體因西奈歸還埃及而憂慮日益攀升，擔心政府很快也會將戈蘭歸還敘利亞，因此政府採取了這種極端手段，公然違反國際法。而催化大眾憂慮、使政府壓力益加沉重的關鍵之一，便是摩西．達揚的言論。在他仍是外交部長時，與埃及簽訂和平協定的三個星期後，他說出戈蘭也會被歸還給敘利亞：「我們必須清楚辨別戈蘭高地與朱迪雅—撒馬利亞的差異，戈蘭一直都是敘

利亞的領土，時機成熟時必將被歸還。」而達揚卻始終希望將朱迪雅—撒馬利亞抓在以色列手中。[48]

非猶太裔戈蘭居民對於以色列兼併的反應是抗拒的，他們譴責以色列擴張主義政策，老師和學生罷課，甚至還有攻擊軍隊車輛的事件發生。可理解地，敘利亞因以色列的決策而害怕高地將被兼併，在其驅策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採行了第四九七號決議，其中言明以色列的決策是「無效的」，並在國際層面沒有任何合法效力。它呼籲以色列「立刻廢除其決策，刻不容緩」。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四日，戈蘭人清楚理解到以色列不願撤銷其兼併後，上千名戈蘭人聚集在馬賈德爾沙姆，宣告發動無限期罷工以示抗議。如同當時一位德魯茲居民所說的：「我們是敘利亞人，我們想要回到我們自己的國家……我是敘利亞人……我不是以色列人……」[49]以色列的回應是嚴酷無情的，國防部長夏隆派遣上百位軍人完全封鎖戈蘭，切斷進出此地的交通，禁止食物輸入，切斷水電供給。這些手段對戈蘭和其非猶太裔人民的影響是極具破壞性的，一位來自馬賈德爾沙姆的德魯茲人米德哈特．沙利．沙利回憶道：「瘟疫蔓延，孩子們餓著肚子，家家戶戶都欠缺牛奶……」

新的殘酷事件也有其正面效應，因為它激發了戈蘭人自力更生、同舟共濟的嶄新集體精神。根據米德哈特．沙利．沙利所說：「那些擁有山羊和母牛的人開始分送牛奶給有嬰孩的人……人們用他們所有的時間來抗爭。他們辭掉了工作，現在唯一的重心，就是要表達他們的憤怒和反抗以色列的作為。」[50]而一位來自馬賈德爾沙姆的農人納茲．卡提爾（Nazi Khattir）回憶道，在軍事手段烽

煙遍地時，戈蘭人開始「組織起來……每個人都被指派一項任務……每一個村莊就是一個單位，雖然分散各地，但是心卻凝聚在一起」。[51]這個對抗以色列的自立自強和反抗精神，在來自馬賈德爾沙姆的賈米爾・阿瓦德（Jameel Awad）的見證中也同樣鮮明，他回憶道：

> 冬天的時候，缺乏污水排水系統〔因為以色列切斷了戈蘭的公共服務〕使村子異常骯髒。我們設立了一個委員會來討論這件事，我們決定要在村子裡建立一個污水系統……每一戶要負擔兩百美元，並且為此計畫工作四天……在罷工結束前，這個計畫便已完成。[52]

軍隊繼續就其兼併政策對戈蘭人施壓，堅持要他們接受以色列身分證。為此，許多戈蘭人再次聚集於馬賈德爾沙姆，在那裡決定拒絕以色列身分證，將接受了以國身分證的戈蘭人「開除」，斷絕與他們的所有關係，甚至婚禮和喪禮——這在狹小而擁擠的德魯茲社群中是嚴酷的懲罰。國防部長一如往常地固執，派遣軍隊到馬賈德爾沙姆去分發身分證給戈蘭人。透過執行宵禁，軍隊挨家挨戶去分發身分證，但這並非易事。戈蘭人米德哈特・沙利・沙利回憶道：

> 當以色列人來到我們家遞送公民身分，並且從我父親、母親、兄弟那裡撤銷舊的軍事身分證時，我的父親將身分證丟還他們，他們丟了回來，我的父親又將身分證丟到屋外，並且關上門。他們撿起了身分證，放回我們的門檻處……[53]

六天後，軍隊撤退了，米德哈特・沙利・沙利憶及：「人們從家裡出來蒐集身分證，然後將其中一些燒了。他們將剩餘的放在一個袋子中，將它們寄到以色列郵政總局，說：『這些是你們的國民身分證，我們要還給你們。』」[54]

雖然以色列人不願意撤銷兼併，但是他們的確在國籍議題上妥協了，最後終於同意讓戈蘭人繼續保有他們的敘利亞公民身分。現在他們所攜帶的以色列身分證明中的國籍一欄是空白的；出生地則明確載為戈蘭高地，而非以色列或敘利亞，至於旅行文件上的國籍欄則是「未定」。

這場持續五個月以上的罷工，變成戈蘭佔領史上一個重要事件，因為它導致極大的社會變遷：戈蘭女人的地位提升了，因為她們在跟軍隊與警察衝突時，在前線十分活躍，以致一九八二年後，戈蘭女孩完成初中學業的人數大為增加；罷工事件前只有一個女人上大學，但是後續幾年就有數十個女人到以色列和國外就讀大學。這場罷工事件，也使抗議期間立場堅定的傳統宗教領袖的地位和影響一度攀升；只不過他們後來遭到積極的世俗領袖的挑戰。

以色列之所以鬆手放棄國籍議題，一方面雖是因為戈蘭人的倔強，另一方面也由於以色列的注意力必須極為戲劇性地轉移到黎巴嫩邊境上。

黎巴嫩與村莊聯盟

一九八二年六月，國防部長派遣他的軍隊至黎巴嫩境內向巴解組織開戰。夏隆相信，如果以色

列可以擊敗阿拉法特駐在黎巴嫩的游擊軍，並摧毀巴解組織在那裡的基地設備，便能逼迫西岸和加薩的巴勒斯坦人接受長久的壓制，放棄他們的獨立抗爭。在一場短暫而血腥的戰役後，以軍戰勝了，但是無法將巴解組織的領導層完全殲滅；阿拉法特和其他巴解組織的領導者，逃亡到突尼西亞和其他地方了。

身為這場戰爭的軍師，夏隆也希望透過擊潰黎巴嫩的巴解組織，提振村落聯盟的士氣；我們應該記得，這是一個當地的議會體制，由以色列點名派任的巴勒斯坦人所主導，管理當地的城市與村落，用以與巴勒斯坦佔領區中親巴解組織的領導者相抗衡——事實上，也就是以國的替身。一九八二年，聯盟被擴充到六個轄區，有他們自己的預算經費、武備軍隊、制服和一份雙週報《鏡報》（*al-Mira*）。如今阿拉法特被擊潰，並負傷逃亡到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Tunis），夏隆召集了村莊聯盟的領導者，告知他們「要準備好迎接新誕生的自治政權」，以色列將配合執行《大衛營協定》，向巴勒斯坦自治邁進。[55]不過，雖然這七個村莊聯盟分部的確在反巴解組織一事上，表現得甚為團結，但是他們仍舊無法有效取代巴解組織，巴勒斯坦社會中，許多人將他們視為賣國賊，也是不可小覷的因素。因此，他們終究無法成為以色列的替代合作夥伴，在佔領地上執行有限度的巴勒斯坦自治。一九八三年，因貝魯特的撒巴拉（Sabra）和沙提拉（Shatilla）難民營中無辜的巴勒斯坦人遭到屠殺，夏隆遭受審查，究其罪責，繼而辭去國防部長一職。新的國防部長摩西．阿倫斯（Moshe Arens）完全放棄將村莊聯盟視為可信賴的巴解組織的替代品與未來自治政體的核心，因此以色列離間和統治佔領地巴勒斯坦人的徒勞嘗試告終。

在以色列一九八四年的選舉中，不論是右派利庫德集團或是勞工黨，都沒有得到組織政府的足夠席次，且雙方都不願嘗試亡羊補牢，與多數國會成員結盟，因此他們組成了一個國家聯合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ment）。聯合協定主張勞工黨的希蒙．佩雷斯與利庫德的伊札克．沙米爾（Yitzhak Shamir）輪流執政，兩人輪流擔任總理和外交部長，一輪兩年。佩雷斯將先擔任總理，而勞工黨的伊札克．拉賓則擔任四年的國防部長。

這個政治布局開啟了一段相對平靜的佔領時期，尤其是頭兩年的輪替，與夏隆指揮時期相比，軍隊政策寬大仁慈許多。這兩年巴勒斯坦佔領地的工業設備發展迅速，當地銀行（自從一九六七年便關閉）再度開張；新的醫院建設完工，既有的健康診所被刷新且現代化；電話線也被安裝好，得以直接撥號聯絡。

然而，數起佔領地軍隊與抗議群眾的衝突顯示，這一切只不過是平靜的假象。這些衝突發生在一九八六年三月，土地節第十週年，巴勒斯坦人為紀念一九七六年六位阿拉伯人之死，而與以色列發生嚴重的大規模衝突；而後九月，黎巴嫩的撒巴拉和沙提拉屠殺事件滿四週年，又發生了衝突；同年十二月上旬，在聯合國常會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原劃分計畫的週年紀念日，再次爆發衝突。然而這些衝突只不過是接下來事件的平淡前奏而已，接下來這一年，變成了佔領歷史上最重要、也最陰雨霏霏的一段時期，加薩走廊和西岸都爆發了全面的巴勒斯坦暴動。

6 黑色十二月（一九八七）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八日，在以色列工作了一整天的巴勒斯坦人搭乘一輛車子，在回程的途中與以色列坦克裝載車擦撞；四名巴勒斯坦人當場死亡，其他七名受傷。傷亡人數是由位於加薩市北邊、接近賈巴雅村的賈巴雅（Jabalya）難民營傳出。這個難民營占地一點四平方公里，是一九四八年戰爭後，為收容自巴勒斯坦南部逃往加薩走廊的三萬五千名難民而建立的。三十九年後，賈巴雅的人口已經高達六萬，躋身加薩最大也最貧困的八大難民營之列，是民怒的匯聚之所，在這次不幸的車禍事件後，也成為全面反抗佔領的樞紐。

賈巴雅為車禍罹難者所舉辦的喪禮隊伍浩大，上千名弔唁者前來送亡者最後一程。對他們而言，這不是普通的喪禮。在加薩人之間謠傳，以色列卡車的駕駛是蓄意撞擊巴勒斯坦的車，目的是為了報復，因為兩天前在加薩市集中，他的親戚被持刀砍殺身亡。車禍倖存者的敘述，使這些謠言甚囂塵上；其中一位描述以色列駕駛「駕著他的卡車朝我們的車開來，看得出他是蓄意這麼做的」。[1]另一位倖存者卡瑪勒．卡杜拉．哈姆德赫（Kamal Qadoura Hamoudeh）在加薩醫院病床上說，車禍發生當下他正在睡覺，但他仍相信卡車是故意輾過他們的車子。

這些說法始終未被證實，但這些謠言使賈巴雅的氛圍極差，而激化暴亂的，除了舉目可見在附近出沒的以色列軍隊外，清真寺尖塔亦對暴動者呼籲：「噢，你們年輕人，走向他們，不要退縮」。暴亂徹夜發生，其中包括與以色列軍隊的直接衝突。[2]

暴亂和衝突持續發生著，哈坦．阿布．西西（Hatem Abu Sisi）當時十七歲，他在隔天早上離家上學途中，急切地加入他的朋友，朝軍隊投擲石頭。軍隊為此開火，哈坦胸中兩槍。他的朋友將他帶到醫院，他的哥哥加茲（Gazi）被叫來。加茲在事件發生後五年回憶道：「我急速衝到西法醫院（Shifa Hospital），看到他躺在病床上。他的臉被包住，我知道他犧牲了，遇害了。我看著他的臉，然後說『阿拉保佑你』。」[3]哈坦．阿布．西西變成了第一個在戰火中遇害的男孩，他母親在後來的訪問中回憶，在哈坦誕生前不久，她曾揣想過他長大會被以色列軍人殺害，且「死後將幫助解放他的同胞」。[4]事實上，在暴亂中遇難的年輕人被稱為沙希德（*shahid*）——烈士，而哈坦的死亡正為此舒哈達（*shuhada*，*shahid*的複數形式）現象發出先聲。

現在我們知道，在加薩走廊爆發的十二月事件，暗示著巴勒斯坦暴動的濫觴，未來它將被稱為「起義」或「擺脫」（shaking off）。它持續了六年，奪走了上百條人命，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巴勒斯坦人。

從現在往回看，以軍有可能在暴亂尚未延燒前，及早將之捻熄嗎？若軍隊迅速而極致地對暴亂者展現其軍力，對其施以毀滅性且難忘的一擊，令其無法恢復元氣，那麼這是可能的。在此事件中，軍隊最初的回應是遲疑的，因為他們猜想這可能只是另一個在佔領地經常出現的、稍縱即逝的巴勒斯坦暴動，且這些暴動通常很快就後繼無力，而非大規模暴動的開始。事實上，這些衝突看來與過去並無不同，沒有清楚的分野。就像我們讀到的，巴勒斯坦人們從佔領之初便焦躁不安，與軍隊間的衝突時有所聞。

然而，以色列安全局的情報顯然有疏失，因為他們沒有預見後來嚴重的問題，且忽略明顯的局勢變化。事後看來，這樣的改變不但非常明顯，且當時曾被匯報過。例如，一九八七年中期，一位前中情局探員埃米爾・納克雷（Emile Nakhleh）就寫道：「加薩就像是一個壓力鍋，隨時準備爆炸。巴勒斯坦人民一天比一天更加義憤填膺、更具反叛性。為此，軍事佔領變得愈加坐立難安……」[5]

不僅以色列的國安軍隊與現實失之交臂，其政治人物亦是如此，這反映在沙米爾和拉賓對於動亂的處理方式上，總理和國防部長在佔領地開始發生暴亂時，即刻譴責伊朗、敘利亞和巴解組織助長不安。但是事實上，伊朗和敘利亞都未介入，而巴解組織的領導者亞西爾・阿拉法特自一九八二年起就流亡突尼西亞，對此事他與以色列人一樣震驚，同樣地，他僅將之看作是長久以來佔領地生活典型的、醞釀的憤怨於焉爆發的一例而已。事實上，事情的發展與他所預期的完全不同。二十多年來，阿拉法特宣導的是，佔領的終結必將透過（他常講的）「槍管」來解決，並呼籲要武裝戰鬥；他的戰略中並不包含非武裝的大眾反抗。

暴亂者

結果顯示，沒有任何特定的群體或個人謀劃策動這場暴亂；相反地，他們都是普通的加薩百姓，對佔領已經忍無可忍。如同當時一位巴勒斯坦人所言，他們了解到，佔領「永遠就是掠奪、掠奪、掠奪」。[6]的確，在一九八七年，他們的生活水準已比二十年前以色列剛佔領加薩走廊時提升了許多，到以色列工作讓巴勒斯坦人口袋有更多現金可花；但同樣地，在以色列工作使加薩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加薩人，看見他們的生活品質與以色列人的差距。「你用你自己的眼睛就可以看出為什麼我們這麼做，」在起義爆發後不久，一位年輕抗議者解釋道。「你看看我們的房子，我們在這裡的生活。我們無法像人一樣地生活在這裡……這是我們的理由。」[7]

白天到以色列找工作，只會讓巴勒斯坦人更加沮喪。入境以色列是一個屈辱的經驗，也是官僚噩夢。因為在佔領之下，往往需要特別的許可證方能通行，為此他們必須在邊境排隊等候數小時，且經常被以色列衛兵們羞辱。以澤丁・阿布萊什是一位醫生，也是少數被允許在以色列醫院工作的巴勒斯坦人之一，在他的書《我不應恨》中，他描述這個跨越邊境從加薩走廊到以色列的經驗。他寫道：

> 文明人很難相信〔在邊境〕發生了什麼事，屈辱、憤怒、身體的折磨，壓力來自於你知道不需任何原因就可以被扣押、遣返，你會因此而錯過一個重要聚會，使你的家人擔心你可能像其他

> 上千人一樣被逮捕了……過邊境永遠沒辦法變成例行公事，往往毫無規律可言，它不僅嚇人且使人筋疲力盡。[8]

巴勒斯坦勞工禁止留在以色列過夜，因此他們必須每日往返加薩，重複同樣的程序；那些遊走法律邊緣、在當地過夜的人，必須掩掩藏藏，通常過著不人道的生活。以色列資方提供給巴勒斯坦人的往往是不討喜、薪資低廉的工作，這些工作以色列人不想做，且通常無法提供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社會安全需求。

以色列在佔領地的經濟體制和政策——剝削巴勒斯坦勞工、沉重的賦稅和其他手段，無疑是巴勒斯坦群眾走向極端的真正推手，也是起義的重要原因。[9]前加薩市長拉沙德．沙瓦，充分表達了這個情緒，他觀察到加薩人民「有著不公平與被歧視的感覺……他們為〔以色列〕做著像是收垃圾和洗碗盤的工作，感覺就像奴隸……」。[10]事實上不出意料地，每日往返以色列和加薩走廊佔領地的工人，占了暴亂初期示威抗議者的極大多數。

在十二月的暴亂中，學生也是重要的參與者。一九六七年後數年間，佔領地有許多大學落成，但學生畢業後工作機會極少，尤以加薩走廊為甚。許多畢業的年輕人對於佔領地或以色列所提供的工作都資歷過高；而在佔領地外找工作往往不可行，因為一旦離開，他們無法確定能否再回到家鄉。一位名叫尤達特（Judat）、曾在約旦的伊爾比德大學（Irbid University）就讀經濟的二十歲巴勒斯坦人，憶及他必須在以色列從事勞動工作：

> 我在特拉維夫的酒吧中工作了一段時間，我跟那裡的以色列學生說話。他們與我讀的教材完全一樣。後來，我在一間餐廳擔任洗碗工直到我真的忍無可忍——他們給我的薪資是如此微薄，並把我當作奴隸一樣，所以我回到村子裡。你覺得訝異嗎？我們有一位牛津畢業的工程師，他的工作是撿橘子和修理車輛。我們有些清道夫是大學畢業的……一位擁有經濟碩士學位的洗碗工。你可以想像這種人的感受嗎？〔我們〕上了大學，我們有偉大的目標，但我們忘記自己的來處。我們的父母將他們畢生的積蓄花在我們身上，為了負擔學費，他們賣了牲畜；而我們回到村子，卻覺得並非真正屬於這裡，但是沒有任何其他地方會接納我們。我整天坐著看報紙，與我的朋友出去閒晃，然後變老。[11]

無聊、失業、沮喪，但受過教育、且具政治意識，尤達特和其他跟他一樣的人站起來反抗佔領。

此外，還有伊斯蘭主義者。伊斯蘭團體在加薩走廊比西岸更強大，一大原因是加薩人、尤其那些住在稠密擁擠的難民營中的加薩人，他們擁有比西岸巴勒斯坦人更傳統且保守的伊斯蘭背景，他們更容易接納伊斯蘭主義團體的訊息。一九八〇年代，加薩有至少八個伊斯蘭主義的派系，這些派系都分屬於穆斯林同志會（Muslim Brotherhood）。穆斯林同志會是一九二四年在埃及建立的活動，活躍於佔領地，提供健康、教育服務和其他慈善工作。這些群體中勢力最大的是哈瑪斯（Hamas），或稱為伊斯蘭反抗運動（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它是巴勒斯坦伊斯蘭主義者於一九八七年

十二月所創，目標是在現今以色列、西岸和加薩走廊的地方，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

如今在哈瑪斯中最重要的人物，便是坐著輪椅的謝赫・艾哈邁德・亞辛（Sheikh Ahmed Yassin）。一九三六年，他出生於巴勒斯坦南部的一個小村莊，那時這裡還在英國託管之下。一九四八年第一次以阿戰爭中，亞辛家族從巴勒斯坦逃離，在加薩走廊落腳，年輕的艾哈邁德便在此地的阿爾加美爾小學（Al Carmel primary school）受教育，離沙提難民營、他家人生活的地方不遠，十三歲時他開始在餐廳工作以幫忙貼補困難的家計。十六歲那年，亞辛於運動時發生意外，自此便下半身癱瘓，但他透過用木製推車和六個金屬輪子來推動自己，持續每天三公里的路程往返學校。亞辛結束高中課業後，成為一位老師，雖然他從來沒有正式被任命為謝赫（sheikh，阿拉伯語，指部落長老、伊斯蘭教教長或智慧的男子），但許多尊敬他為老師和自學者的人，都稱他作謝赫。後來亞辛到開羅念大學，在那裡加入了同志會。他接納了他們的理念後，開始建立年輕運動者基層組織，這後來成為巴勒斯坦穆斯林同志會的主幹。當埃及政府發現亞辛的基層組織後，便將亞辛和他的一些同夥關進監牢。獲釋後他回到沙提難民營，建立一個伊斯蘭中心，並在那裡教書，直到一九八四年六月他因家中被發現軍火而遭以軍逮捕。亞辛被判處十三年徒刑，但一九八五年五月，因以色列交換人質而被釋放。

哈瑪斯從一開始便加入了這場暴動，十二月十一日於加薩走廊、十四日於西岸發行他的第一份公報，哈瑪斯宣布：「我們堅毅的人民在佔領地所發動的起義是為了反對佔領和壓迫」，同時「我們人民知道正確的道路為何——一條犧牲和殉教的路，並將昭告世界，猶太人正對我們人民犯下納

粹般的罪行，他們的行為與之如出一轍。」[12]哈瑪斯發布了他的官方盟約，其中一項呼籲隔年摧毀以色列。不過早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對其群眾來說，目標就已非常清楚，即反抗佔領和在整個巴勒斯坦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用伊斯蘭教教法「沙里亞」（Islamic Sharia law）來統治。雖然只是穆斯林同志會的一個分支，哈瑪斯在理念上與其母體有一極為不同之處，那就是巴勒斯坦的中心地位。

令人訝異且現在看來似乎短視近利地，以色列軍隊在起義爆發前數年，曾積極幫忙坐大伊斯蘭主義團體，以其與世俗國族主義的巴解組織相抗衡，以色列人將巴解組織視為更大的威脅——就像當時美國支持阿富汗聖戰者（Mujahideen）對抗蘇聯一樣。因此軍隊對穆斯林領導者往往較巴解組織者更無戒備，伊斯蘭主義者一度被賦予權力，尤其在加薩走廊，西岸亦是如此，而這都有以色列的戰略許可。以此看來，如同美國在阿富汗一樣，以色列不經意地製造了一個往後將變成自己夢魘的特洛伊木馬。

無怪乎當時以色列情報局在暴亂初期的調查報告中，清楚指出伊斯蘭主義者非常活躍。雖然周圍有一些阿拉法特的海報，以及奇怪的巴勒斯坦旗飄揚著，但示威遊行者所喊的口號中，往往帶有強烈的宗教用語。

一九六七年後，以色列試圖奪取巴勒斯坦人僅有的一點土地和其他資源，尤其是水源，這更刺激了一部分的人使之投身暴亂行動。最明顯的就是猶太屯墾區的建立，如我們前面討論的，這些土

地往往以「軍事目的」為由被沒收充公，直接造成巴勒斯坦人的不安，害怕佔領的終極目標就是把他們驅離。在起義前夕，這種屯墾區在西岸就有一百二十五個，住著六萬三千名猶太人，在加薩走廊則有十八個屯墾區，兩千五百名屯墾者；每年遷入佔領區的屯墾者大幅增加，從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七年年平均是七百七十人，而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七年間則是五千九百六十人。[13]

另一個令巴勒斯坦人感到沮喪的原因，是他們自己的領導者和阿拉伯同胞。一九六七年之後，許多巴勒斯坦人相信佔領地外的軍隊，主要是巴解組織及其阿拉伯鄰居，會解決這個狀況，並且結束佔領。[14]但是一九八二年，夏隆在黎巴嫩擊敗阿拉法特，將他和他親近的領導者驅逐進突尼西亞，在佔領地的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希望；事實上，在巴解組織被從黎巴嫩驅離後的十年間，巴勒斯坦人朝目標前進的步伐明顯遲滯不前。巴解組織官員的腐敗和他們在突尼斯過著優渥生活的謠言，不論是否屬實，都使活在佔領下的巴勒斯坦百姓更加心灰意冷。

至於阿拉伯政府，雖然他們往往發表冗長言論說必須結束以色列佔領，但在一九八〇年代，他們極少付諸實際行動來緩和佔領地人民的處境。例如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暴亂發生前不久）在安曼舉行阿拉伯聯盟會議，其議程表中條列出最重要的議題是伊朗而非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也發現埃及（阿拉伯世界的領導者）與以色列談和，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卻沒有改善他們的生活。加薩的前市長拉沙德．沙瓦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觀察到，巴勒斯坦人「萬念俱灰……他們覺得阿拉伯國家一事無成……而他們視為自己代表的巴解組織也一事無成」。[15]因此如同一位巴勒斯坦領導者所說，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的情況是「〔佔領地的〕巴勒斯坦居民死心了……現在主要的問題是這些〔佔領地〕外面的人如何重新定位他們應扮演的角色。那些外面的人應該與裡面的人『唱和』。」[16]

佔領地的巴勒斯坦人也一直關注著黎巴嫩南部的事件，以色列侵占了其北邊一塊長條型的土地。這塊土地被授意為緩衝區，讓以色列的敵人難以潛入其北部。然而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真主黨（Hezbollah，一九八二年侵占事件後在黎巴嫩浮現的什葉〔Shiite〕運動）挑戰以色列對黎巴嫩南端的佔領，頗有斬獲。一九八七年，真主黨活動顯示反抗以軍是可能的，無需高科技武器或者強大的軍火，而如今這變成了巴勒斯坦抗爭的榜樣。

不僅在黎巴嫩，於其他佔領地發生的某些事件，證實軍隊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的嚇阻效應，最知名的就是巴拉塔難民營。

巴拉塔難民營位於西岸北端，如同位於加薩走廊的賈巴雅難民營，它一直是巴勒斯坦國族主義和反抗運動的溫床，往往刺激軍隊採取行動。現在要談的這個案例發生於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以軍進入營中處理沙比巴赫（Shabibah）——一個新興的運動，成員持續騷擾被懷疑與佔領者合作的當地居民。軍隊專橫霸道地逮捕了一些人，將他們拘留在當地的學校，但是巴勒斯坦女人介入了，她們開始朝著學校前進，向軍隊投擲石頭。這並不尋常，就像阿瑪爾（Amal，巴勒斯坦反抗佔領的季節性示威抗議）的一位組織者所說：「當遊行的時候，女人提高她們的嗓子擾亂軍隊；敲擊瓶子和鍋子，吹口哨。女人不再恐懼……」[17]在巴拉塔，軍隊受驚且撤退了，巴勒斯坦人認為這是一場勝利，而此事件後來被稱為「迷你起義」（mini-intifada），亦即十二月事件的預演。另一

個證實以軍似乎漸漸失去掌控權的事件發生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位勇敢的造反者單槍匹馬乘著滑翔翼飛越黎巴嫩邊境，降落在以色列軍營附近，在被射殺身亡前，他殺死了六位軍人、傷及十三位。

及至十二月，這些反抗軍隊的捷報以及真主黨的榜樣，使巴勒斯坦人頓時膽大了起來，他們終於覺得自己有能力對抗佔領。在西岸捲入前，從賈巴雅（事件的肇始處）暴動迅速蔓延至加薩其他的難民營：鄰近西奈的汗尤尼斯、阿爾布熱捷（Al Bourej）、努賽賴特（Nuseirat）、馬阿茲（Ma'azi）和拉法赫。

以色列的黑色十二月

當以軍終於開始消化此一新的現實、判斷需要做出反應時，才了解到他們既無裝備、也無專家協助他們處理此事——一個傾巢而出卻手無寸鐵的平民暴動，其中領導遊行的還是女人和小孩。

雖然其他國家可能運用警察來處理人民暴動，但在佔領地（除了耶路撒冷），這一直都是軍隊的任務。但當時身為總理辦公廳副主任的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也向作者坦言：「對於如此大規模激烈的群眾暴動，我們在技術上是毫無防備的。」[18]軍隊派遣援軍的速度緩慢，且對於宵禁的使用限制過多，宵禁是一種標準且往往有效的殘酷手段，可在這種情況下迅速恢復秩序，因它往往有助於整體事件的冷卻。這表示示威持續無間斷，且互相哺育壯大。事實上，十二月絕大部分

的時間，軍隊被指示不要與遊行者交戰，除非有人封鎖主要道路，或者襲擊軍隊。另一方面，巴勒斯坦人看見以軍撤退，認為他們可以設置障礙物將自己封鎖在村莊和難民營中，進一步將之變為「解放區」（liberated zones）。

暴亂之初，巴勒斯坦人藉著使用原始武器（主要是石頭），企圖挫挫以軍一直以來的銳氣；事實上，此時巴勒斯坦的形象，已從持槍的人變成了手拿石頭的孩子。達武德・庫塔巴（Daoud Kuttab）解釋道：對於這些年輕的巴勒斯坦人而言，投擲石頭可以被看「『作』『男人之一』」。打擊以色列車輛可以變成英雄；被逮捕卻不招供曾經做過什麼事的就是男人」。[19]巴勒斯坦女孩也加入了：里因・札古特（Reem Zaghout）當時只是個女學生，她記得「男生們向路過的軍人丟石頭……〔女生也會〕加入一起丟石頭、封路、在牆上寫字、加入……」。[20]在此情勢下，軍隊真正需要的是基礎和初級的暴動裝備——盾牌、頭盔、棍棒和催淚瓦斯——但是這些都物資短缺。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九日到三十一日，起義開始時的數週是混亂且暴力的：二十二位巴勒斯坦人被殺，其中五名只有十三到十六歲，除此之外還有三百二十人受傷，其中三分之二年僅十七到二十一歲。巴勒斯坦青年死傷人數之高，反映了他們在暴亂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即使在暴動爆發之前，丟石頭一直都是學童的傳統，但現在這些年輕的巴勒斯坦人也搭建起臨時路障，使用自製彈弓向軍隊發射石彈。起義之初，以軍使用實彈對付示威者，他們被命令瞄準示威者的腳，使之受傷但不致命；但對於孩子們，即使是這樣的傷害也往往致命。雖然傷亡不斷，但是巴勒斯坦人同心協

力。一位參與者憶及：「每個人都參與了……每一個人！男人、女人、孩子全都上街遊行。團結一心……」[21]

十二月二十二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強烈譴責以色列在佔領地違反人權，使用軍隊殺害和傷及手無寸鐵的巴勒斯坦人民。聯合國大會也要求以色列遵守《日內瓦第四公約》關於戰時保護人民的規定，並且為數百位巴勒斯坦人受軍事緩刑致哀。在聯合國和其他地方，往往只有美國和以色列反對這些解決方案。但因如此大規模的暴力和雙方明顯不平衡的權力關係，就連美國也無法寬恕以色列的行為，以色列發現它面對其反對勢力時孤立無援。這對於以色列來說是一個黑色的十二月。

1987

第三部

戰爭與外交

2007

7 起義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起義之際，雖然僅是一自發性的群眾暴動，到了一九八八年一月初，卻已發展為五臟俱全、組織完備、預先規劃好的反抗活動。領導者為當地領袖，主要都是由各種不同的佔領政府下的當地委員會或組織中脫穎而出，在許多地方都代表著巴勒斯坦社會的跨界；其中有些人是世俗的，屬於巴解組織，其他人則歸屬於伊斯蘭主義團體。[1]對佔領政府而言非常諷刺的一點是，在起義之前，軍隊放任這些團體發展茁壯，因為它們可以填補人民的需求與軍隊實際供給之間的差距。然而，現在這自助網絡卻是維持和提供暴動所需的領導階層的中樞。

國家統一叛亂領導陣營（UNLU）

當地領導者在國家統一叛亂領導陣營（Unified National Leadership of the Uprising，或簡稱

UNLU）的大傘下組織發展，並且一肩扛起領導暴亂的責任，發布公報，指導巴勒斯坦同胞行動的時間、地點和內容。國家統一叛亂領導陣營的第一份公報發布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十日，呼籲巴勒斯坦人「將壓迫的政權連根拔起」。[2]它呼籲叛亂者封鎖道路以阻止軍隊自由通行，進而指示「石頭必須命中佔領軍人頭部」，以及運動者應該「在佔領者的腳下縱火」。

國家統一叛亂領導陣營引導叛亂者不要使用軍火，是暴動發展的一個有趣因素及主要特質；事實上，仔細檢視在暴亂初期的十八個月間所分發的傳單，百分之九十均呼籲使用非暴力行徑，只有百分之四點九呼籲半暴力戰略，例如向軍隊丟燃燒瓶。[3]這個戰略的用意在於不要給軍隊使用武力的藉口；據估計，巴勒斯坦暴動中，軍火或炸彈的使用比例不超過百分之五。

巴勒斯坦起義發生在網路和社會媒體世代之前，因此公報顯然是由人工複印、分發，運動者往往會將之放在清真寺入口附近或其他公眾場合，或者張貼在電線杆上。後來，由於軍隊日漸迫近國家統一叛亂領導陣營，他們開始使用電話、傳真或電台廣播的方式傳達指令。

然而在突尼西亞，亞西爾．阿拉法特和其黨羽愈來愈憂心忡忡，因為他們眼見暴動是由當地運動者所組織，而他們對於這些人的掌控力小，他們害怕新竄升的領導階層會將阿拉法特領導的傳統巴解組織打入冷宮。同時，草根式地反抗以色列顯然比軍火攻擊更有效；阿拉法特挹注鉅資建立常態的軍旅，將充足的坦克車和大砲駐放在遙遠的伊拉克、蘇丹和葉門，如今目標卻被手執彈弓和石頭的孩童所達成，相較之下顯得前者極為愚蠢。而今為了證明他和被驅逐在外的巴解組織領導階層並沒有被遺忘，與前此發布的公報不同的是，阿拉法特強迫當地領導人，在國家統一叛亂領導陣營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的第三號公報及其後所發行的公報上，都註記以下文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佔領地的國家統一巴勒斯坦叛亂領導陣營」，清楚聲明國家統一叛亂領導陣營是代表阿拉法特的巴解組織而行動的。

國家統一叛亂領導陣營在加薩走廊和西岸所發動的戰爭不僅僅針對軍隊，也針對某些他們自己的同胞——那些被認為與佔領政府合作的人。如我們所見，這是合謀式以色列佔領（或事實上任何佔領）的重要特質，在起義前數年，以色列建立了一個巴勒斯坦線民網絡，為之提供情報。有些巴勒斯坦人為了錢選擇合作，有些為了換取家庭團圓的許可，有些為了駕照、開鑿水井或擴建的許可證，還有一些人是因為以色列情報局蒐集到關於他們的敏感資訊用以恐嚇，迫使他們合作。通敵者一直以來都是巴勒斯坦社會害怕和憎恨的對象。來自杜拉（Dura）的巴勒斯坦記者哈立德．阿瑪耶（Khalid Amayreh）解釋道：「巴勒斯坦人一直以來的共識是，通敵者是癌細胞。他們是以色列佔領之下最為惡貫滿盈的產物，這種對通敵者的集體怨恨不可小覷。」[4]因為通敵者的存在強化了巴勒斯坦社會中的猜忌和分裂，在社會中每一分子的內心埋下恐懼。一位巴勒斯坦人解釋道：

> 在我還很小的時候就察覺到告密者的存在。每個人都在談論他們，人們也變得害怕告訴彼此某些事。有一種感覺是告密者無處不在……如果你說了什麼，以色列人就會知道，然後你就會因此被懲罰——逮捕。[5]

現在國家統一叛亂領導陣營宣布，與佔領政府合作的人就是背叛巴勒斯坦人，那些被抓到的人會受到嚴厲懲罰。數字顯示從一九八八年初到一九八九年中，超過四十位巴勒斯坦通敵者遭到殺身之禍——有些是被暴民殺害，其他則是被特務所殺。許多人被誤殺，或因個人因素而非政治因素被殺。來自加薩走廊汗尤尼斯的巴勒斯坦運動者胡笙．阿瓦德解釋：「自起義開始以來，被巴勒斯坦人殺害的巴勒斯坦人，並非每一位都是通敵者。有一些是由於個人因素被殺害。在某些案例中，誅殺的過程出了錯。」[6]

軍隊反擊

軍隊從一開始的束手無策，漸漸掌握了情況，一月時，開始採取多種不同的措施來壓制暴亂。新發明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尤其是新式武器的設計。軍隊顯然不可能直接使用精密武器對付以婦孺為首的人民，因此對軍隊來說，挑戰性在於降低其武器的檔次，以達致雙方的武力平衡，但仍維持領先巴勒斯坦暴亂者一步。由此發展出的武器像是用以反擊丟石頭的小孩的投石機，或對群眾發射硬橡皮球和小型爆炸性火藥的車輛。[7]由於被殺的巴勒斯坦人的葬禮往往會變成示威抗議的焦點，故軍隊往往將屍體留著，僅在深夜將之釋出供人埋葬。一位巴勒斯坦的起義領導者說，在這場軍隊和巴勒斯坦人的貓捉老鼠遊戲中，巴勒斯坦人「會從醫院偷走屍體，將之下葬，並且把這變成一場……示威遊行」。[8]

吉洛．彭特克沃（Gillo Pontecorvo）在他一九六五年的經典影片《阿爾及爾戰爭》（*The Battle of Algiers*）中，捕捉到法國人一九五〇年代在阿爾及爾的所作所為，而以色列與法國如出一轍，派軍隊從根基撼動佔領地暴動領導者。他們散播假公報，假冒成國家統一叛亂領導陣營的領導者以混淆大眾視聽，並同時獵捕暴動領導者。在軍隊嚴令禁止加入暴動中下層，組織示威遊行指揮部的許多人民委員會和自助會也遭禁，入會被視為是一種犯罪行為。

軍隊和安全局憑藉嚴謹的紀律和資源的優勢，在巴勒斯坦告密者的協助下，逐漸迫近國家統一叛亂領導陣營，大部分的領導者最後都被捕獲，並遭監禁或逐出佔領區。事實上，軍隊在佔領初期就開始使用驅離巴勒斯坦領導者這個辦法。一九六七年後不久，被流放者往往遣送至以色列本土，更久之後的反抗佔領者則多被遣送至約旦。而現在軍隊拘捕起義的領導者，將之送往仍在以色列佔領下的黎巴嫩，並將他們扔在那裡，沒有任何人看管隨行；數字顯示單是一九八八年，軍隊就驅離超過五十位巴勒斯坦運動者。在該地這些嚴峻的手段並未奏效，因為新的領導者很快就出現，遞補那些遭驅離或監禁的人。

軍隊壓制暴亂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宵禁。在國際法中，宵禁被認為是集體懲戒，故而禁止使用；《日內瓦第四公約》第三十三條清楚表示：「被保護人無論男女，不得因非本人所犯之行為而受懲罰。集體懲罰及一切恫嚇恐怖手段，均所禁止。」但以軍卻仍然施行此一手段。數據顯示，一九八八年在佔領地就發布了一千六百道宵禁命令，其中一百一十八道長達五天以上；西岸和加薩走

廊全部的巴勒斯坦人民，經常處於宵禁之中。宵禁期間，巴勒斯坦人困坐家中，甚至被要求遠離窗戶和陽台；軍隊往往會對違反宵禁的人開火。由於巴勒斯坦人都被關在家中，軍隊便能來去自如，揪出嫌犯逮捕入獄，對巴勒斯坦人殺雞儆猴：這就是他們反抗佔領必須付出的代價。對於只能默默承受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有小孩的家庭）而言，宵禁始終是可怕的夢魘。巴勒斯坦記者蓋茲・班尼・歐德赫（Ghazi Bani Odeh）解釋，在宵禁期間「我們的生活……變成地獄，與左鄰右舍無法聯繫。看不到、聽不到，也無法跟任何人說話」。[9]又如另一位來自加薩走廊汗尤尼斯的巴勒斯坦難民所回憶的：「軍人們會乘著他們的坦克車轟隆隆地到來……整棟房子就像葉子那般晃動。他們通常在清晨就宣布宵禁，且使用的字眼往往粗鄙不堪，『狗娘養的……』和『X你娘』。」[10]

為了阻礙巴勒斯坦人組織示威遊行，軍隊會關閉學校，這也導致社區籌組教學課程的巴勒斯坦「人民學校」（popular schools）的出現。一位巴勒斯坦人黛安娜・沃赫比（Diana Wahbe）回憶在起義期間，她在拉馬拉的學校生活：

> 我們曾經去鄰居老師的家，整天和同個學區的學生一起學習歷史、阿拉伯文、地理、數學和文學。我們是奇怪的組合，公立和私立學校的小孩齊聚一堂，使用著不同程度的老舊教科書，以不同的方式解決問題，且熱切享受新老師、新同學的陪伴。有時，老師因為在這樣的學校教書而被捕，我們就必須找到另一位老師或者願意幫忙的家長來為我們上課。[11]

同時，為了維持佔領而發展出的法治體制，在壓制起義時發揮得淋漓盡致。如《（緊急）防禦法規》中，軍事法庭可以下令拘留一位巴勒斯坦嫌犯長達六個月，且這些「行政拘留」、「防範性拘留」或「扣留」毋需經過審判。此程序在一九六七到一九八〇年間僅零星使用過，但也漸漸不復見。然而，在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佔領地騷動不安的時期，估計受行政拘留的巴勒斯坦人高達三百一十六人；這個手段在此時期被廣泛使用。一九八八年間，不論何時都有估計約三千到四千名巴勒斯坦人受到行政拘留；遭拘留的人包括婦女和年僅十四、五歲的孩子。[12]

拘留人數如此龐大使得現存監獄設備應接不暇，軍隊必須啟用新的監獄。其中最惡名昭彰的拘留中心，莫過於加薩的安薩爾二號拘留所（Ansar II）和位於內蓋夫沙漠的凱西尤特軍事拘留所（Ketsiyot Military Detention Center，又稱七號監獄〔Prison 7〕），也叫作安薩爾三號拘留所（Ansar III）。這些監獄很快地成為了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學校，培養出新一批的領導者，彼此關係緊密。一位曾在以色列監獄待過十年的囚犯，描述獄中經驗如何轉變他的巴勒斯坦身分：「在我進監獄前，」他回憶道，「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巴勒斯坦人。他們教會我我是誰。現在我有選擇了……」[13]在監獄之外，巴勒斯坦佔領地強力支持囚犯，且巴勒斯坦領導階層會進一步讚美他們的勇氣：「榮耀是你的……榮耀獻給那些被關進監牢的反抗烈士……」[14]

被拘留者在獄中會受到審問，而刑求是獲取資訊和懲罰的慣用手段，無疑違反了國際法和人權法。[15]估計於一九八七和一九九四年間，沙巴克審問了超過兩萬三千名巴勒斯坦人，且往往固定使用刑求。以色列佔領地人權情報中心（Israeli Informatio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簡稱「B'Tselem」）研究發現，拘留在以色列監獄中的巴勒斯坦人被「打耳光、拳打腳踢、扯頭髮、以棍棒或鐵鞭施打、被推撞牆壁或地板」。[16]這份報告敘述監獄處置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的方法如下：

> 把被拘留者用一個密封的、蓋住臉的袋子懸吊起來，捆綁雙膝，並對之施以拳腳；將被拘留者從背後將雙手綁住，扭曲地綁在一個戶外的管子上，維持此姿勢長達數小時，有時下雨、有時在深夜，有時則是炙熱的正午時刻；將被拘留者監禁在禁閉室中，有時長達數日，那是一個黑暗、穢臭、令人窒息的密室，長寬皆只有一點五公尺（五英呎）；將被拘留者關入「衣櫃」長達數小時，那是一個狹窄的空間，人在裡面可以站著但無法移動；還有將受縛的被拘留者放在名為「墳墓」的箱型空間長達數小時，上面有移動式閘門，空間只夠一個人蹉臥且不能上廁所。

來自拉馬拉的巴勒斯坦十九歲學生N．S，以哈瑪斯成員身分被起訴，並於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時被軍隊逮捕、審問了三十天；以下他所描述的虐待行為與早期受刑人的回憶相似：

> 沙巴（Shabeh）〔一種刑求方法，蒙住雙眼、銬住雙手，被迫站立或坐著〕主要是在院子中，從早上九點站立到晚上八點。有幾天我一直站在那裡，沒有食物也不能上廁所……有時候我被關進一個漏水潮溼的「壁櫥」〔一個壁櫥大小的房間〕長達八到十小時。在「壁櫥」之中，你必須一直坐著……不能移動……人們往往在「壁櫥」中解手，因為他們不被允許去上廁所，而且裡面沒有容器……壁櫥臭氣薰天。晚上你像動物一樣躺在監獄的囚室中，毛毯和床墊都非常髒，散發著臭味。那裡沒有陽光也沒有新鮮空氣。因為漏水的緣故，囚室中到處是水……毛毯是溼透的，床墊也是……在偵訊室中，逼供的人打我耳光且踹我的下體……[17]

在以色列監獄的這些經驗，當然對被拘留者有著深遠的影響；在以色列監獄中待過一段時間的阿伊薩．歐德赫（Aysha Odeh）在出獄後解釋道：「你發現你無法從心裡的監獄逃出，你心中背負著它，它在每個細節上與你對抗。你在監獄的生活掌控著你對外界的行為……你從未離開監獄；事實上，它如影隨形。」[18]

為了緩和某些激烈地區的緊張狀態，軍隊往往會宣布某個鄉鎮或城市成為「封閉區」，這意味著這個地方被包圍封鎖、與外界隔絕。與宵禁不同的是，在被稱為「封閉區」的地方，居民可以自由走動，但是不可以離開這座城市，軍隊會在每個出入口設置關卡以防有人離開。一九八八年，這方法被施加於西岸接近傑寧的村莊卡巴提葉（Kabatiyeh），以報復當地人殺害一位疑似與佔領政府合作的居民時，這集體懲罰的手段變得惡名昭彰。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到四月三日，軍隊封閉卡巴提葉，使整座城哀鴻遍野。沒有食物得以運入，電話線被切斷，禁止卡巴提葉人將鎮上礦場所

開採的石頭出口到約旦，使得近乎所有村人無事可做。七千位居民中有四百名被拘留，有些人疑似對通敵者動用私刑，軍隊便將其房子夷平。[19]在長期圍困的重創下，居民回歸原始的生活方式，使用剪下來的樹枝取代煤油作為炊飯燃料，種植小片的菜圃作為臨時食物來源。

以軍對巴勒斯坦人所採取最嚴酷的懲罰手段，就是摧毀他們的房子，這往往造成居民的不安。早在起義爆發前，軍隊就採用過類似手段，使用推土機犁平房屋；由於這被視為極其殘酷的懲罰，直到一九八七年為止，此法只被用來對付那些犯下最嚴重罪行的人。這需要國防部長的特別許可，且住戶也有向高等法院上訴請願的機會。雖然法院往往不願干預軍事安全考量，他們仍要求必須維持比例原則，亦即犯罪的嚴重性必須與政府授權摧毀其居所的懲罰相當。[20]但現在，由於暴亂如火如荼地進行，摧毀居所的手段變得普遍，軍事指揮官得以自行斟酌，不再需要經過首長許可。數字顯示，一九八七年共有一百零三棟房子被摧毀，而一九八八年，數字令人驚詫地竄升到四百二十三棟。以下賈拉爾．阿布．盧茲（Jalal Abu Luz）的證詞，讓我們得以一窺房子被拆毀對於一個巴勒斯坦家庭可能造成的毀滅性影響：

> 我被房子毀壞這件事嚇壞了……我變得歇斯底里，開始哭泣並尖叫。我到處亂跑……我回到我房子殘骸旁，坐在一堆土石上開始哭泣……人們過來安慰我……我的太太和孩子回到家，看見房子變成了一堆石頭。我的太太昏倒了……孩子們開始大哭。我的孩子……過來……坐在一堆石頭上，我們一直哭到下午一點……有兩天的時間，我的孩子都沒有上學，因為所有他們的書和筆記本都被埋在殘屋破瓦下了……紅十字會開始發送帳篷和毛毯……我們拿到了一個帳篷和十條毛毯。我們將帳篷搭在石堆上……我的孩子後來回去上學了，但是他們的行為從此改變了……他們在親戚家睡覺時會尿床，且睡覺時會因做噩夢而尖叫。[21]

巴勒斯坦律師拉加．薛哈德敘述看見房子被軍隊拆毀的心情：

> 我看到軍人測量牆壁的厚度以決定炸彈放置的地方。他們以如此理所當然的態度做這些事……真是可怕。這就像看到某人為了做棺材而測量一個活著的人一樣。我看著這些士兵。多麼年輕！要了解他們怎麼能做到這些事，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他們顯然並沒有把住在那裡的家庭成員當作是兄弟、當作人。[22]

在來自西岸的穆罕默德．卡里拉赫（Mohammed al-Kal'ilah）的證言中，顯現出因拆屋政策而對以色列人萌生恨意，由於穆罕默德藏匿了他「被通緝的」兒子，因此房子被拆毀以示懲戒。「我可以殺死那個下令摧毀我房子的人一百萬次，」卡里拉赫承認道：「可是我過去有做過這類的事嗎？我以前有過這種想法嗎？我之前只想要活下去而已。現在他們卻讓我也變成了這樣。他們把我變成了殺人犯。」[23]

謀殺阿布・吉哈德

以色列人鎮壓起義的方法——宵禁、集體逮捕、拆毀房屋等等，一直以來都僅針對佔領地的巴勒斯坦人，但是一九八八年一月，在突尼斯的巴解組織開始積極介入策劃每日暴亂事件。負責人就是組織的參謀長，哈利勒・瓦齊爾（Khalil al-Wazir），人稱阿布・吉哈德——「鬥爭之父」（Father of the Struggle）。

他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出生於巴勒斯坦的拉姆拉鎮（Ramla），當時此地尚在英國託管下。他十三歲時，拉姆拉在第一次以阿戰爭中被以色列軍隊攻占，阿布・吉哈德一家被驅離，舉家走避到加薩走廊定居。年輕的吉哈德在那裡長大，就讀的中學是聯合國救濟工程局所籌辦，而後他從事多種不同的工作以維持家計。因為他參與了被嚴令禁止的政治活動，統治加薩走廊的埃及政權於一九五七年將他驅逐出境，於是他在沙烏地阿拉伯落腳，擔任學校教師。一九六〇年代早期，與阿拉法特及其他組織活動者一起創辦了法塔組織，阿布・吉哈德在此事上扮演關鍵角色，法塔組織的目的在於對抗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這是一個世俗的運動，它擁護巴勒斯坦國族主義意識形態，採取所謂「武力鬥爭」的方式，以求從以色列手中完全解放（尤其是一九六七年戰爭以後的）巴勒斯坦。

一九六九年阿拉法特變成了巴解組織的領導人，在此傘狀的組織下，法塔是最大的派系，此外還包括其他巴勒斯坦團體，阿布・吉哈德成為有力的首要支援，並成功組織對抗以色列的武裝抗爭運動。他是一個安靜、但非常有效率的組織籌劃者，在一九七〇到一九七一年，約旦的巴勒斯坦游

擊隊與胡笙國王的軍隊發生衝突，演變成後來的「黑色九月」時，他一直扮演著軍事要角。巴解組織被胡笙國王軍隊打敗後，阿布・吉哈德與阿拉法特及其他巴勒斯坦領導者、司令官搬到了黎巴嫩，從那裡開始，他領導軍隊對以色列進行武裝抗爭，是眾多攻擊背後運籌帷幄之人。在一九八二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時，阿布・吉哈德指揮反擊，試圖減緩以色列的入侵，以色列戰勝黎巴嫩後，他與阿拉法特及其他巴勒斯坦領導者逃離黎巴嫩，來到了突尼斯。

即使只能遠距遙控，阿布・吉哈德仍持續領導巴勒斯坦人進行武裝抗爭，其中著名的是透過於巴勒斯坦佔領地建立青年委員會，對抗以軍。如同許多其他人，起義剛爆發時，他顯得極為震驚，但是很快便回過神來，要求發動起義的當地人服膺其領導地位，並迅速讓他們願意聽自他從突尼斯發布的命令。由於阿布・吉哈德於指揮巴勒斯坦暴亂中扮演著如此關鍵的角色，以色列人決定除掉他。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五日，以色列突擊隊的船抵達突尼西亞岸邊，他們闖入了阿布・吉哈德的家，一位突擊隊員納胡・列夫（Nahum Lev）憶及：「我對他連續射擊了很久。」[24]阿布・吉哈德的太太吉安（Jihan）聽到騷動，走到樓梯處探查時看見：

> 三名戴口罩、攜帶槍械的男人……他們之中的第一個對阿布・吉哈德開火。他被傷及手臂和心臟。他轉身倒下。然後他們四個人，一邊跑向樓梯處以離開房子，一邊輪流對他射擊。聽到尖叫聲，我的女兒漢娜（Hanan）醒了。其中一個男人推開她說：「去找妳媽媽。」阿布・吉哈德

身上大約有七十五發子彈——其中八顆都在他的心臟。[25]

對此謀殺事件的怒火引發了佔領地集體抗議潮，尤以阿布．吉哈德長大的加薩走廊為甚。在這暴亂潮中，軍隊射殺了十四人，傷及七十人以上。在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進行了三天的哀悼與一場大規模罷工，許多黑旗在巴勒斯坦人的房子上方飄揚。雖然阿布．吉哈德被安葬在大馬士革，但佔領地的各個城市鄉鎮也都舉行了小型喪禮，國家統一叛亂領導陣營發布指示，阿布．吉哈德逝世的那週六應訂為「憤怒之日」，那天抗議和示威聲浪將會大起。雖以軍因突尼斯行動而蒐集到佔領地運動者的名單，也因此逮捕數十位巴勒斯坦運動者，但這場謀殺並未改變暴動的時間長度，它仍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阿布．吉哈德被謀殺後高漲的暴亂事件，具有一個重要影響：它強化了約旦胡笙國王的決心，讓他放手做出前所未有、最戲劇性的關鍵決定，而這對於佔領地的未來有著極大影響。

政治分家

即使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從胡笙國王手中奪走了西岸，他仍然繼續挹注資金到西岸：付給公務員薪水和津貼、管理宗教捐款，並資助學校、診所和其他公共機關。他堅持要在他還有望收回的土地上維持其影響力。以色列對他的干涉視而不見，因為他們希望時機成熟時，可與約旦共同統治這個地區，而非讓以色列與約旦之間的巴勒斯坦獨立建國。事實上，這個「約旦選擇」對以色列至關重要（尤其對於左翼而言），因為他們害怕若西岸有一個充滿敵意的巴勒斯坦國家，會過於接近以色列本土，而輕易地干擾到其日常生活。即使一九七四年十月，在拉巴特舉行的阿拉伯聯盟會議中，胡笙的阿拉伯領導者同胞轉而支持巴解組織，剝奪他代表巴勒斯坦進行協商的權力，胡笙仍持續支持著巴勒斯坦佔領地；從一九七四到一九八八年，國王持續嘗試繞過拉巴特方案，說服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世界和國際社群，他是代表巴勒斯坦人商議巴勒斯坦佔領地未來的不二人選。但是起義打亂了布局，雖然暴亂最初僅針對以色列佔領，但反約旦的情緒在巴勒斯坦人之間也不難得見，並且逐漸達到了新高。

例如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一日，佔領地的巴勒斯坦領導者國家統一叛亂領導聯盟，發布其第十號公報，呼籲巴勒斯坦人不僅要加強對佔領的以軍施壓，也要「抵制約旦政府的手下」，亦即親近約旦而非巴解組織的巴勒斯坦人。[26]他也呼籲仍然在約旦議會占有席次的西岸代表撤掉他們的席次，「否則在我們的土地上就沒有容納他們的空間」。這些話深深傷害了國王，因為到如今，他清楚看見大部分西岸人都公開表態與巴解組織同一陣線而非約旦，這是一九七六年西岸市政選舉後日益積累的過程。未逃過國王法眼的是——這裡還存在許多安全危機，因為約旦本土境內絕大部分的人民都是巴勒斯坦人，起義可能迅速越過邊境進入他的國家，甚至可能危及他的王位。他這幾年的積極付出卻遭巴勒斯坦人冷眼相待，使國王愈來愈厭倦，於是他決定孤注一擲——從西岸完全撤離，並將所有責任轉交給巴解組織。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胡笙國王放棄了一個十三億美元的西岸發展計畫，這些經費本將運用在住宅、健康、教育、文化和宗教計畫上，他辯稱這項土地投資的停擺，是為了使巴解組織在當地負擔起更多權責。兩天後，國王解散了約旦議會下議院，六十位議員中有一半是來自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最關鍵的一刻終於在七月三十一日發生，在電視轉播的戲劇性致辭中，他宣告放棄一九六七年所失去的土地的所有權利，宣布約旦將切斷與西岸的所有行政與法律關係。他解釋道，既然那裡存在著「一個普遍的認知」，相信巴勒斯坦土地要從以色列佔領中解放，此鬥爭不可能在不打亂兩岸法律和行政聯繫下進行，那麼「我們〔約旦〕有責任做出我們該做的事」。[27]他宣稱一個未來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家，會被建立在「被佔領的巴勒斯坦土地上」，他強調這麼做僅僅是為了成全巴解組織——「合法代表巴勒斯坦人的不二人選……」[28]雖然國王輕描淡寫地說，因為無法保證以色列會繼續給予巴勒斯坦人這些聖地的主權，在個人責任感的驅使下，他將不會撤除在耶路撒冷聖地的哈希姆（Hashemite）託管權。

也因此，在「願上帝的和平與祝福與你同在」一語後，國王正式切斷約旦與這塊土地的關係，這塊他一九四八年首次獲得、一九五〇年正式兼併、一九六七年從以色列手中失去，而到這一刻之前他都還希望收回的土地；他也正式結束了他的巴勒斯坦人民代表權。這個舉動對以色列的「約旦選項」是沉重的一擊，巴解組織成為他們在巴勒斯坦佔領地唯一的可能協商對象。

胡笙的決定推動了事件的發展，這個新現狀在該地逐漸成形，且把他的撤離變成了覆水難收的決定。

獨立

胡笙國王從巴勒斯坦佔領地上洗手不幹後，當地的巴勒斯坦領導者對巴解組織施壓，要求他們將暴動的勝利解釋為有明確計畫的行動：為了獨立而進行鬥爭。仍然身在突尼斯的阿拉法特感受到日漸攀升的壓力，他需要有所行動。他把握了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色列軍隊在佔領地和東耶路撒冷施行宵禁的那天，在阿爾及爾的巴勒斯坦民族議會（Palestinian National Council，簡稱PNC，為巴解組織立法機構）的一個特別會議中宣布，將要「在我們巴勒斯坦民族之中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家，以神聖的耶路撒冷作為首都」。[29]然後，他宣讀《巴勒斯坦獨立宣言》（Palestini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此份宣言是巴勒斯坦詩人馬赫穆德．達爾維什（Mahmud Darwish）所寫：

> 巴勒斯坦，三個一神教信仰的發源地，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出生的地方，他們在這裡長大、成長並且出類拔萃。因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確保了人民、土地和其歷史的永久連結。在歷史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堅定地形塑了他們的民族認同……[30]

阿拉法特在他的獨立宣言中所擬想的國家，包含了西岸和加薩走廊，大約是歷史上巴勒斯坦土地的百分之二十二，其他還有以色列視為自己屬地、且於一九六七年六月有效兼併的阿拉伯屬東耶路撒

冷。因為這些土地仍然在軍事佔領之下，阿拉法特的宣言講述的僅是其希望和意圖，沒有任何直接的實質意義。

巴勒斯坦民族議會贊成阿拉法特的宣言；他也首次正式接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第二百四十二條決議。這件事意義重大：雖然一九七〇年以色列不情願地接受了這個決議（它呼籲以國撤離一九六七年所佔領的土地），但阿拉伯國家如埃及和約旦也接受這個決議，如此一來即代表他們接受以色列有權和平地在中東生活，但是直到此刻之前，巴解組織都拒絕接受。對於他們而言，如同第二百四十二條決議所指，接受以色列存在的權利就意味著他們要放棄百分之七十八的原巴勒斯坦土地。由於拒絕接受第二百四十二條決議，巴解組織多年來給了以色列藉口，將之劃歸為欲摧毀以色列的「恐怖分子」，並藉此試圖遣散他們：然而如今，阿拉法特在這一大膽的舉動下改變了巴解組織，並為以色列設下一個挑戰，迫使以國開始與之協商。

阿拉法特可能務實地猜到他即使接受以色列的存在權，也未必會導向與政府的直接對談，因為這將連帶引起關於未來巴勒斯坦國家的討論，而這正是利庫德集團的沙米爾和絕大部分以色列群眾所反對的。同時阿拉法特希望美國——以色列的重要盟友與世界極權大國，至少會正面回應它，像是解除十四年前由當時的國務卿亨利．季辛吉所訂下的、與巴解組織協商的禁令。季辛吉曾對以色列人許諾，在巴解組織明確認可以色列存在權與放棄恐怖主義，接受聯合國第二百四十二條協議前，美國不會再與之協商，這是一九七五年勸誘以色列從西奈撤軍時的眾多承諾之一。而現在，美國國務卿喬治．舒茲（George Shultz）清楚說道，阿拉法特必須符合上述**所有**要求，尤其明確認可

以色列的存在和放棄恐怖主義。阿拉法特覺得他必須順從，因此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他寄出一道訊息給舒茲國務卿，聲明道：「巴解組織決策委員會……指責任何形式的個人、群體和國家的恐怖主義，並且不會採用它。」[31]而十二月十四日，阿拉法特召開了一場記者會，聲明巴解組織認可中東衝突相關的所有群體，擁有和平與安全的生存權，「包括……以色列」，並且他重複說道：「以茲證明，巴解組織放棄恐怖主義。」[32]

對美國人來說，阿拉法特終於願意答應其要求，雖然以色列人仍然拒絕與巴解組織進行任何協商，但是美國迅速地給予回應，停止了杯葛，並準備與之對話。美國大使羅伯特．佩爾特羅（Robert Pelletreau）到突尼西亞與巴解組織首領交涉，且於十二月十六日進行談話，在突尼斯開始建立巴解組織與美國政府的未來關係。然而他們並未有重大進展，因為一九八九年五月，在巴勒斯坦解放陣線（Palestine Liberation Front，簡稱PLF）的成員馬赫穆德．阿巴斯（Muhammad Abbas）主導之下，在特拉維夫附近的海邊發生了巴勒斯坦派系鬥爭，導致一場海運襲擊事件；阿拉法特拒絕譴責這個突擊事件，於是美國以斷絕與巴解組織對話回敬。

事實上在這些年來，阿拉法特持續對以色列進行軍事鬥爭，卻同時試圖與以國進行政治協商，這逐漸腐蝕了他的信用，也延宕了巴勒斯坦國家的前景。及至此刻，解決以巴衝突的歷史契機又再次失敗了。

斷骨和沙米爾的和平計畫

這些外交手段似乎對當地的實際情況影響甚微，以軍和巴勒斯坦運動者持續購買炸彈。一九八九年，以軍為其軍械庫引進了橡膠子彈以對抗暴亂；這些子彈外層由橡膠包裹，削弱其威力，降低了致死率。但這些「軟性」武器仍然造成致命的傷害，使得許多暴動者肢體殘缺，卻無法遏止叛亂。

而今以色列國防軍與暴動者周旋時明目張膽的暴行，遭到國際輿論強烈的抨擊，以色列人別無選擇，只能降低其使用武器的級別，從槍彈變成棍棒和短棍。軍隊在國防部長拉賓的直接指示下行動，而拉賓在某個場合曾經對他的軍隊說：「男士們，為了恢復秩序，開始使用你們的雙手或棍棒，直接擊打這些示威者吧。」[33]這變成了拉賓有名的「斷骨」政策（"break their bone" policy），軍隊由於太過挫折，以致過度發揮了部長的勸戒：他們對巴勒斯坦人施加的重擊，令許多人終生殘廢。斷骨也可以為軍隊解決另一個問題；也就是說，他們不需要將示威者送到拘留營區，就可以使他們動彈不得；陸軍上校葉胡達・梅厄（Yehuda Meir）指示他的軍隊要「打斷〔巴勒斯坦人的〕手臂和腳」，因為「拘留營現在人滿為患了」。[34]

巴勒斯坦佔領地所發生的殘酷事實，在全球各地的電視螢幕中播報出來，以色列感受到國際輿論壓力急遽上升：歐洲人、聯合國、蘇聯，甚至美國政府，都對以色列的強硬手段感到焦慮，呼籲以國主動開啟政治協商管道，尤其在阿拉法特表明認可以色列和放棄恐怖主義後。

在這些日益攀升的國際壓力下，沙米爾於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擬定了四點計畫，[35]規劃了兩階段的和平進程，包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轉型期臨時協議，這將開啟加薩走廊和西岸的地方選舉（意在排除巴解組織），然後由以色列、埃及和約旦共同商議（再次杯葛巴解組織的領導地位）出永久的解決方案。這個方案的核心用意是「〔巴勒斯坦人〕自治，藉此他們可以主宰自己的日常生活」。根據沙米爾的計畫，以色列會繼續掌有國安、外交，以及與西岸、加薩走廊的以色列屯墾者相關的其他事務。

巴勒斯坦人認為沙米爾計畫是以色列的陰謀，想要扼殺巴勒斯坦建國的念頭，孤立巴解組織。事實上我們現在知道，沙米爾所提出的交換條件只是為了減輕以色列的國際壓力，如同他本人日後承認的：「即使必須花十年進行協商……我們的土地〔意指西岸〕一寸都不會給阿拉伯人。」[36]在其他地方，沙米爾也這樣談論他的計畫：「我們可能會花長達十年的時間進行協商，不過這期間我們在朱迪雅—撒馬利亞的〔屯墾者〕就會有超過五十萬人了。」[37]很清楚地，沙米爾的目的是爭取時間，他相信現狀能夠維持不變愈久，以色列就愈能十拿九穩地擁有和統治這些土地。沙米爾的想法反映了他的信念，蘇聯政權的傾倒、美國超級霸權的出現，和從蘇聯來的高技術移民潮大約在此時注入以色列，這些都強化了以國的人口和經濟，而事後看來，這些重要事件也都是以色列的助力。國防部長拉賓支持沙米爾，警告巴勒斯坦人他們最好擁抱沙米爾計畫，因為，「如果巴勒斯坦人拒絕考慮以色列願意提供的唯一方案，那麼〔以色列〕就不會對大幅增加軍事壓力有任何良心不安。」[38]但即使這樣的警告，也都無法動搖巴勒斯坦人，他們駁斥沙米爾計畫，並繼續他們的暴亂。

即使無法完全鎮壓起義，及至一九九〇年軍隊顯然仍占上風，而在投擲第一顆石頭出去時還歡欣鼓舞的巴勒斯坦團體，此刻開始分崩離析。經濟可能是一九八七年起義爆發背後的推力，但在八〇年代末時它卻成為起義崩頹的助力，這是以軍的手段所造成的，國家統一叛亂領導陣營頻繁發動起義，也使得佔領地的經濟現狀每下愈況，情況嚴重到所有巴勒斯坦平民都希望能夠回到以色列工作，讓餐桌上有食物可吃。數字顯示，從暴亂一開始，在以色列工作的加薩勞工人數急速地從起義前的七萬到八萬人，降至一九八九年的五萬六千人，國民平均所得在起義開始的兩年內，滑落了十三個百分點。人們愈來愈後繼無力，暴亂漸漸失去其重要性；工人們回到他們在以色列的工作崗位，削弱了想要繼續叛亂的組織者所做的努力。一位起義的領導者沙里．奴塞依巴（Sari Nusseibeh）寫下了起義「含恨而死」，以及「動機因後繼無力而衰亡，結束於『幽怨的嗚咽』，而非一聲『轟轟烈烈的巨響』」。[39]但是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夢想並未全然消失殆盡。曙光在暴亂的基礎上迸發，為佔領地帶來劇烈的政治變化，而這很快地將在一個出人意表的地方——伊拉克——發生。

8 波灣、馬德里、奧斯陸（一九九一～一九九五）

歷史上的一大諷刺在於，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於中東和平進程中扮演驅動要角的，不是別人，竟是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

一九八〇年代末，經歷與伊朗毫無斬獲的八年戰爭後，海珊的國家破產了，油價持續跌破新低，嚴重損及伊拉克的出口獲利，因此他試圖重振經濟以負擔飛漲的軍事費用。一九九〇年八月二日，在窘迫的情況下，他派遣軍隊侵占了幅員雖小但石油產量豐富的鄰國科威特，計算著透過侵占科威特、奪取其資源，他可以使油價飛漲，復興伊拉克的經濟。然而，他低估了國際情緒。在海珊的軍隊揮軍直入科威特時，聯合國著手阻擋了他的進攻。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六百六十條決議即刻指責伊拉克的進攻，並要求伊拉克無條件撤軍；更多的決議接踵而至，其中也包含對伊拉克進行經濟制裁。

面對沉重的國際壓力，海珊回應以一個雖然諷刺、但獨創性十足的構想，他提出一個綜合性的

解決方案：「在這整個地區……所有佔領事件」，呼籲若以色列即刻且無條件地從佔領地撤軍，「科威特的狀況便比照辦理……」[1]當然，他的假設是以色列會拒絕撤軍，如此一來，這件事情就會分散阿拉伯輿論的注意力，減少迫使他撤離科威特的壓力。不意外地，佔領地的巴勒斯坦人為伊拉克領袖歡呼。莫吉・阿薩德（Moghi Assad）是一位年僅二十的巴勒斯坦學生，他住在西岸的阿吉雅難民營（Azia refugee camp），一家十一口擠在一個小房子裡，他說道：「薩達姆・海珊……給了我們希望。他是一個英雄……薩達姆會幫助巴勒斯坦人……他有權力叫以色列離開。」[2]

在國際舞台上，伊拉克進犯的反對聲浪由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H. W. Bush）領頭，他決心不讓海珊魚目混珠，將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一事嫁接到以色列離開佔領地之事上。但雖然是以聯合國的名義，他要想說服阿拉伯國家加入以美國為首的反伊拉克聯盟，仍舊困難重重：例如，海珊將結束他自己的佔領扣連到以色列佔領之上，只要華府對此提議視而不見，被視為阿拉伯國族主義守門員的敘利亞就不願與之共事。敘利亞外交部長法魯克・沙雷（Farouk al-Shara）後來在一場訪問中說道，敘利亞總統阿薩德（Hafez al-Assad）告訴美國人：「不應有雙重標準；如果我們都支持聯合國安理會執行波灣決議，那麼同樣的決議也應該被實行在以阿衝突上。」[3]

在極度渴望敘利亞加入其陣營的情況下，雖不直接，但布希總統被迫更趨向認同以色列與伊拉克事件的關聯性；在一九九〇年十月二日一場對聯合國大會的談話中，他宣布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一事，將為「這區域中所有國家和人民解決以阿衝突」[4]鋪路。而後，在一個與敘利亞總統哈菲

茲・阿薩德面對面的會談中，布希總統擔保：「一旦我們解決了薩達姆之事，一旦我們讓科威特重返自由，美國就會轉而處理〔以阿〕和平進程。」[5]布希的擔保說服了阿薩德；他和其他阿拉伯國家領導者同意加入以美國為首的反海珊聯盟，甚至派出了一些兵援。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六日，聯合國聯軍空襲海珊的軍隊，二月二十四日開始陸上攻勢；在一場長達一百小時的戰役中，伊拉克軍隊被擊潰，海珊決定撤離科威特。

在巴勒斯坦佔領地上，自波灣戰爭開始那天，眾多外國記者為報導伊拉克事件而離開了以色列與佔領地，以軍趁機施行全面宵禁以箝制巴勒斯坦人。這段期間，軍隊進一步逮捕上百位巴勒斯坦人，試圖從他們身上榨取情報，給起義最後一擊。以色列經常使用殘酷的手段從被拘留者身上取得情報，來自希伯崙拘留所的內部消息透露：

> 純粹的恐怖：他們會將拘留者打到棍棒斷裂，打他們的生殖器，將一位被拘留者綁起來，放在冰冷的地板上，並像踢足球般地對待他——真的把他當球一樣踢，使他到處滾動。他們會使用發電機或野戰電話對他施以電擊，然後將他推到寒冷下雨的戶外，罰站數小時……他們會將拘留者壓碎……將他們變成一塊塊肉團。[6]

軍隊施行了持續七週的宵禁，對佔領地的經濟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加薩走廊尤其受到重創，

損失至少八千四百萬美元；一九九一年二月所生產的十四萬噸（前一年是十七萬五千噸）柑橘，只出口了一萬五千噸。且因為軍隊不再允許巴勒斯坦勞工進入以色列找尋工作，上千個家庭瀕臨經濟崩潰；一九九一年二月底，加薩的紅肉交易下滑了百分之八十，蔬菜也下滑百分之七十。更糟的是，因為巴勒斯坦在佔領地公開支持海珊，他們在突尼西亞的領導者阿拉法特一向不願意違反人民的情緒，也說出了支持薩達姆的言詞，因此沙烏地阿拉伯和科威特在他們的土地上對巴勒斯坦工人進行報復。我們應該記得，因為佔領地上工作機會少，巴勒斯坦人、尤其是西岸人，經常到沙烏地阿拉伯和科威特找工作。他們能夠從那裡寄錢回來給他們在佔領地的家人，而這些資金一直都是佔領地收入的首要支柱。如今因為對巴勒斯坦人支持伊拉克獨裁者感到失望，沙烏地阿拉伯和科威特驅離了巴勒斯坦工人，大部分的人無處可去，只好回到佔領地，他們因此失業了。這個情勢對佔領地的經濟有著毀滅性的影響。

馬德里和會與其後續發展

老布希總統所領導的國際和區域性聯盟大勝伊拉克後，他決心要實踐他的承諾，處理以阿衝突。他的聲譽如日中天，這是解決這件事情的極佳機會。因此戰爭結束後，他很快地派遣他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到中東安排國際和平會議，其中直接的與會者是以色列、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和巴勒斯坦人；因為以色列拒絕與巴解組織談判，所以巴方代表並非巴解組織，而由巴勒斯坦的佔領地領袖代表出席。貝克花了八個月的時間，只為了說服各方參與這個在西班牙的會議，以調解他們的歧見。

馬德里和會（The Madrid peace conference）從一九九一年十月三十日到十一月一日召開，是自一九七七年沙達特總統歷史性地到訪以色列以來，以阿和平嘗試最重大的突破。前次的到訪結束了西奈佔領，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第一份和平條約也在此簽署。現在以色列人和他們的阿拉伯敵國一起圍坐在桌前談判；這些都在美國和蘇聯政權的支持下發生。蘇聯比較像是一個裝飾品，因為它是傾頹中的強權；歐盟和埃及是全程參與者，聯合國因不被以色列信任，只是觀察者的角色。

沙米爾在他的演說中聲明：「我們希望這次的會議能開啟中東歷史的新樂章。」但是他很快又更正了他的說法：

> 我們知道，我們談判桌上的夥伴會對以色列做出領土的要求，但是檢視過去衝突的歷史可清楚知道，其實際狀況並非領土問題。衝突早在以色列因防禦戰爭取得朱迪雅、撒馬利亞、加薩和戈蘭之前就已風起雲湧。一九六七年戰爭前，當現在討論的土地仍未落入以色列控制時，早已沒有任何認同以色列的跡象。[7]

以總理為首的以色列代表到那裡去是為了保護資產，而非與之妥協；相反地，敘利亞則由外交部長

法魯克．沙雷帶領（他與沙米爾一樣心胸狹窄），反覆重申敘利亞的基本要求是，以色列完全地從整個戈蘭高地與其他以色列佔領地中撤出。過去附屬於約旦代表團之下的巴勒斯坦代表，現在由來自加薩走廊的海德爾．阿卜杜勒—沙菲（Haidar abdel-Shafi）所領導，他主張終結以色列佔領，然後指出對巴勒斯坦人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一個以阿拉伯屬東耶路撒冷為首都的巴勒斯坦國家，並允許巴勒斯坦難民回到以色列本土，那個他們因逃難而離開、現在已是以色列國土的家。雖然阿拉法特不被允許參與這個會議，但是他的精神依舊長相左右，至少對於巴勒斯坦代表來說，他要讓人看見他仍是主掌一切的人。一位巴勒斯坦代表格桑．哈提卜（Ghassan Khatib）回憶，巴勒斯坦人從馬德里被車載往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抵達後他們發現前方是一架飛機。他回憶道：「在我們登上飛機後，才被告知我們要去突尼斯……而在那裡，我們見到了阿拉法特。」[8]阿拉法特清楚表達了——他是那個運籌帷幄的人。

在馬德里的這兩天與其說是一個和平會議，還不如說更像一場戰役，各方的口水戰一度近乎導致整件事分崩離析，國務卿貝克必須請求與會者對言行更負責任些。他勸他們：「如果你們不把握這個歷史性的機會，就沒有機會了。」[9]

但無論現場氣氛有多糟，馬德里會議並非一無所獲，因為它為未來的協商創造了一個雙管齊下的機制，確保這並非只是一個一次性會議，高峰會會變成和平進程的序曲。

第一個管道是多向的，以色列、阿拉伯地區性政權和其他不在此區的國家，都可以參與討論這五項中東關鍵事項：水、環境、軍事控制、難民和經濟發展；這多向的談話始於一九九二年一月的莫斯科。第二個管道是至此為止最重要的協商管道，即在華盛頓舉行的雙向協商管道，在此以色列分別與其阿拉伯鄰國（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和巴勒斯坦人）協商，而後者仍然嚴格限定為非巴解組織。以色列人希望當地巴勒斯坦領導者會逐漸壯大，劃清與「外人」（在突尼斯的巴解組織）的關係，並且最後與以色列達成和平交易。

華盛頓會談

但是在華盛頓展開談話時，很顯然這種想法只是一廂情願，因為巴勒斯坦「內人」仍然高度依賴巴解組織的指示和引導，與他們在馬德里的過程如出一轍。更甚者，如果以色列希望「內人」會變得更有商量餘地，此想法就更大錯特錯，因為在協商過程中，從佔領地來的巴勒斯坦協商者堅持討論最敏感的話題，而這些話題都是以色列最想迴避的，特別是耶路撒冷的未來歸屬問題。

以色列—敘利亞在華盛頓的會談也同樣窒礙難行。沙米爾的代表對於撤離被佔領的戈蘭顯得意興闌珊，而敘利亞人卻反覆重申他們的傳統要求：首先，任何關於以色列—敘利亞未來關係的協商有一個先決條件，以色列須同意完全從戈蘭高地撤離，退到敘利亞人所謂的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的國界線，也就是一九六七年戰爭前夕他們所擁有的國界線。

華盛頓和平協商進退兩難的境況是，儘管約旦沒有許多要與以色列協議的事項，它仍希望在與以色列簽約前看見以巴現狀的進展，以免被譴責拋棄巴勒斯坦人。同樣的，黎巴嫩只有很細微的國

界問題要與以色列協議，但它顯然聽從於敘利亞，在敘利亞與以色列簽約前不能有所行動。因此，在華盛頓會談中，真正需要的是敘利亞與巴勒斯坦現狀的突破；可嘆的是，在這一點上協商同樣也是停滯不前。

一九九二年六月，以色列領導階層有所變動：沙米爾的右翼利庫德集團被伊札克・拉賓的左傾勞工黨所擊敗。這是拉賓第二次擔任總理，現在他變得更為成熟老練。他在普選前承諾，如果能有機會組織下一屆政府，他會奮力在到任的六到九個月內與巴勒斯坦人達成協議。此番承諾無疑野心勃勃，事實上，拉賓一就任，即明白說比做容易。華盛頓的和平會談仍然進展牛步，十二月十三日發生的一件事更使之完全停擺。那天，一位以色列軍人被綁架，遭到哈瑪斯的軍事運動者所謀殺，被肢解的屍體後來被人發現。以色列對這殘暴的殺戮事件回以嚴厲且過當的反應：軍隊搜捕了四百一十五位巴勒斯坦佔領地的哈瑪斯運動者，將其以巴士運往當時仍是以色列佔領地的黎巴嫩南部，將他們丟棄在荒郊野外。在華盛頓，因為來自佔領地巴勒斯坦人民的壓力日益攀升，巴勒斯坦代表以離開和平會談作為回應：在四百一十五位運動者未被獲准回到原居地前，不與以色列進行協商。

華盛頓出局——奧斯陸進場

大約在強制驅離事件的兩週前，有兩個人碰巧同時身在倫敦，一位是巴勒斯坦人，一位是以色

列人，他們的相遇後來被視為以巴關係的里程碑。巴勒斯坦人艾哈邁德・庫賴（Ahmed Qurei）人稱阿布・阿拉（Abu Ala'a），他是巴解組織的成員，也是阿拉法特在突尼斯基地的左右手。以色列人亞爾・希斯費爾德是一位政治學教授也是和平運動者，他同時還是外交部長佩雷斯的副手尤西・貝林（Yossi Beilin）的朋友。他們經漢娜・阿什拉維（Hanan Ashrawi）介紹而認識，阿什拉維是現已停擺的巴勒斯坦華盛頓小組的成員，她認識這兩個人，知道他們同時都在倫敦，便建議他們碰面。在其建議下，希斯費爾德和阿布・阿拉在鄰近皮卡迪利圓環（Piccadilly Circus）的卡文迪士飯店（Cavendish Hotel）見面。希斯費爾德提早抵達，先與一位當時兼任外交官的挪威社會學家特傑・羅德—拉森（Terje Rød-Larsen）碰頭，他對於以巴衝突甚感興趣，也正巧認識阿布・阿拉，他聽希斯費爾德說接下來要與這位巴解組織的人見面便說，若與阿布・阿拉的面談結束後，兩人仍想繼續保持聯繫，那麼拉森可以在挪威為他們安排秘密會面，他在那裡關係良好。稍後他便離開了。

希斯費爾德和阿布・阿拉很快地開始對談，討論他們可以如何突破華盛頓的僵局。他們都一致認為會面要避免媒體注意，這是很重要的，需要到一個沒有表演性誘因的地方；他們後來決定要借助拉森的提議，在挪威會晤。倫敦的初次見面開啟了後來所謂的以巴「奧斯陸管道」。

在突尼斯，阿布・阿拉向阿拉法特報告他在倫敦的會談，阿拉法特對此有些猜忌，但因華盛頓會談已經掉入死胡同，他首肯這私人會談繼續進行，甚至增派了兩位巴解組織官員與阿布・阿拉一起到挪威。同時在以色列，希斯費爾德教授已經準備好，要與他以前的一位學生羅恩・蓬達克

（Ron Pundak）一起出發到奧斯陸。雖然在華盛頓的巴勒斯坦人因十二月哈瑪斯被驅逐之事而離開了會議，但在突尼西亞和以色列，一群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已經蓄勢待發，要在挪威進行秘密會談了。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們在奧斯陸見面，決定先將焦點鎖定在加薩。[10]從加薩下手，結束在那裡的佔領，將之還給巴勒斯坦人，讓他們可以自己管理自己，這個想法在當時已醞釀了一些時候了。加薩面積小但是相對自制，放棄它對以色列並不會造成像西岸一樣嚴重的國安問題；它還能變成巴勒斯坦自治的理想試驗。

這個想法曾經被提出過，但巴勒斯坦人一直對此非常猜忌，懷疑以色列試圖用問題叢生的加薩賄賂他們，然後藉此永久地占有西岸。現在，這個問題仍未解決，但總之第一次的挪威會議進行順利，證明秘密會談具備了公開協商（像是現在停擺的華盛頓會談）所沒有的優點；兩天後，代表們離開了奧斯陸各自回去。在突尼斯，阿布．阿拉向阿拉法特報告以色列非常慎重地面對這件事；而以色列方面，希斯費爾德則向副外交部長貝林報告，貝林鼓勵他草擬一份原則聲明（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在這篇聲明中，列舉了未來以巴事務交涉可以依憑的原則，而這應可整合奧斯陸協商者的想法。

再度於奧斯陸會面時，希斯費爾德向巴勒斯坦人展示了這份原則聲明。這份文件成了奧斯陸協商者的主要工作目標，其核心思想是要終結以色列佔領，並在停戰協定的基礎下達成和平協議，這個漸進式的進程，首先從那些本來雙方就已有較多共識的區域著手（如加薩走廊的未來），將較為複雜的事情留待後面處理。其策略是：讓以色列逐漸放棄土地，使巴勒斯坦人在撤離的區域能繼續

維持法治和秩序，以增進兩者的信心和互信，於此狀況下，五年內雙方便可以開始討論他們衝突中較為棘手的議題，如阿拉伯屬東耶路撒冷的未來。

在以色列，貝林不久後終於告訴了他的上司佩雷斯，有關這次在奧斯陸與「突尼斯巴勒斯坦人」（意即被封殺的巴解組織）的會談。因為在華盛頓的談話仍一籌莫展，而拉賓自己設下的選前目標，是在六到九個月內與巴勒斯坦人達成協議，其承諾兌現的日子逐漸逼近了，佩雷斯面見了總理：「華盛頓會談已經沒有希望了。它死了。華盛頓變成了一個交換宣言的地方，而不是協商的地方。」[11]然後，他告訴總理有兩個「狂人」（希伯來文：meshugoim，英文：crackpots）在奧斯陸與巴解組織代表見面。雖然拉賓並不看好奧斯陸的會談，但是他也不阻撓，允許會談繼續進行。

一九九三年三月的封鎖令

與此同時，佔領地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軍的緊張關係益趨嚴重，一九九三年三月，巴勒斯坦運動者殺死十五名以色列人，衝突進入白熱化。軍隊反應激烈，將巴勒斯坦佔領地分解為四個小區域：西岸的北部和南部、東耶路撒冷和加薩走廊，並封鎖區域和區域間、區域和以色列之間的通訊往來。這樣的封鎖長達數週，對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造成全面毀滅性的影響。例如醫療服務受到重創，東耶路撒冷的馬卡沙德醫院（Al Maqassed Hospital）便是一例。

馬卡沙德醫院是一家綜合醫院，為西岸和加薩走廊人民提供佔領地內其他醫院所無法提供的特

殊服務，它不僅損失許多病人，也失去了眾多員工——醫生、護士和技術人員，他們無法自由移動，尤其不能往來加薩走廊，因為此區禁止任何機動車輛駛離。這封鎖令導致求診病人數量、醫院入住率和外科手術的執行大幅下滑。封鎖的頭三個星期，使用門診設備的病人只有原數量的百分之四十四，而住院病人的數量也下滑百分之二十。西岸女性居民到馬卡沙德醫院生產的數量下滑了百分之五十，許多人現在被迫在家生產。[12]

封鎖令也嚴重打擊了巴勒斯坦佔領地的教育系統，在那裡老師和學生因為無法自由遷移，難以到學校去。阿列夫．阿布達拉．哈提卜（Aref Abdallah al-Khatib）來自西岸中部一座約有四千人口的希茲梅赫村（Hizmeh），他敘述封鎖造成的困境：「高中年紀的女孩在東耶路撒冷的貝特哈寧納（Beit Hanina）讀書，距離村子大約八公里。」

>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九日，軍隊在村子的入口處設下路障，阻止女孩們步行到學校。大約三十位住在村裡、但就讀於東耶路撒冷和拉馬拉的不同學校的高中生，無法去上學。村裡大約有七十位三到四歲的孩子就讀於貝特哈寧納的幼兒園，因為這個路障的設立，這些孩子無法上學。有些男校的老師住在拉馬拉，這些老師們每天早晨都被擋在通往耶路撒冷—拉馬拉的道路上，所以每天學校都會延遲開始。[13]

封鎖也對巴勒斯坦經濟造成劇烈影響。在開始的兩個月中，加薩走廊主要的購買力來自聯合國

救濟工程局、巴勒斯坦佔領地內的聯合國軍隊、巴勒斯坦雇主和市民行政雇員們。這些人的薪資總額是每月五百萬美元，相較於正常情況下，巴勒斯坦工人的每月薪資總額一千九百萬美元，實是天壤之別，這十三萬名巴勒斯坦勞工現在卻被阻擋在外，無法進入以色列工作。使情況更雪上加霜的是，加薩為以色列衣料工廠工作的小型承包商被迫停止生產，因為封鎖使他們無法向以色列購買原料。以色列人的手段使佔領地狀況極為慘烈，除了生活必需品外，食物的購買總額大幅下滑百分之五十到七十；而衣服等物件的購買率更下滑了幾乎百分之九十。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經濟困境：到五月底時，加薩的柑橘產區原本是加薩走廊經濟中，僅次於以色列薪資的重要收入來源，卻因封鎖造成的運輸延誤而受到重創。雖然軍隊發給許可證以出口到約旦，但是這些許可證的有效期僅一週，阿倫比橋的安檢以及西岸與約旦的過境程序卻曠日費時，往往超過許可證的有效期。載運加薩農產品的卡車在西岸被阻攔下來，無法過境到約旦，他們載滿水果和蔬菜的車輛被軍隊拘留，任其蔬果腐壞；五月快結束的時候，約有一百輛卡車被拘留，占了所有巴勒斯坦車輛的百分之二十五，造成了介於兩萬五千到三萬噸的瓦倫西亞橙（Valencia oranges）無人採收，在加薩的樹上任其腐爛。

因為，以色列人強硬地反對巴勒斯坦工人回到以色列工作，且了解到失業會醞釀對佔領的不滿，於是他們試著在加薩走廊製造工作機會。軍政府開始雇用巴勒斯坦人清掃街道和沙灘、繪製路標、粉刷和挖掘溝渠；截至一九九三年七月，在加薩約有八千五百名工人，而在西岸約有七千五百名工人，受雇擔任清道夫和油漆工，每日薪資為九塊美金，大約是他們在以色列工作的一半薪水，

且一次往往不會受雇超過十五天。

同時，軍隊利用封鎖的機會，加強搜捕通緝者，在搜捕過程中對巴勒斯坦人極盡殘酷之能事。下面是一位三十五歲的巴勒斯坦人巴希爾・易卜拉因・阿卜杜拉・朗提希（Bashir Ibrahim Abdallah Rantisi）的證言，他的兄弟納比爾（Nabil）曾被國安軍隊通緝：

> 一九九三年四月六日凌晨三點半，士兵們敲著房子的大門。我起床開門。士兵們進來後，問我納比爾在哪。我說他不在家。他們問他的房間在哪裡，我帶他們進去。房間的門沒有鎖，但是他們用槍打壞了它……士兵們四散查看所有房間，開始翻箱倒櫃，把食物全部攪混在一起。我的弟弟阿布德・哈林（'Abd al-Halim）在搜索的過程中被毆打。士兵們給他一根湯匙，命令他挖掘一條一點五公尺深的壕溝。士兵們把三包糖撒在地上，一位軍人用手掬取一些糖粉，將它撒在紡織機上。其中一位軍人爬到屋頂上，那裡有一個小雞窩，裡面還有幾隻雞。他從雞窩中拿了一些蛋，跑到納比爾的房間，開始拿雞蛋朝著牆壁丟。這位軍人把一顆蛋打在杯子裡，混入剛剛從廚房拿的碎乾小麥攪拌，然後打開縫紉機的蓋子，將這混合液倒入機器中。三小時後，這些軍人離開。他們沒收了兩把我們用來切肉的斧頭，並且把我的弟弟阿布德・哈林帶走了……[14]

這所謂的「三月封鎖」事件成了佔領期間巴勒斯坦人最身心受創的時期之一。

回到談判桌

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的哈瑪斯驅離危機後，華盛頓會談於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首度重新召開，這已是第九輪的會議了。三天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奧斯陸見面，但現在巴解組織的奧斯陸小組要求以色列提高對話層級。因為奧斯陸會談從開始到現在已超過三個月，阿布・阿拉和他在突尼斯的上司仍然不確定，希斯費爾德教授和他的助手蓬達克是否能夠正式代表以色列，或者只是故弄玄虛，在演他們自己的獨腳戲而已。

在以色列，外交部長佩雷斯與總理討論了巴解組織的要求，他們同意派出一位高階公務員、外交部總幹事烏里・薩維爾（Uri Savir）參與會談，這表示現在奧斯陸管道已經從學術活動進入了官方層面，雖然仍是秘密，但以色列政府和巴解組織（以色列人尚未正式認同他們作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皆參與其中。很快地，總理增派了一位名叫尤埃爾・辛格（Yoel Singer）的律師到以色列的奧斯陸小組，他自己也插手安排會談，每週五下午與奧斯陸小組召開會議。以色列情報單位莫薩德也開始參與其中，提供總理自巴解組織突尼斯總部領導核心取得的重要資訊。莫薩德利用它的其中一位情報人員，巴勒斯坦人阿德南・亞辛（Adnan Yassin），設法在阿拉法特的副手阿布・馬贊（Abu Mazen）的辦公室中搬入藏有麥克風的沙發和桌燈，他和阿拉法特都在監看奧斯陸會談。握有這樣重要的情報，拉賓得以指揮他的奧斯陸協商者，讓他們洞燭先機，知道巴勒斯坦協商者在奧斯陸會談中會怎麼做。[15]

到了八月初，一張同意書的草稿已經擬好，且耶路撒冷的拉賓和突尼斯的巴解組織領袖阿拉法特都接受，但是仍有些障礙有待以色列和突尼斯的高層裁決。下一個重要時刻發生在八月中。

交易達成

希蒙．佩雷斯事先去了一趟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他要奧斯陸小組的律師辛格加入他的瑞典之行，一起為遊戲畫下休止符。佩雷斯從斯德哥爾摩打電話給挪威的中間協調者特傑．羅德—拉森，請他與挪威外交首長約翰．霍斯特（Johan Holst）到斯德哥爾摩來，霍斯特也涉入秘密協商甚深。佩雷斯自己不願意與阿拉法特說話，因為萬一協商失敗，他不至於需要犧牲以色列，因此他請霍斯特當他的發言人。阿拉法特與他的團隊在突尼斯上線，佩雷斯、一位助手和辛格在斯德哥爾摩，他們都蓄勢待發，準備開始商討最後的這些曾經阻礙以巴協議簽署的關鍵議題。其中包括以色列人根本不願在文件中提起的敏感議題，例如耶路撒冷的命運、難民、國界、屯墾區等等，而巴勒斯坦人卻堅持這些議題必須被書寫下來，並且正式地面對與處理。

當天深夜，他們開始電話協商；霍斯特向突尼斯傳達以方的回應，然後他們在斯德哥爾摩等待，巴勒斯坦人將在傳達阿拉法特和其他人之後回電。這奧斯陸秘密通路的高潮是一次痛苦的妥協。以色列最終答應在書面文字中述及敏感的耶路撒冷、難民與屯墾區議題，只要阿拉法特同意將這些議題延後到未來的協商中討論，而非因此完全癱瘓整個協商過程。他的考量是：物換星移後，若大部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情況都得到顯著改善，關係就會好轉，懷疑也會冰釋，這個棘手的問題會變得較易解決——然而，事後看來，事情並沒有如此發展。協商者現在面臨的另一個顛躓難行的部分，是從埃及到加薩走廊、以及從約旦到耶律哥的邊境控制；以色列試圖完全控制這些應歸巴勒斯坦管轄的關口，以確保沒有武器和不速之客入境。然而，邊境控管是主權的象徵，巴勒斯坦人不會對此讓步。最後，他們在一模糊方案中達到共識，最後協議雙方必須合作處理通行問題；其餘未解決的議題也比照辦理。

但是為何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奧斯陸可以成功，在華盛頓卻破局呢？其中一個原因是，阿拉法特害怕巴勒斯坦當地代表可能繞過他這位巴勒斯坦領袖，在華盛頓與以色列人達成某些協議。另一個原因則是，這次雙方秘密進行協商，而非在眾目睽睽下展示搬演；法國外交官朱勒．康鵬（Jules Cambon）觀察到，若機密性不再，任何協商都將變得不可能，這個判斷果然正確。

現在最需要的，毋寧是以色列政府與巴解組織間彼此正式承認對方；以色列仍然將巴解組織視為恐怖組織，至此都不願正式與之對談。九月九日，雙方終於達成共識，阿拉法特去函拉賓，確認巴解組織承認以色列政府，並將致力於達成和平協議，放棄恐怖主義等暴力行為。阿拉法特也證實那些巴勒斯坦盟約中否決以色列存在權的條款不再具有效力。以色列總理回信說道：「主席先生，鑑於您信中述及的巴解組織的決心，我寫這封信向您確認以色列政府決定承認巴解組織為巴勒斯坦人民代表，並且將開始在中東和平進程中，與巴解組織進行協商。」[16]職此，以色列政府和巴解組

織得以公開簽訂《奧斯陸協議》。然而，他們不在小小的挪威而在華府做這件事，好讓世界強權為這個時刻剪綵。

握手

九月十三日在華盛頓舉行簽約儀式的當天，雙方聚集在白宮的藍廳。在筆者的訪談中，美國國務卿華倫・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回顧當天情境：

> 我看著雙方……阿拉法特和拉賓似乎在大廳中迴旋著，以避免正面接觸彼此，他們的關係是如此緊張……我恐怕儀式開始時，他們不會握手言歡，而總統也同樣擔心著。終於，我鼓起勇氣走向拉賓總理，我說道：「總理，你知道，當我們離開這片草坪時，你被期待著要與他面對面，並且向他問好。」他粗聲粗氣地說，「我會在必要的時候做正確的事……」[17]

在白宮的草坪上，觀眾在艷陽下等待著。幕後，阿拉法特和拉賓仍然各據一方。但是在儀式即將開始時，他們靠近了彼此，與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一起走過草坪，以進行這歷史性的簽署儀式。外交部長佩雷斯，以及巴勒斯坦代表阿布・馬贊，簽下了這份協議，然後，拉賓在柯林頓總統右方，阿拉法特在總統左方，阿拉法特率先跨出了第一步，將手伸向拉賓。柯林頓總統則將手放在拉賓背上，溫和地鼓勵總理靠近一些與阿拉法特握手。幾年後，作者訪問到這位外交部長，他憶及拉賓當天的情緒：

> 拉賓不願意握阿拉法特的手，這很可怕。全世界眾目睽睽，都可以從拉賓的身體語言看出他不願正視阿拉法特。儘管如此，拉賓總算與阿拉法特握手了，阿拉法特是這種事情的專家，他隨即握住了這隻手。在他與拉賓握完手後，阿拉法特走向我，拉賓在我耳邊說道：「現在輪到你了。」他已經在地獄走過一遭了；現在輪到我了。[18]

在華盛頓簽署的這份「原則聲明」其重要性不可小覷，因它為以巴衝突開啟了一個全新的、解決問題的切入點。過去人們認為約旦可為巴勒斯坦事務負責，如今約旦人已經不在選項內；一九七七到一九七九年與埃及的協商中，梅納赫姆・比金總理所提議的巴勒斯坦自治想法已不復可能，比金自己事後也放棄了此提案。現在發展的方向是巴勒斯坦人一直渴望、但長久以來都為以色列人所拒斥的兩國方案。然而，在華府所簽署的文件中，確實未提及「巴勒斯坦國家」一詞，這後來導致某些疑慮，以色列希望能藉此**改造**佔領體制，而非結束它；這僅是在有限的自治形式下，給巴勒斯坦人一些蠅頭小利，而非給予他們完全的獨立。的確，即將到來的協商將加劇這些疑慮，它將著眼於把在華盛頓簽署的文件變成行動計畫，以色列人會堅持不允許任何獨立的象徵被引進巴勒斯坦人之中：阿拉法特不會被稱作總統，而是「雷斯」（Rais，意指首領），巴勒斯坦行政體系則被稱為「巴

勒斯坦權力機構」（Palestinian Authority，簡稱PA）而非「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National* Palestinian Authority），而巴勒斯坦人所管轄的領土不會有自己的國際電話國碼。但是，如同約拉姆．梅特爾（Yoram Meital）正確觀察到的：「多數觀察者一致同意，雙方事實上已經為兩國方案的藍圖做出了擔保（endorse）……不再有單純的自治了。」[19]然而不可忽略的是，這個協議的雙方是不對等的：一方是強權以色列——不論軍事或其他——而另一方則是相對弱勢的巴勒斯坦群體。這權力的不對等讓以色列在奧斯陸擁有更多討價還價的籌碼，並且在原則聲明中，載明此一不平等的讓步**時間**。因為阿拉伯人必須先採取主動回應以國需求，而他們自己最渴望的獨立、佔領的終結和難民問題的公平解決辦法，只有後來的階段才會處理，並且需要更多的協商。

在華府簽約對以色列最顯著的利益，或許在於停止巴勒斯坦起義，因為協議中有一句話，溫吞委婉地呼籲巴勒斯坦人結束暴動。對於巴勒斯坦人而言，起義是一場長期且血腥的事件，一九九一年時它早已元氣大傷，但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三年間卻仍餘波不斷。統計數字顯示，從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一顆暴動的石頭被擲出開始，到一九九三年九月協議的簽訂，象徵起義終止，這期間有超過一千名巴勒斯坦人在軍隊手下喪生，數千人受傷，一千四百七十三棟巴勒斯坦民宅被軍隊犁平。巴勒斯坦暴動是一個對以方施壓極為有效的工具，可使之妥協，但是現在，它必須停止；且由於以色列緊緊扣住那些尚未給予巴勒斯坦人民的重大承諾，巴勒斯坦人的熱度也逐漸減退。

奧斯陸之二——行動計畫

協議在華府簽署完成，但這種種努力僅僅讓這次協議變成一個架構、一份「原則聲明」。它旨在勾勒出一個基礎，讓和平協議可以在其上建立，但它本身並非和平協議，而僅是後續協商的指導原則。首先，亞西爾．阿拉法特將得到加薩走廊與耶律哥區域的統治權；接著，一個過渡性的協議將擴大把其他巴勒斯坦地區歸入他的統治之下；接下來需要兩份後續協議，以監督以色列軍隊在巴勒斯坦地區的重新部署；並且最後，協商將為以巴衝突提出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它必須解決最後的國界問題、屯墾區的安排、難民問題，以及耶路撒冷聖地的未來。

首要的協商議題是裁撤加薩走廊和耶律哥地區的軍隊，並將這兩個地區納入巴勒斯坦治下。一九九四年五月四日，以色列和巴解組織簽訂了《加薩—耶律哥協議》（詳見地圖六），將軍隊從加薩走廊的大片區域及西岸耶律哥城鎮撤出（雖然並未撤離屯墾區和軍事基地），並對阿拉法特打開巴勒斯坦大門。阿拉法特穿著他慣常的軍服、戴著阿拉伯頭巾，在數十年的流亡後，於七月一日回到加薩接管巴勒斯坦行政、領導巴勒斯坦當局，一個「似政府」（quasi-state）的組織。「現在我回到了首次得到自由的巴勒斯坦土地，」阿拉法特宣布：「你可以想像這是怎麼樣撼動著我的心、我的情緒。」

到了八月，巴勒斯坦當局已經接管了巴勒斯坦教育體制、醫療體系和社會福利機構。它開始制訂法規、發放證照、監督行政、發展觀光事業，並且開始徵收所得稅。所有公務員的薪水現在都由

巴勒斯坦當局發給，大幅減低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之間的接觸。

除了這些進步外，許多巴勒斯坦人心中一股失望之情日益萌生，他們覺得儘管軍隊從一些地方撤離了，佔領仍然持續著。而這確實不假，例如教育方面，以色列仍然對於巴勒斯坦課綱有著一定的影響力，並且得以否決某些議題，尤其在歷史與地理學科上。以巴勒斯坦法律體制而言，因為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當局僅能訂立次級法規，巴勒斯坦司法體系基本上仍然附屬於以色列。在經濟方面，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當局擁有的自治權又更加有限，雖然一九九四年四月，以色列和巴解組織簽訂了《經濟關係巴黎協定書》（Paris Protocol on Economic Relations），雙方分別代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當局，兩者看似站在平等的立場，然而在執行時，卻顯示出在佔領之下的更多不對等關係。因此雖然一九九四年似乎是巴勒斯坦歷史的關鍵期，因為他們開始自治了，但是實際上其自治卻處處受限，侷限在非常狹小的地理區——加薩走廊和耶律哥的某些區域——且即使在那些地方，以色列佔領的陰影也持續存在著。

一九九五年初，協商開始推進到以軍從西岸土地撤離的議題，這後來被稱為第二次奧斯陸會談。在這裡，任務變得更為複雜，且不若加薩走廊只有十來個猶太屯墾區，西岸有上百個屯墾區，以色列不願輕易放棄。更複雜的是，西岸有著猶太人和穆斯林都視為第二聖城的希伯崙，在那裡，眾多阿拉伯人之中住了四百位猶太人，他們是猶太屯墾者中的強硬分子，其中很多都是極端主義者。

現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協商者決定將西岸分成三個區域（詳見地圖七）。第一個區域他們稱作「A區」，約占西岸的百分之三，包含所有巴勒斯坦城市和其鄰近地區，其中完全沒有以色列屯墾區。他們決定巴勒斯坦當局可以全權掌理此區——在那裡巴勒斯坦當局得以管理當地生活的各個層面。第二種地區他們稱之為「B區」，約占西岸百分之二十五的土地，包含許多巴勒斯坦城鎮和鄉村，但是沒有以色列屯墾區；他們決定讓阿拉法特掌理此區的市政事務：教育、醫療和其他，但是國安管理將由以巴聯合執行。最後占西岸百分之七十二的「C區」，是所有建有屯墾區的地方，在那裡幾乎沒有巴勒斯坦人，故將繼續由以色列人統治。這個構想是希望隨著時間推移，愈來愈多的B區和C區將可以被轉移到巴勒斯坦治下，變成他們的巴勒斯坦國家。

九月二十八日，長達三百一十四頁的《奧斯陸第二協議》（Oslo II Agreement）於華盛頓簽訂，並且此後數月間，以色列軍隊撤離西岸的六個主要城市和上百個村莊，將之移交給巴勒斯坦管轄。

然而，軍隊離開、將管理巴勒斯坦人民的重責大任移轉給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當局時，很快便可看出，阿拉法特和他的巴府官員（主要是巴解組織中最大的巴勒斯坦政治派系——法塔運動的成員），尚未準備好接管統治，他們沒有穩固的制度以維護當時已經落到其肩頭的巴勒斯坦人民福祉。在《鐵籠》（*The Iron Cage*）一書中，巴勒斯坦學者拉旭德・卡利迪（Rashid Khalidi）觀察到：「事情如此發展並不令人驚訝：幾乎所有巴解組織的領導者，從阿拉法特以降，整個生涯都處在機密的地下解放運動氛圍中，顯然不適合建國任務、透明管理，或者以法制為基礎的穩定統治架

構。」[20]

還有一件事，將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領導者的注意力，從眼前的首要任務中轉移開來，那就是日益膨脹的猜忌，他們懷疑自己掉入以色列人的陷阱，以色列根本不想從餘下的佔領地（主要是B區和C區）完全撤離。他們的懷疑是有道理的，因為以色列人雖然撤離了一些地方的駐軍，但他們繼續興建道路，讓猶太屯墾者得以避開巴勒斯坦當局統治區，在屯墾區間自由往來移動。這反而導致了當地屯墾者人數大幅攀升，由於如今不需要經過巴勒斯坦人口集中的地區，他們覺得比過去更安全，因此許多人加入了屯墾的行列，使這時期的屯墾區大幅擴張。且由於需要更多土地建立屯墾區以容納新來者，也需要土地興建新的道路系統（專程為猶太屯墾者所設計的，巴勒斯坦人被圍籬區隔在外），他們從巴勒斯坦人那裡徵收了土地。因此，在厚實的新道路系統和許多新的屯墾區、屯墾者環繞之下，巴勒斯坦人、尤其是西岸人，愈來愈覺得他們活在彼此隔絕的小區塊中，而佔領非但沒有結束，反而更加穩固。

和平之歌

十一月四日，拉賓參加了特拉維夫的一場支持和平進程的集會。當晚參加的還有右派宗教狂熱分子伊加爾·阿米爾（Yigal Amir），他憤斥拉賓給予巴勒斯坦人的讓步與撤軍。阿米爾帶著槍，這在以色列並不稀奇。下面是在作者的BBC電視節目《五十年戰爭》（*The Fifty Years War*）的訪談

中，佩雷斯所詳述的此一戲劇性事件的發生經過：

當我們抵達集會現場，伊札克〔拉賓〕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一場規模很大的集會，有上萬人參與。他喜出望外。我這一生中從未看過他如此高興。我們認識已經超過五十年，他從未擁抱過我。在那場集會中，他有生以來首次擁抱我。我從未聽他唱過歌。但是在這場集會中，他站起來唱歌……伊札克拿到一張寫著「和平之歌」歌詞的傳單。我們唱完歌後，他將這張紙摺起來，放到他的夾克口袋……這場集會結束時……我們互道再見。我開始走下樓梯，我的車停在較伊札克的車稍微前面的地方……我坐進我的車，關上門，這時突然聽到三聲槍響。「停車！」我向我的司機說。我想要下車。但是我的保全說：「千萬不可。」他們打響警鈴，然後急速開走。我們那時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伊札克被帶到醫院，我要求司機立刻帶我過去。醫院的負責人走向我，告訴我伊札克死了。

在劇慟之下，佩雷斯走到那間病房：

伊札克躺在床上，他的身體肩膀以下都覆蓋著被單。他的表情平靜，還有一抹諷刺般的微笑，很奇特的笑。我親吻他的額頭說：「永別了。」[21]

刺殺總理事件並沒有扼殺以巴和平進程，但它的確使之大大減緩，劫掠了許多它的生命力與能量。一如所示，拉賓並非奧斯陸和平進程的原創者，因為那些首度發起協商的人，是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的，更遑論得到他的首肯了。但是拉賓最後確認奧斯陸和平協議比停滯不前的華盛頓會談更有潛力後，便接手並且開始主導它。畢竟，他是大部分以色列人所信任的領導者，同時兼顧和平與國家安全；而今他的逝世必然造成一片難以填補的空白。

9 錯失良機（一九九五～一九九九）

拉賓死後，由他的勞工黨同袍佩雷斯短暫接任，但因為佩雷斯堅持要得到人民的直接授命，而非只被視為拉賓的繼任者，因此他提議重新選舉。這是一個高風險的策略，尤其佩雷斯敗選經驗豐富——事實上，他一生中從未贏過任何一場全國性的選舉。現在，即使因拉賓之死全國的悼亡情緒達到高峰，佩雷斯依舊再度落選，輸給了由本雅明．納坦尼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所領導的右翼利庫德集團。

年方四十六的納坦尼雅胡，暱稱「比比」（Bibi），能言善道且言談得體。他是建國後第一位在以色列出生的以色列總理，但是他在美國待過數年，其父班．錫安．納坦尼雅胡（Ben Zion Netanyahu）在美國的大學任教。納坦尼雅胡曾經活在其兄約納坦（Yonatan）的陰影下，約納坦在一九七六年時被殺，當時他在菁英部隊總參謀部偵搜隊（Sayeret Matkal）擔任指揮官，執行搶救人質的任務（「恩德培行動」〔Operation Entebbe〕），有次巴勒斯坦人劫持一架飛往烏干達的班機，他

的部隊救援了超過一百位人質。雖然本雅明・納坦尼雅胡自己並非戰爭英雄，但他確實參與了一九六七與一九七三年的戰爭，在戰線後方的小規模行動中擔任司令官。他嶄露頭角的領域是外交；他擔任過許多外交職務，並於一九八四到一九八八年間，在聯合國逐漸因口若懸河而聞名。

如今身為新的以色列總理，納坦尼雅胡身邊圍繞著強硬的利庫德集團首長，例如艾里爾・夏隆和前總理梅納赫姆・比金之子本雅明・比金（Benjamin Begin）。雖然納坦尼雅胡知道他必須繼續執行奧斯陸和平協議，並且尊重他的前任所許下的承諾，但他的作風慳吝。不僅因為他承繼了他自己強烈反對卻非配合不可的和平協議，且他對阿拉法特極其輕蔑卻必須竭力遮掩。更甚者，雖然在競選勝利後，納坦尼雅胡致電了埃及總統〔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約旦國王胡笙和其他世界領袖，並與之交談，但是他怎麼樣也無法致電給阿拉法特。

聯合國使節特傑・羅德—拉森，一直以來都在奧斯陸和平協議的推展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現在開始在幕後工作，以期撮合納坦尼雅胡與阿拉法特。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六日，他面見了這位總理，告訴他「〔阿拉法特〕很渴望與您見面……」。[1]雖然納坦尼雅胡百般不願，但他知道這無可避免；畢竟，以色列已經正式承認巴解組織為巴勒斯坦人民的法定代表，且阿拉法特現在已是統治以色列撤離區的巴勒斯坦當局的主政者了。

一九九六年九月四日，兩位領導人終於在艾瑞茲——以色列與加薩走廊交界處會面。這是文明事務（civilized affair），拍照機會大過嚴肅實質的討論，但是表面上風平浪靜。

隧道之亂

然而很快地，地獄之門大開了。九月二十四日，納坦尼雅胡首肯開鑿古赫羅狄安（Herodian）隧道，隧道位於耶路撒冷舊城地下，是極為敏感之處，開鑿工程將從鄰近聖殿山（阿拉伯文哈拉姆謝里夫〔Haram al-Sharif〕）的西城廣場開始。歷年來，以色列都關閉著隧道北方接近維亞多勒羅沙（Via Dolorosa）的入口，以避免激怒阿拉伯人，他們對於以色列任何改變耶路撒冷現狀的嘗試都充滿猜忌，或甚至在聖殿山下方開挖，都擔心這是為了塌陷其上的清真寺和神殿。然而，因為它只有一個入口，這意味著進來隧道的訪客都必須按照原路回去，與相反方向的人潮推擠；開啟北方位於維亞多勒羅沙的出口能夠減輕堵塞，訪客得以由隧道的南方進入，走完全程再從路的盡頭出去，不需走回頭路。然而，透過開放位於舊城穆斯林區的維亞多勒羅沙出入口，納坦尼雅胡也說明了以色列對耶路撒冷的政治主張，表達了如他所說的「我們對耶路撒冷的主權」。[2]

巴勒斯坦人清楚地接收到這個訊息。阿拉法特發動了大眾遊行和全面罷工以反對此舉，聲稱開啟這個出入口是對「我們的宗教與聖地犯下不可饒恕之罪」。[3]出入口開放不久，巴勒斯坦民兵與以色列警察立刻因此發生了械鬥，其中傷亡人數之巨令人震驚：七十九位巴勒斯坦人與十五位以色列人被殺，數百位受傷送醫；這是一九六七年東耶路撒冷被以色列佔領以來，同規模的械鬥中最嚴重的毀滅性事件。總理當時正在歐洲旅行，他縮短了旅程，趕忙回國處理危機。他在一次的訪談中告訴筆者，他在機場致電阿拉法特，警告他若巴勒斯坦領導者無能綏馭街頭、阻止巴勒斯坦暴民，

那麼以色列將會「出動坦克車」攻擊暴動者。[4]納坦尼雅胡要阿拉法特捻熄巴勒斯坦暴亂，但暴亂的禍端卻是納坦尼雅胡自己挑起的；無怪乎阿拉法特不願合作。

同時間在華盛頓，比爾・柯林頓總統為和平進程中這不期然的脫軌事件深感困擾。他敦促總理再次三思干涉隧道一事，並且召請他和阿拉法特到白宮討論危機的解決之道。在與國務卿華倫・克里斯多福的一場會議前行中，納坦尼雅胡堅持不關閉隧道；他認為若非如此，「阿拉法特會斷定只要他對以色列的舉動有所不滿，採取暴力就能見效……」[5]後來，柯林頓讓兩位領導人在華府地圖室聚首，經過一場白熱化的辯論後，妥協的曙光出現了：雖然納坦尼雅胡不願改變耶路撒冷的情況，但是他會間接補償阿拉法特，保證會在希伯崙的城鎮策動新的協商，這是前任以色列政府的未竟之業。

分裂中的希伯崙

如同我們所見的，古老的希伯崙是傳說中聖經長老亞伯拉罕的出生地，是猶太人與穆斯林的聖城。雖然一九二九到一九六七年之間，只有寥寥數位猶太人住在希伯崙，但是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從約旦手中取得這塊土地後，猶太屯墾者開始逐漸滲透其中心，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在十五萬巴勒斯坦人環伺下，猶太社群已成長到約四百五十人。希伯崙的猶太屯墾者持有軍隊配給的槍枝，長期以來都是所有屯墾社群中最激進、暴力且剽悍的一群。他們慣於虐待城中的巴勒斯坦居民，對之拳腳

相向、投擲垃圾、毀壞其商店、砍下他們的橄欖樹、在井中下毒、闖入其居所，甚至殺人。這些人得以橫行霸道，不僅因為他們手持槍械，也因為有軍隊為之撐腰，當他們的挑釁使民怨沸騰時，軍隊往往透過將阿拉伯人關在他們的家屋中，對之實施宵禁來壓制。

他們對於巴勒斯坦人赤裸裸的敵意，在一九九四年二月達到了血淋淋的高潮。一位猶太屯墾者巴魯克・戈德斯坦（Baruch Goldstein）醫生，穿著軍隊制服，帶著槍和手榴彈，在週五晨禱時闖入易卜拉希米清真寺。年僅三十一的朱懷葉德・哈桑・賈巴里（Juwayyed Hasan el Jabari）當天也在現場，他回憶：「晨禱開始後幾秒鐘，我聽到了一聲〔手榴彈爆炸的〕巨響，繼之而起的是如雨的槍聲……」[6]戈德斯坦開槍戕害了二十九位在祈禱的穆斯林，傷及一百二十五人。巴勒斯坦人尼達爾・馬拉卡（Nidal Maraca）當時才十五歲，他、父母和兄弟都在清真寺中，他回憶道：「當我聽到槍聲，我很害怕，趴到地上去。我四處張望，看到我的弟弟奇法赫（Kifah）〔當時十一歲〕流著血。他身中數槍，包括頭和其他地方……我父親中槍的地方也流〔著〕血……在鞋櫃附近，我看見了我的同學賈布爾・阿布・哈底德（Jabr Abu Hadeed）……扶著他的腰……正慢慢倒向地面……後來我知道我的弟弟死了……隔天我才知道賈布爾也死了……」[7]最後，清真寺的巴勒斯坦人們戰勝戈德斯坦，在他為其來福槍重新上膛時，他們用金屬製的長棍和滅火器打死了他。這件事，後來被稱作「希伯崙屠殺」（Hebron massacre），對希伯崙的屯墾者和巴勒斯坦人之間原本就非常緊繃的關係，造成了深遠的負面影響。

《奧斯陸第二協議》於希伯崙屠殺後一年簽訂，其中對希伯崙訂有特別條款：因希伯崙被歸入

西岸與加薩走廊軍隊重新部署的一部分，以軍必須撤離希伯崙；其中第七條的「希伯崙指導方針」中特別載明此事。在「希伯崙指導方針」的第一款B項中還表達了清楚的時程，載明必須在簽訂《奧斯陸第二協議》後六個月內完成希伯崙的重新部署。然而，如同以巴協議一貫的模式，軍隊並沒有如預期按時撤離；拉賓對這燙手山芋一直頗為疲厭，而他的繼任者佩雷斯試著將這件事延遲到下一次普選之後。事實上，佩雷斯將這顆球丟給了阿拉法特，要求阿拉法特履行承諾，先刪去巴勒斯坦盟約中的反以言辭，以色列才著手處理希伯崙問題。[8]因此納坦尼雅胡上任時，希伯崙之事仍然懸而未決，由於開放耶路撒冷隧道造成了大規模流血事件，他給了阿拉法特機會重啟這個未竟之業。

強硬的協商接踵而至，最後於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七日制定出了《希伯崙議定書》（The Hebron Protocol），或稱《希伯崙重新部署議定書》（The Protocol Concerning the Redeployment in Hebron）。它列出雙方同意的軍事裁撤安排，讓軍隊從希伯崙百分之八十的地區撤離，並清楚載明在簽訂議定書後十天內必須完成撤離。在原本的《奧斯陸第二協議》第十二款中敘明希伯崙會持續城市分裂的狀態，但是新的《希伯崙議定書》有效地撤銷了這個決議，並劃分了城鎮。於是出現了兩個區域：在H-1區絕大部分都是巴勒斯坦人，他們的警察會負責維護內部安全和公共秩序；而在H-2區的一個較小的轄區中，以色列仍然維持著安全管制，這包括了位於希伯崙市區中被巴勒斯坦領土包圍的數個猶太屯墾區，和希伯崙外緣的阿爾巴鎮（Kiryat Arba）屯墾區，而屯墾區周圍必須允許屯墾者和軍隊自由通行；這些地區約有兩萬名巴勒斯坦人。議定書中還寫明了在特別敏感的地帶（例如

H-1區內的四個猶太聖地），以巴聯合巡邏車隊該如何運作，並且明訂巴勒斯坦警察的數量和他們應持的武器種類。

在這些協商中，阿拉法特堅持議定書的執行，必須要有國際組織在希伯崙監督——此要求大有道理。如前所述，不僅希伯崙屯墾者對其敵人的行為惡名昭彰，且戈德斯坦一九九四年屠殺巴勒斯坦人一事種下了不信任的種子，因此現在阿拉法特想要確保獨立組織能夠監督希伯崙殘暴的屯墾者，他不寄望於以軍，因為它過去未能保護巴勒斯坦人民。

因美國壓力芒刺在背，納坦尼雅胡沒得選擇，只能同意外國監督，《希伯崙城臨時國際參與協定》（Agreement on the 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resence in the City of Hebron，簡稱TIPH）於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簽訂。它授權一百八十位挪威、義大利、丹麥、瑞典、瑞士和土耳其觀察者到希伯崙監督，並報告此地是否得以維持正常生活。

《希伯崙議定書》意義重大，因為它顯示了，雖然利庫德集團自一九九三年以來對以巴協商都採取強硬的反對立場，但在其執政期間雖不甘願卻仍執行了，有效地承認了過去勞工黨以土地換取和平的理念。事實上，希伯崙協議是利庫德集團在被佔領的西岸第一次做出的土地讓步。它將過去的爭論拋諸腦後，並且承認《奧斯陸協議》的既存事實。

然而當世界上各個城市，從柏林到尼古西亞（Nicosia）都在致力於消弭分裂與撤除分隔線的同時，一個新的分裂卻正在希伯崙被建立起來，將這座城市變成了持續不斷的以巴衝突的縮影。

霍馬山

那些期待納坦尼雅胡會在希伯崙協議後打鐵趁熱，繼續推動和平進程、結束佔領，並與巴勒斯坦人達成和平協議的人，很快就希望破滅了。如同一位外交官曾經觀察到的，納坦尼雅胡經常像是一個醉漢，從一個電線杆蹣跚地走到另一個電線杆，如今下一個電線杆輪到了霍馬山（Har Homa）。這是阿拉伯屬東耶路撒冷西南邊境的一個小地方，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納坦尼雅胡同意在從巴勒斯坦人手中徵收的土地上建立六千五百棟猶太住宅。[9]他試圖在東耶路撒冷周邊建立一個大的環狀猶太屯墾區，使之有效地與西岸劃清界線——霍馬山會阻斷通往伯利恆和貝特薩霍（Beit Sahour）以南的路。

不意外地，這些新的屯墾區在巴勒斯坦人之間引起了躁動，暴動事件很快便接二連三地爆發。一個月後當阿拉法特再訪白宮時，納坦尼雅胡的霍馬山方案是他的首要議程，他促請柯林頓總統要求總理延緩執行這極具爭議的計畫，但卻屢試徒勞。無論如何納坦尼雅胡還是將之付諸實行，而華府只派遣了美國大使馬丁・印狄克（Martin Indyk）到以色列傳訊給總理，表達美國將新建立的社區視為「破壞我們所有努力之舉」。[10]

約旦國王胡笙對於納坦尼雅胡的作法——持續地建立屯墾區、普遍的暴力和對巴勒斯坦人缺乏尊重——尤其憤怒。我們應該記得，一九九四年十月約旦與以色列簽訂了一份和平協議，迎接和平新世紀的到來，而這至少有一部分是因預期巴勒斯坦人的奧斯陸和平進程會日新月異地開展下去。

當時，在一善意的象徵姿態中，國王的和平協議對象拉賓允許胡笙——一位業餘的飛行員——駕駛他自己的飛機到以色列，這架飛機後來被稱為「第一班和平飛機」；在國王的班機進入以色列領空時，拉賓甚至派遣噴射機護送。然而現在以巴關係盪到谷底，國王坐下來寫了一封信給納坦尼雅胡「在未知面前……為了後代子孫」。[11]下面是這封令人嘆為觀止的信件：

安曼，一九九七年三月九日

總理：

您作為以色列政府領導人，發起這接二連三的悲劇行動，我為此感到心如刀割，和平——我生命中最值得追求的理想——變得愈來愈像遙遠而稍縱即逝的海市蜃樓。如果所有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生命以及他們的未來，並未因為絕望和恐懼而被快速捲入血腥與災難的深淵，我可以繼續漠不關心。坦白說，我無法接受您反覆藉口因承受沉重壓力與脅迫而不得不然。我無法相信以色列人冀求血腥與災難，反對和平。我也不相信以色列史上最握有實權的總理，會不依憑他自己全然的信念做事。我漸漸明白最令人難過的事實是，您並沒有與我並肩去實現上帝的意志，使所有亞伯拉罕的子孫握手言和。您的所作所為似乎正在摧毀我所相信的一切，或說哈希米特家族從費薩爾一世（Faisal the First）和阿卜杜拉王直到如今一直致力實現的一切。您無法向我保證您不會再核准任何屯墾區的建立，您也無法告訴我，您決定建造的兩條道路是為了幫助所有相關的人（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一視同仁），然後就此改變作風……

總理先生，如果這是您的意思，要操縱巴勒斯坦人民使之破釜沉舟地使用暴力抵抗，然後命令您的推土機開入預定的〔霍馬山〕屯墾區，明知需要顧及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敏感、憤怒和絕望的境況，卻冷眼視之……〔或〕命令您的年輕以色列軍隊包圍阿拉伯城鎮，戲謔般地犯下謀殺和傷害罪，導致新一波不幸的巴勒斯坦人民離開他們祖先的家園，並且將和平進程永遠埋葬……為什麼要這樣持續且蓄意地羞辱您口中的巴勒斯坦同胞？為什麼巴勒斯坦人仍然信誓旦旦地說道，他們的農產品在出口和運入以色列時仍因等待過久而腐爛？為什麼明知若加薩口岸的工程不能在這個月底前得到授權，工程就必須再延遲一年，卻仍使之延宕？最後，關於我們都數度談論過的加薩機場，應該正視巴勒斯坦的需求，使之擁有自己的領導人以及往來世界各地的通行自由，而非如現在寸步難行，需要經由其他國家的領地才能進出。我曾經於事前請求許可，望如期搭乘約旦國家三星客機到加薩的巴勒斯坦機場面見阿拉法特總統……乘坐一架固定機翼飛機飛行，卻遭到您的拒絕，只因為您手邊有更重要的事。

我曾希望這次能得到您的正面回應。我相信這可以大大改善氣氛，然而，唉，事實並非如此。儘管如此，現在我該起飛前往加薩了，身為一個擁有完全權力的朋友，您是否會命令您的以色列空軍駕駛來脅迫、阻止我降落，或者做出更嚴重的事？這些人曾經駕駛著相同的飛行器護送過我飛經以色列，這些飛機後來還被稱為第一班和平飛機——這似乎是很久遠以前的事了。如果這次我不計畫攜客回國，您永遠不會知道您曾經多麼接近要做出那樣的決定。我感覺到有股意圖要毀滅所有我努力要在我們的國家與人民間建立的一切，在這混亂且令人眩惑的氛圍中，

我怎麼還能夠與您並肩合作，將您視為真正的朋友？對於實際事件的固執也許另當別論，但是我想，這只是為了固執而固執吧。在所有事件中，我發現您有您自己的邏輯，不需要朋友的任何建議。

我必須寫這樣個人的訊息給您，為此我深感遺憾，但是未來茫茫，憂心後代子孫，我的責任感和關切使我不得不然。

真誠的〔胡笙國王的簽名〕

這封感人肺腑的信顯示國王對納坦尼雅胡失望透頂，或許國王也著眼於未來，希望歷史學家會公開這封信，如同許多人已經做的，向世人昭示，約旦國王已為幫助巴勒斯坦人民竭盡一己之力。

每下愈況

一九九七年七月，柯林頓總統決定，如果他無法制止納坦尼雅胡繼續建造屯墾區，或制止阿拉法特四兩撥千斤的習性，使他遵守先前停止攻擊挑釁以色列人的承諾，那麼整個奧斯陸協商就要宣告放棄。他派遣他的中東特使丹尼斯．羅斯（Dennis Ross），帶著義正辭嚴的私人信函到以色列交給總理，催促他重啟中斷的協商進程。柯林頓表示羅斯的以色列之行極為低調，並強調他認為這是格外危險的時機。

此信言談有禮，但也代表了美國再度主動發球，羅斯繼而向納坦尼雅胡呈報其方案。他主張以色列凍結霍馬山和其他新屯墾區的建立，因為這對巴勒斯坦人而言，就如同公牛前的一塊紅布，但以國將可繼續擴張現存的屯墾區；以色列重新與巴勒斯坦人締結國安合作，從西岸撤離更多軍隊，如同雙方簽訂的《奧斯陸第二協議》所言。巴勒斯坦方面，則需要加強其安全表現，停止攻擊以色列或發動類似的攻擊。

納坦尼雅胡拒絕了柯林頓的提議，因為他覺得他要做出的讓步比阿拉法特多。他將羅斯遣回華府，並讓他捎訊息給總統，表示以色列不會接受美國的新方案，但是，「如果您想要的話，我們可進一步討論。」[12]於是納坦尼雅胡派遣他的國務秘書丹．納威赫（Dan Naveh）到華盛頓，與丹尼斯．羅斯進一步討論此提案，但是此舉為時太晚也太微不足道。由於對以色列的陰謀深惡痛絕，特別是持續不斷併吞巴勒斯坦土地建造屯墾區的行為，巴勒斯坦人訴諸暴力了。一九九七年七月三十日，兩個自殺式炸彈客，也是伊斯蘭主義運動者、哈瑪斯的成員，將炸彈綁在身上於耶路撒冷市中心引爆，導致十六人死亡、兩百人受傷；這是當年度第一起極具毀滅性的攻擊事件。它也扼殺了柯林頓的新方案。

現在總理與其內閣決定要擴大戰事，波及佔領地外的巴勒斯坦武裝分子，作為耶路撒冷爆炸案的反擊，他們決定由莫薩德前往暗殺在約旦的哈瑪斯政策部門領導者哈立德．馬沙爾（Khaled Mashal）。馬沙爾幾乎不被外界所知，但是情報顯示，他在佔領地的哈瑪斯活動中扮演關鍵的指揮

角色，因此對以色列而言，是合理的暗殺目標。

莫薩德的領袖達尼．亞托姆（Dany Yatom）將執行計畫交給哈因．哈肯尼（Haim Ha'Keini），他帶領組織撒利亞部門（Caesarea），在那之下就是負責執行暗殺工作的基頓（Kidon）分部。[13]

然而在安曼動手如果發生差錯，便可能破壞以約之間本已脆弱敏感的關係。這也是為什麼哈因．哈肯尼偏好「靜默」行動，這意味著暗殺小組將不使用槍或炸彈，而是使用「阿爾莫格」（Almog），這是一種致命物質的暗號，其致死率之高，只要使用幾滴在目標物的皮膚上就能殺死他。哈肯尼打的算盤是：使用毒藥暗殺，若執行成功，便不會留下任何可能使以色列被定罪的直接證據，因為這個武器在目標物上不會有立即性的顯著影響。

九月二十五日，哈肯尼的兩位殺手在安曼等待著馬沙爾抵達他的辦公室，他一出現，他們便從背後逼近他，並朝他噴灑致命藥物。他們幾乎成功了，但是馬沙爾從他的暗殺者手中脫逃出來，兩位殺手憂心忡忡；其他參與行動的莫薩德幹員則躲藏在以色列大使館中。[14]

胡笙國王怒不可遏，覺得完全被以色列背叛了。[15]讓他更為憤怒的是，他才剛剛透過在安曼的莫薩德代表，向以色列傳達了巴勒斯坦武裝陣營的提議，他們（其中也包含哈瑪斯）要與以色列簽訂一份為期三十年、被稱之為「哈德拿」（hudna）的停戰協定，並停止佔領地的所有暴力活動。國王尚未接獲任何對於提案的回應，這個在其首都發生的失敗的莫薩德計畫動搖了他的信心。[16]現在國王要求以色列立刻提供用來對付馬沙爾的毒藥的所有詳細資訊，並交出解毒劑以拯救其性命，以色列人害怕這個危機會使他們與約旦的關係變得更糟，於是答應了要求。[17]國王並且堅持以色列釋

放相當程度的巴勒斯坦政治犯，其中包括哈瑪斯的創辦和主導者謝赫・艾哈邁德・亞辛，並且將之帶到約旦；亞辛原本應可直接被送回他在加薩走廊的家，但這對於國王是一個良機，讓國王得以說是**自己**使這個男人被安全釋放。納坦尼雅胡沒得選擇，只能同意，並且進行接下來的協商。在這災難性的行動後的十二天，川流不息的直升機在以色列與約旦之間往返，其中一架載著被釋放的莫薩德任務執行者，另一架則是從以色列監獄釋放出來的謝赫・亞辛和其他二十名犯人。

馬沙爾事件對於佔領地的影響直接而顯著，被釋放的謝赫・亞辛終於如預期地回到加薩，他在數年後成為哈瑪斯反以陣營的重要焦點。至於馬沙爾，在成功地保住性命後，他回到他重要的哈瑪斯行動者的崗位上——至今仍活躍於世。[18]

以巴妙計

自從一九九三年九月第一次以巴《奧斯陸協議》簽訂後，軍隊便從西岸和加薩走廊百分之二十七的佔領地中撤退，將之移交給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當局。這些撤離的地區，主要是西岸和加薩走廊的小鎮和城市，不再有以色列軍隊在街上巡邏，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當局治理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提供教育、醫療健康、稅收等市政服務。阿拉法特希望一九九八年時，軍隊再撤離百分之十三，這被包含在後來被稱為第一次和第二次重新部署中，能讓百分之四十的巴勒斯坦土地從以色列佔領中解放，之後還有第三次進階重新部署，期間軍隊將從更多土地上撤出。但是納坦尼雅胡不願

配合重新部署，堅稱阿拉法特尚未履行過去協定中對他的要求。

同時以色列反對陣營的領導者，也是《奧斯陸協議》最初創始者之一的尤西・貝林以及其他人，都認為是他們的總理而非阿拉法特，成為現在困境的禍源，為了使納坦尼雅胡的軍隊轉而配合預定的撤軍，他們與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像是薩博・埃雷卡特（Saeb Erekat）、阿布・馬贊、哈桑・阿斯福爾（Hassan Asfour）和穆罕默德・達蘭（Mohammed Dahlan）這些阿拉法特身邊的年輕人，他們都在巴勒斯坦當局扮演一定角色。事實上，這是史無前例的情況，重要的以色列政治人物在他們的領導人背後，暗地與巴勒斯坦領導者共謀，迫使以色列總理屈服。會議在埃及駐以色列大使穆罕默德・巴西烏尼（Mohammed Bassiouni）（團體後來以此命名——「巴西烏尼論壇」）的住宅中召開，在那裡，一個說服納坦尼雅胡尊重過去協議的計畫應運而生。

貝林在一次訪談中告訴筆者：「我們常常傍晚去大使家……一起吃晚餐……然後談話。」[19]巴勒斯坦人埃雷卡特描述，這些會議如同「我和以色列反方的共謀……是我和我的以色列同情者的小集團」。在那裡，他繼續解釋道：「我們發展一些如何與納坦尼雅胡周旋的點子，然後我們與美國人聯絡，給他們一些東西。」[20]如同貝林回憶的，美國駐中東特使丹尼斯・羅斯「往往會在會議中打電話……有時候美國特使會加入這些談話。」他們將包裹準備好給美國人，然後他們就會向納坦尼雅胡和阿拉法特提出「美國建議」。這也成為稍後在馬里蘭州瓦伊河林場（Wye River Plantation）的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由柯林頓總統召開的高峰會的協商基礎。[21]

瓦伊河高峰會於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五日開始，直到十月二十三日結束，在似乎永無止境的停滯

和危機之後，納坦尼雅胡和阿拉法特雙雙簽下了《瓦伊河記錄章程》（Wye River Memorandum）。記錄章程旨在幫助過去以巴協議的實行，也就是以色列釋出更多佔領地和巴勒斯坦配合管理安全問題，在眾多事項中，記錄章程呼籲以色列向巴勒斯坦人釋出百分之十三的西岸土地。[22]納坦尼雅胡同意釋放七百五十位巴勒斯坦政治犯，給予巴勒斯坦人加薩領空和港口運作的許可證，並且建立西岸和加薩走廊之間的安全通道，讓巴勒斯坦人可以自由往來兩個巴勒斯坦區域。另一方面，阿拉法特則必須保證要採取具體措施防止對以色列的攻擊，這在《奧斯陸協議》簽署後，還三不五時發生著，他必須回收違法槍枝，並且減少六千到三萬名巴勒斯坦警力，因為其數量變得愈來愈龐大，已經超出原本的協議了。阿拉法特也必須保證會刪除巴勒斯坦盟約中有違巴解組織認同以色列人並且與之和平共存的條文，這是他過去承諾過，但是直到如今都尚未付諸實行的。[23]

納坦尼雅胡憎惡著誕生中的協議，因為他覺得被迫要給予具體的事物——土地和其他種種——他認為這只能換到阿拉法特的空言。但是總理不能直接挑戰美國的意志；因此在瓦伊河，他試圖激怒巴勒斯坦人，使之怒採強硬立場，這麼一來，他就可以不用遵照他們的要求，並且指責他們使高峰會和談失敗。瓦伊河會議中，巴勒斯坦的協談領導者埃雷卡特回憶道：「納坦尼雅胡想方設法要讓我們對提案說『不』。」[24]但是，幸好以色列反對陣營領袖們提供過建議，他們雖身在以色列，但是他們和巴勒斯坦人曾經一起構思過現在在瓦伊河討論的議題，埃雷卡特知道，只要同意所有紙上的提議，巴勒斯坦人就能贏。因為「如果〔納坦尼雅胡會〕執行〔撤軍〕，我們就走上正軌……但

如果他不這麼做，那麼他就出局了〔因為他會腹背受敵，夾在美國和以色列的許多人之間〕。所以我們處於雙贏的狀態」。

在大使巴西烏尼家所構思的計策生效了；納坦尼雅胡進退維谷，他沒有其他選擇，只得簽下《瓦伊河記錄章程》。在國內，許多他自己陣營的右派人士起身發難，因他同意釋出以色列地帶的土地，他們將之視為背叛。當他試著駁回協議以安撫支持者情緒時，以色列左派又指控他拖泥帶水。如此一來他害得自己腹背受敵，首先是由於接受了《瓦伊河記錄章程》，而對於左派來說，則是因為他試圖拖延進度；結果，他發現自己身陷政治困境之中。

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發生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四日，左派和右派聯手，在以色列國會上以壓倒性的八十一票通過自行解散，以策動新普選。因此諷刺地，瓦伊河的最大成就是導致納坦尼雅胡政府的傾滅，自從拉賓被謀殺之後，這個政府就已證明自己是和平的障礙。

10 戈蘭優先（一九九九～二〇〇〇）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七日的大選中，以埃胡德・巴拉克為首的中間偏左勞工黨，擊敗了納坦尼雅胡和他的右翼利庫德集團。巴拉克一度官拜軍隊參謀長，聰明過人，卻也不可一世，目空一切，有一點馬基維利傾向。雖然他的總理任期僅短暫的二十個月，但是事後看來，卻是促進和平、結束佔領至為重要的一頁。在巴拉克任期中，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隔閡大幅減少，且打破了對忌諱議題絕口不提的舊習。

在外交政策上，巴拉克將和平視為重要綱目，但是為此他需要柯林頓總統的支持，不僅得靠他幫忙調停以色列和其仇敵之間的關係，還得仰仗其外交與金融影響力，因為只有美國有地位幫助推動大膽的協議進程，並提供資金以誘使不同陣營妥協。

然而光陰似箭，再十八個月，柯林頓的連任任期就要結束，預計二〇〇一年一月離開白宮。巴拉克的勝選同時在華盛頓引燃期待，讓民主黨政府重新感覺到時間的緊迫性，如同巴拉克第一次以

總理身分正式到訪白宮時，總統的資深助手在簡報時所說的：「已經沒有時間進行柯林頓—巴拉克高峰會前的『相見歡』了。」簡報說道：

> 這次會晤必須有實質策略，擬妥議程和基本規則。柯林頓—巴拉克合作的第一年到二〇〇〇年夏天，未竟之事不會被達成。但第一年中完成的事將……對雙方領導人有著歷史性的意義……因此，雖然在那個與我們處處為敵的以色列總理（指納坦尼雅胡）之後，有這樣一位友善的新總理以壓倒性的勝利繼任，但仍要抗拒那種想要與他慢慢培養感情的傾向。慶祝完了之後就要公事公辦……必須鼓勵巴拉克與總統分享他的進展方向和時程。巴拉克要清楚知道須顧及哪些變因，否則麻煩浮上檯面前，他不會有所覺察。柯林頓總統則必須為巴拉克擬出一張變數清單……[1]

某位華府官員將這個簡報透露給尼姆羅德・諾維克（Nimrod Novik，曾任以色列外交官，如今則擔任巴拉克的間諜，行蹤不定），如此一來，總理便可預期面對總統時會發生什麼事。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五日兩位見面，巴拉克向柯林頓報告他的和平策略。他會暫緩與巴勒斯坦的和平會談，先與敘利亞協商；因為沒有任何以色列總理禁得起與雙方同時談和所需付出的代價。

如同他的前任——拉賓、佩雷斯和納坦尼雅胡——巴拉克認為應該優先結束戈蘭佔領、與敘利亞達成協議，因為他認為與敘利亞的衝突主要導因於戈蘭高地領土的爭執，這與複雜且歷史久遠的

以巴衝突相較，是較容易解決的。而且敘利亞對以色列的威脅較大，與巴勒斯坦人不同，它擁有自己的軍隊和遠程導彈。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的年紀與健康狀況也需要被納入考量；巴拉克上任時，阿薩德已病入膏肓，顯然離大限不遠矣，之後將有新的領導人繼位，和平協議很可能有一段時間難以推進。因此，採取先機與阿薩德談和是合理的，他擁有重大決策權，尤其是與以色列講和這樣重大的事情。總之巴拉克告訴柯林頓，他相信「敘利亞優先」策略會為整個區域帶來動能——這是巴勒斯坦優先策略所沒有的。

柯林頓大致同意巴拉克的分析，優先處理敘利亞問題，協商歸還戈蘭佔領地以換取以色列的和平與安全，暫緩與巴勒斯坦的協談。然而，他籲請總理同時給巴勒斯坦人「一些甜頭」，如此其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一旦知道巴拉克忽略與他的和平會談時，才不會試圖挑戰現狀；事實上，雖然敘利亞優先策略是合乎邏輯的，但它也必然會激怒巴勒斯坦人。

對華府而言，納坦尼雅胡「充滿敵意」，與之周旋了三年後，柯林頓總統就因巴拉克表現出重新推進和平會談的意願，而在一封信中給了他一些允諾作為獎賞。在這封秘密信函中柯林頓寫道：

> 既然以色列準備好要重新為達成中東整體和平努力，認知到以色列在朝此方向前進時可能面臨的危機，並著手處理，我向你保證：
>
> 美國對以色列國安將不遺餘力，堅持維護其〔武器〕品質之精良……美國決心要在以色列推進和平時，將它所需面對的危險與費用減至最低，提供它長期且恆久不變的外交、經濟、安全和科技後盾……美國致力……與以色列密切合作，以減產大規模破壞性武器和對以色列造成威脅的導彈……在武器控制一事上與以色列密切協商，以確保美國和其他軍事控制行動與政策不會成為以色列的障礙，或危及其安全……[2]

當然，最後一段暗示不會干涉以色列發展核武，但不允許其他國家這麼做。

與敘利亞重啟協商

回到以色列後，總理開始拴緊他能力所及的螺絲，以重啟與敘利亞的和平會談。他請求約旦的阿卜杜拉王擔任中間人，試著安排會晤阿薩德，請人發送一封個人訊息給他：「我願意不惜一切代價換取和平……」[3]約旦的年輕國王於一九九九年其父胡笙國王死後繼承其位，他願意幫忙，因為以色列和敘利亞的和平可以有效強化約旦和以色列於一九九四年簽訂的和平協議。

七月二十七日，阿卜杜拉王回報道，雖然阿薩德著實相信巴拉克願致力達成和平協議，他仍然不會在這個階段與他會晤；這並不令人驚訝，因為戲劇性的舉動一直都不是阿薩德總統的作風。透過約旦國王傳來的阿薩德的訊息也揭示，雖然「在四個月內」達成和平協議是可能的，但在任何未來的協商中，敘利亞都會堅持其根本要求：拿回所有戈蘭高地領土，直到恢復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的國界線。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阿薩德而言，與以色列的和平協議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以色列從戈蘭佔領地撤離的**程度**。他堅持以色列**完全**撤離**所有**一九六七年以國進犯之前敘利亞所擁有的土地，也就是整個戈蘭山區，直到阿薩德所稱的「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國界線」，沿著其東北方攘接的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或阿薩德所稱的「湖」），使敘利亞得以擁有湖畔水路的出入口岸。以色列一直不願讓敘利亞如一九六七年以前般，與水接攘，因為加利利海提供了以色列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的淡水需求。然而，前以色列總理伊札克．拉賓曾讓阿薩德知道，如果以色列的需求（主要是安全方面）能夠被滿足，那麼敘利亞終究可以拿回整個戈蘭，下至海岸線。這發生於一九九四年七月，美國國務卿華倫．克里斯多福與拉賓在耶路撒冷見面後，行經大馬士革時，向阿薩德傳遞的一個重要信息：「我剛從以色列過來，」他說，「我可以告訴你……美國知道……以色列最後會完全撤離〔戈蘭〕……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的國界線……」[4]以色列的這個承諾，後來被稱為「押金」，因為它是間接被給予阿薩德的（先「存放」在美國人那裡）。這個消息使阿薩德極為震驚，他馬上反問克里斯多福：「拉賓指的撤退會包含所有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敘利亞治下的土地嗎？」對此，克里斯多福回答：「是的。」

這在當時被視為以敘關係的空前大躍進，也是他們致力於結束戈蘭佔領與安全和平的一大進展，因為它給了敘利亞他們真正魂牽夢縈的東西。雖然當時一些低階的協商隨之而來，但是在拉賓剩下的任期中沒有重大突破，其繼任總理佩雷斯和納坦尼雅胡任內亦如是。進展遲滯的主要原因是，一九九四年七月，敘利亞人從克里斯多福那裡得到的承諾，是以色列人會完全撤出戈蘭，但是在與敘利亞的商議期間，他們卻無法做出如此直接的承諾。[5]

現在，距拉賓透過美國人給予阿薩德承諾已屆五年，巴拉克開始尋求美國人的協助，以與阿薩德重啟和平會談。他向柯林頓求援，請求他與阿薩德聯絡，並且試著安排一位以色列人和一位敘利亞代表進行秘密協商，協商將由柯林頓駐中東特使丹尼斯．羅斯擔任。總理促請柯林頓向阿薩德保證巴拉克敬重他，拉賓的「押金」（前任總理承諾以色列會完全撤離戈蘭高地，直至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的國界線）仍然存在，且巴拉克沒有反悔的意圖，雖然他不會再次明說。柯林頓一直堅定地想幫忙，於是致電給阿薩德，籲請他同意與以色列重新召開和平會談。下面是被以色列秘密探員竊錄下來的柯林頓在電話中向阿薩德說的話：

> 你們的落差並不大……是的，對我來說很清楚的是，他〔巴拉克〕知道拉賓給的〔「押金」細節，指的是以色列會完全從戈蘭撤離〕且他並沒有要撤銷的意思……他相信您是一個有榮譽感的人……比起對巴勒斯坦人做出領土相關行動，他對敘利亞和平路線的推進更有興趣……我知道他不是在玩把戲，因為他真的相信在策略上，〔敘利亞優先〕是至關重要的。[6]

阿薩德接受柯林頓的建議，同意派出一位在敘利亞外交部工作的律師里亞德．達烏狄（Riad Daoudi），與巴拉克的人、前任將軍尤里．薩古以（Uri Saguie），於八月二十七日在瑞士重啟和平

協商。然而，他們的談話並沒有很大的進展，因為敘利亞代表遵照他在大馬士革的頂頭上司外交部長沙雷的指示，堅持薩古以應直白地重述確認前任總理拉賓的承諾，以色列完全撤軍到加利利海水線以外，而這是以色列人不願做的。達烏狄打電話到大馬士革，向沙雷報告情況，下面是他們被以色列探員錄下的對話：

達烏狄：長官，現在的情況……有些緊張。他表達了他們的需求與觀點。我聽到他說他的上司〔巴拉克〕知道〔拉賓的〕押金〔是要完全撤退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的國界線〕。他沒有要撤銷它……〔他說〕他不能以任何方式宣布任何事情〔也就是露骨地說出以色列承諾會完全自戈蘭撤出，退到水線以後〕。

沙雷：堅持下去……

達烏狄：我的確堅持了……

沙雷：好，繼續堅持……

達烏狄：他說我從早上到現在一個字都沒說……我說我是來聽他說他們進行到哪裡的，然後我們再看狀況。

沙雷：是的，很好。我們明天再談。

達烏狄：願阿拉與你同在。

然而，進展停滯並未減緩巴拉克的腳步，他促請柯林頓總統向阿薩德施壓，催促他提高會議層級，如此巴拉克才能親自與敘利亞高級官員協商（他不信任他本人以外的其他代表）。因此，柯林頓派遣他的國務卿馬德琳．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到大馬士革，親自面見阿薩德總統，柯林頓並且於九月二日她抵達前致電給阿薩德，為她的任務護航。下面引言來自以色列情報員秘密錄下的對話記錄（雖然聽不到阿薩德的聲音），顯示對阿薩德而言，一如既往地最重要的事是一個直白的承諾，事實上也就是再次確認拉賓的承諾（他的「押金」）：從戈蘭完全撤離至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的國界線之後：

柯林頓：國務卿歐布萊特週六會與您見面。我請她與您商討一些用詞以繼續推進〔和平會談〕。

阿薩德：〔阿薩德似乎提到了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國界線。〕

柯林頓：我想解釋為何巴拉克不願清楚提到六月四日國界線〔傍水國界線〕……你記得他曾承諾要在以色列國內舉行公投決定任何〔與敘利亞簽訂的〕協議嗎？他擔心……

阿薩德：〔……〕

柯林頓：總統先生，請讓我試著把話說完……他擔心如果他清楚提到六月四日國界線，事情會曝光——這不會是您的錯，總統先生，但是因為在以色列，所有事情都隔牆有耳……他擔心不久後，在以色列民眾投下〔公投〕票之前，會聽到六月四日國界線之事，卻不了解〔敘利亞〕會給予〔以色列〕安全利益……或者其他事情……[7]

十二天後，丹尼斯・羅斯陪同國務卿到大馬士革，並在到訪期間向巴拉克回報近況，其中包含所有人都關切的阿薩德的健康狀況，因為在阿薩德逝世前與之達成協議很重要。羅斯說，「阿薩德總統看起來〔身體〕不錯……握手很有力」，但是「精神上，〔他不如〕以往敏銳……對話之間有一度他脫離狀況，記不得人名……」。[8]羅斯補充道：「我不認為我們〔在他死之前〕有很多時間。」好消息是，羅斯回報阿薩德同意回復低調的以敘和平會談，於九月二十四日在馬里蘭貝賽斯達（Bethesda）召開，並且將導向接下來敘利亞外長和以色列外長在美國的升級會議。

十二月十五日，當巴拉克和沙雷終於在華盛頓見面時，很顯然地，那個一開始最積極要促成會議的巴拉克，現在似乎反悔並試圖拖延進度。巴拉克也許比前任任何一位以色列總理都更加關注民意調查，現在的民意對於以色列從戈蘭高地撤退一事顯得興趣缺缺，更遑論給敘利亞如前所承諾的加利利海的水路入口。許多以色列人認為以敘國界問題並不急，因為既然以色列與敘利亞的關係這幾年都如此平靜，以色列怎會想要歸還戈蘭？〔與其歸還〕，何不等敘利亞——甚至全世界——都對戈蘭屬於以色列一事習以為常？

不過，總理明白與敘利亞適切地達成和平可以帶來更多的政策利益，但他必須讓其人民感覺他極力地奮鬥，而非輕易將戈蘭拱手讓人。因此自從抵達華盛頓會談現場，他就找機會要表現給以色列人看，他在為他們的利益奮鬥，找機會拖延，以展示協商推進之困難；而敘利亞外交部長很快就把機會送上門來了。

從高峰會的第一天，沙雷就發表了大膽的言論，他長篇大論地批評以色列佔領戈蘭高地，悍然無視柯林頓的要求：他和巴拉克的演說須維持「簡潔正面」。如今抓住拖延的機會，巴拉克告訴柯林頓，在沙雷這般的言論和敘利亞的批評之後，總統不可能冀望巴拉克快步推進或公開讓步。柯林頓也對沙雷怒不可遏（「沙雷惹怒我們了，」他告訴巴拉克），同意並且同理巴拉克的觀點。他被期待著應扮演客觀的中介者，但他甚至令人訝異地告訴總理：「我想對你而言，最重要的事是加利利海。如果我是你，我會對有人〔指敘利亞〕可以擁有水路而擔憂。」[9]與巴拉克這段對話的逐字記錄，顯示出柯林頓對敘利亞的輕視。他對總理吹噓道：「看看他〔沙雷〕是怎麼來到這會談的……我甚至不需要〔對阿薩德施加太多壓力〕……」

整體而言，因為巴拉克的反悔和遲滯不前，這幾場高層以敘會談並未達成任何重大突破。然而，巴拉克又再度向柯林頓施壓，要他重新與敘利亞召開會談，「愈快愈好，以免失去動力。」柯林頓同意，並決定二〇〇〇年一月三日開始下一輪的會談，地點尚未決定。

阿薩德的姿態

巴拉克促請柯林頓說服阿薩德做出善意的舉動，以期在以色列民眾心中留下好感，證明敘利亞人不若以色列媒體所描繪的那樣牛鬼蛇神。更精確地說，阿薩德承諾找到、並且歸還在黎巴嫩一九八二年戰爭中遺失的三位以色列軍人遺體，以隆重地安葬他們。

儘管受難者家屬堅信失蹤的軍人仍活著，但總理從情治報告中得知他們已經亡故了。他的情報系統有一部分來自義大利秘密情報單位，從他們最可靠的線民、西岸城鎮的巴勒斯坦市長所搜集的資訊，並將之傳至以色列國安單位。市長告知義大利人，三具遺體已經在一九八四到一九八七年間從黎巴嫩被載運到敘利亞，並在當地入土，其他來源亦證實此資訊為真。於是這個情報帶領以色列情報員到大馬士革墓園中的三座墳塚前，在墓園中第十排鄰近道路的墳墓中，有四座無名塚，其中三座被推測是失蹤的以色列人。在敘利亞的以色列情報員會監看這幾座墳，且一顆美國衛星一個月拍攝一次影像，將之傳送到以色列。有了這些情報，巴拉克相信阿薩德總統不能再藉口他不知道這三位軍人葬身何方了。

柯林頓致電給阿薩德討論此事，由於此事可以幫助巴拉克面對其民眾，阿薩德允許美國團隊（其中包含一位猶太拉比）到大馬士革運送三具軍人遺體。然而，對總理打擊甚鉅的是，經過了七個半小時的挖掘，的確找到了三具遺體，但是他們的年齡、身高與ＤＮＡ並不符合那幾位在執勤中失蹤的軍人；情報系統一如既往，是有闕漏的。

災難性的外交斡旋終章

巴拉克和敘利亞外長再次見面，這次在西維吉尼亞州的謝潑茲頓（Shepherdstown），柯林頓很快就發現，巴拉克這位敘利亞協商的布局者再一次悻悻然不願入場，故意拖延會談進度。而這又是由於以色列民意不支持與敘利亞妥協，巴拉克希望其人民感覺到協商艱巨萬分，而他為了以色列的利益長期努力地奮鬥著。但是使用這樣的拖延戰術，巴拉克不僅激怒了敘利亞人，也激怒了美國人。美國小組成員羅伯特．馬利（Robert Malley）回憶道：

> 柯林頓〔將美國小組〕聚集到桌前，他的頭微微一點，說：「夥伴們，我們有個問題……巴拉克告訴我他寸步難行……因為他面對其國內的問題，如果他太快達成協議，以色列人會覺得他太快投降，沒有奮力一戰。他需要表現出鬥爭的樣子，他需要使這件事延宕久一點，他需要緩慢前進……」[10]

灰心的國務卿歐布萊特揮了巴拉克一鞭，告訴他：

> 坦白說……我們有史以來沒有這麼多電話交談過，而這絕大部分都是你主動的，在這些對話中，你說在敘利亞方面有所進展是多麼重要……而我們非常認真看待這件事……但是你令我們震驚……因為你已經決定不要太快推進……你那邊風平浪靜……你沒有比美國更好的朋友，沒有比柯林頓更好的朋友，你卻玩弄他的信任……他們〔敘利亞人〕一直都是願意協商的……我們很憂慮。[11]

謝潑茲頓的談話並未達成結論，雖然巴拉克的戰略令人沮喪，柯林頓還是同意了他的要求，試圖組織最後一場高峰會，讓敘利亞總統親自參與。巴拉克建議，因為阿薩德不願面見巴拉克，柯林頓應該讓阿薩德搭上美國駐地中海巡邏艦，在那裡，他將提出以色列最後的和平提案，然後與阿薩德完成這個最終階段。巴拉克甚至提議他搭機空降，在柯林頓覺得合適的時候加入最後的會議。

在巴拉克的堅持下，雙方達成共識，因為準確度非常重要，所以柯林頓總統會宣讀一份預先準備好的以色列提案。但是即使到了如此深入的階段，總理仍然將他真正的底線深藏胸中，害怕會在高峰會前走漏消息。巴拉克向柯林頓承諾會在高峰會那天、柯林頓與阿薩德的會議之前打電話給他，告知他以色列願意接受協商的底線。

當以方和美方助手撰寫著柯林頓即將在高峰會向阿薩德宣讀的文書時，巴拉克在三月二日致電柯林頓，請求他一定要「私下」向阿薩德提出以色列的提案，如此才能提高得到正面回應的可能，因為「這是打破僵局唯一的方法」。[12]然而柯林頓想在自己蹚入渾水前，先試試阿薩德的水溫，因此他已經在尚未與總理討論前，先告訴了駐華盛頓的沙烏地阿拉伯大使班達爾王子（Prince Bandar），他是在柯林頓之前和之後歷屆美國總統的親近盟友，藉此柯林頓非正式地將巴拉克的想法傳達給了敘利亞領袖。然而在華盛頓、甚至大馬士革，以色列間諜為數眾多，他們發現了柯林頓的沙烏地阿拉伯後門，所以出乎柯林頓意料之外地，總理說道：「我從情報單位得知您透過沙烏地阿拉伯人向敘利亞傳達以色列的需求……這是個錯誤。」人贓俱獲，嚇了一跳的柯林頓虛張聲勢地說，「……我沒有給班達爾任何實質的……不要胡思亂想……」同時柯林頓對於巴勒斯坦方面也非

常憂慮，阿拉法特頻頻表現出煩躁的跡象，他催促巴拉克給予阿拉法特一些東西以安撫他。柯林頓向總理說：「你和阿拉法特必須在我見阿薩德之前，對我們要進行到哪裡達成共識，這很重要……否則會為你惹來麻煩。我們與阿薩德協商，使巴勒斯坦人如此焦慮，擔心被我們冷落，這令我十分驚訝……所以如果可以的話，盡量讓阿拉法特表示我們關係良好。」他批評道：「阿拉法特就像鱷魚……他一直吃一直吃，而且還想要更多。」即使心不甘情不願，巴拉克仍承諾會如是進行。如同他的前任者，巴拉克並不相信阿拉法特，認為阿拉法特搖擺不定，總是試圖從以色列榨取更多讓步，回報卻少之又少。然而由於他需要柯林頓的協助，好將阿薩德拉進高峰會，巴拉克勉為其難地與阿拉法特協商，遲緩地移交給他三個鄰近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村莊的控制權；這對阿拉法特是重要的，因為這能夠將他的權力延伸直抵耶路撒冷大門。兩人同意，四月二十三日阿拉法特會得到三座城鎮中的兩個，而五月二十三日得到第三個。如同巴拉克正確預測的，得到了這些，阿拉法特的確又要求更多。因此柯林頓總統於三月七日再次致電給巴拉克向他致謝，並要求他再釋放一些被關在以色列監獄的巴勒斯坦囚犯。[13]總理對此感到甚為惱怒：「我會盡力，但是我想先說好，這是你與阿薩德會談的前提。」柯林頓明白他已經將巴拉克推到目前他對巴勒斯坦的底線了，柯林頓立刻補充：「我會盡快致電阿薩德，一旦得到答覆，我就馬上告訴你。」

柯林頓要在即將舉行的高峰會中向阿薩德總統宣讀的文稿，已於二〇〇〇年三月十日準備好了。這是一篇再重要不過的文字，因為它是以色列最後、且有史以來給予敘利亞最全面的提案。以下是柯林頓的開場白：

總統先生，我邀請您到這個會議中，因為我相信我們為了以敘全面和平的努力，如今已經到了關鍵時刻……您知道我從七年前的第一天上任就一直為此事奔波勞碌……現在已經到我任期的最後一年。此刻我有很多事情想要完成。其中一件事，就是以敘和平。一個勇敢的和平，可以結束以阿衝突，給予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一個更好的未來。一個可以開啟美國—敘利亞關係的新世紀，使雙方互利共榮的和平。一個能夠確保敘利亞安定和平，使您驕傲的遺澤世世代代傳揚下去……但是我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若我們現在不克服差異達成協議，它就必須留待其他總統、其他時候再敘。您曾反覆告訴過我們，您想要直接切入事情的核心，將所有牌攤在檯面上以結束協商。巴拉克總理也如是想。但是為此您們兩位需要知道您們的需求是否可以相吻合。我已向巴拉克強調：和平必須是正直高潔的，必須是完全尊重您的尊嚴和確保敘利亞重要利益的和平，而它也要能確保以色列的重要利益，巴拉克對此深感認同。從上次我們談話後，我帶著所有這些納入考量，一直奮力與巴拉克總理商討。我請他向我詳細說明他可以如何達成您的需求，為此他覺得他需要得到什麼……在我的催促下，他將他的需求限縮到最關鍵的幾點。他已經傾盡全力滿足您的需求，也盡了最大力量顧及您的敏感之處。我相信差異已經非常小了。除了缺乏勇氣和政治才能外，歷史學家在回顧此情形時，將無法解釋為何這些裂隙會無法彌合。因此我今天想要做的，是向您大致描述我印象中巴拉克在回應您基本需求上可以做的事情，以及為了回應他的基本需求，需要您做的事情……如果您無法回應他的基本需求，我會尊重您的立場，但是您必須明白我已經盡力了。[14]

在這概括性的開場白之後，柯林頓依著為他準備好的文稿，轉而討論對阿薩德而言至關重要的東西，也就是未來的以敘國界線。阿薩德希望是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的國界線，壤接加利利海東北緣的水路，使敘利亞能夠直接通行：

> 一、國界：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巴拉克已經準備好完全撤離到雙方共識的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的國界線……巴拉克覺得以色列對此湖的主權……〔是〕與敘利亞的任何和平協議的重要元素。因此，他必須在湖的東北岸擁有一條約五百公尺的區域……[15]

三月十七日，柯林頓總統致電巴拉克，告知與阿薩德的高峰會訂於三月二十六日於日內瓦舉行。兩人決定在高峰會當天再議，如此巴拉克便可在柯林頓進入與阿薩德的會議前，告知柯林頓其最低底線。柯林頓希望巴拉克欲保留的那塊湖東北緣五百公尺的土地可以大幅裁減，如此他才能在走進與阿薩德的高峰會時，有較大的成功機會。

到了歷史性的高峰會現場，成功與否緊繫於巴拉克是否能做出實質的讓步。高峰會當天，他致電給身在日內瓦陸際飯店（Intercontinental Hotel）的柯林頓，告訴他其最後提案的安全底線，並且確定總統以正確的方式與阿薩德進行會議。他們的電話會談逐字記錄顯示總理很緊張，柯林頓則有些不耐。[16]巴拉克要求柯林頓，與阿薩德進行會議時，現場只能有四隻眼睛——兩位總統，也許加

上一位阿薩德的翻譯，因為如同巴拉克所說：「一位如阿薩德這樣的領導者在有陌生人在場時無法專注聆聽，這將會大幅減低其〔妥協〕意願。」柯林頓說：「我會盡力……我讀完文稿了。」巴拉克說，阿薩德「應該要知道無法落實此事的後果。他必須明白這會導致現狀的持續，下個三十年戈蘭還會在我們手裡……他應該看見這個選項的其他可能……」。柯林頓答道：「我會處理好。」

然而現在柯林頓想直搗問題核心，知道總理會堅持保留加利利海東北岸多大面積的土地，巴拉克的回應苗頭不太對。他向柯林頓解釋，他的民意調查專家告訴他，以色列民眾對於與敘利亞談和一事仍然不甚支持，尤其對於給予敘利亞人加利利海的水路，「……因此〔這塊地〕……可以從五百公尺降到四百公尺……這是成敗的關鍵……如果他不同意五百公尺或者最低四百公尺……」

這對柯林頓而言是一個可怕的打擊。巴拉克再度食言，無法給予他所承諾的讓步。柯林頓知道他現在對阿薩德的成功機會非常低，阿薩德仍然期待未來的國界線**會是**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線，根據這條線，敘利亞**實際**壤接湖水，而非在四百或五百公尺以外。美國國安顧問桑迪．柏杰（Sandy Berger）回憶道：「總統非常憤怒，因為我們讓阿薩德來到這個會議，以為我們能給予一個正式的新提案。」[17]萬念俱灰的柯林頓懇求巴拉克：「過去我們曾經談到三百公尺。[18]你覺得這不可能通過民意調查嗎？」巴拉克答道：「我確認過了，四百〔公尺〕以下就有問題。」

高峰會起勢良好。阿薩德的翻譯記得：「會議開始時，柯林頓總統贈與阿薩德總統一個禮物，那是一條領帶，上面有一隻獅子，而獅子理所當然在阿拉伯文是阿薩德的意思。阿薩德覺得這很逗人。國務卿馬德琳〔歐布萊特〕配戴著一枚獅子胸針，而柯林頓總統戴了一條獅子領帶，阿薩德總統覺得很逗趣，他很感激地收下了這份禮物。」[19]

但是，儘管氛圍正面，高峰會卻註定失敗。的確，當阿薩德聽到巴拉克的「完全」撤離，**並非**退至如他所預期的一九九四年拉賓向他承諾的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國界線，而是退到一條「大致同意」且「奠基於」一九六七年六月國界線的邊界（這後來變成了以色列的密碼，意指遠離海岸線）時，他極度震驚。他的翻譯官布薩尼．沙班（Bouthania Shaaban）憶及接下來發生的事：「阿薩德總統對我說：『問他什麼是「大致同意的國界線」（commonly agreed border）……這是什麼話？叫他再說一次！』」當柯林頓總統重複這句話後，阿薩德轉向沙班說：「告訴他我失去興趣了。」[20]

這是一個慘烈的外交失敗。

會議結束後，柯林頓致電巴拉克。「我已經盡力了，」他補充道：「他不願意放棄水線。他想要取回水路。我向他解釋後果了……對我而言很顯然地，他不願意在水路上妥協……他不能向敘利亞人解釋為何他無法為他們取回〔所有的〕土地……」[21]巴拉克說出眾所周知的事：「如果他不願意放寬土地一事，那麼協議就不可能成功。」

事後看來，在這期間以敘無法在以色列完全從佔領的戈蘭撤離的基礎上達致和平，是一個錯失的良機，且很顯然錯在巴拉克。他猶豫、害怕他的群眾會不支持他，白白浪費了機會。二〇〇〇年三月在日內瓦，他透過柯林頓給阿薩德的提案太少也太晚了。太少，是因為他給敘利亞人的少於前任總理伊札克．拉賓過去所承諾的，亦即以色列完全撤離戈蘭高地，回復一九六七年之前的情況，當時敘利亞擁有加利利海的入口。而為時已晚則是因為，柯林頓在日內瓦面見阿薩德總統、給予以

色列提案時，已病入膏肓的阿薩德更關心如何將權力轉移給兒子，甚於拿回他所失去的土地；在此之後不到三個月，阿薩德便與世長辭。

11 大衛營Ⅱ（二〇〇〇）

繼柯林頓與阿薩德總統的日內瓦高峰會失敗之後，巴拉克將目標從已死的「敘利亞優先」策略，轉回巴勒斯坦。藉著回頭與阿拉法特協商，巴拉克希望大幅改變以色列一直以來對巴勒斯坦人使用的整體策略。

一九九三年奧斯陸和平協議開始時，巴拉克即對協議規劃讓以色列逐漸將土地移轉到巴勒斯坦人手中，拖延衝突的「關鍵議題」，而將最艱巨的問題，例如神聖的耶路撒冷的命運則留待協議的最後階段再討論的作法，表示強烈反對。的確，《奧斯陸協議》的擬定者十分滿意其漸進策略：讓雙方先建立互信，再轉而處理他們衝突中重大而複雜的議題。但是巴拉克不如是想。他認為將重大、具爭議性的問題留待協商最後才解決，會使整個協商過程被雙方的極端主義者挾持，他們會在最終階段來臨前，致力讓地上事實往他們的方向發展。他也認為，奧斯陸策略規定轉交土地給巴勒斯坦人會損及以色列的利益，因為到最後討論最棘手的問題時，以色列手中就沒有多少籌碼可以牽

制巴勒斯坦人了。且巴拉克認為，土地的漸進轉移會使地上的猶太屯墾區身處險境、四面楚歌——根據原本的《奧斯陸協議》，其命運會在協商最後階段討論，使之如孤島一般四散於西岸，被巴勒斯坦人包圍。

與其延遲核心議題、採取漸進主義，總理傾向單刀直入最後階段，在以色列仍然握有絕大部分土地時，解決最艱巨的核心議題，讓阿拉法特自己宣告：他與以色列的衝突告終，他別無所求了；並且佔領地會一次全部移交給他，他可以在其上建立他的巴勒斯坦王國。

但這絕非易事，因為同理，阿拉法特自然希望堅持在奧斯陸所協議之程序。且巴拉克的新政策會需要重新商討過去的以巴協議，以及一九九八年阿拉法特與巴拉克的前任納坦尼雅胡所簽下的《瓦伊河記錄章程》。協議要求以色列繼續移交土地給巴勒斯坦人，而這點是阿拉法特不願有所延宕的。

通往高峰會之路

在一九九九年勝選之後，巴拉克於七月二十七日與阿拉法特見面，試圖說服他配合其新策略。巴拉克麾下的秘密調查員尼姆羅德．諾維克代表他走遍世界，執行眾多特別任務。在此會晤之前，諾維克與阿拉法特的首席協商者薩博．埃雷卡特，在華盛頓進行了長達五個小時的會議，企圖從他身上探知擺平阿拉法特的訣竅。然後諾維克傳真給總理說道：

> 為了讓阿拉法特處於正確的狀態，〔埃雷卡特〕建議您說話時包含下面這些元素：「您是我的夥伴，因為有您，和平進程才能繼續」；「您的人們受了太多苦，現在才剛開始要恢復元氣」；「我想與您合作，手牽手，為一共同的策略目標……我們不要再猶豫了：我是想要執行……〔之前的〕承諾的。」[1]

當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在艾瑞茲（以色列和加薩走廊間的主要通道）見面時，他們以閒談開場，談論最近剛剛過世的摩洛哥國王哈桑。阿拉法特說：「哈桑曾經稱呼我『我的表弟』，我便也稱他『我的表哥』。」[2]巴拉克試著將對話引領到不同的方向，說哈桑國王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的以埃和平協議中，扮演著主導和協調者的角色：「看見像哈桑和其他這樣致力於和平的領導人，後來成為偉大的世界領袖，實在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

巴拉克於是解釋道，他希望瓦伊河協議可以有「一些更正」，也就是延遲執行其前任者所承諾的土地移交，直到他們找出解決剩餘以阿衝突議題的方法後再進行。但是阿拉法特不願接受：「我們希望結束瓦伊河的現狀」，這表示巴拉克應該先移交給他那些承諾的土地，「只有在那**之後**，我們才會談論〔衝突的〕永久處理方式。」巴拉克駁斥道：「我明白您的答案，」他說，「但我仍然請您重新考量〔您的立場〕……如果我們優先執行瓦伊河……那麼我們會問題叢生，損害達成永久協議的機會……」阿拉法特不情願地勉強答應了。他知道如果他繼續堅持瓦伊河之事，那麼總理便會在執行奧斯陸中程協議時百般刁難，以最低可能的詮釋來執行它。值得注意的是，在之前的中程

《奧斯陸協議》中所使用的語言，往往指稱以色列需要撤離佔領地，「除了明確的軍事基地和區域會在永久協議中決定之外」，阿拉法特認為這個句子有多種可能詮釋；畢竟「軍事基地」和這些「區域」的**大小如何**並未言明。

在進退不得的情況下，阿拉法特至少努力改善氣氛，他說：「我們從已故的拉賓就開始做這件事，未來也將繼續與巴拉克一起〔為和平努力〕。」總理心花怒放，他提及過去的中東和平使者，試圖說服阿拉法特聽從他的新計策：「我感覺到〔已故的〕拉賓、〔已逝的摩洛哥國王〕哈桑和〔已故約旦國王〕胡笙都在天上看著我們……希望我們找到結束衝突的方法。」

後續雙方開始商議如何修正《瓦伊河記錄章程》，並於一九九九年九月四日，阿拉法特和巴拉克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一起簽訂了新的協議。《沙姆記錄章程》（Sharm Memorandum）更大幅拖延以色列從西岸撤離的時間，如果依照阿拉法特的原意和過去給他的承諾，現在以色列軍隊已經從西岸絕大部分的土地撤離，將權力移交給巴勒斯坦人了。如今他們重新制訂了時程和重要日期：雙方會在二〇〇〇年九月十三日簽訂最後決議。

將阿拉法特甕中捉鱉

然而一九九九年九月在沙姆召開的巴拉克和阿拉法特的會談，並沒有達成任何協議：當巴拉克

如上一章所述，試著敲定與「另一個女人」（巴勒斯坦人指稱敘利亞）的協議，講定的日期一再刪改。同時，在佔領地上，即使阿拉法特擁有了大多數的巴勒斯坦城鎮、難民營和村莊，佔領仍然持續著。巴勒斯坦各城市中心的聯外道路幾乎還在軍隊的控制下，而巴勒斯坦人民的自由仍受到軍隊檢查哨、武裝屯墾者及武裝封鎖的限制，且日復一日受到屈辱。

然而，如今因柯林頓和阿薩德的高峰會失敗，巴拉克希望「箝制」阿拉法特，使之同意參加一個非成即敗的會議，並一舉達到完全的共識。巴拉克堅信，與阿拉法特一起召開高峰會，是唯一能逮到阿拉法特、使他做出赤裸決定的方法，因為巴拉克一直覺得他行蹤不定、難以掌握。若阿拉法特確實願意在大議題上妥協，那麼就可能達到以巴協議，以結束以色列在西岸和加薩走廊的佔領，讓阿拉法特在當地建立巴勒斯坦國家。但是如果阿拉法特拒絕進場、不願妥協，那麼巴拉克，如同他說的，就會向全世界「揭露」阿拉法特的背信，將之形塑為對和平無感。這是巴拉克標準的皆大歡喜或兩敗俱傷的行事風格。

當然，總理無法只靠自己的力量將阿拉法特「監禁」在和平高峰會中，他需要美國的權力和影響力。柯林頓總是樂於協助，他答應巴拉克，六月十五日在白宮他與阿拉法特即將進行的會議中，他會提出高峰會的建議，看看巴勒斯坦領導者反應如何。

幾天後，在他與阿拉法特會議開始前，柯林頓致電巴拉克，催促他釋放監禁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囚犯以示善意，如此可幫助柯林頓評估阿拉法特參加高峰會的意願。被監禁在以色列監獄的巴勒斯坦囚犯是巴勒斯坦社會的敏感議題，其釋放一直是刻不容緩的事情。然而一千八百六十位被囚禁

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中，巴拉克僅釋放了三位作為回應——這麼做比完全不釋放更糟，對阿拉法特簡直是一種侮辱。無怪乎柯林頓與阿拉法特的會議進行得一塌糊塗。柯林頓事後向巴拉克回報道，他發現阿拉法特非常多疑，他抱怨巴拉克僅想將之誘引到高峰會，而最後柯林頓會因高峰會破局而責怪他。柯林頓說他向阿拉法特承諾過，如果召開高峰會卻以破局收場，那麼無論如何他都不會責怪阿拉法特，且同時他會支持巴勒斯坦的需求，根據過去簽署的協定，要求以色列釋出更多佔領地。

柯林頓在華府面見阿拉法特的同一天，巴拉克與其顧問在特拉維夫辦公室開會。與會者認為阿拉法特不會在高峰會妥協，這麼高調的會議只要一破局，就可能導致血洗佔領地——二次起義。

軍事情報處長阿莫斯．馬爾卡（Amos Malka）將軍說（這是首次公開的會議秘密記錄），在失敗的高峰會結束後，「〔阿拉法特〕想要的……是一個能夠凝聚情緒的事件……此〔事件〕會帶來爆炸般的後果……」[3]馬爾卡將軍告訴巴拉克，避免巴勒斯坦暴力事件爆發的唯一方法，就是完全接受巴勒斯坦的要求。這將會是「以色列對耶路撒冷、難民、國界問題的投降……」。馬爾卡要說的是，因為以色列**不能**給予阿拉法特這些讓步，所以或許完全**不召開**高峰會反倒更明智。

儘管愈來愈多證據和專家意見都指出，一個破局的高峰會將導致公開與巴勒斯坦人對立衝突，巴拉克還是不為所動地做了。對那些懷疑他政策的人，他辯稱：「嘗試和竭盡所有能夠達成協議的機會是非常重要的……不放棄以色列國家的重要利益。同時，為了防止我們無法達成協議，〔且發現我們得面對〕暴力以及甚而是白熱化的恐怖時，我們應該有所準備。」他當時很清楚警覺到，他採取的是一個高風險的策略。

在華府，柯林頓和其顧問對於是否要屈從巴拉克的三催四請，而與阿拉法特召開高峰會，感到左右為難。他們對三月柯林頓—阿薩德失敗的日內瓦高峰會仍記憶猶新，柯林頓的顧問不想再將他們的總統暴露在另一個可能發生的、羞恥的外交慘敗中。日內瓦的失敗也使以巴協議更加舉步維艱：如果以敘協議成功，那麼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協議便指日可待，因為對黎巴嫩有強大影響力的敘利亞會對其施壓，使之與以色列簽訂協議。如此一來，阿拉法特便會倍感壓力，盡快解決衝突、見好就收。但因以敘和談失敗，很顯然地，阿拉法特現在認為自己是舞台上唯一的主角，且他知道如今對柯林頓和巴拉克而言，和平會談的捷報是多麼重要，這使他與以色列談和的價碼看漲。雖然柯林頓直到如今都踟躕不前，他仍派出其助手檢視巴拉克和阿拉法特的高峰會提案，並開始為此可能性做準備。

同時，巴拉克使盡渾身解數對阿拉法特施壓，迫使他參加高峰會。他召見了駐以色列的埃及大使穆罕默德．巴西烏尼，請他帶口信給胡斯尼．穆巴拉克總統，請他竭盡所能說動阿拉法特參加與巴拉克的高峰會。六月二十三日，巴西烏尼回到以色列報告道，穆巴拉克喜歡高峰會的想法，並說「柯林頓—巴拉克組合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不應錯過」，「這是關鍵時刻」。[4]巴西烏尼還報告說，穆巴拉克對阿拉法特的影響力比任何其他阿拉伯領導人還大，他當場即刻拿起電話，「命令阿拉法特」

到埃及來討論高峰會一事。

同時，總理收到其外交部的秘密報告。這封題名為「阿拉法特的立場」的報告，簡述了「一個外國官員」六月二十五日時看見阿拉法特在納布盧斯，秘密向以方回報。這份秘密文件具有重大意義，因為他勾勒出阿拉法特現在的心境，以及他對於與巴拉克召開高峰會真正的想法。根據這份報告：

> 阿拉法特說，這個預謀的高峰會是以色列和美國的詭計，他們想占他便宜，利用他英文不好，疲憊且身體虛弱的弱點，而這一切都只是為了在四眼相對的會議中，從他身上榨取更多讓步……阿拉法特說，巴拉克企圖將他趕進「結束以阿衝突的牢籠」，但是在以方實現他的需求前，他不會走進這個牢籠……[5]

六月二十七日國務卿歐布萊特在拉馬拉面見阿拉法特，然後直奔耶路撒冷面謁巴拉克。歐布萊特詢問巴拉克是否會接受阿拉法特的要求，在高峰會前先召開為期兩週的以阿低層準備會議，以減少剩餘的隔閡。但巴拉克不願意，他說他知道這種會談的模式：以色列會提出一些想法，巴勒斯坦人則會「拒絕並且要我們給他們更多」。[6]歐布萊特回到拉馬拉，對阿拉法特施加更多壓力，隔天她回報巴拉克：雖然阿拉法特原則上同意參加高峰會，他仍然堅持會議召開前，必須先有為期兩週的前高峰會談。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當時（二〇〇〇年六月）阿拉法特僅控制了佔領地的百分之四十二；其中百分之十四他掌有直接且全部的管轄權，百分之二十八與以色列共同管轄，且由以方負責安全事務。在這些地區，阿拉法特負責巴勒斯坦事務，提供巴勒斯坦居民所有的市政服務：從健康、教育到運輸、城市規劃、通訊和稅收等等。他對《奧斯陸協議》的詮釋是（雖然這不被以色列人接受）：在最後階段的會談（如同巴拉克現在提議的）**召開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佔領地應該已經完全屬於他所管轄了。這便是為何直到如今，阿拉法特都堅持要先召開前高峰會協商：看看他能否在他與巴拉克的高峰會**舉行前**，從以色列人那邊擰出這些土地。但是總理的計策仍是要保有他的這些資產，以利關鍵時刻使用——在其他議題解決前，他要盡可能握有愈多土地——他不同意任何前高峰會協商。

戰爭話語

大約在此時，佔領地傳來不祥情報，指出巴勒斯坦人因和平會談破局指日可待，所以在準備傾巢而出與以色列全面開戰，阿拉法特完全知情，甚至鼓勵如此。根據這些主要以竊聽取得的報告，六月二十九日一位巴勒斯坦武裝分子領袖哈杰·伊斯邁爾（Haj Ismail）與其將官見面，並警告他們和平會談可能破局，在那之後「巴勒斯坦軍隊會正面迎擊以色列國防軍和屯墾區」。[7]伊斯邁爾指示他的人「開始密集且大量地進行軍事訓練〔以準備好〕迎戰」。情報指出，當伊斯邁爾結束他簡

短的報告後，參與者面見了阿拉法特，阿拉法特表示：「巴勒斯坦當局面對的是一個強勁而危險的以色列國家，由一位對真正的和平沒有興趣的總理所領導。因此……儘管舉行了眾多會談，巴勒斯坦當局與以色列將不會有和平協定……」阿拉法特呼籲他的聽眾跟從伊斯邁爾的指示，準備與以色列開戰。

這份錄音情報事後被以色列人用來指控巴勒斯坦人蓄意開戰，罔顧和平。但這也使巴拉克的動機受到質疑：儘管這個或其他情報清楚指出高峰會的失敗會導致衝突，他仍堅持著手準備高峰會。他的所作所為史無前例，且在在說明了他是一個魯莽的賭徒，在謝潑茲頓和日內瓦會議中，巴拉克數度讓柯林頓總統失望，柯林頓仍然願意對巴拉克言聽計從，這顯示他相當程度也算是一個願下險棋的人。

七月四日，柯林頓打電話給巴拉克問他可以給阿拉法特什麼「糖果」，使柯林頓和阿拉法特的電話交談可以進行得順利一些，他將在電話中正式邀請他參加高峰會。巴拉克試著伸出援手，請柯林頓讓阿拉法特知道，參加高峰會的獎勵是，一旦高峰會開始，他便會釋放三十二位巴勒斯坦囚犯（一個極少的數字，因在以色列監獄中共有一千八百六十位囚犯），在這期間，他會考慮在東耶路撒冷的鄰近地區，對巴勒斯坦控制權給予有限度的妥協。不久柯林頓回覆總理，他與阿拉法特的談話進行得很順利，阿拉法特同意參加高峰會；這並不令人驚訝，因為阿拉法特想當然耳不想被譴責在和平嘗試中不合作。高峰會決定在大衛營舉行，而總理同意稍稍讓步——在此之前會有以巴協商者之間為期兩天的低層會談，以減少彼此的隔閡。

七月九日，巴拉克召集其政府官員報告道：「美國總統決定召開一場高峰會，昨天下午在電話中，我為其決定向他致上我們的感激之意。」[8]他補充：「如果老天不從人願，我們無法達成協議，那麼我們面對的新現實將會超乎想像地艱巨……但如果勉力達成協議，我們可能從此改變中東的地圖。」再次令人震驚地，巴拉克很清楚高峰會破局的悲慘結果，但卻仍想採取這危險的路線。為了鼓勵其部會首長贊同他的任務，巴拉克承諾若，他能在高峰會達成協議，那麼「在公投中，全國都會〔被要求〕贊成它，且我有信心，如果我們達成協議，絕大部分〔以色列人會〕排山倒海地〔贊同〕」。他解釋道，重點是要達成以巴分離的和平協議，也就是「我們在這頭，他們在那頭」——一個兩國方案。首長們同意了。

當會議結束，大部分與會者三三兩兩離開會場後，總理留了下來，軍事情報局長阿莫斯·馬爾卡走近他。馬爾卡將軍告訴總理的一席話，事後觀之果然不出所料：

> 你去〔大衛營的高峰會〕會空手而歸。因為根據我們所有最好的情報指出，阿拉法特是被你和柯林頓施壓硬拖去高峰會的。他根本不想參加高峰會，他只想在他的領土差異縮小〔如同他相信過去給他的承諾，百分之九十歸他所管〕之後，才進行高峰會……他也想要在大量囚犯〔從以色列監獄〕獲釋後，才參與高峰會。[9]

巴拉克對此警告置若罔聞。

滑鐵盧

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美國的協商者抵達大衛營——一個充滿象徵性的地點，因為一九七八年的以埃和平協議是在此進行的。他們於七月十日抵達，而實際的討論隔天才開始。在與阿拉法特的首次會議後，柯林頓向巴拉克報告：「阿拉法特認為你和我會耍他……我對阿拉法特說：『假若高峰會失敗，我不會責怪你……』」[10]巴拉克不相信阿拉法特，阿拉法特也不相信他，巴拉克警告柯林頓，阿拉法特一定要了解到「除非一**切**都達成協議，否則沒有任何協議」。巴拉克還說，若雙方無法達成協議，那麼所有在高峰會的提案都是「空談」。巴拉克一如他一貫的作風，主宰整場會談，忘記了他僅代表著關係中較劣勢的一方。他建議柯林頓告訴阿拉法特，若他合作可能得到獎賞，也就是美國會給予一百到兩百億美元的經濟支持，以助重新安置巴勒斯坦難民，改善巴勒斯坦佔領地的基礎設施，振興他們久病不癒的經濟。巴拉克說：「阿拉法特必須了解到，〔若不合作〕他會錯過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稍後在阿斯彭會議廳入口前，柯林頓召集了所有人正式為高峰會揭幕，阿拉法特和巴拉克面面相覷，看誰會第一個踏過門檻。在柯林頓的笑眼下，巴拉克推了阿拉法特一把，讓他先跨了過去。此刻的照片也許是整場高峰會最有名的，因為它象徵了即將發生的事。

斬首美國策略

在優雅的開場後，總統在巴拉克身旁就座，告訴他：「我努力找到一個開啟協商的方式」，他繼而在會議中報告他的策略。[11]他提議，與其從無關痛癢的事開始慢慢回到雙方分歧的根本，他們應該將某些東西視為共同基礎；這段話早已寫在柯林頓的講稿中，他認為這種方式可以「推進會談」。例如，他提議未來的巴勒斯坦國界要如巴勒斯坦人所要求的，根據一九六七年國界線劃定，也就是戰前將以色列本土和西岸與加薩走廊分開的國界線。考慮到以色列的需求，包括大部分猶太屯墾者所居住、且鄰近以色列的大塊西岸屯墾區，未來巴勒斯坦國家的西方邊界應充分調整，使以色列得以兼併這些區塊；以色列會為這些邊界的修正，透過給予其他地方的土地補償巴勒斯坦人（被稱為「土地交換」）。柯林頓繼續說道，至於未來巴勒斯坦國家的國界線，將沿著約旦河的東部，巴勒斯坦人會得到一直以來企盼的主權，但為防阿拉伯聯合從東部、也就是約旦河對岸進犯，出於以色列的安全考量，會有一些防範措施。至於巴勒斯坦難民，柯林頓繼續說道，這個問題將被解決，一部分難民得以回到以色列本土，就此巴勒斯坦的「返家權」要求，至少象徵性地達成。剩餘的難民，則會有國際組織幫助他們在未來的巴勒斯坦國家或其他國家重建家園；柯林頓提到在一次與阿拉法特的對談中，阿拉法特曾經同意讓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到加拿大而非以色列。[12]關於耶路撒冷，柯林頓的文字仍然模稜兩可，因為這是所有事情中最敏感的議題，最好留待高峰會稍後階段再敘，以免太早談及，而導致尚未成熟的會談破裂。

巴拉克對美國的策略並不意外，因為他在華府的間諜遠在他出發前往大衛營前就向他報告此事，這給了他相當足夠的時間對美國路線做出反應：他不支持。他向柯林頓解釋道，如柯林頓現在所做的，以一篇文字羅列出原則為這個高峰會揭幕，會限制巴拉克需要的非正式交易能力，他在這些交易中可以看清阿拉法特是認真看待大衛營之事，或僅想從以色列身上榨取更多讓步。換言之，總理想透過與巴勒斯坦人協商的過程，達到柯林頓寫在他講稿中的內容。也或許就如同他過去與敘利亞的協商，巴拉克想要在其以色列民眾面前做做樣子，使他們覺得協商困難、不容易獲得讓步；亦如同柯林頓後來在其回憶錄中所說，他想要「溫火慢熬幾天」。[13]但是巴拉克不想被看成在直接否定總統的想法，他告訴柯林頓，美國的講稿需要修改，透過分別標示「I」和「P」使以巴立場並呈，修改完畢後，他會配合，雙方亦會以此開場。

柯林頓退讓了，他承諾兩天內會提出修正版本，這種作風在會議中反覆上演。巴拉克也堅持這新的美國草案在柯林頓向阿拉法特發表**之前**，須先讓他過目。柯林頓必須同意，因為他必然知道一九九八年他的國務卿給予巴拉克的前任總理的承諾，其內容迄今仍有效，其中歐布萊特承諾要**先**與以色列商量。下面是她的信函：

國務卿，華盛頓，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機密。

親愛的總理，

美國知道要避免提出以色列不滿意的提案，因此美國欲提出的供雙方考量的想法，都會事先與以色列商議。尤其是對於國安或國界相關的安全考量……

真誠地　馬德琳．歐布萊特[14]

美國承諾有效地給予以色列一張通行證，得以裁決任何美國和平提案，且也強化了一種信念，身經百戰的美國外交官亞倫．大衛．米勒（Aaron David Miller）曾形容：「若得不到以色列的信任，你就沒有機會建立任何和平進程。」[15]也許的確如此，但是它無法減輕巴勒斯坦的猜忌：美國不管在大衛營還是任何其他地方，均未擔任中立的裁判，而由以色列決定了美國的立場。

最後，美國提案修正後，以色列人驚訝地發現通篇文章中關於耶路撒冷的想法都沒有標註「I」或「P」；有效力地表示雙方已經同意耶路撒冷現存的市政系統中，有兩個首都，且此城須與巴勒斯坦人共享。總理派出他的助手達尼．亞托姆向白宮表示抗議；亞托姆回報，美國說這僅是「無心之過」，他們當場就改變文字，在「耶路撒冷」前加上「擴張」一詞。這表示任何耶路撒冷的分割發生**之前**，都必須先擴充耶路撒冷市區，以含括更多西岸巴勒斯坦地區，這使以色列人可以在新的、擴充後的城市中，讓出一塊像是郊區阿布迪斯周邊的土地給阿拉法特作為首都。

巴勒斯坦人對於此文亦不滿意。主要的巴勒斯坦協商者薩博．埃雷卡特回憶道：「當我〔為阿拉法特〕翻譯文件提到耶路撒冷之處……他義憤填膺……阿拉法特將這份文稿從我手中抽出，丟到半空中，然後說：『這完全行不通』。」[16]令巴勒斯坦人尤其忿忿難平的是，他們察覺到這份文稿中

以色列介入的斧鑿痕跡；巴勒斯坦猜到這是以色列在背後下指導棋，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擴張」等字是以手寫的方式加上去。

後來，巴拉克與柯林頓總統一起坐在阿斯彭的陽台上，他提出美國文稿中的耶路撒冷議題，意味著這不是無心之過：「我對於〔美國文稿的〕內容、對於我們作為人類、對於我們自己身為領袖都感到失望，」他說。[17]「我們屢次談話，最基本的共識是您不會〔使我們〕錯愕震驚。而我必須告訴您，我覺得非常錯愕……我想請您不要再讓這種事重演……」這是重話，柯林頓總統立即道歉，由此看出巴拉克其實才是這場會議運籌帷幄之人。柯林頓深表歉意，「昨天發生的事是我的過失……因為時間壓力，他們〔美國小組〕只能急就章。」總理堅決撤銷作為協商基礎的美國文稿，因為在與阿拉法特達成和平之前，他不想要任何白紙黑字的東西，趁總統尷尬之際，他說道：「也許我們以完全沒有文稿的形式開始是最好的……你們美國人，應該說這份文稿是非正式的，我們應該在沒有文稿的情況下開始討論。」仍為巴拉克的進攻感到暈頭轉向的柯林頓，再次投其所好地說：「我們同意，這份文稿不存在了。」

這或許是柯林頓在這場高峰會中最大的錯誤。他急於迎合取悅，無法堅持立場，尤其在巴拉克面前。這導致高峰會中嚴重的立場傾斜，然而這場高峰會只有同時對巴勒斯坦人及以色列人施加強勁的壓力才能成功。柯林頓需要的不是同情心，而是大公無私的堅定和領袖特質。後來在此事上，柯林頓在其回憶錄中形容巴拉克為一個「聰明的文藝復興者」，也許是因為對他的仰慕，使柯林頓對巴拉克如此寬大為懷。[18]

在美國的文稿退場後，雙方被告知接下來所有的討論都會以純粹口語方式進行。協商邀四方參與，會觸及衝突的核心議題，亦即國界和屯墾區、難民、安全，以及最重要的耶路撒冷。但由於沒有文稿引領討論方向，會議混亂無序，美國人完全沒有控制局面的能力。

壓力鍋

在高峰會的第四天，總統召集阿拉法特和巴拉克到阿斯彭召開三方會議。下面是他們對話的逐字記錄：

柯林頓：還有許多事必須進行……如果不加快腳步……我們不會結束……我們有時間的問題……你們兩位都明智且勇敢……

阿拉法特：您的話給了我們推進的動力……我以我和巴拉克之名向您承諾，我們會聽從您的指示。

巴拉克：我感覺〔已故的〕拉賓〔叫我們〕向前邁進……結束戰爭。

柯林頓：如同他在對我們微笑。

巴拉克：還有〔已故的〕沙達特和比金。

柯林頓：他們全部都在對我們說「上工吧，同志」！[19]

隔天，七月十五日星期六，美國小組的丹尼斯．羅斯來面見巴拉克，說四個討論小組都沒有任何進展，「如果今天事情仍然沒有起色，那麼就無望了……我們需要一些紙上作業……書寫與同意……**我不明白為何你駁斥我們的第一份文稿**……我需要知道你的底線。」[20]巴拉克回答：

巴勒斯坦人一點進展都沒有，你們現在卻問我要底線……要我在他們無所作為時給出更多讓步。如果他們不採取行動，就不會有協議。若這位領導者不明白做出失敗的決定，他〔就無法成為〕巴勒斯坦國家的總統，〔只能〕被丟回原點……他就不會行動……我覺得你們並未讓阿拉法特體認到，若他不採取行動會失去很多。

為了使事情有所進展，柯林頓總統嘗試了新方法，召開替代會談，讓雙方毫無邊際地展開協商。他們會在被隔離的情況下試著勾勒出協議的輪廓，但是——這是關鍵——阿拉法特或巴拉克若覺得他們的手下太超過，它們有權否定所有協議結果。協議結束後，協商者會直接向柯林頓總統和他們各自的領導人報告。

巴拉克派出他的部長什洛莫．本—阿米（Shlomo Ben-Ami）和其助手吉利德．謝爾（Gilead Sher）為代表；阿拉法特則將正在大衛營電影院觀賞影片的薩博．埃雷卡特和穆罕默德．達蘭召集

過去，指示他們要「多用腦」。埃雷卡特憶及他們出發前往晚間會議前，阿拉法特「抓住我，並說：『薩博，對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耶路撒冷——聖殿山』」。[21]

這晚是場協商的硬仗，觸及了眾多議題，從未來巴勒斯坦國家疆界、佔領地上屯墾區的命運到耶路撒冷，情緒益發沸騰。當他們討論對巴勒斯坦難民的補償方案時，以色列協談者一度堅稱，一九四八年離開阿拉伯國家的猶太難民移居到新建立的以色列也是一種補償。但是對埃雷卡特而言，這太過分了。「不，先生，」他向謝爾吼道：

你不會因你歷年來的佔領得到補償。如果你想要繼續在此處作文章的話，我們要求你為日復一日的佔領做出補償。有人佔領了我三十五年，然後回來跟我要補償嗎？你奪走我的童年。當你的佔領觸及我的家鄉耶律哥時，我年僅十二歲。我從此再也不是同一個人了，你剝奪了我正常生活的權利。而現在你想要為此得到賠償？我會計算每個鐘頭，並且找出所有合法的方式讓你為每一個該死的鐘頭付出代價，〔每一次〕殺戮、拆除房屋、沒收土地、關閉學校、強制驅逐、傷害和殺戮……[22]

在這協商之夜過後，以色列人隔天向巴拉克報告。他們向巴勒斯坦協商者提議，以色列看情況從西岸土地的百分之八十九點五撤出，讓他們在那裡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此時加薩走廊三分之一仍在以色列佔領之下，他們也提議完全撤離加薩。以色列還提供巴勒斯坦政府東耶路撒冷外圍數個

社區的主權，以及一個連結加薩走廊和西岸的地帶（「安全通道」），讓人貨得以通行巴勒斯坦的兩個地區，除此之外尚有其他讓步。相對地，巴勒斯坦人則同意容許以色列政權統治一九六七年以來在東耶路撒冷佔領區建立的所有猶太屯墾區，他們也同意以色列主掌哭牆、猶太聖地和部分耶路撒冷西牆。

聽到他部下的讓與，總理並未跌回座中，但他要他的兩位協商者向柯林頓總統報告，巴拉克「無法接受這個提案……」，[23]他不欣賞巴勒斯坦人給出的讓步，或至少這是他想表現的態度。當其代表向柯林頓報告時，巴拉克著手寫信給柯林頓：「我認為什洛莫．本—阿米和吉利德．謝爾昨晚的討論其差無比，這不是協商，這是意圖操控和推迫我們到一個我們完全無法接受的境地，巴勒斯坦方卻文風不動……我不想要使以色列國家傾頹，也不願士氣崩落……我不會讓這件事發生。」[24]然後他繼續解釋，他認為如何可讓事情進展得更好，也就是：「只有總統強力搖撼阿拉法特，才有進展的機會……只有阿拉法特清楚這是事實，他才會有所行動。他必須明白他有機會成功建立巴勒斯坦國家……否則便是悲劇……」美國小組的馬丁．印狄克看了巴拉克給柯林頓的信，認為巴拉克想做的是將這場高峰會變成一個壓力鍋，希望柯林頓總統將阿拉法特丟進鍋中，然後加熱。[25]

七月十六日星期日（高峰會第六天），柯林頓總統到巴拉克的住處，報告他與阿拉法特重要談話的內容。他似乎採納了總理的建議，對巴勒斯坦領導人施壓：「這是我與阿拉法特有過最強硬的會議。」柯林頓報告，並繼續敘述他向阿拉法特說的話：

> 你必須抉擇……你一直在向我編故事……你不能期待從巴拉克那裡得到更多……如果你不提出任何提議，那麼我們現在就結束吧……以色列一直是理性的，你卻不是……你會無法建國……我希望你振作，給我一些讓步……你不是在良性溝通……以色列是在良性溝通，你卻不是……你會失去唾手可得的東西……[26]

柯林頓描述阿拉法特「發抖並且道歉……他沒有任何人可以諮詢。他向我說：『您真的是我的心理師……』我對他態度強硬……〔我向阿拉法特說〕『這些都是鬼扯……鬼扯……瘋了』」。巴拉克的回答無疑地有些誇大：「我經歷過戰爭和危險，但是今天早上或許是我生命中最難熬的日子……」然後，他煞有其事地說：「什洛莫〔本—阿米〕和吉利德〔謝爾〕昨晚已經超出我可以接受的極限……如果這個提案成真，阿拉法特文風不動，那麼我們就要準備開戰了……我懇求您，如果他端出了可笑的提議，不要叫我……您承諾〔若高峰會失敗〕不會責怪他，這必須是建立在他良性協商的基礎上……」

現在很顯然地，巴拉克開始將高峰會的失敗歸罪於阿拉法特。然而，重要的是，記錄清楚顯示，柯林頓在高峰會前已經承諾阿拉法特，若高峰會失敗，不會怪罪他，而這**沒有任何附加條件**；不若現在巴拉克正在做的，將之嫁接到阿拉法特是否良性溝通之上。柯林頓說，他會請阿拉法特回覆是否接受巴拉克部屬們在非正式夜談中給出的提案，並說：「好，我要打電話給〔我的女兒〕雀兒喜（Chelsea）了……如果他說出什麼渾話……我會把他攆出去。」

後來，總統向巴拉克報告阿拉法特的回應：「他已經很接近您的領土需求，」柯林頓說，「而我認為這大約是百分之八到十〔併入以色列，為了大塊屯墾區之故〕。」[27]柯林頓的言論是可疑的：所謂的「大約百分之八到十」的西岸土地併入以色列，這似乎意指阿拉法特同意給出遠遠超過巴勒斯坦人有史以來所明確聲明的，若此為真，將是重大突破，但這會不會僅是柯林頓對阿拉法特的**臆測**，將阿拉法特的話加上正面的註解，好讓巴拉克繼續協商？柯林頓補充道，阿拉法特「想要以土地交換」作為以色列兼併之領土的補償，「但僅是象徵性的」。

既然現在重大突破的國界議題似乎已經解決，很顯然地雙方要開始面對最具爭議的議題了。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爭相設之為首都的城市，在高峰會第七天（七月十七日）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雙方都覺得（雖然他們不願公開說出），耶路撒冷應該可以有一些討價還價的空間。雙方對這個地方都有著強烈的情感，尤其是耶路撒冷舊城的心臟——猶太的聖殿山，亦即穆斯林的哈拉姆謝里夫，對此他們不可能妥協。哈拉姆謝里夫是一個複合字，意味著尊貴的聖所，實際坐落在聖殿山頂，以巴雙方尋求的都不僅是實際控制這個地方，而是能夠名正言順地被視為擁有當地的主權。

現在在大衛營，柯林頓總統權傾一方，他向巴拉克說：「我接受您對聖殿山的主權」，這意味著整個地方包括聖地（哈拉姆）。但他繼續解釋道：「對我而言，最好的方式是在不損及您主權的情況下，畫給他一個〔關於耶路撒冷的〕大餅。」[28]現在柯林頓想要看看巴拉克是否可以提供一個讓阿拉法特滿意、並使會議有一個圓滿結局的耶路撒冷提案。在與柯林頓面談的深夜，巴拉克給了他通行證，讓他試圖找出解決辦法，巴拉克說：「我可以接受。」這將是**美國**給阿拉法特的提案，而不是巴拉克的。總統將告訴阿拉法特，他會想辦法讓巴拉克點頭。會議後，巴拉克在其住處向其國務卿達尼·亞托姆報告其提案，而亞托姆寫下記錄。從記錄中可見，巴拉克授權柯林頓就耶路撒冷議題提供阿拉法特一些他可以承受的東西的交換條件是——在美國軍事協助方面提出許多要求：「〔我要求〕提供F-22〔戰機〕、戰斧〔巡航導彈〕……一個〔以色列和美國之間的〕防禦協定，這包含了非常規飛彈攻擊和常規攻擊……〔例如，若有人對以色列發動非常規武力攻擊，美國會報以同等級的攻擊〕……」最後，巴拉克告訴亞托姆：「我告訴他〔柯林頓〕，他們不可以動我們的非常規武力……」[29]後者，想當然耳，指的是以色列的核武。

然而，很快地就可看出柯林頓對阿拉法特一籌莫展。這位巴勒斯坦領導者堅稱，只會同意賦予他阿拉伯屬東耶路撒冷（包含哈拉姆謝里夫／聖殿山）完整主權的協議，而這一點，柯林頓知道巴拉克定然不會接受。在益發沮喪的情況下，柯林頓告訴巴拉克，唯一能做的就是結束高峰會。巴拉克請柯林頓給他一些時間考慮他的下一步。

請阿拉法特入甕？

當巴拉克和柯林頓再次在巴拉克的住屋會面，他們請記錄員迴避，所以沒有會議記錄可循。巴拉克表示，他現在會給柯林頓一筆「押金」，內容涵蓋廣泛，將由柯林頓總統轉交給阿拉法特。然而名義上，這並非直接來自巴拉克的提議，而是以柯林頓的名義提出他認為（一旦阿拉法特首肯），或許能夠從巴拉克總理那裡取得的斬獲。巴拉克提案主旨如下：以色列會結束加薩走廊與西岸的佔領，但是考量到其屯墾區，須保留百分之九的西岸土地，為此他會贈與阿拉法特接近加薩走廊的、占地百分之一的以色列土地作為補償；以色列也會給阿拉法特百分之八十五與約旦接壤的邊界主權。在耶路撒冷，九個外圍社區中的七個會移交給巴勒斯坦政府；巴勒斯坦則負責耶路撒冷內部社區的城市規劃；在舊城，他們會擁有穆斯林和天主教社區。聖殿山／哈拉姆，聯合國安理會會通過決議案將之交給巴勒斯坦、摩洛哥和耶路撒冷委員會主席（Chair of the Jerusalem Committee，耶路撒冷的伊斯蘭高層委員會），但相當重要的是，以色列會維持對於遺址與聖殿山的主權。在國安方面，巴勒斯坦必須符合以色列的需求，包括和約簽訂後十二年，以色列仍有約旦谷地的控制權，使它得以防禦伊拉克之屬可能的進犯，並阻斷軍武從約旦河對岸走私到巴勒斯坦地區。難民處置議題上，巴拉克說可能會有「一個皆大歡喜的解決辦法」。然後他補充道，若阿拉法特拒絕這組套裝方案，那麼阿拉法特**果真**就是他認為的那種人；如同巴拉克說過的：「如果他看起來像瘋子，走路也像瘋子，嘎嘎叫時也像瘋子，那麼他大概**真的是**一個瘋子。」

無庸置疑地，巴拉克給予阿拉法特的提案，允諾了許多土地和其他方面的讓步，尤其在耶路撒冷部分。在一九六七年兼併後數年間，統一的耶路撒冷已經變成猶太國家認同的重要部分，而將其心臟——舊城——切開一半讓與阿拉法特，如同美國小組馬丁．印狄克所正確觀察到的：「若非前所未有的果敢和領導特質使然，就是完全失去理智了。」[30]話雖如此，也必須注意巴拉克仍然拒絕給予對阿拉法特而言**最重要**的東西：聖殿山的主權。

這是否是巴拉克的另一個馬基維利式陷阱，欲誘引阿拉法特入甕？是否巴拉克已預期不論對其他議題有多麼大方，只要提案不包含巴勒斯坦對聖殿山的主權，阿拉法特必會拒絕，以此巴拉克可以做出願意釋出重大讓步的姿態，但實際上卻因知道這不會奏效而得以自安，甚至還可以從容離開大衛營，並將阿拉法特打造成不想要和平之人？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儘管如此，這仍是大衛營最為戲劇性的時刻。柯林頓的國安顧問桑迪．柏杰回憶：「巴拉克向總統提出的方案極為戲劇化……總統回到阿斯彭會議廳，只召見馬德琳〔歐布萊特〕、丹尼斯〔羅斯〕和我，他坐下就說：『我想我們現在有些事要做了。』」[31]

柯林頓要求單獨面見阿拉法特，只有國務院翻譯賈邁勒．希拉勒（Gamal Helal）在場翻譯對話；所有其他美國小組成員都退到廚房。柏杰記得「我們都聚集在門後方，我們之中的一個人會輪流走到門邊，打開一點縫隙，從窗戶偷看以得知事情的進展」。[32]在主廳中，柯林頓向阿拉法特提出了巴拉克的提案。柏杰說：

柯林頓對阿拉法特使出渾身解數。他一招一式都在誘引、說服，有時甚至有些嚇人。他一度俯身阿拉法特上方。阿拉法特大部分都專心聆聽，但是在被這六呎四吋（一九三公分）的龐然大物籠罩、且在柯林頓說道這會是歷史性的一刻時，他逐步逼近阿拉法特的臉，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後者看起來有些無助。

阿拉法特說他需要一些時間考慮，他會給總統答覆。七月十九日週三早晨，阿拉法特終於交出下面這封信：

親愛的柯林頓總統：

由於我們現在所進行的討論和議題事關重大，尤其是耶路撒冷議題……我們認為必須與巴勒斯坦領導階層商議……我們想要表達的是，我們願意繼續協商，地點將由您決定……[33]

柯林頓嗅出異樣。他認為阿拉法特的信，意味著要將巴拉克的提案「裝入口袋」，然後以此作為另一個高峰會的開場，以要求更多讓步。柯林頓也理解到若他現在讓阿拉法特脫身，讓他離開大衛營，他可能失去所有這壓力鍋環境擁有的優勢。因此他要求阿拉法特給予他一個直截的答案——就在此時此地。然而這個答案揭曉了，就是個「不」字。聽到這個消息，輪到巴拉克寫信給柯林頓了：

親愛的總統先生：

我寫這封信向您表達我深深的感謝和關切……

很遺憾地，我今天早上得知高峰會會以失敗收場。我們很強烈感覺到巴勒斯坦方並未良性溝通，也不願因應我們的需求而認真調整……很顯然地，巴勒斯坦領導層在此刻已違背其承諾——結束衝突……現狀會導致此區情況江河日下。我們應該盡全力避免如此……[34]

巴拉克的這封信結束在請求繼續奧斯陸和平進程（「我再度肯定我們為達成協議所付出的努力」）。

在與巴拉克的後續會議上，柯林頓顯然十分苦惱，他感謝巴拉克的信，並且告訴巴拉克他也有同感。他補充道：「我會支持並保護你，我站在你這邊……這實在令人憤怒……所有阿拉伯人都一樣……〔他們都試圖從你那裡〕敲詐……」柯林頓繼續向巴拉克說道，當他批評阿拉法特不合作時，阿拉法特開始他的「小演說」：「我敬愛您且感謝您」，以此分散對實際議題的注意力——他根本不想一起為找到衝突的解決方式而努力。[35]

政治流氓

高峰會進行至現在，巴拉克都拒絕與阿拉法特面對面，但是現在柯林頓建議他們這麼做，因為這樣的會議會給巴拉克正面形象，如此他就不會被指控沒有傾盡全力達成和平。然而，巴拉克興趣

缺缺。「我們已經小心翼翼地不給予他美國或以色列〔書面〕文稿，如此他就不會有記錄在手……」巴拉克說，「他需要〔與我有〕一個〔面對面的〕會議，以留檔存證……」柯林頓再度勸諫，但是巴拉克不為所動。

後來柯林頓向巴拉克報告，他與埃及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和其他人談話，請他們幫忙說服阿拉法特接受提案。[36]以現在的眼光來看，讓阿拉伯領導者如沙烏地、約旦，尤其是埃及等巴勒斯坦的非官方護衛者被蒙在鼓裡，並且在高峰會前或期間均無法強化其支持，是一件極大的錯誤；而今當討論已經定案，且在他們完全不知道細節與細微處的情況下，希望他們介入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記得：「我接到美國總統的電話，他告訴我，我必須打電話給阿拉法特，驅策他接受耶路撒冷的提案。我問他，『條件是什麼？』總統說：『我不能告訴你，因為我承諾不洩漏任何細節……』〔所以我說〕『謝謝你，總統先生。我愛莫能助。』」[37]事實上，阿拉伯領導者不但不驅策阿拉法特接受，反而敦促他維持他的剛毅不撓，尤其是在耶路撒冷一事上。

柯林頓也向巴拉克表示，巴勒斯坦人「嚇得屁滾尿流」，他們會因高峰會的失敗受到譴責，故而希望繼續協商。巴拉克回答道：「我們都是成人了……不是兒戲……他們都在胡搞……他們玩弄了我們。」柯林頓向巴拉克敘述巴勒斯坦陣營的情況，「問題是他們都必須召開委員會決議事情……在那裡唇槍舌劍。」柯林頓一再請求巴拉克與阿拉法特並席而坐，直接解決事情，但是巴拉克再度拒絕：「我不會跟一個混混走進同一間房……他是一個政治流氓……」柯林頓：「但是你並沒有與他協商過。」巴拉克：「**他**不曾協商過……」柯林頓：「你認為不正視他是對的嗎？」巴拉克：「我不想要見他。」柯林頓：「你想要離開然後將這一切都搗毀？」巴拉克：「我會宣布我們沒有合作夥伴，只有操控者……」[38]

破局

柯林頓必須暫時離開前往參加一個計畫已久的、在日本沖繩舉行的八人高峰會，但是他向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施壓，要求他們留在大衛營繼續協商。由於巴拉克或阿拉法特都不願被視為會議的破壞者，他們同意留下來，在國務卿馬德琳的監督下繼續協商；但是因為柯林頓人已在日本，他們便退回各自的舍宅，中斷了協商。

歐布萊特試著至少改善大衛營走味的氣氛，巴拉克獲准離開大衛營去蓋茲堡戰場（Gettysburg battlefield）一日遊。而阿拉法特當然也必須被恩准離開，所以歐布萊特邀請他到她的農場，距此二十五分鐘車程。她回憶道：

> 我們剛抵達時，我年方兩歲的孫子剛剛午睡醒來，他一看到阿拉法特就尖叫，我想完蛋了。然後，我們坐在游泳池旁邊，阿拉法特講故事……他喜歡卡通《湯姆與傑利》（*Tom and Jerry*），他把我另一個在跳板跳水的孫子逗得好開心，他還親吻了我的孫女，然後我們拍了一張完全不合邏輯的照片，阿拉法特穿著他的制服，站在所有這些穿著泳裝和浴袍的人身邊，看起來好像

是後製剪貼進我們之間的。[39]

回到大衛營，協商代表在大衛營的保齡球道玩著保齡球。電影院放映著《神鬼戰士》（*Gladiator*）。他們都在休假中，只等總統回營。

七月二十三日，柯林頓從日本回來，與總理並肩而坐。現在巴拉克強調他是多麼想要達成協議，結束以巴衝突。「不論任何利誘，我們都矢志不移。」他建議柯林頓再去找阿拉法特，問後者對於他去日本前的提案有何回覆。巴拉克補充道：

> 我不能再退了……這是我能通過〔以色列公投〕的最大讓步……這僅是策略性的，但卻是真的……這〔對〕巴勒斯坦人是一個公平的交易……阿拉法特必須了解，現在不做就永遠不可能了；且在數週或數月後，他可以得到一個擁有百分之九十土地的國家，有效的國界，可以自由移動到不同的國家……他會得到東耶路撒冷的一部分……這對他而言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現在是讓他決定他要當國家領導者，或是幫派老大的時候了……[40]

巴拉克試圖使柯林頓安心地相信，阿拉伯世界不論如何都會支持阿拉法特，但是柯林頓不如是想。「如果阿拉法特放棄〔耶路撒冷〕清真寺的主權，沙烏地阿拉伯會把他碎屍萬段。」的確，其同事阿克拉姆．哈尼葉（Akram Hanieh）說，此觀點正反映了阿拉法特對柯林頓和其小組所說的：

> 耶路撒冷不僅是一個巴勒斯坦城市，它是阿拉伯、伊斯蘭和基督教城市。如果我要為耶路撒冷做任何決定，我必須與遜尼派、什葉派，還有所有阿拉伯國家商議。我必須與眾多國家討論，從伊朗、巴基斯坦，到印尼、孟加拉，遠至奈及利亞。你認為所有人都會同意放棄耶路撒冷和阿克薩清真寺嗎？[41]

柯林頓說如果阿拉法特不願合作、給予巴拉克的提案正面回應，那麼「我會責怪他〔阿拉法特〕……我會說你〔巴拉克〕已經盡一切所能，是他沒有恰當地回應……你已經很勇敢地行動了。是他們沒有恰當地回應」。這很顯然與柯林頓當初在高峰會之前承諾阿拉法特的天差地別，他承諾過即使會議失敗，都不會責怪阿拉法特。

現在，總理停止協議，開始準備與巴勒斯坦人衝突，他打電話給在以色列的沙巴克領導人阿維．狄契特（Avi Dichter）警告道：「我們大概要失敗了……準備好迎戰」；他也傳了相似的訊息給軍隊參謀長。

同時柯林頓面見阿拉法特，詢問為何在他去日本之前，阿拉法特仍然拒絕對提案給予正面答覆，對此阿拉法特答道：「你想要參加我的葬禮嗎？我寧願死，也不願同意以色列對聖地的主權。

我不想要變成阿拉伯和穆斯林歷史中的叛徒……我們會解放耶路撒冷，也許不是現在，但是一百年後必然如此。」[42]柯林頓怒斥：「巴拉克讓步了，你卻沒有……我們在談國家，不是宗教。你不是曾夢想得到基督徒區和穆斯林區的主權……還有一個巴勒斯坦國家嗎？〔現在巴拉克都雙手奉上了〕……」但是阿拉法特不動如山。

當晚（七月二十四日）稍後，柯林頓決定最後一搏，他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協商代表同席而坐。他給巴勒斯坦人耶路撒冷外圍轄區的主權；耶路撒冷內部社區的有限主權；舊城穆斯林區和基督徒區的主權，以及他認為可以讓阿拉法特心動的東西，他稱之為聖地的「保管主權」（custodial sovereignty），一個國際法中從未聽過的詞彙；然後他在會議中請巴方代表將新提案轉達阿拉法特，請他慎重考慮。巴勒斯坦人讀了提案，但由於未獲得耶路撒冷聖殿山的全部主權，他們覺得無法給予正面的答案。會議進行到三點鐘，阿拉法特派遣他的代表穆罕默德．達蘭與薩博．埃雷卡特，將一封拒絕提案的信交給柯林頓。達蘭記得：

> 那天下著雨，我們走向柯林頓總統……當然，柯林頓總統在我們踏進房中的那一刻，就從我們的姿態中……得知我們帶著一封拒絕信……我們走進去的樣子、我們的表現都再清楚不過，但是那是令人動容的時刻。[43]

凌晨三點十五分，柯林頓總統打電話給巴拉克，告訴他阿拉法特拒絕了提案。數小時後，巴拉克在道格伍德別館（Dogwood cabin）中召集了他的協商代表，宣布高峰會垮台，看來「我們沒有談和的對象了」。[44]他補充道：「現在真正的戰役在我們的國家……直到如今，阿拉法特都未準備好要結束衝突，但是他也許有別的策略……想藉由〔與以色列……〕的局部衝突，得到〔他想要的……〕。」

柯林頓和歐布萊特來到巴拉克的住處，討論在會議閉幕時柯林頓的講詞。柯林頓說：「我會說您已經表現出勇敢與果決，阿拉法特則靜默無聲……還有您英明睿智。」[45]回顧了近兩週大衛營的情況，柯林頓說巴勒斯坦人「懷著其差無比的策略來到這裡……阿拉法特已經七十二歲了，他一直以來都僅是一個革命領袖，他身邊的人們都已垂垂老矣……阿拉法特與真實世界脫節了……他不住在我們這個世界。我們總是不斷嘗試找出替代方案〔但是他沒有……〕」。

演練過一次講詞後，巴拉克告訴柯林頓他可以接受，並說既然阿拉法特不願妥協，「我不會再給他〔撤離更多佔領地〕。」柯林頓承諾會支持他。這是另一次的出爾反爾，因為在高峰會前，柯林頓不僅承諾若高峰會垮台，他不會怪罪阿拉法特，還承諾會依照先前的協議，持續讓以色列轉交土地給巴勒斯坦人。在會議後，巴拉克說道：「把阿拉法特塑造為不願讓步的人，我便能立刻停止轉交土地給他……」[46]

因為上述所有現實因素，高峰會結束了，而阿拉法特成為千夫所指的和平破壞者。

美國偉大的外交官季辛吉曾觀察出協商只有在一種條件下才能成功，也就是雙方的最低條件可以被滿足。[47]在大衛營，阿拉法特的最低條件並沒有被滿足，給予他的提案遠不能滿足他的需求。的確，巴拉克的提案大方，影響深遠，且在土地的讓步和耶路撒冷的未來等所有事情上，他都比他之前的歷任總理還要慷慨。但是這些都與阿拉法特需要的天差地別；因為對他而言，關鍵是耶路撒冷，他覺得他沒有立場對聖地擅作主張，因為其影響的不僅是巴勒斯坦人，還有更廣大的穆斯林群體。對他而言，土地的重要性遠遠不及情感與伊斯蘭價值觀，很顯然地，他不可能在不被賦予聖殿山完整主權的情況下，簽訂任何協議而未得到阿拉伯的支持，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和約旦的支持；然而，這並非此時此刻所能達成，須由美國人事先策劃。

巴拉克一直以來堅決反對與阿拉法特面對面協商，若召開面對面協商，能夠有所斬獲嗎？即使是現在，我們也無從清楚得知此種會議是否有助於動搖阿拉法特的立場，使高峰會起死回生，因為主要的問題在於大議題的歧見（不僅是耶路撒冷，更是難民營的命運），鴻溝太深，難以彌合。但可以確定的是，巴拉克從未能真正與阿拉法特溝通，這對事情是沒有幫助的。

儘管大衛營高峰會破局，在二〇〇〇年夏天所發生的一切，無疑地會被未來的歷史學家視為解決以巴衝突和結束佔領重要的一頁，因為它釐清了主要的議題，使雙方可以先消化一些未來協商會需要處理的事情。

山雨欲來風滿樓

高峰會結束後，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兩方最急切的就是將失敗責任推諉給對方；這對於爭取國內和國際支持至關重要。由於七月二十九日，阿拉法特必須到巴黎面見法國總統賈克．席哈克（Jacques Chirac），解釋為何他拒絕接受大衛營的提案，巴拉克前一天便致電席哈克，先發制人地告知了他的故事版本，並籲請席哈克「鼓勵阿拉法特做出可以幫助我們達成協議的決定……」。[48]

這是暴風雨前的寧靜，不過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美國外交官的溝通仍然維持暢通，以確保預料中的大規模衝突能夠避免。八月三十日，巴拉克總理與柯林頓總統的特使丹尼斯．羅斯見面，在場還有大使印狄克、特別顧問羅伯特．馬利和美國外交官賈邁勒．希拉勒，希拉勒來到以色列是為了了解雙方是否有機會重回和平談判桌。巴拉克問他的客人：「我們有談和對象〔指阿拉法特〕嗎？還是我們僅在與某個並非真正想要和平協議的人周旋？」[49]賈邁勒．希拉勒是一位埃及出生的美國人和國務院專家，他也是柯林頓總統與阿拉伯領袖的會議翻譯，他非常了解阿拉法特，他說：「我不清楚……從大衛營回來後，阿拉法特被視為凱旋歸來的英雄，而這是他的感受……〔他認為他是〕耶路撒冷的捍衛者。我不清楚他是否還在歡快的感受之中，還是已經回到現實了。」

九月六日，巴拉克在電話中告訴柯林頓總統：「我決定與阿拉法特再做一次和平嘗試……」[50]柯林頓態度強硬地說，大衛營後「阿拉法特拜訪了三十個國家……也許他更喜歡像摩西一樣環遊世界……如果你和我都離職了，他怎麼占得到便宜？」柯林頓和巴拉克開始想著如何重回以巴和平會

談，或許設在華府，接下來他們數度在電話中長談以發展其計畫，打算在大衛營的基礎上，試圖彌合剩下的歧異之處。巴拉克甚至表示將與阿拉法特面談（這是目前為止他一直不願意做的事情），以增進兩者間的關係，並且發動新的提案；柯林頓就此建議說道：「我看不出與阿拉法特的這種會面有什麼不妥。」

九月二十五日，大衛營高峰會垮台後剛滿兩個月，巴拉克派遣黑鷹直升機到拉馬拉，將阿拉法特及其同僚接到他在科柴夫亞爾（Kochav Yair）的家共進晚餐，試圖破鏡重圓。他們事前已同意在會議結束後，馬上派人參加為期三天在華府的和平會談。在他們的會議上，巴拉克告訴阿拉法特：「這是真實的一刻……我們沒有太多時間了。」[51]阿拉法特的話很少，如同他平時在此類會議中的表現，以他不熱絡的、低喃式的態度說：「是的、是的……時間不多了……可能有事會發生。」但是他的確表達了他最深的關切：在野黨右派利庫德集團黨魁艾里爾．夏隆最近宣告，將拜訪正值敏感話題的耶路撒冷聖殿山，這可能導致尖銳的流血衝突。這樣的到訪必然激怒穆斯林，因為猶太聖殿是深埋在地下的，但「拜訪」聖殿山，則很明顯地指的是走進聖殿山（哈拉姆謝里夫）園區內，那裡有著許多清真寺，包括神聖的阿克薩清真寺。大衛營高峰會後，這個區域變成了火藥庫；畢竟，正是因為這個地方的權力歸屬問題而導致協議失敗，高峰會破局。

12 阿克薩起義（二〇〇〇～二〇〇一）

二〇〇〇年九月二十八日，艾里爾．夏隆造訪聖殿山，這件事成為巴勒斯坦佔領地歷史的分水嶺。這位利庫德黨魁受到嚴密的警備保護，以防巴勒斯坦可能的攻擊，他於早晨抵達，並在聖地中遊歷了半個鐘頭。一位阿克薩清真寺的巴勒斯坦守衛哈杰．卡米爾（Haj Kamil）記得，夏隆在清真寺前廣場逡巡時，「非常挑釁地羞辱巴勒斯坦人和穆斯林聖地……我們開始喊叫，叫他離開：『滾出清真寺，神聖的清真寺，阿克薩清真寺……』〔夏隆的保鏢〕用棍棒打我……」[1]在他參觀時僅有少許的干擾，參觀後當天巴勒斯坦人向聖地附近警察投擲石頭之事亦零星出現。從現在的角度看來，這些事件是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的序幕，它還有一個更為人知且充滿宗教意涵的名稱——「阿克薩起義」（al-Aqsa *intifada*）。

巴拉克本可以阻止夏隆參觀此地，尤其阿拉法特已在他們九月二十五日的會晤上警告過他，這樣的挑釁造訪可能引發嚴重後果，為何巴拉克仍不阻止，我們無從得知。在筆者的訪談中，巴拉克

說只是因為他沒有權力阻止任何人參觀聖地，包括反對陣營的黨魁，除非它對國安造成威脅。但是當然後續之事很清楚地顯示，它的確危及國安。因為對夏隆而言，造訪此地的目的就是增加他的支持率，尤其在他自己的利庫德集團中，因為黨內一位年輕且更口若懸河的政敵本雅明．納坦尼雅胡情勢正在看漲。同時這也是夏隆表態的方式，他不若巴拉克在大衛營高峰會將耶路撒冷放在談判桌上討論，他對耶城絕不讓步。

而這，如同第一次巴勒斯坦佔領地的起義，僅是由一件小事（一場車禍）引燃，第二次起義的導火線也是一起無足輕重的事件：一個政治人物造訪耶路撒冷聖殿山。夏隆的到訪本身雖極具爭議性，但僅是一個催化劑，而非巴勒斯坦新起義的潛在原因。那麼這場新戰爭的深層原因為何？

衝突專家中的佼佼者特德．格爾（Ted Gurr）注意到，公民抗爭往往導因於個人認為他們應得的與實際獲得的有所落差，而此一相對剝奪感往往導致「不滿與憤怒，而憤怒是動員的階段，因為侵犯是使人感到舒坦的回應方式」。[2]這本質上地解釋了第二次起義的原因並非來自如夏隆、巴拉克、阿拉法特或其他人的個人行為，而是巴勒斯坦人們期待從和平協議中獲得的，與他們實際得到的，兩者之間有所落差，後者甚至無法滿足他們最基本的需求。

仔細看的確會發現，巴勒斯坦人在和平協議中幾乎一無所獲；若有得到什麼，那麼應該就是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糟。當一九九三年《奧斯陸協議》開始執行時，加薩走廊有三千位以色列屯墾者，西岸則有十一萬七千人；但二〇〇〇年夏隆造訪耶路撒冷時，加薩已有六千七百位屯墾者，西岸則有二十萬人。巴勒斯坦人對這大幅增加的人口恨之入骨；畢竟《奧斯陸協議》的目的，是讓以

色列為了和平放棄土地，因此人們預期猶太人來此屯墾或者新屯墾區的建立會終止。新屯墾區的建造也使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平添許多不便，剝削了更多資源，以供應他們的需求，尤其是水。[3]巴勒斯坦人的挫折感加總匯集成了一個新的彈藥庫，只待某個如夏隆造訪聖殿山這般的星火，便可引爆；若夏隆未成行，可能早晚還是會有其他事情引燃導火線。

地獄之門大開

夏隆造訪當日僅有少許衝突發生，以色列人雖為此慶幸，但仍然因隔天的週五禱告而惴惴不安，因為這一直都是敏感時段，回教教典宣講者往往利用這些時間煽動群眾的情緒，以色列人擔心巴勒斯坦人會暴動。巴拉克聯絡了美國國務院，請他們轉達訊息給阿拉法特，任何抗議都可能招致不幸，尤其三天前阿拉法特和巴拉克才剛在華府發起和平會談，且此刻以巴協商者在和平會談上進展頗佳。

當然，阿拉法特對於抗議和示威的控制權有限；首先，因為西岸與加薩走廊大部分土地仍然在以軍管轄之下；再者，也非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服從於他，尤其是伊斯蘭主義者。但以色列總是習慣指認單一權力歸屬者（如阿拉法特），並認為他是任何暴力或抗議的負責人。美國國務卿馬德琳．歐布萊特私下籲請阿拉法特安定街頭，雖然我們不知道他有否採取任何行動，但我們知道九月二十九日週五，當耶路撒冷聖殿山的禱告結束後，地獄之門打開了。

巴勒斯坦人從聖殿山開始向在哭牆前的猶太人丟石頭，哭牆就在聖殿山圍地的山腳下，由於這是猶太除夕，哭牆前的廣場擠滿了信徒，如今他們被緊急疏散。隨後與警察的嚴重衝突在聖殿山園區爆發，警察突破了園區，而巴勒斯坦人有七人死亡、兩百多人受傷。聖殿山的守衛哈杰・卡米爾記得：「槍聲……人們恐懼……嚇壞了……女人嚇得尿褲子……孩子尖叫，而地毯上到處是年輕男子的鮮血……所有人不是躺在地上，就是躲在牆和樹後面……」[4]隔天暴動仍持續，軍隊施以重手回擊，向示威者開槍，射殺了八人，傷及數百人。

第二次起義的一貫特色是，巴方的死傷人數跟以方比起來，有著天壤之別。不若第一次起義開始時軍隊還躊躇不前，相當程度弱化了威嚇效力；這次起義，軍隊一開始的反應就快速有力。雖然現在我們傾向於用巴勒斯坦人是否使用槍枝，來標舉第一次和第二次起義的差異；然而在起義剛開始的那段時間卻遠非如此，第二次起義開始時如同第一次一樣，是沒有軍武的公民暴動。第一次起義時，軍隊一開始苦於不知如何恰當反應，但他們現在已經知道，如果暴動變成武裝械鬥，就能善用他們對巴勒斯坦人的科技優勢，因此軍隊甚至**希望**這場暴動變得更暴力。為了達到這個理想的轉型，軍隊大量過度地懲治暴動，意圖搧風點火。在起義的第一個月，他們發射了令人瞠目的一百三十萬枚子彈。當然，這些子彈並非意在直接奪取人命，雖然確有些巴勒斯坦人傷亡，但主要是為了製造出戰爭的氛圍，激怒巴勒斯坦人以槍火回敬。[5]軍隊如此劇烈的反應，的確逐漸將巴勒斯坦公民暴動轉型為武裝叛變，在巴勒斯坦方，槍枝取代了石頭，而以軍則丟掉過去他們用來壓制巴勒斯坦人反抗的短棍，改而全面採用軍事武器。

然而即使是子彈也無法壓制巴勒斯坦暴動，它從耶路撒冷擴大至所有佔領地。在九月三十日加薩走廊的暴亂中，一個十二歲的巴勒斯坦男孩穆罕默德・杜拉（Mohammed al-Dura）與他的父親，被困在巴勒斯坦狙擊手和以色列軍隊的槍戰間中彈身亡。令人遺憾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起義中不乏這樣的案例，這可能也僅是年輕男孩悲壯死亡的眾多案例之一，但這起事件被法國第二電視台的攝影記者拍下，穆罕默德和他的父親在水泥桶後方躲避子彈卻徒勞的片段，被巴勒斯坦電視台一次次地重播，更刺激了快速升溫的戰爭。穆罕默德・杜拉變成了一位烈士，一個巴勒斯坦反抗佔領的象徵；後來，阿拉伯世界發行了父親和兒子的圖像郵票，且有數條街以男孩之名命名。

緊急外交

在杜拉被殺的當天，聯合國大使特傑・羅德－拉森來到總理面前，報告他與阿拉法特最近的會面，他在會面中促請阿拉法特遏止這些暴動。如同拉森告訴巴拉克的，「我認識他十年了，每次面臨〔重大抉擇時〕，他都轉向流血和暴力……」[6]拉森向巴拉克建議，應該讓聯合國介入安撫情況，以重新召開和平會談，這是阿拉法特自己向他提出的要求。拉森解釋為何要聯合國介入，而非美國：「所有美國的提案都被視為是以色列的提案。阿拉法特甚至說馬丁・印狄克〔美國駐以色列大使〕是以色列間諜，因此〔聯合國〕秘書長可以幫上忙。」但是總理不願聯合國介入——就如同巴勒斯坦人不相信美國人，以色列人也不相信聯合國，因為從一九六〇年代起，在許多會議中阿拉

伯方都占了絕對多數，也因此得以通過反以色列決議。

如今，只能留待華府解決危機。由於對暴力事件感到驚駭，柯林頓總統在巴黎召開緊急會議，呼籲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嘗試阻止流血衝突。會議將在美國大使的住所舉行，由國務卿監督，雖然結束佔領地爭戰的協商會在巴黎舉行，但是雙方陣營接下來會移駕到埃及的沙姆沙伊赫簽署協議，如此一來，對阿拉法特極具影響力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便可加入陣局，以利執行。

然而浮上檯面的是，阿拉法特和巴拉克帶著非常不同的議程來到巴黎：雖然阿拉法特堅持對暴動的發生原因進行國際調查，但他希望將責任放到以色列的肩上，因為夏隆到訪聖殿山引發了無數的爭議；然而巴拉克堅決反對任何國際調查，倒是堅持立即結束巴勒斯坦抗爭。

他們於十月四日會面，在其中馬德琳．歐布萊特向巴拉克施加了莫大的壓力，要求他控制軍隊。「我們必須恢復和平，走向和平的道路，」她告訴他；而後巴拉克堅持阿拉法特應立刻停止示威，「他不可以〔透過暴力〕得到任何東西」。[7]他補充道，他有一個「明證」，指的是秘密錄下的巴勒斯坦官員間的對話，其中顯示這些暴亂的領導者（尤其是塔茲姆〔Tanzim〕，這是一支隸屬於阿拉法特法塔運動的軍隊）認為阿拉法特想要加劇暴動。「塔茲姆失去控制了，」巴拉克說，「阿拉法特是幫派領袖。」歐布萊特不相信並警告他：「群眾情緒是針對你……我們〔美國〕是唯一支持你的……整體氣氛對你不利。」賈克．席哈克總統在與巴拉克會面時，對他施加了更多壓力，席哈克支持執行阿拉法特建議的國際調查，以查明暴力發生的原因。席哈克告訴巴拉克，以色列版本的說詞「與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印象都不符」，他繼續批評軍隊強硬鎮壓暴動的手段：「今天早上有六

十四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兩千五百人受傷……總理先生，您沒有辦法解釋這個數據……我們沒有辦法讓任何人相信巴勒斯坦人是侵略者。」[8]

三方會議開始舉行，阿拉法特和巴拉克親自領導他們的團隊，美國團隊則由歐布萊特掛帥。雖有一些強硬的交鋒，但逐漸地他們達成了約兩頁的停戰協定草稿，它擬定了軍隊從巴勒斯坦地區撤離的時程（因為在衝突的第一天，以軍重新進入了這些地區），而阿拉法特則應採取明確措施，終止巴勒斯坦示威抗議。在強大的美國和以色列壓力之下，阿拉法特放棄訴請國際調查，以美國領導的事實搜證委員會調查暴力事件的來由、為何它愈演愈烈，以及雙方能從此事學到什麼教訓，以避免重蹈覆轍。但是後來事情的發展，打亂了數小時的協商所達成的共識。

身為主辦國，席哈克總統堅持在協議開始前，雙方要到愛麗舍宮（Elysée Palace）向他報告。以色列和美國期待的是純粹形式的簡短拜訪，然而卻驚訝地發現席哈克自己組織了一個完備的會議，其中他邀請了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Kofi Annan）和他的中東特使特傑．羅德—拉森，以及歐盟外交政策首長（tsar）哈維爾．索拉納（Javier Solana）。現在阿拉法特看見重申國際調查議題的新契機，他設法逃避在美國和以色列強大壓力下必須配合的協議。席哈克總統不知道雙方已經有了協議，他站在阿拉法特這邊，說他確定歐盟會支持這樣的調查，並補充道，最好聯合國秘書長能出面說明與組織。看見法國人站在他這邊，支持國際調查的提案，阿拉法特在會議後即刻回到他的旅館，拒絕加入簽約行列。緊急高峰會失敗，而佔領地的衝突依舊持續。

十月六日是流血衝突最甚的一天，週五晚禱結束後，巴勒斯坦人在聖殿山豎起巴解組織和哈瑪斯旗幟，並向聚集著以色列祈禱者的哭牆前廣場投擲石頭。從這裡，新的暴動延燒到耶路撒冷舊城的穆斯林區，獅門的警局陷入火海。巴拉克總理向阿拉法特發布最後通牒，如果巴勒斯坦人不約束自己，他就會指示軍隊「用盡一**切手段**阻止暴動」。[9]阿拉法特公開回應巴拉克的恫嚇：「這是另一個巴拉克的宣言，這之後又會有另一個宣言，然後再一個宣言……」

然而，事發至今不論有沒有總理的最後通牒，軍隊都已對巴勒斯坦人施加了強大的壓力：切斷城市與小鎮（的對外聯繫），使之成為孤島，實施不分晝夜的宵禁，關閉道路和逮捕嫌犯。也許軍隊現在對巴勒斯坦人所採取最具毀滅性的手段是：在西岸和加薩走廊部署上百個檢查哨與路障，並且一設就是數週、甚至數月。以色列軍人在這些路障區實施無差別對待，不論老病或傷者皆一視同仁。世界衛生組織調查發現，二〇〇〇年九月到二〇〇四年十二月，有六十一位巴勒斯坦女人在以軍檢查哨生產；三十六位新生兒因在塵土紛飛的道路旁難以照料，感染併發症，在出生後隨即死亡，生病和受傷的人也在前往醫院的途中，排隊等待通過軍隊檢查哨時死亡。一位以色列軍人的證詞使我們得以窺見軍隊運作的方式，和這期間軍隊檢查哨做出的毫無邏輯可言的決定：

> 在一個一般的早晨，當世界正在快速轉動時，人們僅能在隊伍中等待四、五個鐘頭。在其他地方，你往往會從凌晨四點等到下午兩點。檢查哨的指揮官可以非常獨裁地決定是否讓某人通行……而商品的通行與否也是毫無規則可循：有時允許貨物放行……有時指揮官決定不予放行。[10]

十月的十個日子

在第一次起義中，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幾乎都僅在暴動中扮演著間接角色，他們捐血、食物和錢給在佔領地的巴勒斯坦人，但不採取直接行動反抗以色列。然而此刻，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民不再如此，在當時他們占了以色列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十七。他們之中的一位，來自烏姆阿法姆（Umm el Fahm）的莫哈涅德．伊巴里（Mohaned Irbari）解釋道，因為巴勒斯坦同胞在耶路撒冷與警察交戰時被殺害，他和他的朋友非常恐懼，這使「我們之中的很多人出來〔走上街頭〕……向軍人和警察丟石頭……我們忽近忽遠地跟著警察，像貓捉老鼠一般」。[11]警察暴戾相向，在這國家的歷史上，他們首次對自己的公民開火。其中一位阿裔以色列暴動者被殺害時，莫哈涅德．伊巴里憶及：「所有人都愣住了。但是憤怒隨即席捲而來，我們再度向警察反擊……我們氣壞了，開始大叫：『阿拉真偉大！阿拉真偉大！』喊得我頭暈目眩。」在以色列的十日暴亂接近尾聲時，已有十三名阿拉伯裔以色列人死亡，約七百名受傷，還有數百名被逮捕。

這戲劇化的事件毒害了以色列境內的以阿關係，更加劇了猶太—阿拉伯之間的隔閡。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因警察採取強硬手段深感憤怒；另一方面，猶太裔以色列人則將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主動參與阿克薩起義視為一種背叛。在意見調查中顯示，百分之五十五的猶太裔以色列人表示，由於阿裔以色列人參與暴動，他們對阿裔以色列人的看法益加負面。在暴動前的數年來便加速醞釀著的、將阿裔以色列人驅逐出境的呼聲重新出現；在二〇〇二年三月的一次意見調查中，猶太裔以色列人贊

成強制驅離阿裔以色列人的百分比，從一九九一年百分之二十四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一；百分之六十則說他們傾向鼓勵阿拉伯人自願遷出。[12]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同他們在第一次起義的間接抗議，阿裔以色列人的示威抗議，不僅是為了與他們在軍事佔領下的同胞團結抗外，也是他們一種挫敗感的表現，因為在以色列社會中，他們長期遭受歧視。猶太裔以色列人往往稱以色列本土的阿拉伯人為「我們的阿拉伯人」，他們總是被視為次等公民，慣常地被歧視，且平均收入是國內所有族群中最低的。如同莫哈涅德．伊巴里解釋的：使他參與示威，並與警察衝突的原因「不只是夏隆到訪阿克薩」，也因為他在以色列長期受到歧視，「我這幾年吃屎吃夠了……」[13]

回頭來看，二〇〇〇年十月的事件標誌著以色列境內以阿關係的新階段，而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兩個族群間日益升騰的緊張關係看來在未來數年只會愈演愈烈，也許甚至會導致以色列境內猶太裔以色列人和阿裔以色列人之間的起義。[14]

拉馬拉的私刑

讓我們回到巴勒斯坦佔領地。十月十二日在西岸，巴勒斯坦人殺害了兩個以色列預備軍人。這件事因其暴戾程度、以軍的回應，以及其所導致的持續高溫，成為二次起義令人毛骨悚然的歷史中的另一個里程碑。

這兩位預備軍人，在回到其軍事基地的路上錯誤地開到了巴勒斯坦人的拉馬拉，拉馬拉是最大、最現代，也最世俗化的巴勒斯坦城市。在緊張的氛圍中，軍人被巴勒斯坦警察帶到鄰近的警察局，並一度被拘留。很快地一位暴民來到警察局，而義大利電視台記者剛巧在此區域，用鏡頭捕捉到這戲劇性的發展，這位暴動者進入警局刺殺了以色列人，在另一位攻擊者出現之前，他向歡騰的群眾展示沾滿鮮血的雙手。不久之後，其中一位預備軍人的屍體從一樓窗戶被丟出，擲入下方暴民之中，然後群眾抬著屍體在拉馬拉街道上遊行；這件事表現出的赤裸憎恨令人痛徹心扉。這段殺人畫面在世界各地和以色列輪番播放，與電視播放的加薩走廊穆罕默德．杜拉之死恰成對照，杜拉之死使巴勒斯坦人的態度更加強硬；同樣地現在以色列受到了刺激，要求報復。

在特拉維夫的國防部，巴拉克總理召開了一場特殊的緊急會議，會議中眾人一致贊同嚴正報復的必要性，目標對準了以色列認為該為私刑負責的阿拉法特巴勒斯坦政府；這是他們首度決定在起義和戰爭中使用攻擊式直升機反擊。在行動之前，巴拉克告訴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警告他即將到來的軍事攻擊；使穆巴拉克知情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埃及與以色列已經達成和平，且穆巴拉克本身是阿拉伯世界的領導人物，也是巴勒斯坦最重要的支持者。巴拉克說：「這些照片令人忍無可忍，其中一具屍體被拖行在街頭……像狗一般。」[15]

攻擊式直升機開始行動，對發生私刑的拉馬拉警局發動攻擊，摧毀多輛警車；他們也攻擊巴勒斯坦之聲電台、三個播送器和加薩走廊的目標物。攻擊過後，總理致電柯林頓，要求他孤立阿拉法

特。巴拉克說：「美國的立場一定要清楚。巴勒斯坦人不可以繼續享有〔美國〕的經濟或其他援助……美國應該慎重考慮公開叱責阿拉法特對和平進程造成無法修復的傷害，助長暴力風氣……」[16]巴拉克也期待柯林頓「大聲且清楚地表示與以色列站在同一陣線」，並幫助它在外交上「傳達其憂慮……給歐洲國家，以盡可能統一政策〔對抗阿拉法特〕……」。巴拉克也對柯林頓發出警告：「如果柯林頓總統七年來致力的和平進程，僅因為阿拉法特不斷的欺瞞，而被降格為一則無疾而終的進程的殘篇，那麼歷史會因此被扭曲。」然後巴拉克坐下來寫正式信函給柯林頓：「令人嚴重懷疑阿拉法特主席是否真的是談和對象。上週之事與今日的私刑使在以色列的我們懷疑這點……」[17]從大衛營以來，巴拉克持續著巴勒斯坦方沒有談和對象的說辭；而這在接下來的以色列行政中將達到高峰。

同時愈來愈多的壓力加在阿拉法特和巴拉克身上，要他們到埃及的沙姆沙伊赫參加高峰會，以討論停戰，結束佔領地上的暴力事件。穆巴拉克總統致電巴拉克，說服他來參加：「您是位強人，請盡可能地耐心等待。我現在會跟他說……〔私刑〕讓我們所有人都震驚萬分。」柯林頓總統不斷促請巴拉克參加高峰會，巴拉克反唇相稽：「七年前，他〔阿拉法特〕是個恐怖分子……不容置疑的……是**您**將他變成了一個受歡迎的人物。」[18]但不論如何，巴拉克答應他會到埃及與阿拉法特和其他人見面。[19]

試著在沙姆找出解決之道

十月十六日，他們在沙姆沙伊赫碰頭，希望能結束暴力事件，而這變成了至此密度最高的國際參與：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柯林頓總統和穆巴拉克總統、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和代表歐盟的哈維爾．索拉納〔都列席在場〕。

會議進展緩慢且令人煎熬；氣氛則是緊繃且令人不快。穆巴拉克總統身為主持人，尤其主動並堅決要成功；他指出艾里爾．夏隆造訪聖殿山一事，抱怨道：「夏隆是這一切混亂的來由。」[20]

由於阿拉法特一如前幾天在巴黎一樣，堅持展開國際調查，找出起義發生的原因，會談一度停滯不前。巴拉克與聯合國秘書長並席而坐，將被處私刑的軍人們怵目驚心的照片展示給他看，並告訴他：「我們不會接受任何國際調查，除非是美國人主掌的。」[21]他向安南保證：「我們可以在公開示眾之前，讓您看報告……但是我們不會讓〔阿拉法特〕得逞，〔同意〕接受國際調查。」然後巴拉克面見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並向他展示了照片。國王回覆：「我們想要在離開這裡時有一個正面的宣言……阿拉伯街頭有著可怕的情緒。」[22]柯林頓總統最後試著達成交易，但是就在雙方簽署協議之前，阿拉法特故技重施，如在巴黎一般未簽名就從房中溜走。柯林頓無計可施，只能向聚集在此的全球媒體宣讀這已同意但尚未簽署的停火文稿：

巴拉克總理和阿拉法特主席已經同意……首先，發布公開聲明，一致呼籲結束暴力。其次，美

國會組織……一個真相調查委員會，釐清過去數週發生的事件……最後的報告會被遞交給主辦的美國總統以供刊行。第三……美國會與雙方商談……關於如何推進〔和平進程〕。[23]

然而在該地，巴勒斯坦暴動仍然如火如荼地進行，軍隊的壓制手段變得前所未有的強硬；雖然在沙姆總理已經承諾要將坦克從暴動發生後他們所進犯的新區域撤回，但實際上軍隊仍然文風不動。其實在與其將領開會時，巴拉克甚至指示他們要將螺絲拴得更緊——他的有些指示違反國際法：「癱瘓巴勒斯坦的電視與廣播能力……切斷他們的供電長達六小時……阻止汽油〔運入巴勒斯坦地區〕……不買他們的農產品。」[24]總理對他的首長說：「〔我們應該〕睜大眼睛〔行動〕，我們不是生活在西歐或北美……〔中東〕是非常難搞的鄰居。」[25]

巴拉克每天打電話給柯林頓，催促他搖撼阿拉法特，迫使他「立即停止暴力、挑釁……」。[26]柯林頓在與阿拉法特的一次談話後，回覆巴拉克，敘述他向阿拉法特說的話：「你知道，我們還是沒有結束暴力，你沒有依照你〔在沙姆〕的承諾做事。」柯林頓說，他接下來便重述一連串雙方在沙姆同意、而阿拉法特尚未實現的條款。但後來，柯林頓向巴拉克報告道，阿拉法特「開始說巴拉克如何過度使用權力，看看巴勒斯坦的傷亡人數……他們沒有食物可吃，沒有辦法工作，這一切……」。柯林頓回答阿拉法特，如同他現在向巴拉克敘述的：「那也許是真的，但是你這方面仍然應該執行協議；除非暴力事件終結，否則你還會一直受到這些麻煩困擾。」

由於暴亂持續著，巴拉克不斷催促他的軍隊領袖向巴勒斯坦人加壓：「擾亂金錢兌換……汽油……水泥……電力〔以及〕……增加〔檢查哨……的〕安檢」[27]然而，並非所有巴拉克的首長都認為武力可以終結與巴勒斯坦人的戰爭。奧斯陸和平協議的首腦希蒙．佩雷斯促請巴拉克允許他到加薩面見阿拉法特，以達成協議，停止衝突。巴拉克一如既往地善忌多疑，他同意了這個會面，十一月一日佩雷斯便飛往加薩，與阿拉法特會晤。阿拉法特心情極差，譴責巴拉克的軍隊行動：

〔在〕耶律哥、拉馬拉、納布盧斯、伯利恆……到處都是大規模轟炸……〔以色列電台宣布〕明天會使用空軍……新武器會被用來傷害巴勒斯坦領導人……〔巴拉克〕沒有〔如他在沙姆所承諾的〕撤離坦克。你們阻止交換食物……包圍〔巴勒斯坦〕城市……超過兩百名〔巴勒斯坦人〕被殘殺，一千名受傷……我們竭力安撫情況，〔但是〕你們使用坦克、直升機……[28]

其中一位阿拉法特的同袍也在場，他插話：「立刻叫你們的坦克離開，你們把人當牛一樣殘殺……撤離你們的坦克……」[29]

回國後，佩雷斯向巴拉克報告了阿拉法特的許多憤怒不平，尤其是巴勒斯坦人對於軍隊毒辣的手段和使用坦克感到憤恨；但是他也帶來了一些捷報，他和阿拉法特達成共識：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將一起同時在廣播中宣讀一篇文稿，以恢復和平。下面是建議的宣言文字：

> 今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方已經同意發布一個共同呼求：停止暴力。為了恢復和平與平靜，我在此呼籲所有軍隊和群體停止使用暴力、挑釁或使用武力……雙方都希望兩個分離的政治實體可以以和睦的關係並肩共存，擁有穩定、繁榮與和平的未來。雙方會盡一切所能有尊嚴地、公平互惠地實現這個勇敢的和平夢想。[30]

當天下午十二點四十五分左右，巴拉克總理在特拉維夫廣播站，準備好下午兩點要宣讀這份雙方同意的宣言。但他發現宣讀的人不是阿拉法特，而是他的一位助手。這很顯然違反與佩雷斯達成的共識，且大大降低巴勒斯坦武裝分子認真聽從的可能性。似乎為了應驗阿拉法特的怠慢，很快地大約下午三點，耶路撒冷發生一場爆炸案，兩名以色列人遇難。阿拉法特—佩雷斯協議就此胎死腹中。

謀殺

稍後，法國總統席哈克打電話給巴拉克致哀。「我對今日在耶路撒冷發生的攻擊事件感到震驚……」席哈克說，「我譴責他。我今早與阿拉法特說話，我堅定地告訴他，他必須回到談判桌……」[31]綏靖的壓力也來自美國，十一月四日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馬丁·印狄克與巴拉克見面，傳達了總統的訊息，阿拉法特—佩雷斯會議是重啟和平會談很好的起始點，雙方應該再給和平協議一次機會。印狄克說柯林頓也向阿拉法特傳達了相同效力的訊息，催促他逮捕恐怖分子、停止在以色

列開火、停止示威與暴動。印狄克籲請巴拉克試著將巴勒斯坦傷亡人數降到最低，因為巴勒斯坦人的大量傷亡數字只會引燃更多暴力事件。的確，巴拉克很清楚如此高的巴勒斯坦傷亡數字會損及以色列的國際形象，而慎重將此納入考量後，他決定採取對抗暴動的新政策：謀殺。

以色列人以容易混淆的詞彙指稱這個新策略，例如「清理」（liquidation）、「目標式殺人」（targeted killing）、「瞄準進犯者」（pinpointing attackers）或「中立化組織攻擊者」（neutralizing the organizers of attacks）。阿克薩起義以來，這個政策的第一個知名目標，就是巴勒斯坦運動者胡賽因·阿巴亞特（Hussein Abayat），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九日，他在鄰近伯利恆的貝特薩霍，因以色列攻擊式直升機發射的飛彈擊中座車而身亡。[32]貝特薩霍的一位居民印馬德·阿米爾·法雷思（Imad amil Fares）親眼目睹遇害過程：

> 我突然聽到爆炸聲。我家的窗戶破了，百葉窗毀損。我向外看時，看到一輛灰色三菱汽車著火，還有駕駛者〔阿巴亞特〕被燒焦的屍體。兩個女人躺在車子旁邊，看起來受了重傷。她們的臉都是黑的，完全燒焦了，還流著血……[33]

更多暗殺接踵而來；但即使如此也無法阻止暴亂。

巴拉克為戰情的升溫而譴責阿拉法特，向世界、尤其是向華府堅稱，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方沒有

談和的對象。因美國參議員團隊的報告，他的論述變得益加鏗鏘有力，此團隊由柯林頓總統和巴拉克的親信丹尼・艾布拉姆（Danny Abram）領導，他到拉馬拉面見阿拉法特，並向以色列口頭報告，然後以如下文字向總理的負責人簡述他們告訴他的話：

> 丹尼・艾布拉姆的報告（十一月二十五日）
>
> 一、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丹尼・艾布拉姆、韋恩・艾文斯（Wayn Evans）、參議員多里切利（Torichli）和參議院成員辛茲（Hintzi）面見阿拉法特。二、客方發現阿拉法特是失去自我控制的人。艾布拉姆報告道，阿拉法特言行怪異，甚至嚇壞其客人，以其生命作為要脅。三、因為這次會議，艾布拉姆總結到阿拉法特已不再是〔和談〕的對象。[34]

然而，十二月十一日巴拉克打電話給柯林頓，向他報告最新的國安情況（「兩天相對平和後，又是一天的硬仗」），他繼而表示希望再做一次和平嘗試，也許柯林頓可以鼓勵阿拉法特，「再做一次最後嘗試……重啟協商。」[35]柯林頓一向願意配合巴拉克的想法，他回覆：「我〔的任期〕還有四十天，我會竭盡所能幫忙達成和平……」[36]

巴拉克此舉怪異且混淆視聽：自從大衛營高峰會破局，他就堅持阿拉法特不是和談對象，但同時他又促請華府試圖與這個「非和談對象」阿拉法特重啟談判。當然，可能巴拉克覺得他必須表現出願意給出協商機會的姿態，以安撫國際輿論和某些他自己偏左勞工黨的同僚。不論原因為何，十二月十九日柯林頓總統召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協商者，到華盛頓附近的博林空軍基地（Bolling Air Force Base）。二〇〇〇年聖誕節前，柯林頓邀請他們到白宮，在這些協商者的協議基礎下，向他們報告他自己的和平提案，這是他下個月永久地離開白宮之前的最後一搏。

比爾・柯林頓的最後一搏

柯林頓在白宮發表的〔提案〕後來被稱作「柯林頓參數」（Clinton Parameters），這並非最後協議的條例，僅是加速協商的指導原則，他希望接下來幾週內可以達成協議共識。在這些指導原則之後，雙方應該快馬加鞭地進行協商，以便在二〇〇一年一月十日——恰恰在柯林頓離開白宮前，擬定一個和平方案。由於巴拉克害怕阿拉法特會將任何提案放入口袋，稍後以之開場，好向以方榨取更多讓步；於是巴拉克和柯林頓約定，後者只會向雙方宣讀他的想法，不會提供他們正式的書面文件。依據以色列和華府的共識，柯林頓很有可能在會前便告知巴拉克其指導方針，但未告知阿拉法特。十二月二十三日週六早晨，柯林頓在白宮宣讀他的想法，以巴協商者記下筆記。然後他只給雙方幾天時間回答接受與否。柯林頓結束以色列佔領與終止以巴衝突的提議如下：

關於國土，以色列應移交給巴勒斯坦人土地以供他們建立自己的國家，柯林頓建議數據約在百分之九十的中段（mid-90），西岸土地的百分之九十四到九十六之間。[37]而其他百分之四到六的西岸土地併入以色列，這些擁有百分之八十屯墾者居住的大塊屯墾區會被重新整合（所有孤立的屯墾區

都會被拆除），柯林頓建議以色列給予巴勒斯坦人其他地方的土地作為交換與補償。關於耶路撒冷，過去協商最窒礙難行的部分，柯林頓提議「大致原則是〔在目前的耶路撒冷地界中〕阿拉伯區歸屬於巴勒斯坦人，而猶太區則歸以色列」。事情的核心，也就是聖殿山，總統基本上建議雙方共享此地之主權：巴勒斯坦**擁有**聖殿山主權，而以色列主權則在**其下**，在猶太聖殿遺址被埋沒之處。關於難民和巴勒斯坦人所要求的「歸鄉權」，得以回到其父祖們在以色列的家園，柯林頓建議這指導原則應該是：巴勒斯坦國家會是巴勒斯坦人選擇回歸的重點地區，但不排除以色列接受部分難民。

仔細閱讀柯林頓的提案會發現，他尋求的是逐一排除以巴協議的兩個主要障礙——也就是耶路撒冷聖殿山的主權和巴勒斯坦人要求回歸以色列本土的問題。因此巴勒斯坦人被賦予聖殿山主權，而這是以方的讓步；為此以色列要求巴勒斯坦人放棄回到以色列的歸鄉訴求。最後也最關鍵的，如柯林頓總統所言，以色列堅持認為協議就代表衝突的結束，而一旦施行，巴勒斯坦對以色列的要求都將結束。

在巴拉克試著說服他自己的行政首長接受柯林頓提案時，他也試圖向阿拉法特施壓，要他也如是行之。他與埃及總統談話，建議穆巴拉克與阿拉法特見面，試圖從他身上擠出正面回應；他也要求穆巴拉克催促阿拉法特減低佔領地暴動的程度，因為這樣可以「幫助我說服以色列大眾接受〔柯林頓的提案〕」。[38]巴拉克告訴穆巴拉克，以色列被要求做出的妥協「是極難割捨的」，但如果阿拉法特直截了當地答應柯林頓的提議，那麼「我也會跟進」。巴拉克以下面兩句話結束與穆巴拉克的對話：「我坐在這裡，在這〔被殺的總理〕拉賓曾經用過的同一張椅子上，過去每次發生危機，他都會與您聯絡，您若能說服阿拉法特往前走，無疑是非常大的幫助。」

以色列在一封給白宮的信函中正式接受柯林頓提議，其中還包含了長達二十頁的文稿，寫明以色列的保留和評論。[39]

在華府等待阿拉法特的回覆時，以軍持續在佔領地踐踏巴勒斯坦暴動者。二〇〇〇年十二月，指揮南方司令部的官員多隆．阿爾莫格（Doron Almog）將軍率眾進行大規模軍事掃蕩，以對付在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暴動。在其命令下，整片土地都被掃平，樹被連根拔起，房子被拆毀，許多大塊區域變成了「特殊安全區域」——大規模屠殺區。因為巴勒斯坦暴動者發現，要在佔領地直接與軍隊搏鬥變得愈來愈困難，他們便轉戰以色列城市：十二月二十八日，靠近特拉維夫的一輛巴士遭受炸彈攻擊，傷及十三人。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阿克薩起義的第三個月，死傷人數非常慘重，尤其是巴勒斯坦方：共有兩百七十二人被殺，與這段期間內以方的四十一人死亡相較，數量不可相提並論。

錯失良機

柯林頓總統要在華府面見阿拉法特。在獲得巴勒斯坦方對於他提出的和平倡議之回應的前一

天，他致電巴拉克，報告他至今為止與巴勒斯坦領導者有過的對話，在其中「阿拉法特有各種評論」，使柯林頓不確定阿拉法特是否會正面回應柯林頓的指導原則。[40]巴拉克懷疑：「當我看著他的行為，讀著情報時，我知道使他駐足不前的原因為何……」巴拉克補充道：

> 他助長暴力……他試圖從你我這邊盡可能榨取東西……你，總統先生，必須幫忙讓事情以原貌呈現——哪一方願意付出、哪一方又助長恐怖主義……阿拉法特不能繼續愚弄你我……

一月三日，柯林頓致電巴拉克，向他報告與阿拉法特的會議，並告訴他阿拉法特拒絕了提案。柯林頓極為沮喪地告知巴拉克，他向阿拉法特說：「您知道，他們一直告訴我，您是那種一定會等到十二點前的五分鐘〔才肯行動〕的人，但是我怕您的錶壞了，主席先生。」[41]

無庸置疑地，歷史的判決將會顯示，二〇〇〇年十二月，阿拉法特錯失了一個良機，錯過得到一個獨立的、以阿屬東耶路撒冷為首都的巴勒斯坦國家的機會，其中包含大衛營沒有、如今卻要給他的聖殿山的巴勒斯坦主權。為什麼阿拉法特拒絕這項提案？也許是他覺得繼任的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可能會比柯林頓政府大方，因為巴勒斯坦人覺得柯林頓與以色列過度親密；或者他不想要站在他的人民前面，告訴他們，雖然他保全了耶路撒冷的主權，但是他無能為巴勒斯坦人爭取到回歸古巴勒斯坦的權利。數年來，他和其他人一直向巴勒斯坦難民保證，他們有一天會回到他們的老家，也就是現在的以色列。一位阿拉法特的親信、巴勒斯坦協商者阿布・阿拉曾解釋道：

> 沒有任何一個巴勒斯坦人曾經放棄過回家的夢。這個夢是支持我們走下去的力量，事實上，是它讓我們活下去……離散的巴勒斯坦人之間使用著不同的詞彙。他們向對方打招呼時會說「待我們回去再見」（On our return）；他們經常說「我們的故鄉」（Our homeland）；而在愉悅或節慶之時，他們會說：「我們的宴席會在我們回去時舉行。」（Our feast comes with our return.）[42]

很顯然地，阿拉法特不能捨棄巴勒斯坦身分認同和生活重心；他選擇維持現狀，決定要等待更好的提案，以避免做出艱難的抉擇。他親密的顧問穆罕默德・拉希德（Mohammed Rashid）後來承認：「不接受柯林頓的提案，是我們犯了戰略錯誤。」[43]直至寫作此書時，都不再有比柯林頓提案更好的條件被正式給予巴勒斯坦人。

而巴拉克主要擔憂的是，在接下來二〇〇一年二月的以色列大選中，必須將巴勒斯坦暴動隔絕於安全距離之外。因此他同意其協商者繼續在塔巴、埃及進行低階協商，因為持續對話對於減低暴力的程度有百利而無一害。

然而，同時巴拉克卻指示軍隊使用鐵拳面對巴勒斯坦武裝者，像是透過執行宵禁、部署更多檢查哨、監控巴勒斯坦人的行動，以及加速暗殺巴勒斯坦領袖：二月十三日，年紀五十歲、擔任阿拉法特護衛隊「武裝—17」資深官員的馬蘇德・阿雅德（Maso'oud Ayyad），在開車接近加薩走廊北邊的賈巴雅難民營時被殺，被以色列直升機發射的三顆飛彈擊中。四位旁觀者，包括一個小孩，

都在攻擊中受傷，兩位則受到驚嚇。總理說這個暗殺是「一個清楚的警訊，告訴任何想要傷害以色列人的人，他們終究逃不出以色列國防軍的手掌心，他們會找到他，並向他算清總帳」。[44]這是競選很好的講詞，但事實上，暗殺策略對於起義中減少巴勒斯坦暴力的整體效果一直以來並不顯著。雖然以色列最高法院判定只要對象仍活躍於戰鬥之中、或對象是全職武鬥者，暗殺便是合法的，但是它使以色列大眾感到些許不安。二〇〇一年二月十九日，以色列國會的外交與國防委員會主席丹・麥歷多（Dan Meridor）發出一封信給總理，籲請他重新考慮這極具爭議性的政策。下面是這封信的內文：

> 最高機密
> 總理先生，
> 我想請您注意世界上「暗殺政策」導致的嚴重後果。歐洲聯盟請求我們停止這樣的活動，因為這是「一個違反國際法的政策」。美國也對「目標精確的進攻」政策表示反對，甚至宣布會延遲將遙視影像發送予以色列……近年來世界經歷的改變包括允許指控戰爭犯罪，這應該在我們決策時被納入考量……[45]

是否要繼續暗殺巴勒斯坦運動者，和所有壓制巴勒斯坦暴亂的其他政策，現在都由一個新的總理（那個第一時間因其到訪聖殿山而引發暴亂的）艾里爾・夏隆主宰。

13 夏隆與阿拉法特（二〇〇一～二〇〇四）

諷刺的是，夏隆造訪聖殿山引發爭議後不久，他便以排山倒海之姿在大選中擊敗了巴拉克，二〇〇一年三月開始成為以色列總理。不若他的前任尋求以迅雷之姿達成和平協議，結束以巴衝突和佔領，夏隆的目標較小：結束巴勒斯坦暴動，恢復穩定，回歸正常生活，並且在平靜的狀況下，與巴勒斯坦人討論一個有限度的臨時性協定。夏隆完全沒有想要與敘利亞協商，他認為其和平代價（歸還戈蘭）太高，且以敘邊境數年來都平靜無波，似乎沒有協商的急迫性。

最血腥的暴動

夏隆幾乎即刻便須面對巴勒斯坦暴動的眾怒。單單三月、他的正式就職月，在以色列就有三起自殺式炸彈攻擊，其中有六名以色列人罹難、數十人受傷。夏隆對這些攻擊感到極其憤怒，公開譴

責阿拉法特，他後來也經常如此；他的言論咄咄逼人，激烈到連新任的美國總統喬治・W・布希都開始擔心，夏隆可能會殺了這位巴勒斯坦領導人，果真如此，將導致整個中東掀起熱浪。在這血腥的三月間，兩位領袖在華府見面，布希總統想要確認夏隆不會採取極端手段。在三月二十日的對話中，夏隆總理承諾不會這麼做：

布希總統：你真的對阿拉法特恨之入骨？

夏隆總理：沒錯！

布希：你企圖殺死他嗎？

夏隆：不會！

布希：很好！[1]

暴力之火持續蔓延，在以色列北部的內坦亞（Netanya），一名巴勒斯坦自殺式炸彈客自爆，導致五人罹難、一百多人受傷。由於以色列國內輿論強烈抨擊夏隆未採取足夠手段阻止這些攻擊，夏隆派遣了F-16戰機轟炸納布盧斯與拉馬拉；這是一九六七年戰爭後，戰機首次被用來攻擊西岸。[2]但即使空襲也無法阻止自殺式炸彈，因為事到如今，武裝的巴勒斯坦組織已經發展出有效制衡以色列的戰術了。

由於以軍和巴勒斯坦人之間武力差距極大，這個方式應運而生。一名巴勒斯坦運動者薩依德・

西揚姆（Sayeed Siyam）解釋道：「我們哈瑪斯的人認為自殺式攻擊……是巴勒斯坦人對抗佔領的王牌……我們沒有阿帕契直升機……所以我們用自己的方法。」[3]如同精確導航的人肉飛彈，自殺式炸彈造成以色列的嚴重傷亡，尤其是市民方面，它癱瘓了日常生活，嚴重打擊以色列的士氣。在阿克薩起義最初兩年，巴勒斯坦人派出了一百四十五位自殺式炸彈客。[4]也因此，第一次起義的象徵是巴勒斯坦孩童向軍隊投擲石塊，阿克薩起義的象徵則變成了自殺式炸彈客。

五月二十日，緩和情勢的契機出現在米切爾報告（Mitchell Report）的發表。前美國參議員喬治・米切爾（George J. Mitchell）在成功調停了北愛爾蘭的衝突後，曾主持二〇〇〇年十月在沙姆沙伊赫的高峰會所成立的調查委員會。米切爾的職責是調查阿克薩起義的原因，提出衝突的解決方案，以避免類似事情重演。米切爾在報告中提出一連串可供雙方遵循的具體步驟，始於終止對彼此的仇視（若雙方要邁向下一步，這是非常關鍵的），最後走向重回和平談判桌。

夏隆迅速回應，在五月二十二日宣布單方面停火，承諾軍隊僅在自我防禦時開槍；夏隆可能斷定巴勒斯坦人無論如何都會繼續暴動，而他可藉此譴責阿拉法特的暴力。的確，巴勒斯坦的回應並不正面，五月二十五日，兩位自殺式炸彈客發動攻擊，其中一起在以色列城鎮哈代拉（Hadera），另一起在加薩走廊的安全前哨站，兩起事件導致六十五名以色列人受傷；兩天後，三十名以色列人因耶路撒冷爆炸案受傷。為何阿拉法特無法接受停火，我們無從得知。也許是因為他覺得難以控制大多數的武鬥者，尤其是哈瑪斯的伊斯蘭主義者，因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拒絕聽令於他，或是因

為他知道停火不會真的阻止軍隊在佔領地使用鐵血手段，例如宵禁、檢查哨、禁運和其他方式。的確，雖然夏隆已經正式採納了米切爾報告，他卻同時指示軍隊參謀長沙烏爾・穆法茲（Shaul Mofaz）將軍「到處攻擊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每早醒來都應該要發現十二個他們的人死了……」。[5]夏隆稱暴動為「恐怖主義」，他向其宣戰，將之視為軍隊的首要任務，告訴穆法茲：「這是你的戰爭……你的考驗就是戰勝巴勒斯坦人。」[6]夏隆戰爭經驗豐富，他（在一九四八到一九七三年以色列的戰爭中）曾任軍人，在一九八二年黎巴嫩入侵時也當過國防部長，但他真的相信這種方式能使軍隊擊潰暴動，得到「勝利」嗎？也許並非如此，透過命令軍隊殺害數十名巴勒斯坦人，他讓軍隊得以肆行暴虐，而他當時必定知道，這只會助長暴力的惡性循環。

六月一日在特拉維夫的夜店，從納布盧斯來的哈瑪斯特務薩依德・胡特里（Said al-Hutri）透過自爆，執行了一場大屠殺；他殺了二十一人，傷及超過八十人，且大多數是青少年，這是由史以來特拉維夫最嚴重的自殺式攻擊。對夏隆而言，阿拉法特是這一切的罪魁禍首，雖然大部分的自殺炸彈都是阿拉法特世俗巴勒斯坦政府的勁敵哈瑪斯，或伊斯蘭主義的吉哈德所執行的，而對此阿拉法特幾乎沒有控制權，但夏隆仍然認為阿拉法特沒有盡全力阻止攻擊。確實，兩人彼此仇視由來已久，早在一九八二年黎巴嫩戰爭時便已埋下種子，夏隆是那場戰爭的指揮官，他在貝魯特包圍了阿拉法特，當時之所以沒殺他，只因美國給了明確的指示。現在，特拉維夫受到攻擊的當晚，總理催促他的內閣召開緊急會議，請他們支持「清除」阿拉法特——也許是驅逐他；我們記得，夏隆三月才向布希總統承諾過不會殺害阿拉法特。雖然將之驅逐是可能的，但仍令人擔憂，因為阿拉法特總

是攜帶槍械，他很可能選擇出面迎戰，而非讓自己被以軍逮捕。若阿拉法特變成烈士，反而可能產生不良效果，是故內閣決定不驅逐他。

同時世界領袖因震驚於以色列和佔領地的流血事件，催促阿拉法特也加入夏隆的行列，接受米切爾報告所要求的停火提案，他最終於在六月二日接受了。但這仍無法阻止起義，讓情況愈發如火如荼的尤以以色列的暗殺策略為甚。這是從前任巴拉克政府沿襲下來的策略，它迫使武裝分子為了證明其韌性而還以顏色。七月三十一日，軍隊在納布盧斯暗殺了兩位哈瑪斯資深運動者謝赫・賈馬勒・曼舒爾（Sheikhs Gamal Mansur）和賈馬勒・沙林姆（Gamal Salim），不出意料之外地，此舉導致哈瑪斯於八月九日採行報復性攻擊，目標指向耶路撒冷中部人聲鼎沸的薩巴羅（Sbarro）披薩店，造成十五人罹難，一百三十人受傷。

以色列再度出擊，八月二十七日透過飛彈攻擊，轟炸了拉馬拉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簡稱PFLP）辦公室，戕害其目標——六十三歲的派系領袖阿布・阿里・穆斯塔法（Abu Ali Mustafa）。這使得衝突的情緒迅速沸騰，因為穆斯塔法僅是一位政治領袖，而非武裝分子。巴勒斯坦人賈布理・拉朱布（Jibril Rajoub）也是阿拉法特的親信，他記得當他聽到這起謀殺事件時有多麼震驚：「我呆若木雞〔就好像〕我麻痺了，〔而且我知道〕謀殺阿布・阿里・穆斯塔法必會激起巴勒斯坦極大的反彈。」[7]的確，透過殺害政治領袖，夏隆將他反暴動的策略拉抬到一個新階段，有效迫使巴勒斯坦人將其攻擊升級到以以色列政治領導人為目標，以證明他們有能力反擊。十月十七日他們成功了，在耶路撒冷的凱悅飯店（Hyatt Hotel），兩名巴

勒斯坦人殺害了以色列作風最強硬的政治人物之一——旅遊局長雷哈瓦姆・紀爾維（Rehavham Ze'evi）。巴勒斯坦人後來說道，這場謀殺是為了報復以色列戕害其領袖阿里・穆斯塔法。

這以牙還牙的模式持續了數週到數月，十二月十二日，西岸靠近艾曼紐（Emanuel）猶太屯墾區的地方，一輛巴士受到攻擊，造成十人罹難、三十人受傷，這對夏隆而言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拿起電話，命令軍隊炸毀阿拉法特在加薩的司令部，摧毀他整個直升機機隊——警告巴勒斯坦領導人，套索已經收緊，軍隊很快就會逼近他。夏隆將所有持續的暴力事件都歸咎於阿拉法特，宣布：「阿拉法特主席冷眼旁觀……不再與他談判。」[8]

但不論總理高興與否，阿拉法特都還是佔領地上巴勒斯坦領導者，也許是為了顯示他仍是有分量之人，現在他認為他該管束武裝分子了。十二月十六日他呼籲「全面停止所有行動，尤其是自殺式行為」；他的指示有著強大的影響力，導致近乎全面終止對抗以色列的局面——包括哈瑪斯和伊斯蘭主義的吉哈德。[9]對於那些認定阿拉法特可以使巴勒斯坦暴力事件得到控制的人（若他想要的話），這是個鐵證。儘管伊斯蘭主義聲勢愈來愈浩大，他身為最知名的巴勒斯坦領袖，似乎仍對他們有些駕馭能力。

但同時，以色列卻繼續扳倒巴勒斯坦武裝分子，他們的首要目標是來自西岸小鎮圖勒卡爾姆、年方二十八的雷德・卡爾米（Raid Karmi）。參謀長沙烏爾・穆法茲在筆者的訪問中提到，卡爾米是「一個恐怖分子，雙手沾滿鮮血……我們必須逮捕他，要不就是殺死他」；而後者似乎更為乾脆，

因此決定殺死他。[10]卡爾米行蹤飄忽不定，且過去已有一次死裡逃生的經驗。國防部長本・埃利澤（Ben Eliezer）向筆者解釋道，卡爾米「使用偽裝，他不斷遷徙……變更根據地……」，但以色列最後找到一個弱點：卡爾米幾乎每日午餐前都會去拜訪他的情婦，一位巴勒斯坦官員的夫人。卡爾米會走一樣的路徑，沿著墓園的圍牆回到他的藏匿處；洞悉卡爾米的路徑，軍隊便得以戕害他。

話雖如此，以色列人卻進退兩難。從二〇〇一年十二月開始的停戰協定，雖然力量薄弱，但仍具有效力，高調的謀殺必會使之付之一炬；然而，夏隆堅持發動此類特殊行動，儘管內閣中有些反對聲浪，他仍堅持己見。斬首卡爾米的綠燈亮起後，一顆炸彈被埋放在墓園圍牆中、卡爾米慣行的小徑上；二〇〇二年一月十四日當他經過此地時，一起威力強大的爆炸使他當場死亡。卡爾米的同僚阿布・哈米德（Abu Hamid）記得在命案後，他們討論且發布了一則回應：「所謂的停火作廢了，作廢了，作—廢了……你們〔以色列〕開啟你們自己的地獄之門。你們會被地獄之火燒死。」[11]

卡爾米被謀殺後的幾週，雙方都血跡斑駁，光是二月一個月，就有二十八名以色列人、數十名巴勒斯坦人罹難，使人無法不去想為何以色列明知這會扼殺停火協定，仍舊覺得殺死一個人（即使危險如卡爾米）是值得的。當然，軍隊在總理的指揮下反擊了，夏隆公開宣布：「巴勒斯坦人必須受到重擊，要讓他們痛苦難當。我們必須讓他們付出代價、人命……」[12]

一場巴勒斯坦武裝分子主要的報復攻擊，將情況很快地推落谷底。這場報復攻擊以卡爾米的家鄉圖勒卡爾姆為根據地，這將戲劇化地轉變以巴戰爭的路線。

防衛盾牌

穆罕默德・阿卜・巴塞特（Muhammad Abd al-Basset）是年方二十五的巴勒斯坦人，他受雇於圖勒卡爾姆的哈瑪斯領袖阿巴斯・薩依德（Abbas al-Sayyid）麾下的穆阿邁爾・沙胡力（Muammar Shahrouri）。在猶太逾越節即將到來之際，阿卜・巴塞特與薩依德和沙胡力，在沙胡力祖父鄉下的公寓見面，為完成他自殺式爆炸任務做最後準備。阿卜・巴塞特是一位義憤填膺的年輕人，他想去約旦與他的未婚妻結婚，卻遭以色列人拒絕；對佔領萬念俱灰之下，決定化身成自殺炸彈客。

兩位雇主拍攝阿卜・巴塞特宣讀他的遺言，他站在哈瑪斯的旗幟前，手握M-16突擊步槍；他的影像後來在巴勒斯坦佔領地被廣為傳播以資宣傳，顯示哈瑪斯能與其他不同的巴勒斯坦軍事組織匹敵，並向其支持者證明他們在對抗佔領。阿卜・巴塞特宣讀道：「夏隆，我們的血液不是廉價的，我們的家園也不是這麼輕易就能被入侵，沒有人能夠保護你免於我們身體的榴霰彈……」當他們結束錄影時，薩依德幫阿卜・巴塞特著裝，繫上一條內含十公斤炸藥的腰帶——這腰帶是早先哈瑪斯工程師在納布盧斯製造後送來的。兩人幫助炸彈客著裝。穆阿邁爾・沙胡力記得：

> 阿卜・巴塞特自己帶了衣服——它們必須是合身的。他買了毛衣，戴上假髮，一頂金色的假髮。他是一個面貌姣好的男人，所以最適合他的方式就是把他裝扮成女人……我們幫他刮鬍子、剪頭髮，並且戴上假髮，我們讓他變得很美麗……然後他帶著一個袋子，戴上太陽眼鏡……看起來像一位外國女人……[13]

沙胡力記得準備就緒後所發生的事：

> 阿卜・巴塞特微笑著……阿巴斯〔薩依德〕告訴阿卜・巴塞特：「但願阿拉成全（*inshallah*，God willing）你能在今天變成一個烈士（*Shahid*），明天……你會到天堂……」阿卜・巴塞特……呼喚著真主……他請求原諒……他朗讀著很多可蘭經，他祈禱著，我也和他一起祈禱……然後一種自由的感覺升起……房間充滿幸福的氛圍，因為阿卜・巴塞特要走出去了，他知道這不只是去赴死，他出去是為了更接近阿拉，他將以最好的方式走向阿拉，所有可能的最好方式……是的，他很快樂……是的，他等待了八個月就為了這一刻……

在屋外，法特希・拉賈・艾哈邁德・哈提卜（Fathi Raja Ahmed Khatib）準備好要將阿卜・巴塞特載往以色列，因為他有以色列身分證，這使他們得以輕易從西岸進入以色列。阿裔以色列人幫助佔領地的巴勒斯坦人發動反以攻擊之事值得另外單獨研究，雖然只有一小部分阿裔以色列人逾越界限，但是這已足夠使他們與猶太裔以色列社群的關係烏雲滿布了。穆阿邁爾・沙胡力憶及當炸彈客要離開時：

阿巴斯〔薩依德〕向他道別，擁抱他，告訴他「我們會想念你的」，而我……我不知道我該做什麼……我感覺血液奔騰……我給他溫暖，我擁抱他並且親吻他，我告訴他，「你會去天堂，而我希望未來那時我也能去到那裡。」

三月二十七日，駕駛和炸彈客約下午兩點時離開圖勒卡爾姆，過境到以色列，他們到處找尋軍隊聚集之處，因為他們更希望攻擊軍隊而非市民。司機法特希．哈提卜憶及：「我們幾乎不曾說話，他只是一直向阿拉禱告，說著『讓我成功吧』。」[14]

由於無法找到合適的軍隊目標，他們轉向內坦亞的濱海城鎮，阿卜．巴塞特走進花園酒店（Park Hotel），因為曾在這裡工作過，他對此地瞭若指掌。在主要的餐廳中，客人們聚集在逾越節餐桌上，他引爆腰際的爆裂物，立即殺死二十九人、傷及一百五十人；這是阿克薩起義爆發以來最具毀滅性的單起自殺爆炸案。

以色列人瞠目結舌。夏隆召集他的首長，徵求他們同意執行他認為最恰當的報復行動：全面攻擊西岸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政府。他想要一舉重新佔領巴勒斯坦鄉鎮和城市，以實際踏上這塊土地，清理恐怖分子。

討論中有一件僵持不下的事情——該如何處置阿拉法特。有些人建議驅逐他，但其他人、尤其是勞工黨的希蒙．佩雷斯反對，勞工黨現已與夏隆結盟，他認為驅逐阿拉法特是無意義的，因為他

在外地比在境內可能對以色列造成更大的傷害。佩雷斯解釋道，在外地，阿拉法特曝光率高，且會以遭受迫害的姿態示人，而電視也會大幅報導他的相關消息。在內閣會議中，佩雷斯說：「我不想再有一個耶穌的故事附加在我們的肩上。」

一位內閣成員告訴筆者，政府集會討論了另一個可能性——刺殺阿拉法特。「將一個重達一噸的炸彈設在拉馬拉〔阿拉法特的〕司令部，以此作為第一步〔行動〕的開始」。[15]然而美國否決這個手段。美國駐以色列大使丹．辜爾澤（Dan Kurtzer）遞給夏隆一封信，讓他清楚知道以色列不可以碰阿拉法特。最後首長們決定將阿拉法特定義為「敵人」，並命令軍隊包圍他的辦公室，以實際孤立他。

骰子擲下：防衛盾牌行動（Operation Defensive Shield）。首長們決定全面進攻西岸。這與《奧斯陸協議》完全分歧，且一反數年來所同意的逐漸撤離和分治，將已經移交給阿拉法特的西岸佔領地，再次納入軍事控制之下。

與此同時，在阿拉法特的拉馬拉司令部穆卡塔（muqata），他們預期會有一場攻擊，因此西岸各地的巴勒斯坦領袖開始聚集此處，他們發現阿拉法特「穿著卡其色的迷彩服……準備應戰……非常謹慎……機警」。[16]

傑寧慘案

三月二十九日軍隊開始入侵西岸，迅速逼近阿拉法特在拉馬拉的司令部，以進行攻擊。這尤其具毀滅性，坦克和軍隊環繞園邸，炸毀周邊的圍牆，層層包圍此區，軍隊接近阿拉法特的私人辦公室。

接下來幾天，軍隊攻陷更多西岸城鎮。傑寧是首當其衝的頭號城市之一，它位於西岸北部，以色列稱之為「烈士之都」，從二〇〇〇年十月到二〇〇二年四月，這裡發動了二十八起自殺式攻擊。傑寧的難民營是西岸第二大難民營，住有一萬四千名難民，也是巴勒斯坦武裝行動的溫床。

四月三日，軍隊進入此區，但發現巴勒斯坦人早已準備就緒，傑寧大塊區域都安置了地雷，他們進展緩慢。軍隊避免進入難民營中的狹窄巷弄，只有在巨大的裝甲推土機為他們開路，在擁擠稠密的房舍間整平了道路之後才移動。一位以色列推土機駕駛回憶：

> 整整三天，我所做的只是在摧毀這整個區域，夷平任何子彈來處的房子。為了將一棟房子推倒，我毀壞更多其他房子。在我來之前，擴音器警告他們即刻離開房子，但是我沒有給任何人機會。我不等待……我只是全力撞倒房子，盡可能快速將之剷平……我根本不管巴勒斯坦人……每推倒一棟房屋我就覺得很痛快，因為我知道死亡對他們而言微不足道，失去他們的房子對他們而言更痛苦難當……[17]

及至四月十五日，傑寧的戰役終於結束。當軍隊終於開放記者和國際觀察家進入這個城鎮時，他們看見了巨大的破壞，尤其是難民營的中心，那裡廣大的地區被夷平，四千名巴勒斯坦人無家可歸，到處瀰漫著死亡的氣息。一位巴勒斯坦武裝者穆罕默德．阿布．哈米德（Mohamad Abu Hamid）憶及：「你可以看見成堆〔的屍體〕，這裡一隻手臂，那裡一條腿……從礫石中伸出來。」[18]有些巴勒斯坦人被礫石困在裡面。阿布．哈米德記得一名巴勒斯坦人如何在礫石堆下存活了八天。他身體有一半被燒傷、沒有食物，推土機摧毀房子時，他被困在倒塌的屋頂下，僅有一個小空間。阿布．哈米德敘述：「到處移動時，他發現一罐起司，所以他吃了那些起司，然後尿在這小罐子中，他必須喝自己的尿維生……」[19]

這種故事和恐怖景象對巴勒斯坦人影響甚大，尤其是年輕一代，這刺激他們加入武裝行列，對抗佔領。一位巴勒斯坦領導者哈尼．哈桑（Hani al-Hassan）看見傑寧事件如何影響一位名叫札卡利亞．祖拜迪（Zakaria al-Zubaidi）的年輕人，祖拜迪看見他的家被摧毀、妹妹被殺害。哈尼．哈桑說：

> 他跑向我索取房屋摧毀的補償金。我們給了他兩千五百塊美金。他起先花了一千五百美元，買了卡拉什尼科夫（Kalashnikov，一種步槍，蘇聯共產時期發明，以售給第三世界國家、推動無產階級革命聞名）。然後用剩下的錢雇請其他人。從那時候起，他就成了最強悍的反以戰士。有時候他告訴我：「哈尼，我又殺了一隻狗〔以色列人〕。要為我妹妹報仇，我還需要九十九

隻。」他們把他逼瘋了。[20]

聯合國安理會被這些景象嚇得呆若木雞，四月十九日他們決定採用第一四〇五條決議（二〇〇二年），堅持「透過真相搜尋小組調查傑寧難民營最近之事，提供精確的情報」。[21]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設立了真相搜尋小組，但是以色列不願配合調查，處處設障，使之根本無法實際執行。[22]這僅是國際機構調查以軍在佔領地涉嫌犯下的戰爭罪行的眾多失敗嘗試之一。

回到拉馬拉

在穆卡塔，阿拉法特被包圍的情況更糟了。阿拉法特的親信亞西爾．阿貝德．拉布（Yasser Abed Rabbo），被允許進出阿拉法特的司令部，他說「非常可怕」：

> 那個味道！這是殺戮、殺戮。他們四百多人在那裡面，只有五六個馬桶。且不是每個都能用。常常沒有水。他們沒有更換的內衣褲。我走進穆卡塔假裝我有文件在身，但我其實是從家裡帶內衣褲過來。這是人們的請求。[23]

一位美國外交官被允許進入被包圍的阿拉法特司令部，試圖安排一個停火協議，他敘述裡面的狀況：

> 我從通道這邊看過去，滿是群眾，他們看起來好像很久沒吃東西了，很顯然地沒有使用廁所。當我走過，上去二樓，我看見阿拉法特的人在那裡，他們看起來非常可怕……沒有刮鬍子，他們瘦了很多，形容枯槁，我不禁想道，天啊……[24]

二〇〇一年以軍突擊和（尤其是）二〇〇二年的防衛盾牌行動，對孩童有著極大的毀滅性影響，我們可以從下面找到的資料中得知：

> 過去這一學年尤其慘痛，因為急遽攀升的貧困侵襲著〔巴勒斯坦〕國家，環境與設施的毀壞、住屋和機構的拆除、死亡、受傷、殘廢，和所愛的人被逮捕……變成新的和唯一的生活模式……教育系統並未幸免於難。在二〇〇一到二〇〇二學年度的尾聲時……兩百一十六位學生被殺，兩千五百一十四位受傷，一百六十四位被逮捕，十七位老師和教職人員……被殺，七十一位被逮捕，在〔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以色列進犯到學期結束前這段時間，有一千兩百八十九間學校被關閉長達三週。大約百分之五十九的學童和三千位教育部門的雇員都被禁止到他們的學校來……計畫好的考試被軍事行動打亂……大部分的孩童……整個「暑假」都因軍事宵禁被關在家裡……以色列突擊……對學童的學習能力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他們的安全感、

他們的心理健康、他們的尊嚴，還有他們的意識。這些孩子都受到各種層次的侵犯，他們在憎恨感的宰制下長大，讓他們養成一種所謂的「暴力行為取向」……在巴勒斯坦案例中，暴力的形成都因以色列軍事佔領而開始和結束。[25]

五月二日，因為美國施壓，夏隆命令終止防衛盾牌行動，但軍隊仍駐紮此區，將西岸城市、小鎮和村莊變成了軍事管制區，這裡的居民此後數天幾乎都在宵禁中度過，軍隊逐戶搜捕要犯。這是巴勒斯坦佔領區歷史上最慘烈的時期。

加薩的戰爭犯罪？

防衛盾牌雖然減少巴勒斯坦暴亂，但整體而言並未成功壓制它。六月五日暴亂又再度大行其道，一輛滿載爆裂物的車子在以色列北部引爆，導致十六人罹難、五十人受傷。而後七月十六日，巴勒斯坦武裝分子又在靠近西岸艾曼紐屯墾區的地方突擊了一輛猶太公車，導致九人遇害、十八人受傷；隔天，兩起自殺炸彈客又在特拉維夫殺害了五人、傷及四十人。

這些攻擊許多都是哈瑪斯內部策劃的，這個伊斯蘭運動在加薩聲勢浩大，且由於它反對與以色列談和，便更覺毋需對此負責，也因此對佔領政府而言更具侵略性。雖然夏隆持續將阿拉法特視為主要禍源，但他也指示軍隊盯緊另一個重大目標——薩拉赫．薛哈德（Salah Shehadeh），他是哈瑪斯的創始人之一，也是加薩走廊軍事部門的指揮官。不久之後的七月十七日，在軍隊參謀長摩西．亞隆（Moshe Yaalon）的辦公室召開會議，討論暗殺薛哈德的空襲計畫。空軍代表埃利澤．舍科迪（Eliezer Shkedi）在會議中發表軍事策略，並估計小於一噸的炸彈未必能殺死薛哈德，因為預定的攻擊將發生在他身處某棟建築內的時候。國防部長本．埃利澤在筆者的訪問中解釋道：「一噸的炸彈有著使命必達的確定感。你可以確定它必能殺死那個人……而此處〔對薛哈德〕使用這種炸彈就可以說得通。」[26]的確，以色列當時所投擲的一顆重達一噸的炸彈，往往指的是MK 84通用炸彈（Mark 84 general-purpose bomb），它的威力強大到可以擴及十五公尺寬、十一公尺深，並穿透超過三公尺的混凝土。這也是為何舍科迪指出，投擲這顆炸彈會導致在場其他房屋遭受巨大傷害。他預測：「這些破屋在這個事件之後就不再存在了……那住在裡面的人怎麼辦？我認為很可能……他們都會被殺……」[27]但不論如何，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命令執行此行動，七月二十二日，一架以色列F-16戰機對目標投下了一顆MK 84炸彈。這碩大的一噸炸彈被投擲在加薩市的住宅區，造成連帶傷害，除了薛哈德之外，還殺死了十四個無辜的人，包括他的女兒和妻子（本．埃利澤告訴筆者，「我們知道他的妻子也是一個恐怖分子」）。[28]空軍指揮官丹．哈盧茨（Dan Halutz）毫無悔意，他向投擲炸彈的機師道賀，告訴他們：「弟兄們，你們晚上可以安然入睡……我就是如此……你們的任務執行得很完美……太棒了。」[29]

這行動是否足以構成戰爭犯罪，應留待國際法專家判定，但無疑地，決定在人口稠密的地區投擲如此大的炸彈，不免令人對此決定的決策者產生深刻懷疑。

一張路線圖

同時在外交層面，夏隆和他的顧問團試圖說服布希政府，這暴力的蔓延都應歸咎於亞西爾・阿拉法特。事實是，當時巴勒斯坦暴動者對抗以色列的武器是自殺式炸彈，由於美國九一一攻擊事件也是遵循同樣模式，造成三千名美國人喪生，美國對以方心有戚戚，這也讓夏隆反對阿拉法特的論述更具說服力。

夏隆成功說動美國政府，對抗阿拉法特的高潮在防衛盾牌行動不久之後，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布希總統公開說出他的兩國方案，其中說到安全的以色列國家將與一個可行而民主的巴勒斯坦和睦共存，但是他提出附加條件（這是夏隆的點子）：巴勒斯坦須選出一位新的領導人。布希宣稱「和平，需要一個新的、不同的巴勒斯坦領導者」，他繼續呼籲巴勒斯坦人民選出一位不「向恐怖妥協的」新領袖。在其回憶錄中，布希寫道：「二〇〇二春天，我斷定只要阿拉法特在位，就不可能達成和平……」[30]

如此出手干預巴勒斯坦內政，是史無前例的，這也使許多巴勒斯坦人深受震撼。致使布希說出這種言論的其中一位美國官員道格・費斯（Doug Feith）說：「總統抓住這匹馬〔阿拉法特〕、這匹老馬，對準他的頭開槍，然後說我們不要他媽的阿拉法特、巴解組織，他們反民主、支持暴力和恐怖主義，且從伊朗馬那裡獲取槍枝。去他的。砰。」[31]布希的兩國方案與要求巴勒斯坦人民換掉阿拉法特，是實踐後來被稱為「路線圖」（Roadmap，結束以色列佔領和解決以巴衝突的新方案）的

重要步驟。

很少人知道約旦在這新方案中扮演著先驅者的角色，但無疑地約旦這麼做大有道理，因為它境內有一百七十萬名巴勒斯坦難民，對於佔領地的情況高度敏感。[32]然而，布希總統在六月二十四日的演說中，鼓吹解決以阿衝突的兩國方案，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認為布希雖然說出了他的看法，但如果沒有後續實際的執行步驟，看法本身起不了太大作用。[33]趁前往白宮時，國王決定催促布希總統擬定一個行動計畫，將他關於巴勒斯坦國家的看法付諸實行。

二〇〇二年八月一日在白宮，國王告訴布希總統：「我們需要一個路線圖，以了解我們該如何從我們現在的位置，到實現您、總統先生所提出的看法……」[34]在會議現場的國務卿克林・鮑威爾（Colin Powell）記得國王補充道：「擁有看法和發表言論是一回事，如果您沒有規劃出**如何**抵達那裡……您必須有一條路徑……」[35]總統同意要採取更多行動以實踐他的想法，並指示他的官員開始擬定計畫，規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如何將布希的兩國方案付諸實行，並建立一個可行的、與以色列並肩共存的巴勒斯坦國家。

二〇〇二年底，路線圖在至少概念上地位均等的「中東問題四方」（俄國、聯合國、歐盟和美國）監管下問世。新推出的路線圖有三個面向：第一個面向要求巴勒斯坦人無條件停止暴力行動，同時以色列必須凍結所有屯墾活動，並拆除二〇〇一年三月起建立的屯墾區前哨站。在此面向中，巴勒斯坦人也必須執行全面的政治改革，透過指派一個總理、擬定憲法，並舉行民選——這都是為

了推翻阿拉法特，布希總統希望巴勒斯坦人與之劃清界線；第二個面向，二〇〇三年十二月成立一個獨立的、擁有臨時國界的巴勒斯坦國家；第三個面向，二〇〇五年時簽訂最後的和平協議，將解決邊界、耶路撒冷狀況、難民和屯墾區的問題。然後會有一場會議，所有阿拉伯國家會與以色列簽訂這個和平協議，為以阿衝突畫下終點。[36]

現在布希要求允許路線圖開展前必須將權力讓給新的總理，然而阿拉法特已經領導巴勒斯坦人民太久，要他讓位，需要國際特務和其人民的強力勸服。由於被孤立，他機會渺茫；為了說服他，人們擔保他能擁有總理的選擇與罷免權。二〇〇三年三月七日他終於軟化，公開邀請阿布．馬贊、一位溫和主義者和暴力起義的批評者擔任第一位巴勒斯坦總理。四月三十日在阿布．馬贊和他的新內閣宣誓就職時，中東問題四方公布其路線圖。

為了執行路線圖，布希總統派遣一位經驗豐富的外國事務官員約翰．沃爾夫（John Wolf）到中東。沃爾夫的其中一個目標是，將加薩走廊和伯利恆地區的國安責任從以色列移交到巴勒斯坦當局，伯利恆地區在防衛盾牌行動後便一直在以色列的控制下。只要巴勒斯坦人能證明他們會維持安全、管制移交地區的攻擊行動，計畫的第一步就是讓以國撤離阿克薩起義中重新佔領的地區。如此一來，路線圖第一面向的兩個條件（以色列撤軍和巴勒斯坦箝制恐怖行為）便可以達成。

六月二十七日，沃爾夫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同意所謂「加薩協議」，使得加薩和伯利恆地區在隔天便轉由巴勒斯坦管轄。更進一步地，新的巴勒斯坦總理阿布．馬贊也說服了武裝分子，暫停

三個月的反以軍事行動。由於情況大有斬獲，對以色列的自殺式炸彈攻擊暫停了，加薩走廊的生活稍稍回歸正常。根據沃爾夫所言：

> 危機減緩了……加薩和以色列的生活品質都快速提升。加薩協議使巴勒斯坦人得以自由活動，人們可以去到海邊。我們有一項非官方的指標……〔佔領地的〕商店開到多晚——以前店門緊閉的商店現在開到晚上十點或十一點……這真的是百花齊放的時候……[37]

由於巴勒斯坦總理阿布．馬贊致力實踐路線圖，他獲邀前往白宮，這是喬治．布希上任後一直不肯給予阿拉法特的機會。

艾里爾．夏隆的牆

七月二十五日阿布．馬贊抵達華府，他此行有一個目的，即說服總統譴責以色列的「安全圍籬」，巴勒斯坦人往往稱之為「那道牆」。這是延伸到西岸的一系列水泥圍牆、電網、鴻溝和看守台，以色列人仍在持續興建中。圍籬的用意是阻止自殺炸彈客越界進入以色列，以色列人自圓其說地聲稱這不過是一項安全措施。然而，巴勒斯坦人相信，以國試圖將它變成以國和西岸之間的實體政治國界，而這代表著巴勒斯坦國界的兼併，因為圍籬的路線直接切入西岸，而非沿著所謂的綠線

（一九六七年戰爭前分隔西岸和以色列本土的最初國界）而建。

現在在橢圓形辦公室，阿布．馬贊在總統面前攤開一張大型地圖，展示以色列圍籬如何深入西岸，大大有別於綠線。這不僅是侵占土地，並且已經對西岸人民造成極大的痛苦，因為它將農人與其土地、病人與其醫院、孩童和他們的學校分割開來。布希看了看這張地圖，告訴他：「有這種牆的存在，有這種地圖的存在，我們永遠不可能建立一個可切實生存發展的巴勒斯坦國家。」[38]在後來玫瑰園的記者會上，總統說：「我認為這道牆是問題所在……這道蜿蜒直入西岸的牆使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難以發展出共同信任。」[39]

四天後，輪到以色列總理艾里爾．夏隆訪問白宮，在阿布．馬贊的報告後，安全圍籬變成了總統的首要議題。但夏隆不為所動，辯護說這對以色列的國安是必要的——數字會說話，這道圍籬阻止了越界進入以色列的自殺炸彈客。雖然幾天前，布希與巴勒斯坦總理談話時甚為憤怒，現在他卻沒有在此事上對夏隆緊迫盯人，只說：「我希望長時間下來，可以不再需要這道牆。」[40]國務卿克林．鮑威爾解釋總統的想法：「你被攻擊，卻被要求不可以保護自己，這實在說不通。如果這道圍籬是保護你自己的方法，那麼就算了……〔夏隆〕反駁道圍籬可以被建起來，也可以被拆除，所以我們並非在決定最後的國界。」[41]布希總統接受了這個說法；他的心早已偏向以色列——傾向以以色列的角度看事情——而這在九一一事件後變得更為嚴重；這輪廓可以從其回憶錄中看出，他在裡面寫道：「我為以色列強敵環伺下脆弱的處境感到驚訝……我相信我們有責任維持深厚的關係……」[42]

國際法庭較不願與以色列妥協。在一場二〇〇四年的諮詢會議中，法庭批評以國興建這道牆，

因為它「阻礙了佔領地巴勒斯坦居民的移動自由……〔它也阻礙了〕他們的工作、醫療、教育和維持一定的生活品質……」。法庭裁決：「因此以色列有義務停止建造這道牆……〔以色列有義務〕歸還土地、果園、橄欖園，和其他因為建造這道牆而被從任何自然人或合法公民手中奪取的不動產……」[43]

回到暴力的惡性循環

儘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停火了，且這段時間停戰協定一直被維持得很好，但是八月十四日，以色列暗殺了穆罕默德．賽德爾（Mohammed Seder，伊斯蘭主義吉哈德在希伯崙的軍事部門領導者）；他一直都在以色列的通緝名單中。根據國防部長的軍事秘書麥克．赫爾佐克（Mike Herzog）所述：「我們知道賽德爾在計畫一場攻擊。所以我們派遣我們的特殊軍力逮捕他，他在槍戰中遇害。他是一個壞蛋。」[44]穆罕默德．賽德爾是否真的在計畫攻擊以色列、是否如軍事秘書聲稱的，他是在軍隊逮捕時「在槍戰中」遇害，抑或是貨真價實的謀殺，我們也許永遠無從得知。但是現在，巴勒斯坦總理面對一個棘手的問題：如何阻止巴勒斯坦人復仇，回到攻擊和被攻擊的惡性循環中。雖然被謀害的賽德爾屬於伊斯蘭主義的吉哈德，但是計畫執行報復的卻是哈瑪斯。

八月十九日，來自加薩的畫家、同時也是哈瑪斯成員的馬吉德．薩特伊（Majd Zaatri），將載著二十九歲的拉葉德．阿卜杜勒．哈米德（Raed Abdel Hamid）至耶路撒冷市中心，哈米德在那裡

點燃爆裂物。薩特伊記得「炸彈客盛裝打扮〔就像一位正統的猶太人〕，穿著白襯衫和黑長褲，〔而我〕為他戴上帽子……」。[45]在坐車到耶路撒冷市中心時，薩特伊向拉葉德·阿卜杜勒·哈米德解釋如何使用爆裂帶：「我向他示範啟動爆炸的開關。我向他示範如何不會卡住……他不可以戴反……我向他示範如何穿上，使開關可以朝外……」這位準爆炸客的心神狀態良好，薩特伊憶及：「他很高興。他笑著……他是大學畢業的人。他不是年輕孩子。他在安曼讀過書……他有兩個兒子，現在第三個要出生了。」他們停在耶路撒冷猶太信徒社區的公車站牌旁，炸彈客走出車子。薩特伊記得：「我向他說：『上帝與你同在』，『再見，天堂見。』」

這位自殺炸彈客在公車上引爆炸彈，導致大規模爆炸，殺害了二十三個人，其中七個是孩子和嬰兒，更有超過一百人受傷。兩天後的八月二十一日，以色列進行了報復，軍隊在加薩發動直升機攻擊，殺死了哈瑪斯官員伊斯邁爾·阿布·沙那卜（Ismail Abu Shanab）。雖然是以色列破壞了停戰協定，但美國人沒有訓斥他們的行為；白宮發言人史考特·麥克萊倫（Scott McClellan）說：「以色列有權自我防禦」。於是哈瑪斯和伊斯蘭主義的吉哈德決定撤銷停戰，起義再度勃發。

大約此時，以色列蒐集的情報顯示，哈瑪斯的創始人和精神領袖謝赫·艾哈邁德·亞辛將於九月六日在加薩，與整個哈瑪斯領導層召開一場會議。這似乎是一次殲滅整個哈瑪斯高層千載難逢的機會，可望造成整個組織的嚴重損失。一架戰機在會議舉行的建築上方擲下了一顆五百公斤的炸彈。但以色列的情報有瑕疵：會議原本預期應在三樓舉行，但或許是因為謝赫·亞辛坐輪椅的緣故，領導人卻聚集在一樓。因此雖然三樓被炸彈完全摧毀，但謝赫和其他在一樓的哈瑪斯領導者都毫髮無損。謝赫·亞辛的兒子當時在他的身邊，憶及：「我們聽到頭頂上有爆炸聲……〔其中一位參與者〕伊斯邁爾·哈尼葉（Ismail Hanieh）以他一貫的平靜聲音說道：『我們被轟炸了，謝赫，我們必須即刻離開這棟房子。』亞辛問道：『你確定是我們的房子？』哈尼葉說，『是的，快、快。』」[46]然後，哈尼葉抬起亞辛的腿，他的兒子托著他的肩，一起衝出屋外。

儘管如此，以色列人持續獵殺武裝分子，而這件事讓原本以牙還牙的惡性循環更如火上加油一般。九月七日，一架武裝直升機攻擊了哈瑪斯成員阿卜杜勒·薩利姆·阿布·穆薩（Abdul Salem Abu Musa）在加薩走廊南方的房子，至少傷及十二人。兩天後巴勒斯坦回報以兩起自殺攻擊，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一共造成十五人死亡、數十人受傷。九月十日以色列再度出擊，向一位資深哈瑪斯成員馬赫穆德·札哈爾（Mohamoud Zahar）位於加薩市的房子發射飛彈，殺死他的兒子和一名保鏢，並造成二十五名無辜人民受傷；札哈爾自己則死裡逃生，僅傷及皮肉。

艾里爾·夏隆一如既往地責怪阿拉法特使情況愈演愈烈，九月十一日他聲稱阿拉法特為一個「完全的和平障礙」，並引導其內閣做出決定，要「以我們選擇的方式和時間，除去這個障礙」。[47]儘管他向布希總統承諾過，但是如今毋庸置疑地，他已經開始為暗殺阿拉法特的可能性做準備了。

14 單向主義和其獎賞（二〇〇四～二〇〇七）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持續的血腥戰役背景下，一種新的想法開始逐漸在以色列生根發芽。其主要概念從為結束衝突而與巴勒斯坦人協商，到轉而採取單邊步驟，旨在實際與之分離，結束特定地區的佔領。這個想法在夏隆的總理任期中達到高峰，使之採取在加薩走廊和西岸的四個屯墾區單邊撤離軍隊和屯墾的手段。毫無疑問地，這是一項大膽的行動，因為即使是前任左翼政府都不願在與巴勒斯坦人達成最終協議前撤離佔領地，或拆除屯墾區。遇害的總理伊札克・拉賓曾一度說過，他會很高興看到加薩沉入海底，但即使是他——與巴勒斯坦人達成奧斯陸和平協議的主事者——都不願意在協議達成結論之前，拆除任何屯墾區。

從巴勒斯坦佔領地單邊撤離並非夏隆的想法，而是巴拉克，他在大衛營高峰會破局後，宣布巴勒斯坦沒有和平的對象，而以色列即使一廂情願，也必須創造一個他所謂的「我們在這裡，他們在那裡」的局面。在大選中擊敗巴拉克的夏隆，由於對與巴勒斯坦協商缺乏信心，故對他前任總理的

單邊撤離的想法饒富興趣。但與巴拉克不同的是，巴拉克主要專注於與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分開，而夏隆首先著手的是他視為以色列枷鎖的加薩走廊。

夏隆打著如意算盤，認為透過建立一個時程表，將重點放在撤離加薩走廊，並將它塑造為和平進程的一部分，就可以重新得到國內外的支持；同時，巴勒斯坦則必須奮力重整以色列留下的爛攤子。更重要的是，撤離是如此出人意料——向來手段強硬的夏隆能如此大刀闊斧地改變作風——它能誤導中東和平四方（美國、歐盟、俄國和聯合國所組成的聯合外交代表）使之不緊迫推行前述的和平路線圖。夏隆憎惡路線圖，因為它使他必須在許多敏感議題上妥協，包括東耶路撒冷的所有權、西岸猶太屯墾區的管轄權，以及最芒刺在背的，四百八十萬巴勒斯坦難民回歸以色列的權利。

前置作業

這單邊撤離加薩的計畫逐漸成形，其背後的推力是夏隆的重要政治與外交政策顧問多夫・魏斯格拉斯（Dov Weisglass）。他將這個想法帶進一場小型顧問會議，會議成員往往在週五早上或週六晚上，聚集於總理的梧桐牧場（Sycamore Ranch），在其廚房開會。很難正確無誤地重建整個討論過程，因為此會議沒有出現過任何逐字記錄稿，在總理辦公室的正式行程表中，僅有幾場會議以暗號「梅拉私約」（Private Meira）的方式出現，名稱來自負責會議組織的職員梅拉・卡翠爾（Meira Katriel）。然而我們確實知道的是，二〇〇三年九月、十月，夏隆和他兒子的貪污事蹟流言四起，

以及與巴勒斯坦似乎永無止境的血腥戰爭致使夏隆的人氣下滑，他決定放手執行單邊撤離計畫。但在這之前，他必須先試試美國的水溫。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在羅馬召開的一場會議中，夏隆告訴白宮安理會負責以巴事務的閣員艾略特・亞伯朗斯（Elliott Abrams），他在考慮從加薩走廊撤離。雖然明知這樣的計畫必然打亂其他計畫好的佔領地協議，夏隆仍然一意孤行，強調從加薩走廊撤離，在任何方面都不會與路線圖有所悖逆，他承諾以色列仍然會致力配合中東四方的計畫。羅馬會議是夏隆首次在其親信圈外，說出其單邊撤離加薩走廊的計畫。

之後，夏隆開始準備向以色列大眾提出單邊撤離加薩走廊一事，要求擬稿人將之加入演講稿中，並說：雖然以色列會持續配合執行路線圖，但是這與單方面結束佔領並無衝突。後來，十二月十八日，在以色列北部核茲利亞（Herzliya）的一場會議中，夏隆公開宣布了他的「脫鉤計畫」（Disengagement Plan）；其原名「分離計畫」（Separation Plan）被改掉，因為「分離」一詞使人想起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而「撤退」（withdrawal）一詞在以色列仍是禁忌，因此「脫鉤」被認為對大眾效果較好。

夏隆宣稱：「就像所有以色列公民一樣，我渴望和平」，然而「如果巴勒斯坦人沒有做出相似的努力，尋求衝突的解決之道——我不想遙遙無期地等他們」。[1]他補充道——無疑是為了告訴國際聽眾——路線圖是「達成真正的和平最好的方式」，但「恐怖主義組織與亞西爾・阿拉法特沆瀣一氣，以一連串未知的、最野蠻的恐怖攻擊破壞和平進程……」。他警告道，如果巴勒斯坦繼續無視於他們執行路線圖的義務——如果他們無法停止攻擊以色列——「那麼以色列會率先採取單方面的安全措施，從巴勒斯坦撤離……完全配合美國」。

夏隆進一步解釋，他的計畫將如何進行：他會全面撤除加薩走廊的二十一個猶太屯墾區，將八千六百位屯墾者重新引渡回以色列安置，重新部署軍隊，強化以色列與加薩的圍籬。但狡猾的地方是，他也強調以色列會同時加強控制「以色列國土上其他相同情況的地區（也就是西岸）」，將之變成以國未來協議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換句話說，這個計畫的本意是用加薩走廊——早在一九六七年國防部長摩西・達揚就曾稱為「蛇窟」的地方——交換猶太歷史的搖籃——西岸。

當以色列大眾和全世界正在消化他的大膽提議時，夏隆同時也在大幅殲滅加薩走廊的武裝分子。戰勝哈瑪斯和其他反以色列的武裝分子至關重要，以免他們宣稱是他們的施壓致使以色列撤離。後來，加薩街頭的通敵者告知以色列人許多武裝分子的下落，軍隊便進一步逐一殲滅。以色列暗殺名單上最高階的巴勒斯坦人，是下肢麻痺的哈瑪斯精神領袖謝赫・亞辛，如前所述，他成功地逃過了一次劫難。因為他聲音尖細，夏隆戲稱他為「吱吱叫的狗」，並且欲置他於死地。但由於上次奪命未遂，謝赫對其行動更為小心，以色列需要耐心等候機會逮住他。國防部長沙烏爾・穆法茲在一次與筆者的訪談中說：「我們跟蹤他很多個晚上，我會等……到〔凌晨〕一兩點，看看是否有機可趁〔暗殺他〕。」[2]

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儘管以色列直升機盤旋在他家上方，謝赫仍然決定要到清真寺禱告，他在兒子阿貝德．阿米德．亞辛（Abed el Amid Yassin）和幾位貼身保鏢的陪同下前往。在清真寺時，他們發現空中有更多的以色列飛機，阿貝德．艾爾．阿米德告訴父親：「爸爸，我們不能離開這裡，我們待在清真寺，他們不會攻擊清真寺。我們留在這裡，躲起來。」[3]但是凌晨四點四十五分時，亞辛的兒子事後回憶：「我們決定在晨禱後回家，因為謝赫累了……他吃過藥後就睡在清真寺的墊褥上。我們聽不到直升機的聲音，所有人都深信危險遠離了……」他們跑離清真寺——亞辛的兩位貼身保鏢推著輪椅，向彼此高喊「跑、跑」和「阿拉真偉大」。他們被三顆飛彈擊中，謝赫和其保鏢遇害；其子倖存。

亞辛被暗殺的二十六天後，代理其位的阿卜德爾．阿齊茲．朗提希（Abdel Aziz Rantissi）裝扮成老年人出門，也因座車受到飛彈攻擊而遇害。在這次謀殺後，哈瑪斯放棄了抵抗。他們向埃及情報局長奧馬爾．蘇萊曼（Omar Suleiman）發送了訊息給夏隆，說道：如果以色列停止暗殺，哈瑪斯就會停止自殺式攻擊。夏隆同意，於是停戰開始了；往後很長一段時間都不再有對以色列的自殺式攻擊。[4]

夏隆的獎賞

總理不與巴勒斯坦人討論他撤離巴勒斯坦的計畫，但是他仍然認為美國應該為他準備撤離佔領

地一事給予他獎賞，因為喬治．W．布希於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提出了他的兩國並存觀點，而夏隆認為自己這麼做正是執行布希計畫的正確方向。

夏隆試圖從華府得到書面承諾，尤其在以色列的西岸屯墾區和巴勒斯坦難民這兩個關鍵議題上。他希望美國正式同意以色列和未來巴勒斯坦國的最後國界線，有別於一九六七年前切分以色列和西岸的綠線，它將更**深入**西岸，使以色列得以兼併這條線周邊的大塊猶太屯墾區。他也想得到美國的書面承諾，在任何以巴的最終協議中，不能有百萬計的巴勒斯坦難民被允許回到他們父祖在以色列的家園——即所謂的「歸鄉權」（以色列稱之為巴勒斯坦「回鄉的**要求**」）不能適用。然而，對於華府而言，公開將票投給以色列、支持西岸土地兼併和將巴勒斯坦離散者的歸鄉權拒之門外，會使阿拉伯世界陷入瘋狂。因此，美國外交官先到他們的阿拉伯盟國約旦的安曼那裡去試試水溫。在約旦絕大多數的人口都是巴勒斯坦人，國王希望能參與所有方案的討論；如果巴勒斯坦人對結果不滿，他可能是首當其衝遭池魚之殃的人。

三月三十一日在約旦，美國官員告訴約旦外交部長馬爾萬．馬阿謝爾（Marwan Muasher），有關夏隆單邊撤離的提案，以及他希望從美國這裡得到的獎賞。馬阿謝爾嚇得魂飛魄散，他說約旦只能同意「一九六七年國界有細微的調整」，但是廢止巴勒斯坦人的歸鄉權，他告訴客人：「沒有任何阿拉伯國家會接受這件事。」[5]約旦人也擔心夏隆只撤離人口過剩的加薩走廊，而不從西岸撤離。美國外交官尤其忽略了後面這點，因此，事後他們立刻迫問夏隆（雖然只是象徵性地）這是否是他的企圖。國務卿鮑威爾記得他告訴夏隆：「你也應該對西岸做些什麼。它必須看起來像是一個

面對問題的整體對應方式，而非僅〔從一個加薩撤軍〕。」[6]

最後，夏隆妥協了，承諾除了加薩走廊外，以色列也會解散西岸的四個小屯墾區。這對約旦來說是正確的一步，但國王阿卜杜拉二世仍擔憂美國總統可能給予夏隆類似的讓步，因此四月八日國王寄了一封信給布希：

> 我寫信給您，是為了告訴您約旦的一些想法……我害怕以色列要求的讓與〔作為加薩撤軍的獎賞〕會破壞雙方的努力。尤其，我們希望沒有任何與一九六七年〔國界線〕不同的邊界讓步被釋出。〔巴勒斯坦〕難民的處置方式也應該維持開放，以待雙方達成共識……[7]

儘管國王阿卜杜拉二世提出這些憂慮，布希政府仍然堅決聽從夏隆的計畫。四月十四日夏隆到訪華府，想要完全確定可以得到他想要的書面承諾，有了這個，他認為有助於讓以色列大眾接受其單邊撤離方案，且理所當然地也有助於未來的以巴協商。因此在他抵達前，夏隆就派遣大使與美國官員仔細討論最終美國的承諾內文。

以色列協商代表堅持美國應該精確詳述其承諾（以書面文字的方式，加上署名），允諾以色列在未來任何與巴勒斯坦的協商中，得以保留每一個一九六七年國界以東的西岸屯墾區。然而美國人對此躊躇不前——他們深知接受這個要求會觸怒阿拉伯世界。反之，他們寫出了一篇語焉不詳的傑作：「從如今新的地上事實看來，大批以色列人口聚集之村落已經存在，因此期待一個完全徹底的

〔以色列〕領土歸還〔回到一九六七年國界〕是不切實際的。」[8]這可以確保以色列留下大塊屯墾區，但由於其語言模糊至極，美國人得以抵禦阿拉伯的批評。

對於巴勒斯坦人要求擁有「歸鄉權」回到以色列本土一事，以色列協商代表要求美國保證巴勒斯坦難民會被安置在未來的巴勒斯坦國家，而「不是以色列」。然而，美國人無法接受這種措辭，而是傾向於正面陳述：難民終將融入未來的巴勒斯坦國，對以色列隻字不提。由於夏隆的協商代表堅持放上「不是以色列」一語，美國人想出了新說辭：巴勒斯坦難民會被吸收進未來的巴勒斯坦國家，「更甚於以色列」。以色列人滿意了，他們達成了國界和難民的雙重目標，得到撤離加薩走廊和象徵性地撤除四個西岸屯墾區的報償。

高峰會之後的記者會中，布希述及夏隆的承諾，亦即從加薩走廊撤除所有屯墾區，以及撤離西岸特定的軍事基地和屯墾區。至於報償，布希說：「在今日交換的信件和我今天稍晚會發布的談話中，我會向總理重述我對於以色列國安的承諾……地上事實〔指西岸的大塊屯墾區〕在過去數十年中已經大幅改變，而任何最終決議必須將這些現狀納入考量……」且巴勒斯坦難民會被吸收到未來的巴勒斯坦國家，更甚於以色列。[9]

這是夏隆的一大勝利。世界最強國的領導者布希總統，更向以色列的立場靠攏，宣布兩個一直以來在巴勒斯坦人民心中深重執守著的原則——以色列從一九六七年國界撤離，和巴勒斯坦離散者回到古巴勒斯坦地區的歸鄉權——化為烏有。布希總統對於他現在所背書之事的重要性是否有任何

真實的了解，我們不清楚，但是在此之前的和平進程原則被重寫了。

毒死阿拉法特？

同時，夏隆堅持斬除他在佔領地上的仇敵，以確保當以色列撤離加薩走廊時，他們不會聲稱以色列的撤離是由於巴勒斯坦的施壓。夏隆主要專注於對付哈瑪斯和伊斯蘭的吉哈德武裝分子，但巴勒斯坦當局的主席阿拉法特，似乎也在他的頭條名單中——儘管夏隆在二〇〇一年三月已向布希總統承諾不會傷害他。

夏隆言語中涉及阿拉法特的用詞，似乎顯示這位巴勒斯坦領導者正面臨驚濤駭浪，在拉馬拉司令部穆克塔，他僅接見的少數訪客警告他，他很可能會被以色列人帶走。一位前英國秘密情報局官員、後來從事歐盟外交工作的阿拉斯塔爾．克魯克（Alastair Crooke），記得他與阿拉法特的最後對話，他說：「你知道，如果還有另一個〔以色列的〕大規模攻擊，我認為他們會殺你。他們沒有紅燈。」阿拉法特回應：「阿拉斯塔爾，他們有**綠燈**。這比在貝魯特〔夏隆一九八二年圍堵我〕還要嚴重。」[10]

在前述二〇〇四年四月十四日夏隆訪問華府期間，除了收到美國對難民與國界的書面承諾外，至關重要地，他也成功地為二〇〇一年三月他對美國總統的承諾（不會傷害阿拉法特）找到開脫之辭。四月他們在白宮的會談中，布希要夏隆將阿拉法特的命運交給上帝決定，夏隆即刻回覆「神有時需要援手」。[11]事實上，夏隆不再堅守不殺阿拉法特的承諾，此事可在他回國後的電視訪談中得到證實，他在節目中說道：「我從這承諾中鬆綁了……我從這關於阿拉法特的承諾中獲釋了。」[12]由此可見，不若二〇〇一年三月，二〇〇四年的現在，對不傷害阿拉法特一事，布希不再堅持，有效地給予夏隆痛下殺手的（若非綠燈，也至少是）黃燈。

二〇〇四年一整年，阿拉法特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他的一位助手巴沙姆．阿布．沙里夫（Bassam Abu Sharif）說，阿拉法特「的體重一直在減輕，他的皮膚非常蒼白，幾乎變成透明的，他的活力大大減低。他的呼吸有異味，而這並非洋蔥或大蒜造成的」。[13]其他人也體認到阿拉法特健康狀況大幅轉變。他的同仁穆罕默德．拉希德記得有一次拜訪阿拉法特時，「阿拉法特看到我，他微笑，向我招手讓我進來，但是他很虛弱、很虛弱，我靠近他、親吻他時，他說，『離我遠一點，我不想要傳染給你。』」[14]

夏天時，阿拉法特已經病入膏肓，但仍然不願被裁撤到醫院，以免夏隆不許他回拉馬拉。最後，當他健康狀況已經惡劣至極，他沒得選擇，只能同意被裁撤。十月二十九日，一架約旦直升機將阿拉法特從拉馬拉載運到安曼，一架法國飛機在此等待著要載他到法國。阿拉法特的同僚納比勒．沙阿斯（Nabil Shaath）在他搭乘飛機到法國之前見到了他：

> 我奔上前去問候他。我們一起走了約五十公尺到法國飛機停放的地方。我站在他的右方，支撐

著他，他一面走一面說。他說：「〔我的醫生〕希沙姆（Hissam）說我會沒事，因為希沙姆自己也有過類似的症狀，他現在身強體壯……我會沒事的。而且席哈克醫生〔阿拉法特如此稱呼法國總統〕會照顧我。他很關心我……」[15]

但事實並非如此。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靠近巴黎的沙馬特（Chamart）的派西軍醫院（Percy Military Hospital）中，阿拉法特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五歲。他的死因仍然籠罩在迷霧中，他被以色列人毒死的臆測漫天飛舞。

雖然我們並沒有直接證據顯示以色列殺害阿拉法特，但是證據的分量仍顯示，不應排除這個可能性。事實是，早在二〇〇一年三月，布希總統覺得須從夏隆口中得到不傷害阿拉法特的承諾時，美國就懷疑以色列人會這麼做。在後續的幾個月中，夏隆公開說道必須「除掉」阿拉法特，雖然我們也應公平地提及，他從未解釋他話語中所謂的「除掉」是什麼意思——是身體上的還是政治上的。

以色列人企圖殺害阿拉法特的明確指標，可以在以下「最高機密」文件中找到；在二〇〇〇年十月十五日的報告中（夏隆甚至還未上任前的幾個月），以色列安全局沙巴克寫道：

> 在佔領地的暴力事件之後，疑惑再次竄升，是否阿拉法特是一個助長以巴歷史衝突的主因，或說，是否我們與之交手的，是一個……政策和行為都嚴重威脅以色列國安的領導人。

在爬梳了「為何阿拉法特是必要的」，以及「為何阿拉法特不是必要的」之後，文件說道「〔阿拉法特〕造成的弊大於利……」，接下來的結論直截了當：「七、阿拉法特此人，是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他的消失比持續存在有更多好處。**」[16]然而，即使是這份沙巴克「最高機密」報告，都沒有給予我們足夠的謀殺證據，我們很可能需要等待更多資訊，以確定殺死阿拉法特的真正原因。

錯失良機

阿拉法特之死成了另一次錯失的良機，因為如今有一位新的、溫和的巴勒斯坦領導者——前任總理阿布．馬贊——在二〇〇五年一月當選總統，美國本可進一步推進以巴和平進程。但是，如同美國外交官阿隆．大衛．米勒的觀察：「政府並未努力賦予阿布．馬贊更多權力，推展和平進程，而是讓情況游離不定。」[17]也許是因為布希總統不願推迫夏隆，或他真正的感覺是離以巴混亂愈遠愈好；又或者在這緊要關頭，美國政府覺得與其催促一個完備的以阿協議，不如幫助夏隆單邊撤離加薩走廊，作為以軍和屯墾者從巴勒斯坦佔領地上撤離的重要先鋒。

單邊撤離——但佔領並未結束

二〇〇五年八月十四日深夜，整個加薩走廊實施宵禁，軍隊和警察在猶太區挨家挨戶向加薩走

廊屯墾者發布驅逐警告，呼籲他們離開，否則就要被強制撤離；驅逐令也同樣被傳達到即將拆除的四個指定的西岸屯墾區，其中有六百八十位屯墾者。三天後撤離開始。這個行動包含四個面向：屯墾者的實體撤離（因為雖然屯墾者早已收到撤離令，卻仍留了下來）；其所有物的撤離；摧毀空建築；以及最後，軍隊撤離。

儘管有一些戲劇性場面，像是軍隊必須將屯墾者拖離他們的房子，但是撤離的進度比預期快速，九月十一日，加薩分部司令部的以色列國旗最後一次被降下，軍隊離開了，為加薩走廊三十八年來的軍事佔領畫下句點。總括而言，大約兩千五百三十棟房屋被拆除。四個西岸屯墾區的撤離同時進行，且早在八月二十三日就撤離結束，兩百七十棟屯墾者的房屋被拆毀。

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人對夏隆的單邊撤離都感到五味雜陳。最直接且暫時的結果是：一向深感懷疑的國際社會一面倒地鼓掌叫好，似乎樂於接受夏隆的說辭，相信他的撤離最終得以推動兩國方案。夏隆的險棋很顯然地緩釋了許多以色列的壓力，且如同他所預期的，雖然沒有真正公開承認過，但是此舉的確破壞了中東問題四方的路線圖，在撤離之前，路線圖一直都是和平進程的核心，它可能迫使以色列在極為敏感的議題上妥協。夏隆的得力助手、撤離計畫的策劃者多夫．魏斯格拉斯委婉表示，單邊撤離的優點是，可把較不討喜的路線圖擠到路邊。在一次坦白的訪問中，他說撤離政策會變成路線圖的「甲醛」〔毒物〕。他解釋：

〔單邊撤離的〕重要性在於凍結政治進程。當你凍結進程，你就阻礙了巴勒斯坦建國，阻礙了關於難民、邊界、耶路撒冷〔所有路線圖核心〕的討論。被稱為巴勒斯坦國家的整套計畫，和其周邊相關之事，在我們的議程中都有效地被抹除……且這些都有著權勢和許可。這些都有著〔美國〕總統的支持……我們告訴這個世界，〔巴勒斯坦方〕無人可以討論和平。然後我們得到了一張求索無門的證書。這張證書說：一、沒有對象可以談判……二、既然沒有對象可以與之談判，那麼地理現狀就不會改變。三、這張證書只有在某些特定情況——當巴勒斯坦變成芬蘭——發生時，才會被駁回。四、再見掰掰。[18]

然而地上事實很快就說出了真相，那原本看似結束的佔領，其實大部分都只是幻覺。在西岸，雖然屯墾者真的被從他們的四個屯墾區和其被拆除的房子中遷出，軍隊仍然持續控制這塊土地，禁止巴勒斯坦人進入；因此雖然它如今空無一人，卻未被移交給巴勒斯坦人。同時在加薩走廊，與其說是結束佔領，不如說夏隆的撤離運動變得好像只是佔領方重新組織了運作方式而已，因為以色列仍然維持他們對這個控制區雖遙遠但有效且具壟斷性的控制權。最顯而易見的，就是以色列持續控制著加薩領空——就如同它一九六七年起一直握有的控制權。這使軍隊得以監控巴勒斯坦人在地上的一舉一動，從空中攻擊嫌犯，並干擾收音機和電視播報。

〔加薩〕機場本可賦予巴勒斯坦人進出加薩與國際貿易的移動自由，以色列壟斷並控制加薩領空，也使他們無法掌控〔加薩〕機場。一九九三年《奧斯陸協議》給予以色列對加薩走廊領空的完

全控制權，也聲明以色列人可以在當地建造機場。加薩機場應時而生，並於一九九八年啟用，每週提供限量航班往來不同的阿拉伯國家。然而二〇〇〇年十月八日第二次起義爆發之後，以色列關閉了機場，稍後更轟炸跑道，然後將機場變成軍事基地。在以色列完成撤離後，巴勒斯坦重新接管他們的機場，卻發現不僅跑道被摧毀，以軍還肆意破壞、搗毀許多機場建築。在這單邊撤離之後，機場對加薩的重要性已被正式承認，但是在寫作本書時、也就是撤離九年之後，機場仍然不被允許重新啟用。

以色列對於加薩的持續控制也同樣顯示在其水域之統理。一九九五年九月以色列和巴解組織簽下的《奧斯陸第二協議》中，以色列同意允許漁船從加薩航行到海岸線二十海里（大約三十七公里）之遙（除了某些特定區域禁止進入之外）。然而實際操作時，以色列卻駁回許多申請，僅允許漁船在距離約莫十二海里（二十二公里）處捕魚；以色列巡邏船甚至數次向航行超過此距離的巴勒斯坦漁船開火。在撤離加薩走廊後，以色列更減低了海釣里程。結果，本來是許多家庭賴以生存、居民重要的食物來源的加薩漁業受到了嚴重打擊。

在《奧斯陸協議》中，以色列也應允巴勒斯坦人建立和管理加薩的一個海港，這本可大幅改善加薩人的經濟。二〇〇〇年夏天港口建設工程啟動，但當年十月，由於第二次起義的爆發，以色列轟炸海港建設區。結果，捐款的國家不再贊助此計畫，自此海港不再有任何工程建設竣工。二〇〇五年以色列撤離加薩之後，以色列承諾會允許工程重新啟動，以使外國捐助者和計畫投資者安心，以色列甚至承諾不會再攻擊此海港。然而，在寫作此書時，以色列仍然延宕工程的進行。

除了完全掌有加薩的領空和水域外，以色列人甚至在撤離加薩走廊後，繼續控管著走廊的進出口貿易，並且對所有通關口的貿易行為具有完全的控制權；加薩和西岸的通行仍然完全仰賴以色列的裁決和臉色。

換句話說，即使二〇〇五年以色列從加薩走廊離開，以方仍然藉著提供加薩（也因此得以間接控制）飲用水和灌溉用水、通訊、燃料、電力和污水系統之便，繼續控制此區的海陸空界。也無怪乎當以色列堅稱他們撤離加薩走廊後佔領就告終時，會被國際輿論嚴重抨擊，指控它簡化對國際法的詮釋。如以色列所為，將佔領與**實體存在**綁在一起，是罔顧國際法的實質意涵，因國際法說的是對一個地區任何形式的**有效控制**也是軍事佔領的特徵——就像以色列很顯然仍持續掌有對加薩的控制權。換句話說，即使二〇〇五年撤離，加薩走廊仍是以色列的佔領地，這是普遍同意且國際法所支持的看法。

然而在加薩走廊的實體缺席，的確使以色列人無法如以往地繼續監控當地武裝分子，在其撤離後，武裝分子比以前更能自由掌理此地。我們應該記得在撤離前，軍隊試圖透過謀殺領導者以削弱其實力；但他們低估了武裝分子的韌性，還有即使群龍無首他們仍能持續自行運作的能力。事實上，近距離觀察加薩武裝分子在以色列撤離之前、之中和之後的表現，即可窺知一二。二〇〇五年六月，他們從加薩向以色列發射了十七顆火箭推進式炸彈，七月則有二十八顆，但是到了八月，以色列預定要撤離的月分，他們將之限縮到僅六顆，以避免激怒以色列導致他們反悔。但是到了九

月，以色列人完成撤離後，武裝分子再度向以色列發射了二十九顆火箭彈，並聲稱以色列撤軍是因為他們的反抗，此說法為許多巴勒斯坦人所接受。[19]

以色列人離開後，加薩武裝分子仍然一如既往地警戒，並試圖延攬更多加薩人加入他們的陣營。事實上由於阿拉法特逝世，且以色列無法壯大其繼任者，巴勒斯坦當局在以色列撤離後已無力重整加薩走廊的秩序，而這真空狀態很快地被武裝分子填滿。加薩走廊的經濟處境每下愈況，被歸類為貧戶的人數從二〇〇〇年的百分之三十竄升到二〇〇五年的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而這也使得巴勒斯坦平民蜂擁到哈瑪斯一方，因哈瑪斯整體而言被認為較法塔清廉。

布希總統為了推進他的巴勒斯坦民主願景，堅持巴勒斯坦人於二〇〇六年一月舉行選舉，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意外地哈瑪斯操持了議會，並因此得以在加薩建立政府。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五日在加薩，其持槍者打敗了一位親法塔的警察，哈瑪斯史無前例地完全掌控了加薩走廊。

以色列從加薩走廊的單邊撤離，揭開以巴關係的新樂章，巴勒斯坦的世俗領袖聲勢逐漸下滑；尤其在加薩，更為激進的成分日益攀升，武裝分子使用如發射台等，向以色列發射火箭推進式炸彈和飛彈。而這另一方面，也引起以國內部對於單邊撤離的爭論，懷疑撤離佔領地是否真對以色列本土有利，抑或白白將權利拱手讓人。

進入佔領的第五個十年

時至今日，以色列從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勝利後得到佔領地的年代誌如下：一九六七年後的第一個十年，以色列發現他們不知道如何處理他們從埃及、約旦和敘利亞手中不期然獲得的如此廣大的土地。它沒有完善的計畫，對於要留下哪些土地、歸還哪些土地遲遲難以下定決心，其直覺是靜觀其變，大致上傾向保留土地，忽略與鄰國的和平。考慮歸還某些佔領地（主要是將西奈歸還埃及、戈蘭歸還敘利亞），看來也僅是為了讓以色列緊緊攢住西岸——猶太歷史的搖籃，以及抓住為了某些戰略考量而致力保留的加薩走廊。但在沒有任何強大的國際壓力下，即使這些主張歸還土地的非主流想法都倏忽即逝。官員們並未提出警告，告知可以達成協議的時間短暫、機會難得，尤其是與巴勒斯坦的協議，如果他們沒有迅速行動，很可能要再等一整個世代或者更久。回頭看，我們可以說，在佔領地的第一個十年，以色列錯過了一個千載難逢的、與其鄰國達成和平協議的機會。

第二個十年，從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七年，以色列終於決定它要怎麼做了：在一九七七年之後的選舉變動中，右翼利庫德集團在以色列歷史中首次掌權，新總理梅納赫姆·比金著手進行一個大

規模計畫，欲將佔領變為不可逆，其主要方式是在佔領地上建造猶太屯墾區，尤其是在西岸和加薩走廊。在國際壓力下，因沙達特總統大膽公開提議結束協商，同時美國史無前例地承諾給予經濟與國安協助，比金為首的政府結束了對西奈的佔領。但比金決心擁有巴勒斯坦佔領地（西岸和加薩走廊），以及至少在此之前以色列正式兼併了的戈蘭高地。從歷史與事實的角度來看，很顯然地，以色列透過部署不合時宜和不正當的殖民手段，試圖鞏固這些佔領地的控制權，尤其屯墾區的建造更是對國際法的挑戰。

在接下來從一九八七年到二〇〇七年的二十年佔領期間，以色列終於開始慢慢清醒，尤其是面對一九八七年第一次起義，愈來愈多人了解到佔領策略註定失敗。一九九一年一個新的和平之舉在馬德里會議中揚起，旨在透過歸還土地和結束佔領以換取和平。但這個和平進程不夠嚴格，且以色列的表現氣量狹小。一九八八年，巴勒斯坦人透過承認以色列的存在權，有效地放棄對於百分之七十八的古巴勒斯坦土地的訴求，但堅持不許以色列鯨吞蠶食剩餘的百分之二十二，因此不願在和平會談中做出更多妥協。由於失望至極，他們在該地反抗佔領，因為這是他們合法的權利，也可能是他們從過去歷史中學到了教訓：以色列只有在面對壓力才會投降。

在和平進程中，以色列逐漸了解到和平的代價可能非常高昂：敘利亞堅持要完全自戈蘭高地撤軍，而巴勒斯坦人也要求平等協議。在不願付出代價的情況下，以色列在夏隆擔任總理的二〇〇一到二〇〇六年間臻至高峰，擱置敘利亞的和平議題，單向地從被以色列視為眼中釘的加薩走廊撤離，而這使他們得以緊握西岸和其資源，避免觸及佔領相關的更大議題。然而，因哈瑪斯在加薩的

勢力竄升，並繼續以火箭式炸彈從加薩走廊攻擊以色列，以色列的單向撤離終止。

在加薩走廊的哈瑪斯和在西岸較為世俗的巴勒斯坦政權之間，過去幾年來競爭日益激烈，隔閡加劇，而這成為以色列手中的助攻牌，使以色列政府得以為其不願推進和平協議找到託辭，歸咎於巴勒斯坦的內部分歧與哈瑪斯不願承認以色列的存在權。且所謂的阿拉伯之春，以及巴希爾．阿薩德（Bashar Assad）政權的解體，使得意在結束戈蘭佔領的以敘和平會談直到如今都苦無機會進行。

所以這為我們留下了什麼？在以色列佔領的第五個十年，又有什麼在前方等著我們，或者已經開展（underway）了？

很顯然地，第一個十年的抉擇——維持現狀——已經不再可能；而第二個十年的替代方案——建立屯墾區謀求將佔領地併入以色列——也是不切實際的。第四個十年的策略——單向主義——在以色列不再被看好，以國轉而重拾一九九〇年代早期的政策，亦即試著與巴勒斯坦和阿拉伯談和以結束佔領。但為了讓和平協議能夠有建設性地重新展開，國際社群、尤其是美國，必須使出強硬手腕對付以色列，必要時甚至要賄賂以使之妥協。如果過去四十年證明了些什麼，那麼便是以色列不會輕易地放棄佔領地。

我相信佔領在未來的某個時候一定會結束，如同所有戰爭和衝突一般。一九六七年，沒有人可以想像以色列、埃及和約旦會簽訂完全的和平協議，而今我們可以期待未來的某個時候，同類型的協議能在以巴之間、以敘之間，和以色列與黎巴嫩之間簽訂。但由於各方（尤其是以巴）之間甚深

的嫌隙，以及最近中東的革命分散了與以色列衝突的注意力，要能達成真正的協議可能還需數個世代。但很清楚地，在過去四十年的佔領中，以色列吞併佔領地的企圖是失敗的。

我相信歷史的判決，會將本書所敘述的這四十年佔領，視為以色列和猶太歷史上的恥辱。這段時期，以色列透過猶太離散群體、尤其在美國的猶太人，證明了即使是曾經親身經歷難以言喻悲劇的國家，也會在握有權力時，做出相似的殘忍行為。一九六七年當時的國防部長摩西・達揚觀察，如果可以選擇要被世界上的哪個國家佔領，他懷疑他會選擇以色列。而他是正確的；回頭看，以色列很顯然是強硬且殘暴的佔領者——且在寫作此書時仍然如此。當其他殖民者，如統治印度和其他地方的英國學會，與當地菁英合作，為被殖民者建造學校、大學與其他公共設施，以色列相反地從未真正想過它有任何責任幫助或保護其治下的人民，或幫助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最多只將他們視作受控的市場和廉價勞工的來源。以國迫使佔領地人們生活在卑劣、缺乏希望的處境，反倒強化了他們的力量，使之更堅定，必要時透過暴力手段以圖結束佔領，活得尊嚴與自由。

後記

《被詛咒的勝利》在英國出版後不久，二〇一四年夏天，以色列與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全面開戰。這場激烈衝突的根源，也就是後來在以色列和其他地方被稱為「保衛邊界軍事行動」（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被用在以色列的持續佔領與軍隊的殘酷施壓中，尤其是在加薩走廊，將近兩百萬巴勒斯坦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如前文所述，以色列在二〇〇五年夏隆總理治下正式撤離加薩走廊，宣稱加薩走廊已不再是佔領地，以色列在國際人權法上不再對加薩人民負責。然而，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大都不認為這項撤離行動站得住腳，因為即使調離了軍隊和屯墾區，以色列仍持續在外透過各種手段實質控制著加薩走廊。以色列使用電子裝置，例如於加薩走廊上空三百公尺處施放監控熱氣球，以蒐集加薩走廊各個角落的居民資料。飛行員再根據這些情報暗殺以色列視為「恐怖份子」的巴勒斯坦抗爭運動者，從直升機對他們發射飛彈，又從飛機上對他們投擲炸彈。

如此多年下來，加薩人民慢慢習慣了直升機、飛機、以及惡名昭彰的無人機（以色列以此來進

行監視和攻擊）在頭頂盤旋時不斷傳來的轟隆聲。一位名叫雅敏（Yamin）的加薩人在訪問中解釋道：「當我們聽見阿帕契〔直升機〕或以色列F16〔戰機〕的聲音時，我們知道它僅會在那裡盤旋一陣子，而為了安全起見，我們會躲進屋中。但是無人飛機二十四小時都在空中，所以人們不會閃避它，畢竟我們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躲著它。[1]」

以色列亦從海洋持續控制著加薩走廊，其海軍經常巡邏加薩沿岸的地中海水域，有效地封鎖了走廊，防止任何人透過海路接近此區。一次一艘土耳其船隊在為加薩人運送食物和補給物時，試圖經過以色列海軍巡邏區，以軍攻擊他們，船上數人慘遭殺害，船隻也被奪走。除此之外，以色列也監視加薩走廊出入口，藉此控制加薩人，巴勒斯坦人往往經此往來西岸，但能否通行，則全看以色列人的心情而定。加薩人基於商業理由或為了拜訪西岸的家人朋友而須到西岸去時，為了成功通行，就必須提供以色列官員加薩走廊與特定對象的情報作為報償，因此他們實質上成為以色列遙控佔領下的通敵者。

執行封鎖

二〇〇七年，巴勒斯坦的伊斯蘭運動組織哈瑪斯掌權一事成了加薩命運的轉捩點，致使以色列對當地居民施加更殘酷的手段。繼任的以色列政府視哈瑪斯為勢不兩立的仇敵，改採在一九八二年戰爭時對黎巴嫩使用的有效策略，企圖推翻其領導階層。

當時——遠在哈瑪斯成立之前——以色列最主要的巴勒斯坦宿敵是亞西爾・阿拉法特。阿拉法特會從他當時在貝魯特的司令部派遣游擊軍攻擊以色列。為了瓦解阿拉法特的軍事活動，以色列於一九八二年夏天進犯黎巴嫩，封鎖其首都；在當時，筆者是砲兵，也參與了以色列國防機器這次的封鎖行動。

以軍從四面八方包圍貝魯特，從海陸空控制此區，切斷水電供給，且限制運入城市的食物數量和種類（尤其是麵粉）；同時，大砲、飛機和戰艦持續大面積轟炸貝魯特。以軍希望透過對首都施壓（轟炸、禁運食物、限水與電）以打擊貝魯特人的士氣，使之背棄阿拉法特。這個手段顯然見效：一九八二年八月，因以軍長期的軍事行動，首都又慘遭重創，黎巴嫩政府在氣力耗盡的情況下，要求阿拉法特及其游擊軍離開貝魯特，阿拉法特只好在突尼西亞重新落腳。

自從哈瑪斯在加薩掌握權柄以後，以軍故技重施。利用其海陸空優勢，封鎖了加薩走廊，使之民不聊生，欲透過破壞其士氣，使加薩人民轉而背離哈瑪斯。

以色列對加薩的封鎖最顯著的就是對食物進口的限制：給加薩人僅供溫飽的食物。以軍發展出一套數學公式，以計算加薩人消耗每一種特定食品所需的天數，以軍稱之為「呼吸長度」（the length of breath）。以軍還設定了作為進階警示之用的高標和低標，分別代表「短缺」和「剩餘」。當某食物品項達到了「高標」便禁止進口，只有在數學公式計算下，瀕臨「低標」的進階警示被釋出後，才會再度開放進口。這殘酷的體制造成了加薩人的食物焦慮，他們的存活完全仰賴色列人高抬貴手。同時被以軍視為「奢侈品」的食物品項（例如水果罐頭）則完全自商店架上消失。

在以色列封鎖之下，建材也同樣受到限制：鋼筋、水泥和礫石塊完全不能放行，而這也導致了嚴重的住房短缺。因為除了人口的自然成長外，以軍攻擊行動中也摧毀了許多住宅，在四萬棟住宅的需求中，僅有極小部分得以落成。住房危機直接導因於以色列的封鎖，它造成了慘無人道的後果，因為許多加薩人必須安身在日漸擁擠的居住空間中。加薩人密哈達・阿布・葛奈門（Mihdad Abu Ghneimeh）住在加薩市西部的一棟房子中，這棟房在以軍攻擊時便已半毀，如今這三十平方公尺的臥房卻住滿了他的二十六位遠房親戚、他太太和七個小孩。他敘述這惡劣的情況：

> 我快受不了了。我們沒有任何隱私。因為我的遠親也都與我們住在一起，我妻子必須整日包著她的頭。孩子在我們所有人一起睡覺的房間讀書；沒有窗戶，門也無法上鎖。由於我的孩子小的才幾個月，大的十四歲了，有男有女，讓他們整日生活在一起實在不恰當。這常常造成爭吵或關係緊張。[2]

加薩的農人也受到以軍封鎖的波及，他們若非完全不能，就是僅能部分進入距離以加邊界第一道圍籬一千到五千公尺的土地；軍隊限制他們進入的土地佔加薩走廊總面積的百分之十七，相當於農地總面積的百分之三十五。為了防止巴勒斯坦農人潛入禁地，以色列空軍投擲警告傳單，推土機則越過第一道圍籬進入加薩，將溫室夷為平地，將果樹連根拔起；軍隊也往往對試圖進入自家土地的農人開火，進而將禁區變成了刑場。[3]農人們即使得以幸運進入自己的土地，也只能眼睜睜看著

蔬果在樹上自行腐爛，因為若無進一步指示，從加薩走廊出口物品也同樣受到重重限制。

如同二〇〇七年一般，在海上，海釣禁令變得益加嚴格，因為海軍禁止漁夫接近離陸地三海哩（約五點六公里）以外的海釣區，而這表示一九九〇年代初期與以色列簽訂的《奧斯陸協議》中，他們本應擁有的百分之八十五的領海都被禁絕。雖然以色列的封鎖策略無法說服加薩人背棄哈瑪斯，但是它的確造成了深刻的傷害和廣泛的失業現象，因為許多人都無法工作，失業率一度上探百分之四十。

只要埃及政府與哈瑪斯交好，尤其在穆罕默德・穆爾西（Mohamed Morsi）統治期間（二〇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到二〇一三年七月），食物和其他補給品就仍可透過連接西奈沙漠和加薩走廊的地下密道涓涓流入加薩走廊。但是二〇一四年六月，阿卜杜勒・法塔赫・薩伊德・胡笙・卡利勒・塞西（Abdel Fattah Saeed Hussein Khalil el-Sisi）接任埃及總統後，認為哈瑪斯與穆斯林運動的其中一個同盟過從甚密（而這與埃及立場相反），因此迅速疏遠了哈瑪斯，命令軍隊關閉西奈—加薩的通道。由此，以色列嚴酷的封鎖令加上西奈—加薩通道的關閉，將加薩走廊變成了一個等待引爆的火藥桶。而最後的導火線則是被佔領的西岸所發生的事件。

火藥桶引爆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位年輕的以色列屯墾者遭隸屬哈瑪斯的巴勒斯坦運動者綁架，但並非出自

哈瑪斯的指示。此事件被本雅明・納坦尼亞胡為首的以色列政府視為是對以色列的嚴重攻擊，將之看作削弱哈瑪斯在西岸勢力的好時機。在西岸南方的小鎮希伯崙，哈瑪斯的勢力尤為堅強。政府派遣了數百人的軍隊進入被佔領的西岸找尋被綁架的屯墾者（最後發現他們已罹難），並趁機攻擊哈瑪斯。

軍隊對西岸的哈瑪斯所採取的手段尤為殘酷且羞辱，上百位運動份子遭到逮捕，其中許多人與三位屯墾者的綁架案毫無瓜葛，他們未經審判便被送進監獄。軍隊關閉哈瑪斯的據點與查禁其組織，並奪取他們的電腦以供情治之用。以色列在西岸的鎮壓使在加薩的哈瑪斯和其他武裝運動者，例如伊斯蘭主義的吉哈德，羞憤難當，他們開始從走廊對以色列村莊發射火箭。這舉動也是為了一舉攻破長達八年的封鎖，因為在與西奈相連的通道被關閉後，這封鎖變得尤其令人難以忍受。

以色列和哈瑪斯交戰了四十五天。哈瑪斯使用火箭和飛彈，最遠可至特拉維夫；飛彈甚至一度極為靠近以色列國際機場，導致國際航班停飛。同時，哈瑪斯的步兵試圖透過地下通道網絡滲入以色列屯墾區。戰爭前，他們就在以軍的眼皮底下挖掘了這些通道。

哈瑪斯對以色列造成的損害微乎其微，因為以色列的反飛彈防禦系統「鐵穹」（Iron Dome）有效地攔截了大多數的飛彈，而哈瑪斯發動的地上地下攻擊也能夠輕易被訓練稍好、裝備精良的以色列軍隊擋下，在哈瑪斯戰士從地道浮出以色列地表時，以軍有科技能瞄準他們。相反地，以軍卻對加薩走廊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噴射機和大砲被無差別地用來夷平巴勒斯坦住宅區，遺留下一幅幅毀滅景象。及至戰爭結束，走廊的某些住宅區就如同二戰時的德勒斯登（Dresden）一般，有高達兩千兩百位巴勒斯坦人被殺害，埋在礫石堆之下，其中大部份都是無辜市民。

未來之路

除了封鎖加薩（在筆者寫作的如今，此封鎖仍持續著），趁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浪潮風起雲湧之際，國際注意力集中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時，以色列趁機在西岸建立了更多屯墾區，鞏固它與被佔領的西岸的關係。若無人阻止以色列繼續攫取巴勒斯坦土地、建造更多屯墾區，那麼一個可切實生存發展、連接西岸與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國家便不可能實現，因為若要建立兩個獨立國家，以色列和未來的巴勒斯坦國必須被實際分割開來。那麼如何說服以色列人結束他們對加薩的遙控佔領，並打消他們直接佔領和吞噬西岸的念頭？

如筆者在本書最後一章所言，結束佔領最有效的選擇便是透過以巴的直接協商，使雙方達到共識，建立一個與以色列和平共處的巴勒斯坦國家。但是直到如今，顯而易見地，握有幾乎所有資產、相對強大的以軍，除非逼不得已不會有任何動作。要說服以色列結束佔領，唯有施壓；事實上，歷史的教訓說明只有在遭受壓力的情況下，以色列才可能放棄佔領地，與其敵人妥協。壓力應該來自兩方面：面對以色列強硬的態度，巴勒斯坦人沒有其他選擇，只能透過發動非暴力甘地式的第三次起義來反佔領——在我寫作的如今，可以清楚感覺到巴勒斯坦反佔領的升溫。以色列的另一個壓力來源則必須來自國際社會，且這必須包含杯葛來自佔領地猶太屯墾區的產品和服務。杯葛對

結束南非的種族隔離政府有顯著效果，對以色列沒有理由無效。

如同過去其他的佔領地，我們有理由相信以色列佔領在未來必然會傾頹，一個巴勒斯坦國家會出現在西岸和加薩走廊。但是國家的建立不會平白被送到人們面前，巴勒斯坦人必須透過持續戰鬥來爭取；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抗爭必須得到來自國際社會的幫助，在以色列佔領（現代歷史上最慘無人道的佔領之一）仍持續之時，國際社會不該袖手旁觀。

圖片來源

圖一　三位以色列傘兵抬頭望著哭牆（David Rubinger/達志影像/Corbis）

圖二　六日戰爭後，摩西・達揚在耶路撒冷附近與巴勒斯坦人會面（Micha Bar Am/Magnum/Imaginechina）

圖三　敘利亞難民帶著家當逃向山區（Micha Bar Am/Magnum/Imaginechina）

圖四　被允許留下的戈蘭德魯茲族群使用擴音器呼喚在敘利亞的親屬（Micha Bar Am/Magnum/Imaginechina）

圖五　通敵者幫助軍隊指認嫌犯（Micha Bar Am/Magnum/Imaginechina）

圖六　以軍撤除西奈猶太屯墾區（Peter Marlow/Magnum/Imaginechina）

圖七　巴勒斯坦男孩向以色列坦克投擲石塊（Reuters/達志影像/Corbis）

圖八　巴勒斯坦自殺炸彈客（Abed Omar Qusini/Reuters/達志影像/Corbis）

Bush but Says Security Fence Will Still Go Up',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30 July 2003.

41. Interview with Colin Powell for *Elusive Peace*.
42. George W. Bush, *Decision Points*, 400.
43. 轉引自 Saree Makdisi, *Palestine Inside Out*, 28。
44. Interviews with Mike Herzog, 11 October 2004, and Giora Eiland for *Elusive Peace*.
45. 下面引言根據與馬吉德・薩特伊之訪談，1 February 2005, Beersheva prison, for *Elusive Peace*。
46. Shlomi Eldar, *Getting to Know Hamas*, Tel Aviv: Keter, 2012, 39.（希伯來文）
47. 轉引自 Ahron Bregman, *Elusive Peace*, 279。

十四、單向主義和其獎賞（二〇〇四～二〇〇七）

1. 此與下面引言皆根據 the speech by Sharon at Herzliya, 18 December 2003，作者自藏。
2. Ahron Bregman, interview with Shaul Mofaz for *Elusive Peace*.
3. 此與下面引言皆根據 the testimony of Yassin's son, in Shlomi Eldar, *Getting to Know Hamas*, 53。
4. Ibid.
5. Interview with Marwan Muasher for *Elusive Peace*.
6. Interview with Colin Powell for *Elusive Peace*.
7. Source: Marwan Muasher.
8. See a letter from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to Sharon, 14 April 2004，作者自藏。
9. White House transcript of the Bush–Sharon press conference regarding Sharon's Gaza Disengagement Plan, 14 April 2004, at http://electroncintifada.net/bytopic/historicalspeeches/262.shml.
10. 轉引自 Ahron Bregman, *Elusive Peace*, 278-9。
11. Uri Dan, *Ariel Sharon: An Intimate Portrait*, New York: Palgrave, 2006, 246.

Uri Dan是夏隆的好友。

12. Ariel Sharon in a TV interview, 24 April 2004, as quoted in Charles Enderlin, *The Lost Years*, 235.
13. Bassam Abu Sharif, *Arafat and the Dream of Palestine: An Insider's Account*, New York: Palgrave, 2009, 249.
14. Interview with Mohammed Rashid.
15.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Nabil Shaath, 15 April 2005, Tel Aviv, for *Elusive Peace*.
16. A 'Top Secret' Shabak document, 15 October 2000.
17. Aaron David Miller, *The Too Much Promised Land*, 355.
18. Dov Weisglass, interview, *Haaretz*, 8 October 2004.（希伯來文）
19. Rocket threat from the Gaza Strip, 2000-2007, http://www.terrorism-info.org.il/malam_multimedia/English/eng_n/pdf/rocket_threat_e.pdf, accessed 29 August 2012.

後記

1. In Tom Anderson and Therezia Cooper, 'Gaza: Life beneath the drones', in *Gaza Reports*, 25 January 2014.
2. 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Easing the Blockade: Assessing the Human impact on the population of the Gaza Strip*, March 2000.
3. OCHA-WFP, *Between the Fence and a Hard Place — The humanitarian Impact of Israeli-imposed restrictions on access to land and sea in the Gaza Strip*, August 2010.

Elusive Peace，作者自藏。

11. Interview with Mohamad Abu Hamid, for Elusive Peace, no date (Roll 403-4); also http://www.guardian.co.uk/isreal/Story/0,2763,633643,00.htm.
12. Ariel Sharon speaking to the press on 5 March 2002, as quoted in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Israel/Palestine. The Black Book*, London: Pluto Press, 1988, 58.
13. Interview with Muammar Shahrouri, 31 January 2005. 此訪談在一棟以色列監獄中進行，沙胡力因參與花園旅館爆炸案入獄，在此服刑；for *Elusive Peace*，作者自藏。
14. Interview with Fathi Khatib, 31 January 2005. 此訪談在貝爾謝巴監獄進行，哈提卜由於參與花園旅館爆炸案入獄，在此服刑；for *Elusive Peace*，作者自藏。
15. Interview with General Giora Eiland, Ramat Ha'sharon, 28 September 2004, Ramat for *Elusive Peace*.
16. Interview with Mohammed Rashid, Paris, 3 November 2004, for *Elusive Peace*.
17. This testimony appears in Saree Makdisi, *Palestine Inside Out*, 183-4.
18. Ahron Bregman, *Elusive Peace*, 205.
19. Interview with Mohamad Abu Hamid, for *Elusive Peace*, no date, Jenin (Roll 403-4).
20. Interview with Hani al-Hassan, 9 June 2004, Ramallah, for *Elusive Peace*.
21. Tenth emergency special session, Agenda item 5, 'Illegal Israeli actions in Occupied East Jerusalem and the rest of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prepared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ES-10/10'.
22. Ahron Bregman, interview with Terje Rød-Larsen, Herzliya, 29 June 2004, for *Elusive Peace.*
23. Interview with Yasser Abed Rabbo, 26 June 2004, Ramallah, for *Elusive Peace*.
24. Interview with Anthony Zinni, 19 October 2004, Washington DC, for *Elusive Peace.*

25. Rita Giacaman, Anita Abdullah, Rula Abu Safieh and Luna Shamieh, 'Schooling at Gunpoint; Palestinian Children's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Warlike Conditions', 1 December 2002, as cited in Baruch Kimmerling, *Politicide*, 196.
26. Ahron Bregman, *Elusive Peace*, 229; Binyamin Ben Eliezer was not present in this meeting.
27. Danni Haloutz, *Begovah ha'einayim* (*Straightforward*), Tel Aviv: Yediot Aharonot, 2010, 248.（希伯來文）
28. Ahron Bregman, interview with Binyamin Ben Eliezer.
29. Interview with the Chief Commander of the Israeli Air Force, Dan Halutz, *Haaretz*, 23 August 2002.（希伯來文）
30. George W. Bush, *Decision Points*, Washington DC: Broadway, 2011, 401.
31. 轉引自 Aaron David Miller, *The Much Too Promised Land*, 326。
32. 在約旦有十個官方的巴勒斯坦難民營。安置了三十萬七千七百八十五名登記註冊之難民，或說向聯合國救濟工程局登記的一百七十萬難民中的百分之十七。一九四八年以阿戰爭和一九六七年戰爭後，四座難民營建立於約旦河東岸。並且在安曼、札卡（Zarqa）和馬達巴（Madaba）的三個社區被約旦政府認為是難民營，聯合國則視之為「非正式」難民營。
33. Interview with Marwan Muasher, 12 December 2004, Amman, for *Elusive Peace*.
34. The following is mainly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Flynt Leverett, 15 October 2004, Washington DC, and with anonymous, for *Elusive Peace*.
35. Interview with Colin Powell, Washington DC, 22 February 2005, for *Elusive Peace*.
36. 路線圖全文請見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website, 30 April 2003。
37. Interview with John Wolf, 18 October 2004, Philadelphia, for *Elusive Peace*.
38. Interview with Nabil Shaath.
39. 轉引自 Ahron Bregman, *Elusive Peace*, 269。
40. Guy Dunmore, 'Bush Attacks Israelis for Building of West Bank Wall,' *Financial Times*, 26 July 2003; also Brian Knowlton, 'Sharon Meets with

源，作者自藏。

28. Arafat in a meeting with Shimon Peres, Gaza, 1 November 2000, 22.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29. Haled Salam in a meeting with Peres, 1 November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30. Text of ceasefire, 2 November 2000，作者自藏。
31. Transcript of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Chirac and Barak, 2 November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32.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during the al-Aqsa Intifada', The Palestinian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25 March 2001.
33. Ibid.
34. A report by Danny Abram, 25 November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35. 此與下面數則引言皆來自transcript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Clinton and Barak, 11 December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36. 喬治・W・布希於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七日當選總統。柯林頓在位時間到二〇〇一年一月二十日新總統就任前。
37. 此與下面數則引言皆來自Clinton Parameters as they appear in Walter Laqueur and Barry Rubin, *The Israel-Arab Reader,* 562-4; also in *Haaretz,* 31 December 2000。（希伯來文）
38. 此與下面數則引言皆來自transcript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Barak and Egypt's President Mubarak, 26 December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39. Letter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amuel Berger, 28 December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40. 此與下面數則引言皆來自transcript of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Clinton and Barak, 1 January 2001，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41. Transcript of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Clinton and Barak, 3 January 2001, at 17.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42. Ahmed Qurie, *From Oslo to Jerusalem: The Palestinian Story of the Secret Negotiations,* London: I. B. Tauris, 2006, 5-6.

43. 轉引自Raviv Drucker, *Harakiri,* 390。
44. Arieh O'Sullivan, 'IDF Kills Hizbullah Cell Leader in Gaza', *Jerusalem Post,* 14 February 2001.
45. 私人來源。關於以色列暗殺政策之合法性，請參見David Kretzmaer, 'Targeted Killing of Suspected Terrorists: Extra Judicial Executions or Legitimate Means of Def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6, No. 2 (2005), 171-212。

十三、夏隆與阿拉法特（二〇〇一～二〇〇四）

1. 轉引自Charles Enderlin, *The Lost Years: Radical Islam, Intifada, and Wars in the Middle East 2001-2006*, New York: Other Press, 2007, 26。
2. Suzanne Goldenberg, 'War Jets Attack West Bank after Mall Bomb Carnage', *Guardian*, 19 May 2001.
3. Robert Pape, *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73-5, 32.
4. Baruch Kimerling, *Politicide: Ariel Sharon's War against the Palestinians*, London: Verso, 2003, 137.
5. Ahron Bregman, *Elusive Peace*, 156.
6. 轉引自Amos Harel and Avi Isacharoff, *Hamilhama Ha'shvit* (*The Seventh War*), Tel Aviv: Yediot Aharonot, 2004, 115。（希伯來文）
7. Interviews with Jibril Rajoub for *Elusive Peace*, 25 May 2004, 4 June 2004 and 13 October 2004, Jericho and Ramallah.
8. James Bennet and Joel Greenberg, 'Israel Breaks with Arafat after Palestinian Assault on Bus in West Bank Kills 10,' *The New York Times*, 13 December 2001.
9. Arafat's declaration in Gaza, Palestine Satellite Channel Television, 16 December 2001, at 16.00.
10. Ahron Bregman in an interview with Shaul Mofaz, Tel Aviv, 31 February 2005; and with Binyamin Ben Eliezer, Tel Aviv, 27 September 2004; both for

12. *Haaretz,* 12 March 2002.（希伯來文）
13. Interview with Mohaned Irbari, no date, for *Elusive Peace,* 作者自藏。
14. 在壓力日益攀升時，政府指派了一個調查委員會——或委員會——訪查二〇〇〇年十月之事件。
15. 此引言來自 transcript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Barak and Mubarak, 12 October 2000, at 15.05，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16. 此與下面數則引言皆來自 transcript of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Clinton and Barak, 12 October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17. A letter from Barak to Clinton, 12 October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18. 此引言來自 transcript of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Barak and Mubarak, 12 October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19. Transcript of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Clinton and Arafat, 15 October 2000, at 21.05，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20. 此與下面引言皆來自 protocol of a meeting between Mubarak and Barak, Egypt, 16 October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21. Transcript of a meeting between Kofi Annan and Barak, Egypt, 16 October 2000, at 10.15，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22. Trascript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Jordan's King Abdullah II and Barak, Egypt, 16 October 2000, at 11.05，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23. 作者自藏；also Annex B-1, Sharm el Sheikh Understanding, a letter dated 17 October 2000 from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the United Nations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The Palestine Papers,* Al Jazeera, accessed 7 February 2011.
24. Transcript of a meeting between Barak and military commanders, 21 October 2000, 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25. Transcript of a governmental meeting, 22 October 2000, 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26. 下面數則引言皆來自 two transcripts of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Clinton and Barak, 22 October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27. Ehud Barak's instructions to army commanders, 24 October 2000, 私人來

47.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201.
48. Transcript of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Jacques Chirac and Barak, 28 July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49. 此與下面引言皆來自 transcript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Barak, Ross and the US peace team, 30 August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50. 此與下面引言皆來自 transcript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Clinton and Barak, 6 September 2000，私人來源。
51. 此與下面引言皆來自 transcript of a meeting between Barak and Arafat, Kochav Yair, 25 September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十二、阿克薩起義（二〇〇〇～二〇〇一）

1. Interview with Haj Kamil for *Elusive Peace,* Jerusalem (no date, Roll 228).
2. Ted Gurr, 'A Casual Model of Civil Strife', *American Political Review,* Vol. 62, No. 4, 1968, 1104.
3. Jeremy Pressman, 'The Second Intifada: Background and Causes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Studies,* 2003, 136, 228.
4. Interview with Haj Kamil for *Elusive Peace.*
5. Akiva Eldar, 'Popular Misconceptions', *Haaretz,* 11 June 2004.（希伯來文）
6. 下面引言來自特傑．羅德—拉森與巴拉克之對話逐字記錄，30 September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7. 此與下面數則引言皆來自歐布萊特與巴拉克之對話逐字記錄，Paris, 4 October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8. Transcript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Chirac and Barak, Elysée Palace, Paris, 4 October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9. 此與下面引言來自 Raviv Drucker, *Harakiri. Ehud Barak: The Failure,* Tel Aviv: Yediot Aharonot, 2002, 313。（希伯來文）
10. Saree Makdisi, *Palestine Inside Out,* 50, 53
11. Research interview with Mohaned Irbari, Umm el Fahm, 15 August 2004, for *Elusive Peace,* 作者自藏。

引言皆來自此報告，作者自藏。

28. Conversation between Clinton and Barak, 17 July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下面數則引言皆來自此對話記錄。
29. A note for the record dictated by Barak to his aide, Yatom and Based on his conversation with Clinton, 18 July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30. Martin Indyk, *Innocent Abroad,* 322.
31. Interview with Sandy Berger for *Elusive Peace.*
32. 此引言與下面數則皆來自 interview with Sandy Berger。
33. Letter from Arafat to Clinton, 19 July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34. Letter from Barak to Clinton, 19 July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35. Transcript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Clinton and Barak, 19 July 2000, at 19.18；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36. Clinton-Barakconversation, 19 July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37. 轉引自 Clayton E. Swisher, *The Truth about Camp David,*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04, 307。
38. Clinton-Barak conversation, 19 July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39. Interview with Albright for *Elusive Peace.*
40. Transcript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Clinton and Barak, 23 July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41. The papers of Akram Hanieh, editor-in-chief of the *Al Ayyam* news paper and adviser to Arafat, 'The Fifth Paper: The Summit According to Jerusalem Time', no date, no place，作者自藏。
42. 此引言與下面數則皆來自 transcript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Clinton and Arafat, 24 July 2000, at 19.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43. Interview with Mohammed Dahlan for *Elusive Peace.*
44. 此與下面引言皆來自 trasncript of a discussion among the Isareli team, 25 July 2000, at 08.1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45. 此與下面引言皆來自 transcript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Clinton and Barak, 25 July 2000, at 09.35，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46. 私人來源。

9. 引自馬爾卡和巴拉克之會議記錄，9 July 2000，私人來源。
10. 此與下面引言皆來自 transcript of a meeting between Clinton and Barak，11 July 2000。
11. 下面來自 Clinton-Barak conversation，11 July 2000, at 17.35，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12. Transcript of Clinton-Barak conversation，11 July 2000, 17.35，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13. Bill Clinton, *My Life,* London: Hutchinson, 2004, 912.
14. Secret letter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K. Albright to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24 November 1998，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15. Aaron David Miller, *The Much Too Promised Land,* 205.
16. Interview with Saeb Erekat for *Elusive Peace.*
17. 此與下面引言皆來自 transcript of a meeting between Clinton and Barak, 14 July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18. Bill Clinton, *My Life,* 855.
19. 柯林頓、巴拉克和阿拉法特的會議，14 July 2000, at 23.35，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20. 此引言與下面數則皆來自 transcript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Barak and Dennis Ross, Dogwood, 15 July 2000, 10.25，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21. Interview with Saeb Erekat for *Elusive Peace.*
22. Ibid.
23. Transcript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Barak, Gilead Sher and Shlomo Ben-Ami, 16 July 2000, at 13.15，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24. Letter from Barak to Clinton, 16 July 2000，私人來源；下面引言皆來自此文件，作者自藏。
25. Martin Indyk, *Innocent Abroad: An Intimate Account of American Peace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290.
26. Clinton, report to Barak, 16 July 2000, 21.00，私人來源；下面數則引言皆來自此文件，作者自藏。
27. Clinton-Barak conversation, 16 July 2000, at 22.50，私人來源；下面數則

2. Letter from President Bill Clinton to Prime Minister Ehud Barak, 20 July 1999，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3. 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4. 下面引自私人來源；亦可參照 *Tishreen* (Syria), 3 October 1999。
5. 這些低階談話，尤其是國務卿、埃胡德・巴拉克和敘利亞國務卿席哈比（Shihabi）之間的談話；請見 Ahron Bregman and Jihan el-Tahri, *The Fifty Years War,* 264-66 (UK edn).
6. Transcript of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Bill Clinton and Hafez Assad, 24 August 1999 at 18.2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7.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Clinton and Assad, 2 September 1999.
8. 下面參考自 transcript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Prime Minister Ehud Barak and US envoy Dennis Ross, 5 September 1999，私人來源，作者自藏；Ross's report on Assad's state of health also on 14 September 1999.
9. 此引言與下面數則皆來自 transcript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Barak and Clinton, 15 December 1999, at 10.30。
10. Interview with Robert Malley for *Elusive Peace.*
11. 此引言與下面數則皆來自 transcript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lbright and Barak, 10 January 2000。
12. 下面數則引言皆來自 transcript of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Clinton and Barak, 2 March 2000, 20.35 (Israeli time)。
13. 下面數則引言皆來自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Clinton and Barak, 7 March 2000。
14. 'The Script', 10 March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15. Ibid.
16. Transcript of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Clinton and Barak, 26 March 2000, 13.30.
17. Interview with Sandy Berger, 18 April 2005, Washington DC, for *Elusive Peace.*
18. 事實上，在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三日，與丹尼斯・羅斯會晤時，巴拉克說：「我在考慮加利利海沿海道路以東兩百到三百公尺。」
19. Interview with Bouthania Shaaban for *Elusive Peace.*
20. Ibid.
21. 此引言與下面數則皆來自 transcript of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Clinton and Barak, 26 March 2000, 20.45。

十一、大衛營 II（二〇〇〇）

1. 尼姆羅德・諾維克對總理說，引自諾維克與薩博・埃雷卡特之會議，Washington DC, 23 July 1999，私人來源，作者自藏。埃雷卡特是巴勒斯坦首席協商者，但是也被視為一個障礙。在一九九九年八月五日，與巴拉克助手丹尼・亞托姆的會議中，聯合國代表特傑・羅德—拉森提到埃雷卡特：「他可能極難溝通。他的消息靈通……你必須非常小心薩博・埃雷卡特……如果你與埃雷卡特召開高峰會，就不會有進展……」在與以方的拉森與其太太穆娜（Muna）的另一個會議中，他說：「薩博有很多弱點……薩博滿口謊話，甚至對阿拉法特說謊……這使〔阿拉法特〕興奮，他什麼都說得出來……」在這些會議後，以色列人向美國人施壓，要求換掉埃雷卡特，但是屢試徒勞。
2. 此和下面引言皆來自 transcript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Barak and Arafat, Erez crossing, 27 July 1999，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3. 此和下面引言皆來自 transcript of a meeting chaired by Barak in Tel Aviv, 15 June 2000, 19.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4. Mohammed Bassiouni, report to Prime Minster Ehud Barak, 23 June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5. 'Arafat's Positions' (Secret), 27 June 2000，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6. 引自 transcript of a meeting between Albright and Barak, 27 June 2000，作者自藏。
7. 此與下面引言皆來自 a secret Shabak report，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8. Barak, in a meeting of the government, 9 July 2000；下面引言皆為相同來源。

作者自藏。

5. Dan Naveh, *Sodot Memshalah,* 40.
6. 易卜拉希米清真寺倖存者之證言，請參考resistance.arabblogs.com/massacres/hebron/testimonies/index.htm, accessed 29 August 2012.
7. Ibid.
8. Danny Yatom, *Shutaf sod* (*The Confidant: From Sayeret Matkal to the Mossad),* Tel Aviv: Yediot Aharonot, 2009, 36.（希伯來文）
9. Aaron David Miller, *The Much Too Promised Land: America's Elusive Search for Arab-Israeli Peace,*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08, 271.
10. 轉引自 Akiva Eldar, 'The Har Homa Test', *Haaretz,* 10 December 2007。（希伯來文）
11. 胡笙國王致納坦尼雅胡總理書，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12. Dan Naveh, *Sodot Memshalah,* 71.
13. 在莫薩德的前任首長亞托姆的回憶錄中，以「H」指涉哈因・哈肯尼；見Danny Yatom, *Shutaf Sod,* 13.哈肯尼召集執行「寇瑞許行動」（Operation Koresh）的突擊小組，由一位綽號湯米的幹員領導，小組部分行動涉入一九九五年伊斯蘭吉哈德領袖法特奇・沙卡齊（Fatchi Shkaki）在馬爾他（Malta）的狙擊案；一九九二年阿塔夫・巴西索（Ataf Basiso）在巴黎的暗殺案；一九九〇年三月在布魯塞爾射殺杰拉德・文森・布爾（Gerald Vincent Bull）博士，他是一位加拿大工程師，為伊拉克政府設計了一款超級大砲。
14. 在一場由約瑟夫・希克漢諾夫（Joseph Ciechanover）所主導的三人會議中，擬定了一份後來變成「最高機密」的行動未遂報告書，其中部分文字是首次公開被刊出，判定「莫薩德〔亞托姆〕和撒利亞領導者〔哈肯尼〕都未曾在正式行動前實地探勘，且事件發生時並不在場，亦未身在靠近現場之處……莫薩德一直以來的運作慣例是，在這樣的行動中，兩位高級長官應到場……」。報告書也批評哈肯尼忽視「一位沙巴克報信者……他提供了關於馬沙爾行動的重要資訊……我們認為撒利亞的領導者犯了錯，他未對沙巴克報信者給予足夠的重視……」。*Report on the Mashal Affair,* Chapter 13, 244.會議的完整報告長達三百三十頁，其中僅

公開了十五頁。

15. 希克漢諾夫會議的報告說道：「〔失敗的〕行動……對於與約旦關係的影響幾乎未被討論……情報單位或與總理的討論中都未被提及。」見Ibid., 23，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16. 希克漢諾夫會議的機密報告說：「莫薩德的領導者犯的錯誤是，未馬上〔亦即在行動之前〕將國王的訊息傳達給總理。」Ibid., 244.
17. Ronen Bergman, 'Ex-Mossad Officer Took Part in Failed 1996 Assassination Attempt on Hamas Leader, Gave Antidote That Saved His Life', *Yediot Aharonot,* 17 June 2005.（希伯來文）
18. 在以色列，莫薩德的指揮官亞托姆於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被迫辭職；撒利亞的領導人哈因・哈肯尼也辭職下台，與出任莫薩德代表之首的機會擦肩而過。
19. Ahron Bregman, interview with Yossi Beilin, Tel Aviv, 24 January 2005, for *Elusive Peace*，作者自藏。
20. Interview with Saeb Erekat, Jericho, 28 March 2004, for *Elusive Peace*，作者自藏。
21. Yossi Beilin, *Madrich le'yona petzuah,* (*Manual for a Wounded Dove),* Tel Aviv: Yediot Aharonot, 2001, 36.（希伯來文）; also Ahron Bregman, interview with Yossi Beilin.
22. 欲覽瓦伊河記錄章程全文，請參見Walter Laqueur and Barry Rubin (eds.), *The Israel-Arab Reader,* 529。
23. 相關文章為：6-10, 15, 19-23 and 30。部分相關文章為：1-5, 11-14, 16-18, 25-7 and 29。參見亞西爾・阿拉法特致柯林頓總統書, 13 January 1998, www. Miftah.org。
24. 此引言與下面數則皆轉引自 Ahron Bregman, *Elusive Peace: How the Holy Land Defeated America,* London: Penguin Books, 205, xxvii。

十、戈蘭優先（一九九九～二〇〇〇）

1. 引言來自 'Brief to the President', 4 July 1999，私人來源，作者自藏。

Fifty Years War, 作者自藏。

32.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tatement by Yasser Arafat, 14 December 1988, Vols. 9-10, 1984-1988.
33. General Amram Mitzna to author, Haifa, 27 January 1997, 作者自藏; Ahron Bregman and Jihan el-Tahri, *The Fifty Years War,* 233 (US edn).
34. 'Israel Declines to Study Rabin Tie to Beatings', *The New York Times,* 12 July 1990.
35. Israeli Government Press Release, 14 May 1989, 作者自藏。
36. *Jerusalem Post International,* 27 May and 24 June 1989.
37. *Maariv,* 26 June 1992.(希伯來文)
38. Joel Brinkley, 'Israel Says Army Will Get Tougher If Palestinians Reject Offer of Vote', *The New York Times,* 16 May 1989.
39. Sari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A Palestinian Life,* London: Picador, 2008, 315-16.

八、波灣、馬德里、奧斯陸(一九九一～一九九五)

1. Lawrence Freedman and Efraim Karsh, *The Gulf Conflic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1.
2. Gary Stein, 'Hussein a Hero to Palestinians on West Bank', SunSentinel.com, 15 August 1990.
3. Ahron Bregman and Jihan el-Tahri, *The Fifty Years War,* 202 (UK edn).
4. Lawrence Freedman and Efraim Karsh, *The Gulf Conflict,* 168.
5. Ahron Bregman and Jihan el-Tahri, *The Fifty Years War,* 217 (US edn).
6. A report in *Hadashot,* 24 February 1992(希伯來文), as appears in Norman G. Finkelstein, *The Rise and Fall of Palestine,* 49.
7. Walter Laqueur and Barry Rubin (eds.), *The Israeli-Arab Reader,* 577- 82.
8. Ahron Bregman and Jihan el-Tahri, *The Fifty Years War,* 267 (US edn).
9. Ibid., 269.
10. Interview with Yair Hirschfeld, Ramat Yishai, 25 February 1997, for *The*

Fifty Years War, 作者自藏。

11. Ahron Bregman, interview with Shimon Peres, Tel Aviv, 24 January 1997, for *The Fifty Years War,* 作者自藏。
12. 'The Closure of the West Bank and Gaza Strip: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gainst Residents of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B'Tselem, Information Sheet,* May 1993.
13. Ibid.
14. Testimony to B'Tselem. 11 August 1993, 61-2.
15. Ronen Bergman, 'Stories from the Couch', 7 Days, *Yediot Aharonot,* 15 March 2013.(希伯來文)
16. 此兩封信收錄在Shimon Peres, *Battling for Peace: Memoir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5, 377-8。
17. Ahron Bregman, interview with Warren Christopher, Los Angeles, 23 January 1998, for *The Fifty Years War,* 作者自藏。
18. Ahron Bregman, interview with Shimon Peres for *The Fifty Years War.*
19. Yoram Meital, *Peace in Tatters: Israel, Palestine and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ing, 2006, 34.
20. Rashid Khalidi, *The Iron Cage: The Story of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for Statehood,* Boston: Beacon Press, 2006, 159.
21. Ahron Bregman, interview with Shimon Peres for *The Fifty Years War.*

九、錯失良機(一九九五～一九九九)

1. Dan Naveh, *Sodot Memshalah* (*Executive Secrets*), Tel Aviv: Yediot Aharonot, 1999, 27.(希伯來文)
2. Serge Schmemann, 'Ten More Die in Mideast Riots as Violence Enters 3rd Day; Mosque is Scene of a Clash', *The New York Times,* 28 September 1996.
3. Kotel Tunnel Incident, 1996, Palestine Facts, in http://www.palestine-facts.org/pf_1991to_now_kotel_tunnel_1996.php, accessed 20 August 2012.
4. Ahron Bregman,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Benjamin Netanyahu〔無日期〕,

2. 此引言與下面數則皆轉引自 Zachary Lockman (ed.) *Intifada,*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9, Communiqué No. 1, 328-9。
3. Mary Elizabeth King, *A Quiet Revolution: The First Palestinian Intifada and Nonviolent Resistance,*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07, 257.
4. Khalid Amayreh, in 'He Pointed the Finger and Pulled the Strings, But the Protection Ran Out', *Guardian,* 10 August 2002.
5. 轉引自 Naria Abu-Zahra and Adah Kay, *Unfree in Palestine,* 89。
6. Hussein 'Awwad, a Testimony to B'Tselem, the Israeli Human Rights Centre, 11 August, 1993, 8.
7. Bernard E. Trainor, 'Israel vs. Palestinians: Tactics are Refined', *The New York Times,* 30 March 1989.
8. Daoud Kuttab, 'A Profile of the Stonethrowers', 198.
9. 證言轉引自 Saree Makdisi, *Palestine Inside Out: An Everyday Occup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2008, 188。
10. 'Memories of the First Intifada', testimony of a woman from Khan Younis, Gaza, 19 December 2011, http://lifeonbirzeitcampus.blogspot.be/2011/12 memories-of-first-intifada.html, accessed 10 August 2011.
11. Thomas M. Ricks, 'In Their Own Voices', 91-2.
12. Don Peretz, *Intifada: The Palestinian Uprising,*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0, 64.
13. 證言轉引自 'A Man is Like a Stalk of Wheat', in David Grossman, *The Yellow Wind,* 10。
14. UNLU Communiqué No. 24 in Daoud Kuttab, 'A Profile of the Stonethrowers', 200.
15. 聯合國將酷刑定義為：「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報或供狀，為了他或第三者所做或涉嫌的行為對他加以處罰，或為了恐嚇或威脅他或第三者，或基於任何一種歧視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體或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為」。《世界人權宣言》第五條說明：「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
16. B'Tselem, 'Violence against Minors in Police Detention', Jerusalem, 1990;

此報告集中討論十二到十八歲未成年者。亦可參照Norman G. Finkelstein, *The Rise and Fall of Palestine: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Intifada Years,* Minneapolis, Mi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48。
17. *Israel's Interrogation of Palestinians from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Human Rights Watch/Middle East,* New York, 1994, 21-2.
18. Aysha Odeh, in Buthina Canaan Khoury, *Women in Struggle,* H-Gender-MidEast, September 2005, http://www.h-net.org/reviews/showrev.php?id=15464, accessed 18 August 2012.
19. Joel Greenberg, 'Lynch Village Shows No Remorse', *Jerusalem Post International,* 4 September 1988.
20. 見 Amnon Straschnov, 'Don't Destroy Terrorists' Homes', *Haaretz,* 6 July 2008。（希伯來文）
21. 證言轉引自 Saree Makdisi, *Palestine Inside Out,* 108-9.
22. 'Sumud', in David Grossman, *The Yellow Wind,* 150-51.
23. 'The Terrorist's Father', in David Grossman, *The Yellow Wind,* 196.
24. Michal Shmulovich, '24 years later, Israel acknowledges top-secret operation that killed Fatah terror chief', *Times of Israel,* 4 November 2012.
25. In Ahron Bregman and Jihan el-Tahri, *The Fifty Years War: Israel and the Arabs,* London: Penguin Books/BBC Books, 1988, 193-5 (UK edn).
26. 此引言與下面數則皆摘自 UNLU Communiqué No. 10, 11 March 1988，作者自藏。
27. King Hussein, Address to the Nation, Amman, 31 July 1988, in Walter Laqueur and Barry Rubin (eds.) *The Israel–Arab Reader,* 338-41; also James Lunt, *Hussein of Jordan,* 235.
28. King Hussein, Address to the Nation.
29. Youssef Ibrahim, 'PLO Proclaims Palestine to be an Independent State', *The New York Times,* 15 November 1988.
30. Palestini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Walter Laqueur and Barry Rubin (eds.) *The Israel–Arab Reader,* 354-8.
31. Interview with George Shultz, Washington DC, 15 October 1997, for *The*

50. Sakr Abu Fakhr, 'Voices from the Golan', 30–31.
51. Marvin Wingfield, *The Golan Heights: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Washington DC: ADC Research Institute, 2010, 18.
52. Michelle Stewart, Nancy Tuohy and Jonathan Molony, *From Settlement to the Shelf,* 30-31.
53. Sakr Abu Fakhr, 'Voices from the Golan', 31.
54. Ibid., 31.
55. *Jerusalem Post,* 2 September 1982.

六、黑色十二月（一九八七）

1. 'Intifada: Recollections from the Past', *Palestine–Israel History,* 22 December 1997, in http://www.arabicnews.com/ansub/Daily/Day/971222/1997122234.html.
2. John Kifner, 'Kill Us or Get Out! Arabs Taunt as Rocks and Bullets Fly in Gaza', *The New York Times,* 16 December 1987.
3. Susan Warren, 'Palestinians Honour Dead on Martyr Street/Intifada Starts Its Fifth Year', *Houston Chronicle,* 12 September 1991.
4. Alan Sipress, 'Arafat Visits Cradle of Intifada', *Inquirer,* 3 July 1994.
5. 轉引自 Mark Tessler, *A History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685。
6. 'Memories of the First Intifada', testimony of a woman from Khan Younis refugee camp in Gaza, 19 December 2011, http://lifeonbirzeitcampus.blogspot.be/2011/12/memories-of-first-intifada.html, accessed 10 August 2012.
7. John Kifner, 'Kill Us or Get Out'.
8. Izzeldin Abuelaish, *I Shall Not Hate,* 20-21.
9. Zeev Schiff and Ehud Yaari, *Intifada: The Palestinian Uprising, Israel's Third Front,* New York: Touchstone, 1990, 17, 83.
10. 轉引自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 Arab Conflict, 1981-1989,* London: John Murray, 1999, 532。

11. 'The Other Barta'a', in David Grossman, *The Yellow Wind,* 119-20.
12. See First Communiqué of Hamas in Khaled Hroub, *Hamas: PoliticalThought and Practice,*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2000, Document No. 1, 265.
13. Charles Smith, *Palestine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A History with Documents,*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2000, 414.
14. Andoni Ghass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tifada* 1987 and *Intifada* 2000', in Roane Carey et al., *The New Intifada: Resisting Israel's Apartheid,* London: Verso, 2001, 209.
15. In Arie Shalev, *The Intifada: Causes and Effect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1, 13.
16. Yassir abd Rabbo, in Helena Cobban, 'The PLO and the Intifada',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44, No. 2 (Spring 1990), 229.
17. Melanie Kaye/Kantrowitz, 'Women and the Intifada', *Off Our Backs,* Vol. 19, No. 6 (June 1989), 1.
18. Ehud Barak to author, Tel Aviv, no date，作者自藏。
19. Daoud Kuttab, 'A Portrait of the Stonethrowers', in Laleh Khalili, *Heroes and Martyrs of Palestine: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Commemo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5.
20. In Thomas M. Ricks, 'In Their Own Voices: Palestinian High School Girls and Their Memories of the Intifadas and Non-Violent Resistance to Israeli Occupation, 1987–2004', *NWSA Journal,*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90, http://www.pwrdc.ps/Bibliography-%20New/6.pdf, accessed 12 August 2012.
21. 'Memories of the First Intifada', testimony of a woman from Khan Younis refugee camp in Gaza, 19 December 2001.

七、起義

1. Yehuda Litani, 'How the Protests are Organized', *Jerusalem Post International Edition,* 13 February 1988.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277; also, William B. Quandt, *Camp David: Peacemaking and Politics,* Berkeley, Calif.: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Appendix C.

13. Interview with Yitzhak Shamir, Tel Aviv, 21 January 1997, for *The Fifty Years War*；作者自藏；also Uri Dan, *Mivtzha Gomeh,* 65。
14. 摘錄於Uri Dan, *Mivtzha Gomeh,* 54。
15. Kliot Nurit and Shemuel Albeck, *Sinai: anatomia shel prida* (*Sinai: Anatomy of a Settlement's Evacuation),* Tel Aviv: Defence Ministry Press, 1996, 44-5.（希伯來文）
16.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116.
17. 有關比金的計畫請見*Jerusalem Post,* 29 December 1977; also Ilan Kfir, *Yediot Aharonot,* 20 January 1980（希伯來文）; also 'Prime Minister Menachem Begin: Autonomy Plan for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28 December 1977', in Walter Laqueur and Barry Rubin, *The Israel-Arab Reader,* 400-402.
18. David Hirst and Irene Beeson, *Sadat,* 299.
19. Ibid., 294.
20. Eliahu Ben-Elissar, *Lo od milhama,* 15.
21. Uri Dan, *Mivtzhah Gomeh,* 98.
22. William B. Quandt, *Camp David,* 161.
23. Israel Government Statement on Settlements, 12 February 1978,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Vols. 4-5, 1977-9.
24. Zbigniew Bre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246.
25. Cheryl A. Rubenberg, *Israel and 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A Crit- ical Exami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6, 231.
26. 此引言與下面數則皆來自Jimmy Carter Library, Declassified E.O.12958, Sec.3.6。
27. Yoel Markus, *Camp David: ha'petach le'shalom* (*Camp David: The Road for Peace),* Tel Aviv: Schocken, 1979（希伯來文）, 17; and Uri Dan, *Mivtzha Gomeh,* 202.
28. Yoel Markus, *Camp David,* 99; and Uri Dan, *Mivtzha Gomeh,* 212.

29. Uri Dan, *Mivtzha Gomeh,* 214.
30. Yoel Markus, *Camp David,* 101; and Uri Dan, *Mivtzha Gomeh,* 21.
31. Uri Dan, *Mivtzha Gomeh,* 219.
32. Ibid., 220.
33.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London: Collins, 1982, 347, 351.
34. Ezer Weizman, *The Battle for Peace,* London: Bantam Books, 136-7.
35.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261.
36. Uri Dan, *Mivtzha Gomeh,* 246. Elyakim Rubinstein, 'Moshe Dayan and Sadat's Visit', lecture, 1 November 1987.（希伯來文）
37.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270;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396.
38. Letter from Begin to Carter, 17 September 1978, The Jimmy Carter Library.
39. Email communication with Prof. Yair Hirschfeld, 19 May 2010, 作者自藏.
40. 轉引自Tom Segev, *1967,* 607.
41. Interview with Nasser Laham, http://www.justvision.org/portrait/76134/ interview.
42. In *PLO Information Bulletin,* Vol. 4, No. 19, 1 November 1978.
43. 'Sadat Greeted Wildly on Arrival in Al Arish after Israelis Pull Out', *The New York Times,* 26 May 1979.
44. 'Nablus Mayor on Hunger Strike', *The New York Times,* 16 November 1979.
45.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501.
46. 此引言與下面數則接來自'Druze National Document', March 1981, 作者自藏。
47. 在如此強烈反彈下，以色列最終退讓了，戈蘭人被定義為「居民」而非以色列「公民」。
48. Moshe Dayan in *Davar,* 17 April 1979.（希伯來文）
49. Interview with Haila Hussein Abu Jabar in Brooke Kroeger, 'The Golan Heights: The Camp David Fear in the Occupied Golan Heights', 10 November 1980, http://brookekroeger.com/the-golan-heights-the-camp-david-fear-in-the-occupied-golan-heights/, accessed 11 August 2012.

五、利庫德年代

1. 利庫德集團平台請見Walter Laqueur and Barry Rubin (eds.), *The Israel–Arab Read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6th edn,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1, 206-7.
2. Arye Naor, *Begin ba'shilton: edut ishit* (*Begin in Power: Personal Testimony),* Tel Aviv: Yediot Aharonot, 1993, 47.（希伯來文）
3. 此會議相關資料請見Eliahu Ben-Elissar, *Lo od milhama (No More War),* Jerusalem: Maariv, 1995, 33-6。（希伯來文）
4. 這早先出版在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Appendix I ('The Dayan-el-Tohami Proto- col, 1977'), 287-90。下面引言出處亦同。
5.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3, 107; also, Uri Dan, *Mivtzha Gomeh* (Operation *Bulrush),* Tel Aviv: Maariv, 1981, 25.（希伯來文）
6. Mohamed Heikal, *Secret Channels,*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6, 256.
7. 此引言與下面數則都來自吉米・卡特給沙達特的一封信，21 October 1977, Declassified E.O.12958, Sec.3.6, Per 4/30/84, NLC-84-1, The Jimmy Carter Library。
8. Eric Silver, 'Begin's Secret Interviews', *The Jerusalem Report,* 21 May 1992.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在以色列備受尊敬。當蘇聯在一九六七年戰爭發生時即與以色列斷交，致使許多東歐國家起而效尤時，羅馬尼亞仍維持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
9. 此引言與下面數則皆來自*Al-Ahram,* 10 November 1977。
10. Transcript of the Dayan-Tohami meeting, private source, note-taker the Mossad agent Yosef Ben-Porath，作者自藏。
11. Ibid.
12. Anwar Sadat, *In Search of Identit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78, 309; also, Ismail Fahmy, *Negotiating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Baltimore,

四、西奈

1. 關於貝都因人迫遷一事，可參照Nahum Barnea, *Davar,* 19 March 1972。（希伯來文）
2. 一九七四到七五年，政府試圖將被疏散的貝都因人安置在永久村莊中，給他們達赫尼亞赫（Dahniah）區的土地，配給用水給他們；三百五十個家庭接受了這個方案。
3. 參見與埃及國務卿之訪談，Saad el-Shazli, Cairo, 28 September 1996, for *The Fifty Years War*，作者自藏。
4. Golda Meir, *My Life: The Autobiography of Golda Meir,* London: Futura, 1976, 377.
5. Henry A.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1973-1977,* Michael Joseph, 1982, 1250-51. 見此書中的協議原文。
6. Matti Golan, *The Secret Conversations of Henry Kissinger: Step-by-Step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Bantam, 1976, 260.
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機密）, 13 August 1974,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DC, 7，作者自藏。
8. Ibid., 3, 7.
9. Ibid., 12.
10. Ibid., 13.
11. Letter from 71 Senators concerning reassessment to President Gerald Ford, 9 December 1974, in the author's archive.
12. Letter from US President Ford to Prime Minister Yitzhak Rabin, 1 September 1975，作者自藏；亦見Donald Neff, 'It Happened in January',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1997。
13. David Hirst and Irene Beeson, *Sadat,* London: Faber & Faber, 1981, 193.
14. Letter from US President Ford to Prime Minister Yitzhak Rabin, 1 September 1975.
15. Donald Neff, 'It Happened in January'.

21. Moshe Dayan, *Story of My Life*, 401-2.
22. *Jerusalem Post*, 24 April 1972.
23. 'Gaza Linked to Israel National Power Grid', *Jerusalem Post*, 27 November 1969.

三、戈蘭高地

1. 此區的牲畜財產包括三萬七千頭牛、一到兩百萬隻山羊和綿羊、一千三百匹馬、七千隻駝獸、二十萬隻雞和七千個蜂巢箱。一九六六年底，果園面積約四萬德南（Dunam，鄂圖曼制度量衡，一德南等於四分之一英畝），其中包括二百七十萬棵果樹，其年產量為兩萬兩千噸各式水果；參見Sakr Abu Fakhr, 'Voices from the Golan',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29, No. 4 (Autumn, 2000), 6。
2. Sakr Abu Fakhr, 'Voices from the Golan', 22.
3. Ibid., 14.
4. Ibid., 11, 15, 18.
5. Ibid., 17.
6. Ibid., 13.
7. 根據敘利亞資訊來源，一九六七年戰爭前夕，戈蘭高地上的居民總數有十三萬五千人。另一資訊顯示有約十三萬人；請參見 Muhammad Muslih, *The Golan: The Road to Occupati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1999。
8. Moshe Dayan, 'Hopeful Truth of the New Reality', *Life,* 29 September 1967.
9. 轉引自Shay Fogelman, 'The Disinherited', *Haaretz,* 30 July 2010。（希伯來文）
10. Sakr Abu Fakhr, 'Voices from the Golan', 12.
11. Ibid., 15.
12. Ibid., 12.
13. Report of the UN Secretary General, GA Resolution 2252 (ES-V); and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37-A/6797, and S/8158, 5.

14. 轉引自Shay Fogelman, 'The Disinherited'。
15. Ray Murphy and Declan Gannon, 'Changing the Landscape: Israel's Gros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Occupied Syrian Golan', Washington DC: Al-Marsad: Arab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Golan, 2008, 27-30.
16. Ibid.
17. *Haaretz,* 12 September 1967（希伯來文）; also 'The Disinherited: Syria's 130,000 Golan Heights refugees', in *Israel Occupation Archive,* 30 July 2010, http://www.israeli-occupation.org/2010-07-30/the-disinherited-syrias-130000-golan-height-refugees/.
18. Shay Fogelman, 'The Disinherited'.
19. Sakr Abu Fakhr, 'Voices from the Golan', 12.
20. Ibid., 23.
21. 此與下面引言皆來自Shay Fogelman, 'The Disinherited'。
22. Reuven Pedatzur, *Nitzachon ha'mevucha,* 110.
23. 關於德魯茲請見Kais M. Firro, *A History of the Druzes,* Leiden: E. J. Brill, 1992。
24. Ray Murphy and Declan Gannon, 'Changing the Landscape', 34.
25. Sakr Abu Fakhr, 'Voices from the Golan', 14.
26. Ibid., 20.
27. Ibid., 30.
2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4 December 1968, XX FRUS, 1964–68, Doc. 339, 62 at 672-3.
29. Yehiel Admoni, *Decade of Discretion,* 25.
30. Michelle Stewart, Nancy Tuohy and Jonathan Molony, *From Settlement to the Shelf: The Economic Occupation of the Syrian Golan,* Washington DC: Al-Marsad, 2009.
31. 'Golan's Capital Turns into Heap of Stones', *The Times,* 10 July 1974, 8.
32. Yehiel Admoni, *Decade of Discretion,* 125.
33. Sakr Abu Fakhr, 'Voices from the Golan', 20.

的胡笙國王傳記中，細緻地報導了以方與國王會晤的內容。

68. Reuven Pedatzur, 'The Allon Plan is Unacceptable'.
69. Gershom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Israel and the Birth of the Settlements 1967-1977,*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6, 164.
70. Reuven Pedatzur, 'The Allon Plan is Unacceptable'.
71. Reuven Pedatzur, 'The Secret Ritual of Hussein's Meetings', *Haaretz,* 6 July 1990.
72. Anwar al-Khatib al-Tamimi, 'Firsthand Account of the Fall of Arab Jerusalem', in http://www.palestine-studies.org/files/pdf/jps/9704.pdf.
73. 轉引自 Gordon Neve, *Israel's Occupation,* 63。
74. 見 www.monde-diplomatique.fr/cahier/procheorient/ rabat74-en 第二段。
75. James Lunt, *Hussein of Jordan,* London: Fontana/Collins, 1990, 253.
76. *The Washington Post,* 19 November 1974.
77. 賈布理從一九四七年以來是希伯崙毋庸置疑的市長，之後也擔任安曼行政首長一段時間。在胡笙國王的要求下，賈布理回到希伯崙擔任市長，在一九六七年戰後數年以色列治下，他的存在抵消了來自巴解組織等國族主義者漸增的影響力，因為後者想要與約旦脫離關係。
78. Shlomo Gazit, *Trapped Fools,* 181.
79. *The New York Times,* 14 April 1976.

二、加薩走廊

1. Yehiel Admoni, *Decade of Discretion*, 43.
2. 艾希柯爾發表於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收錄在 Yehiel Admoni, *Decade of Discretion*, 41.
3. Gershom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46; Yehiel Admoni, *Decade of Discretion*, 41.
4. Gidi Weitz, 'It's Our Defeat', *Yediot Aharonot*, 3 June 2005, 34; Tom Segev, *1967*, 643.
5. 轉引自 Gershom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142。

6. Ibid., 152.
7. 轉引自 Paul Cossali and Clive Robson, *Stateless in Gaza*, London: Zed Books, 1986, 84。
8. *Haaretz*, 25 August 1968.（希伯來文）
9. Sara M. Roy, *The Gaza Strip: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2001, 139.
10. Janet Abu Lughod,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Occupation', in Naseer Aruri (ed.), *Occupation*, 404.
11. Ariel Sharon, *Warrior: The Autobiography of Ariel Sharon*, London: Macdonald, 1989, 250；另見 Nathan Shachar, *The Gaza Strip: Its History and Politics from the Pharaohs to the Israeli Invasion of 2009*, Eastbourne: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0, 80。
12. David Ben-Gurion's diary, 29 January 1960.（希伯來文）
13. 值得一提的是，夏隆在回憶錄中宣稱這是他自己的戰術，但事實上過去已有其他人使用過。例如一九五〇年代阿爾及爾殖民地傘兵團司令馬賽爾・比亞爾（Marcel Bigeard）將軍，廣泛使用這個手段來鎮壓民族解放陣線（FLN），採用烹調詞彙「切丁」（quadrillage）來形容分區監控系統，亦即將一區分割為易於掌控的小部分或「方塊」來削弱敵人戰力。
14. Ariel Sharon, *Warrior*, 251.
15. Phil Reeves, 'Sharon's Return Puts Wreckage Street in Fear', *Independent*, 21 January 2001.
16. Izzeldin Abuelaish, *I Shall Not Hate*, London: Bloomsbury, 2010, 61.
17. 其中七千兩百一十七名來自賈巴雅難民營，四千八百三十六名來自沙提難民營，三千八百零二名來自拉法難民營。見 Sara M. Roy, *The Gaza Strip*, 105。
18. Uzi Benziman, *Sharon: An Israeli Caesar*, London: Robson Books, 1987, 116.
19. David Richardson, 'Last of the Aristocrats', *Jerusalem Post*, 17 May 1985.
20. Anan Safadi and Philip Gillon, 'Gaza after Shawa', *Jerusalem Post*, 27 October 1972.

岸軍政府官員，然後擔任發言人。這段談話發生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36. Shlomo Gazit, *Carrot and the Stick,* 282.
37. 轉引自 Tom Segev, *1967,* 553。
38. Shlomo Gazit, *Carrot and the Stick,* 284-5；另見 Michael Shashar, *Milchemet ha'yom ha'shvi,* 209。
39. Shabtai Teveth, *The Cursed Blessing,* 217.
40. 'Sumud' in David Grossman, *The Yellow Wind,* London: Jonathan Cape, 1988, 158-9.
41. Ibid, 159-60.
42. 見 Shlomo Gazit, *Carrot and the Stick,* 300-303。
43. 轉引自 Tom Segev, *1967,* 553。
44. Nadia Abu-Zahra and Adah Kay, *Unfree in Palestine: Registration, Documentation and Movement Restric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12, 78.
45. Baruch Kimmerling, 'Jurisdiction in an Immigrant-Settler Society: The Jewish and Democratic Stat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5, No. 10, December 2002, 1130-31.
46. David Kretzmer, *The Occupation of Justice: The Supreme Court of Israel and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3.
47. 根據阿里・阿布・沙因（Ali Abu Shaeen）的訪談內容，見 Ahron Bregman and Jihan el-Tahri, *Israel and the Arabs: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TV Books, 2000, 173。
48. 見 B'Tselem, 21 August 1993, 17。
49. 證詞見 B'Tselem, 11 August 1993, 61-2。
50. 資料來源：Ronen Bergman, *Ve'Harashut Netunha (Authority Given),* Tel Aviv: Yediot Aharonot, 2002（希伯來文），原始文件見圖片部分。看來以方搞錯了他的年紀。
51. 'A Doll at the Allenby Bridge' in David Grossman, *The Yellow Wind,* 161.
52. Yigal Allon, 'Israel: The Case for Defensible Borders',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76, 55(1): 44, 41-2. 亞隆後來提出的計畫甚至更為寬廣，長約二十公里，涵括西岸山脈的東面。

53. Yigal Allon, 'Israel: The Case for Defensible Borders', 50.
54. Reuven Pedatzur, 'The Allon Plan is Unacceptable', *Haaretz,* 20 July 1990.（希伯來文）
55. *The New York Times,* 16 August 1967.
56. Shlomo Gazit, *Carrot and the Stick,* 163.
57. Ibid, 152；圖肯來自納布盧斯的望族，以強烈反對以色列佔領聞名。
58. Arie Brown, *Moshe Dayan ve'milchemet sheshet ha'yamim,* 11.（希伯來文）
59. XX FRUS 1964-68, Doc. 320,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srael,* 13 November 1968, 633, 634 and 637.
60. 根據傳奇故事，取名為麥比拉（希伯來文「雙重」之意）是因為這是個雙層洞穴，一層之上還有另一層。也有可能是因為先祖在此成雙成對埋葬，亞伯拉罕和撒拉（Sara）、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利亞等。拉結（Rachel）在伯利恆難產死後，就葬在附近。見創世記二十三章；四十九章二十九至三十二節；五十章七至九節、十二至十四節。
61. Dan Perry, 'Jewish Settlers, Crux of a Deepening Existential Quandary for Israel', *Associated Press,* 15 December 2003.
62. Yehiel Admoni, *Decade of Discretion: Settlement Policy in the Territories 1967-1977,* Tel Aviv: Devir, 1992, 58（希伯來文）；另見 Arie Dayan, 'Gazit: Kiryath Arba was Established Because Dayan was in Hospital', *Koteret Rashit,* 29 May 1985。（希伯來文）
63. Rami Tal, 'Moshe Dayan: Soul Searching', *Yediot Aharonot,* 27 April 1997.
64. 'The Truth about Kiryath Arba Men', *Al Ha'mishmar,* 8 February 1980（希伯來文）；另見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405。
65. Rami Tal, 'Moshe Dayan: Soul Searching'.
66. Ibid.
67. 關於以色列官員與胡笙國王會晤的內容，見 Avi Shlaim, *The Lion of Jordan: The Life of King Hussein in War and Peac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8, 280 and elsewhere. 阿維・施萊姆（Avi Shlaim）在這本精彩

2007, 490-91。

6. Naseer Aruri (ed.) *Occupation,* 128. 一九七一年，猶太屯墾區密佛哈倫（Mevo Horon）就建立在貝特努巴的廢墟之上。依姆瓦斯和雅魯的土地荒廢，到了一九七二年透過加拿大猶太社群（Canadian Jewish community）的捐贈，在該地建起「加拿大公園」（Canada Park）。其他的土地則由鄰近的以色列屯墾區瓜分。
7. 轉引自 Shlomo Gazit, *Carrot and the Stick,* 41。
8. Uzi Narkiss, *Chayal she'l Yerushalaim*（耶路撒冷軍人）, Tel Aviv, 1991, 333.（希伯來文）
9. 轉引自 Tom Segev, *1967,* 482。
10. Interview with Major Eitan Ben-Moshe, *Yerushalaim,* 29 November 1999.（希伯來文）
11. 證詞見 http://www.jpost.com/LandedPages/PrintArticle.aspx?id=64540。
12. Interview with Muhammed Abdel-Haq, 26 September 1999, in Tom Abowd, 'The Moroccan Quart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 *Jerusalem Quarterly File,* no date, 9.
13. Moshe Dayan, *Story of My Life,* London: Sphere Books, 1976, 465.
14. Nadav Shragai, 'Scream Out in Tiny Letters', *Haaretz,* 3 November 2003.（希伯來文）
15. 見 Shlomo Gazit, *Carrot and the Stick,* 198。
16. Nadav Shragai, 'Scream Out in Tiny Letters'.
17. Felner Eitan, *A Policy of Discrimination,* Jerusalem: B'Tselem, the web site of the Israeli Informatio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下稱 B'Tselem）, Report, May 1995, 10.
18. 以下引言轉引自 Nadav Shragai, '26 June 1967: The Government Asks That the Press Refrain from Making a Fuss about the Annexation of East Jerusalem', *Haaretz,* 26 August 2005。（希伯來文）
19. Anwar al-Khatib al-Tamimi (governor of Jerusalem District), 'Firsthand Account of the Fall of Arab Jerusalem', in http://www.palestine-studies.org/files/pdf/jps/9704.pdf.

20. Shlomo Gazit, *Carrot and the Stick,* 183.
21. Letter, 10 July 1967; 請見 Palestinian Academic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ASSIA) Documents 100-101。
22. 哈提卜於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提交的、關於以色列對耶路撒冷採取措施的備忘錄，見 http://www.palestine studies.org/files/pdf/jps/9704.pdf。
23. Shlomo Gazit, *Carrot and the Stick,* 240.
24. Moshe Dayan, *Yoman Vietnam*（越南日記）, Tel Aviv: Dvir, 1977, 138.（希伯來文）
25. 達揚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對軍隊下的指令，見於 Martin Gil bert, *Israel: A History,* London: Black Swan, 2008, 396。
26. 達揚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對軍官下的指令，轉引自 Shabtai Teveth, *The Cursed Blessing: The Story of Israel's Occupation of the West Bank,*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9, 110。
27. Shlomo Gazit, *Trapped Fools: Thirty Years of Israeli Policy in the Territories*（下稱 *Trapped Fools*）, London: Routledge, 2003, 163.
28. 達揚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與巴勒斯坦諸市長會晤內容，作者自藏。
29. 胡笙國王於一九八八年六月七日至九日在阿拉伯國家聯盟的演說中說道，自從以色列於一九六七年奪取西岸、加薩以來，約旦已經支付了西岸一萬八千名以及加薩六千名公務員薪水。這幾年之間，約旦國庫也為在約旦就學的西岸大學生支付學費。
30. Moshe Dayan, *Story of My Life,* 399.
31. 見 Rosemary Sayigh, *Voices: Palestinian Women Narrate Displacement,* http://almashriq.hiof.no/palestine/300/301/voices/Westbank/hajji_fatima.html。
32. Ibid.
33. 刊載在耶路撒冷當地報紙 *Kol Ha'ir*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的訪談內容（希伯來文）。
34. Arie Barun, *Moshe Dayan ve'milchemet sheshet ha'yamim* (*Moshe Dayan and the Six Day War*), Tel Aviv: Yediot Aharonot, 1997, 170.（希伯來文）
35. Michael Shashar, *Milchemet ha'yom ha'shvi* (*The Seventh Day War*), Tel Aviv: Sifriyat Ha'poalim, 1997, 240.（希伯來文）達揚在一九六七年任西

Solution: A Matrix of Control', *Middle East Report*, No. 216, Fall 2000。

9. Shlomo Gazit, *The Carrot and the Stick: Israel's Policy in Judea and Samaria, 1967-68*, (henceforth: *Carrot and the Stick*), Washington DC: B'nai B'rith Books, 1995, 120.
10. Ahron Bregman in conversation with Miriam Eshkol, London, 29 October 1999.
11. Yuval Elizur, 'New Horizons – Also to the Economy', *Maariv*, 13 June 1967（希伯來文）; about objections to the return of Jerusalem see a letter from US President Johnson's envoy, Harry C. McPherson, to the president, 11 June 196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64–1968*, Vol. 19, Doc. 263.
12. Philip Ben, 'Senator Kennedy in New York: "The Arabs must recognise Israel without any preconditions"（阿拉伯人必須無條件承認以色列）', *Maariv*, 12 June 1967（希伯來文）.
13. Shaul Ben Haim, 'Richard Nixon: "Within 4–6 months the Arabs would agree to talks with Israel"', *Maariv*, 25 June 1967（希伯來文）.

關於佔領

1. 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War on Land, The Hague, 18 October 1907; and Fourth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 Persons in Time of War, Geneva, 12 August 1949, both in www.icrc.org.
2. 轉引自Robbie Sabel, The ICJ *Opinion on the Separation Barrier: Designating the Entire West Bank* as 'Palestinian territory', 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2005。（強調處為作者所加）
3. 此議題請參見Meir Shamgar, 'The Observa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Administered Territories', *Israel Yearbook on Human Rights I* (1971), 262-77; also in Meir Shamgar (ed.), *Military Government in the Territories Administered by Israel, 1967-1980: The Legal Aspects*, Vol. I, 1982, 13-59; also, Yehuda Blum, 'The Missing Reversioner: Reflections on the Status of

Judea and Samaria', *Israel Law Review*, 3, 1968, 279-301; also, Stephen M. Boyd, 'The Applic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Israel Yearbook on Human Rights*, I, 1971, 258-61。

4. 'Settlement in the Administered Territories, Meron Memorandum', 14 September 1967, in Iain Scobbie with Sarah Hibbin,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Law: Territorial Issues*, The US/Middle East Project, 2009, 103-4. Original source: Israel State Archives, 153.8/7921/3A. Legal opinion numbered as document 289-91.
5.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252 (ES-V), 4 July 1967; see also UN 35/122A, 11 December 1980, in *Yearbook of the United Nations*, 34 (1980), 430.
6. 'Separate Opinion in the Matter of 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Wall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ICJ Reports' (2004), http://www.icj-cij.org/odcket/files/131/1689.pdf.

一、西岸與耶路撒冷

1.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一八一號決議案，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2. Albion Ross, 'Amman Parliament Vote United Arab Palestine and Trans Jordan', *The New York Times,* 25 April 1950. 亦見 Naseer Aruri (ed.), *Occupation: Israel Over Palestine,* London: Association of Arab-American University Graduates, 1984, 6。
3.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General Census No. 1, *The West Bank of the Jordan, Gaza Strip and Northern Sinai, Golan Heights,* Jerusalem, 1968, 9.（希伯來文）在以色列將二十八個西岸村莊併入耶路撒冷後，一九六七年六月底，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數增加到七萬人。
4. *Memory of the Cactus: A Story of Three Palestinian Villages*，由人權組織阿勒哈克（Al-Haq）攝製的紀錄片。
5. 以下引言轉引自Amos Kenan, *Israel: A Wasted Victory,* Tel Aviv: Devir, 1970, 18-21（希伯來文）；另見Tom Segev, *1967: Israel, the War and the Yea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下稱*1967*）, London: Abacus,

Shlaim, Avi. *Lion of Jordan: The Life of King Hussein in War and Peac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8.

———. *Israel and Palestine: Reappraisals, Revisions, Refutations*. London: Verso, 2009.

Shultz, George P. *Turmoil and Triumph: My Years as Secretary of State*. New York: Scribner's, 1993.

Smith, D. Charles. *Palestine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A History with Documents*. 5th e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Snow, Peter. *Hussein: A Biography*. London: Barrie & Jenkins, 1972.

Sprinzak, Ehud. *The Ascendance of Israel's Radical Rig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Tessler, M. *A History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Teveth, Shabtai. *The Cursed Blessing: The Story of Israel's Occupation of the West Bank*.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9.

———. *Moshe Dayan: The Soldier, the Man, the Legend*. London: Quartet, 1974.

Van Creveld, Martin. *Moshe Daya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4.

Wasserstein, Bernard. *Divided Jerusalem: The Struggle for the Holy Cit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Weizman, Eyal. *Hollow Land: Israel's Architecture of Occupation*. London: Verso, 2007.

Weizman, Ezer. *The Battle for Peace*. London: Bantam Books, 1981.

Wingfield, Martin. *Golan Heights: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Washington, DC: ADC Research Institute, 2010.

Ya'alon, Moshe. *Derech arukah ketzara* (*The Longer Shorter Way*). Tel Aviv: Yediot Aharonot, 2008 (in Hebrew).

Yatom, Dany. *Shutaf sod* (*The Confidant: From Sayeret Matkal to the Mossad*). Tel Aviv: Yediot Aharonot, 2009 (in Hebrew).

Zak, Moshe. *Hussein oseh shalom* (*King Hussein Makes Peace*). Ramat Gan: Bar Ilan University, 1996 (in Hebrew).

註釋

作者誌

1. Eyal Erlich interviewing Ahron Bregman, *Ha'aretz* supplement, 21 February 1988.（希伯來文）
2. Linda Grant, *Still Here*, London: Abacus, 2002.

導論

1. 關於一九六七年戰爭，可參考書籍如Ahron Bregman and Jihan el-Tahri, *The Fifty Years War: Israel and the Arabs*, London: Penguin Books/BBC Books, 1998, part 2, 60-99; Michael B. Oren, *Six Days of War: June 1967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2. 'Military Governors were Appointed to the West Bank, Gaza and the Sinai', *Maariv*, 8 June 1967.（希伯來文）
3. Avi Shlaim, *Israel and Palestine: Reappraisals, Revisions, Refutations*, London: Verso, 2009, 32.
4. E. C. Hodgkin, 'Grim Reports of Repression in Israeli-Occupied Lands', *The Times*, 28 October 1969.
5. Figures are from Baruch Kimmerling and Joel Migdal,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97.
6. Gordon Neve, *Israel's Occupatio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xvii. 關於以色列死傷人數請見 www.mfa.gov.il/MFA/Terrorism.
7. James Joll, *Europe Since 1870*,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viii.
8. 也稱為「控制矩陣」（matrix of control），請見Jeff Halper, 'The 94 Percent

Press, 2008.

Newman, David (ed.). *The Impact of Gush Emunim*. London: Croom Helm, 1985.

Noor, Queen. *Leap of Faith: Memoirs of an Unexpected Lif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3.

Nusseibeh, Sari. *Once upon a Country: A Palestinian Life*. London: Picador, 2008.

Oren, Michael B. *Six Days of War: June 1967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Ovendale, Ritchie.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Wars*. London: Longman, 1992.

Pappe, Ilan.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7.

Pedatzur, Reuven. *Nitzhon ha'mevukhah* (*The Triumph of Embarrassment: Israel and the Territories after the Six-Day War*). Tel Aviv: Bitan/Yad Tabenkin, 1996 (in Hebrew).

Peres, Shimon. *The New Middle East*. New York: Henry Holt, 1993.

———. *Battling for Peace: Memoir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5.

Peretz, Don. *Intifada: The Palestinian Uprising*.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0.

Quandt, William B. *Peace Process: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since 1967*.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Qurie, Ahmed (Abu Ala'a). *From Oslo to Jerusalem: The Palestinian Story of the Secret Negotiations*. London: I. B. Tauris, 2008.

Rabin, Yitzhak. *Pinkas sherut* (*The Rabin Memoirs*). Tel Aviv: Sifriat Ma'ariv, 1979 (in Hebrew).

———. *The Rabin Memoir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9.

Rabinovich, Itamar. *The Brink of Peace: The Israeli–Syrian Negoti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Waging Peace: Israel and the Arabs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Rafael, Gideon. *Destination Peace: Three Decades of Israeli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tein & Day, 1981.

Raz, Avi. *The Bride and the Dowry: Israel, Jordan and the Palestinian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June 1967 Wa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Riad, Mahmoud. *The Struggle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Quartet, 1981.

Ross, Dennis. *The Missing Peace: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Fight for Middle East Peac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4.

Rubinstein, Danny. *Mi lashem elai: gush emunim* (*On the Lord's Side: Gush Emunim*). Tel Aviv: Ha'kibbutz Ha'me'uhad, 1982 (in Hebrew).

Sadat, Anwar. *In Search of Ident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Said, Edward. *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 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on, 1969–1994*.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4.

———. *Peace and Its Discontents: Gaza–Jericho, 1993–1995*. London: Vintage, 1995.

Savir, Uri. *The Process: 1,100 Days That Change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Sayigh, Yezid.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Schiff, Ze'ev and Ehud Ya'ari. *Intifada. The Palestinian Uprising: Israel's Third Fron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0.

Seale, Patrick. *Asad: 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East*.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Segev, Tom. *1967: Israel, the War and the Yea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 London: Abacus, 2007.

Shamir, Yitzhak. *Summing Up: An Autobiograph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4.

Sharon, Ariel. *Warrior: The Autobiography of Ariel Sharon*. London: Macdonald, 1989.

Sher, Gilea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Negotiations, 1999–2001*. Abingdon: Routledge, 2006.

Routledge, 2003.

Golan, Galia. *Israel and Palestine: Peace Plans and Proposals from Oslo to Disengage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Golan, Matti. *The Secret Conversations of Henry Kissinger: Step-by-Step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Quadrangle/*The New York Times*, 1976.

———. *Shimon Peres: A Biograph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2.

Gorenberg, Gershom. *The Accidental Empire: Israel and the Birth of the Settlements, 1967–1977*.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2006.

Grossman, David. *The Yellow Wind*. London: Jonathan Cape, 1988.

Halevy, Efraim. *Man in the Shadows: Inside the Middle East Crisis with the Man Who Led the Mossa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6.

Haloutz, Danni. *Begovah ha'einayim* (*Straightforward*). Tel Aviv: Yediot Aharonot, 2010 (in Hebrew).

Hart, Alan. *Arafat: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Sidgwick & Jackson, 1994.

Hefez, Nir and Gadi Bloom. *Ha'roeh: sipur chayav shel Ariel Sharon* (*The Shepherd: The Life Story of Ariel Sharon*). Tel Aviv: Yediot Aharonot, 2005 (in Hebrew).

Herzog, Chaim. *The Arab–Israeli Wars: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2.

Hirst, David. *The Gun and the Olive Branch: The Roots of Violence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Faber & Faber, 1977.

Hirst, David and Irene Beeson. *Sadat*. London: Faber & Faber, 1981.

Hroub, K. *Hamas: Political Thought and Practice*. Beirut: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2000.

Hunter, Robert. *The Palestinian Uprising*.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Indyk, Martin. *Innocent Abroad: An Intimate Account of American Peace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Khalidi, Rashid. *The Iron Cage: The Story of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for Statehoo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Kimmerling, Baruch and Joel Migdal.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Kissinger, Henry.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 *Years of Upheaval, 1973–1977*.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82.

Kliot, Nurit and Shemuel Albeck. *Sinai: anatomia shel prida* (*Sinai: Anatomy of a Settlement's Evacuation*). Tel Aviv: Defence Ministry Press, 1996.

Laqueur, Walter and Barry Rubin (eds.). *The Israel–Arab Read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6th ed.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1.

Lochery, Neil. *The Difficult Road to Peace: Netanyahu, Israel and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Reading: Ithaca Press, 1999.

Lunt, James. *Hussein of Jordan*. London: Fontana/Collins, 1990.

Makdisi, Saree. *Palestine Inside Out: An Everyday Occup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2010.

Makovsky, David. *Making Peace with the PLO: The Rabin Government's Road to the Oslo Accor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6.

Ma'oz, Moshe. *Palestinian Leadership on the West Bank: The Changing Role of Arab Mayors under Jordan and Israel*. London: Frank Cass, 1984.

Markus, Yoel. *Camp David: ha'petach le'shalom* (*Camp David: The Road for Peace*). Tel Aviv, 1979 (in Hebrew).

Miller, D. Aaron. *The Much Too Promised Land: America's Elusive Search for Arab–Israeli Peace*.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09.

Milton-Edwards, Beverley. *Islamic Politics in Palestine*. London: I. B. Tauris, 1996.

Morris, Benny.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981–1999*. London: John Murray, 1999.

Naor, Arye. *Begin ba'shilton: edut ishit* (*Begin in Power: A Personal Testimony*). Tel Aviv: Yediot Aharonot, 1993 (in Hebrew).

Naveh, Dan. *Sodot memshala* (*Executive Secrets*). Tel Aviv: Yediot Aharonot, 1999 (in Hebrew).

Neve, Gordon. *Israel's Occupatio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truggle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Bowen, Jeremy. *Six Days: How the 1967 War Shaped the Middle East.* London: Simon and Schuster, 2003.

Breger, Marshall and Ora Ahimeir (eds.). *Jerusalem: A City and Its Future*.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Bregman, Ahron. *A History of Israe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 *Elusive Peace: How the Holy Land Defeated America.* London: Penguin, 2005.

———. *Israel's Wars: A History since 1947*. London: Routledge, 2010.

Bregman Ahron and Jihan el-Tahri. *The Fifty Years War: Israel and the Arabs*. London: Penguin Books/BBC Books, 1998.

Brzezinski, Zbigniew.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3.

Bush, George W. *Decision Points*. London: Virgin, 2010.

Carter, Jimmy.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London: Collins, 1982.

Cheshin, Amir, Bill Hutman and Avi Melamed. *Separate and Unequal: The Inside Story of Israeli Rule in East Jerusale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Clinton, Bill. *My Life*. London: Hutchinson, 2004.

Cobban, Helena.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eople,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Corbin, J. *Gaza First: The Secret Norway Channel to Peace between Israel and the PLO*. London: Bloomsbury, 1994.

Dan, Uri. *Mivtzha Gomeh* (*Operation Bulrush*). Tel Aviv: Maariv, 1981 (in Hebrew).

Dayan, Moshe. *Diary of the Sinai Campaign*. London: Sphere Books, 1967.

———. *Avnei Derekh: otobiographia* (*Milestone: An Autobiography*). Tel Aviv: Yediot Aharonot, 1976 (in Hebrew).

———. *Story of My Life*. London: Sphere Books, 1976.

———. *Breakthrough: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Egypt–Israel Peace Negotiation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1.

Drucker, Raviv. *Harakiri: Ehud Barak be'mivchan ha'tozaha* (*Harakiri. Ehud Barak: The Failure*). Tel Aviv: Yediot Aharonot, 2002 (in Hebrew).

Drucker, Raviv and Ofer Shelah. *Bumerang: kishalon ha'manhigut ba'intifada ha'shniya* (*Boomerang*). Tel Aviv: Keter, 2005 (in Hebrew).

Dumper, Michael. *The Politics of Jerusalem since 196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Eban, Abba. *An Autobiograph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8.

———. *Personal Witness: Israel through My Eyes*. New York: Putnam's, 1992.

Efrat, Elisha. *Geographya shel kibosh* (*Geography of Occupation: Judea, Samaria and the Gaza Strip*). Jerusalem: Carmel Press, 2002 (in Hebrew).

Eldar, Akiva and Idith Zertal. *Adonei ha'aretz: hamitnahalim umedinat yisrael, 1967–2004* (*Lords of the Land: The Settlers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1967–2004*). Kinneret: Zmora-Bitan, 2004 (in Hebrew).

Enderlin, Charles. *The Lost Years: Radical Islam, Intifada, and Wars in the Middle East 2001–2006*. New York: Other Press, 2007.

Fahmy, Ismail. *Negotiating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Farid, Abdel Majid. *Nasser: The Final Years*. Reading: Ithaca Press, 1994.

Finkelstein, G. Norman. *The Rise and Fall of Palestine: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Intifada Years*.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Finklestone, Joseph. *Anwar Sadat: Visionary Who Dared.* London: Routledge, 1996.

Fisk, Robert. *The Great War for Civilisation: The Conquest of the Middle East*.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5.

Freedman, Lawrence. *A Choice of Enemie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8.

Gazit, Shlomo. *The Carrot and the Stick: Israel's Policy in Judea and Samaria, 1967–68*. Washington DC: B'nai B'rith Books, 1995.

———. *Trapped Fools: Thirty Years of Israeli Policy in the Territories*. London:

參考書目

Abbas, Mahmoud. *Through Secret Channels*. Reading: Garnet, 1995.

Abu Sharif, Bassam. *Arafat and the Dream of Palestine: An Insider's Accou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Abuelaish, Izzeldin. *I Shall Not Hate: A Gaza Doctor's Journey on the Road to Peace and Human Dignity*. London: Bloomsbury, 2011.

Aburish, Said. *Arafat: From Defender to Dictator*. London: Bloomsbury, 1998.

Albright, Madeleine. *Madam Secretary: A Memoir*. London: Macmillan, 2003.

Arens, Moshe. *Broken Covenan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risis between the US and Israel*.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5.

Arieli, Shaul and Michael Sfard. *Choma u'mechdal* (*The Wall of Folly*). Tel Aviv: Yediot Aharonot, 2008 (in Hebrew).

Ashrawi, Hanan. *This Side of Peace: A Personal Accoun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5.

Baker III, James A. *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 Revolution, War and Peace 1989–1992*. New York: Putnam's, 1995.

Beilin, Yossi. *Touching Peace: From the Oslo Accord to a Final Agreemen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9.

———. *The Path to Geneva: The Quest for a Permanent Agreement, 1996–2004*. New York: RDV/Akashic, 2004.

Ben-Ami, Shlomo. *Scars of War, Wounds of Peace: The Arab–Israeli Traged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5.

Ben-Elissar, Eliahu. *Lo od milhama* (*No More War*). Jerusalem: Maariv, 1995 (in Hebrew).

Boutros-Ghali, Boutros. *Egypt's Road to Jerusalem: A Diplomat's Story of the*